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汇添富基金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戈尔康达往事

——1920~1938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

Once in Golconda:

A True Drama of Wall Street 1920 - 1938

[美] 约翰·布鲁克斯 著
(John Brooks)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戈尔康达往事

——1920~1938 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

[美] 约翰·布鲁克斯 著
(John Brooks)

李 晟 李泽民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尔康达往事：1920～1938 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美)布鲁克斯(Brooks, J.)著；李晟，李泽民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8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Once in Golconda: A True Drama of Wall Street 1920—1938

ISBN 978-7-5642-0251-4/F·0251

I. 戈… II. ①布… ②李… ③李… III. 资本市场-经济史-美国-1920～1938 IV. F83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989 号

☐ 责任编辑 史亚仙
☐ 封面设计 未 名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GEERKANGDA WANGSHI

戈尔康达往事

——1920～1938 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

[美] 约翰·布鲁克斯 著
(John Brooks)
李 晟 李泽民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宝山葑村书刊装订厂装订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5.5 印张(插页:2) 253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3.00 元

图字：09-2007-294 号

Once in Golconda : A True Drama of Wall Street 1920 — 1938

John Brooks

Copyright © 1969 John Brooks

Foreword © 1997 Tad Crawfo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
SIA.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
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copyright ©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2008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拨动琴弦
唱一首经典
资本脉络
在伦巴第和华尔街坚冷的墙体间，仍然
依稀可见



千百年后
人们依然会穿过泛黄的书架
取下
这些书简
就像我们今天，怀念
秦关汉月
大漠孤烟
.....

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丛树海

编委会执行主任

张 晖 林 军

编 委

黄 磊	袁 敏
韩贤旺	钱 慧
于凌波	刘劲文
魏小君	王 波
曹翊君	郭 君
金德环	田晓军
柳永明	骆玉鼎
周继忠	崔世春

策 划

黄 磊 钱 慧

总 序

“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大时代，无数投资人渴望着有机会感悟和学习顶尖投资大师的智慧。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素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有句名言：成功的捷径是与成功者为伍。（It's simple to be a winner, work with winners.）

向成功者学习是成功的捷径，向投资大师学习则是投资成功的捷径。

巴菲特原来做了十年股票，当初的他也曾经到处打听消息，进行技术分析，买进卖出做短线，可结果却业绩平平。后来他学习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之后，投资业绩很快有了明显改善，他由衷地感叹道：“在大师门下学习几个小时的效果，远远胜过我自己过去十年里自以为是的天真思考。”

巴菲特不但学习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还进一步吸收了费雪的投资策略，将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称自己是“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费雪”。巴菲特认为这正是自己成功的原因——“如果我只学习格雷厄姆一个人的思想，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富有。”

可见，要想投资成功很简单，那就是：向成功的投资人学投资，而且要向尽可能多的杰出投资专家学投资。

源于这个想法，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携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这套“汇添富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在本套丛书的第一辑里，我们为您奉献了《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攻守兼备——积极与保守的投资者》、《价值平均策略——获得高投资收益的安全简便方法》、《浮华时代——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简史》、《忠告——来自 94 年的投资生涯》、《尖端时刻——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人的投资经验》、《战胜标准普尔——与比尔·米勒一起投资》、《伟大的事业——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分析》这八本讲述国外金融市场历史风云与投资大师传奇智慧的经典之作。而在此次第二辑中，我们还将向您推荐八本同样具有震撼阅读效应的经典投资著作。

本辑丛书不乏投资大师现身说法的传世之作。其中的《投资存亡战》一书作者杰拉尔德·勒伯被称为“华尔街奇才”。该书以投资感悟入手，生动介绍了市场时机选择、资产配置、套期保值损失、股票组合调整等成功投资者需要了解的基本原则。该书笔调幽默、涵盖面广、可读性较强，杰拉尔德·勒伯作为一名华尔街股票经纪商，拥有 40 多年的从业经验，其建议中肯且切实有效，值得广大投资者借鉴。该书初版于 1935 年，并于 1936 年、1937 年、1943 年、1952 年、1953 年、1954 年、1955 年、1956 年、1957 年、1965 年和 1996 年进行了重版。《黄金简史》作者则为享誉全美的大师级投资顾问彼得·伯恩斯坦，他的书脍炙人口，《与天为敌》等在国内出版以来，受到广泛的引用与关注。该书叙述了自古以来，直到现代的黄金市场投资的全过程，是市场上关于黄金交易起源及其发展的一本最好的读本！该书详尽分析的黄金投资作为我国一新兴的投资品种，目前正方兴未艾，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切合市场脉动、满足市场的需求。丛书中的《华尔街的扑克牌》，通过扑克牌原理来完美地比喻投资行为和华尔街生活，向读者展示了风险和回报的真正意义。该书作者基于对金融心理学、博弈论和扑克牌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揭示了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中所存在的具有相似性的高技巧工作和应该避免的危险性行为。该书语言诙谐幽默、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本辑丛书中的另一本《标准普尔选股指南》则将为读者不遗余力地阐释投资工具的运用和策略。该书解释了如何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和投资风格，以归纳出不同的投资想法，在这当中，可以使用的筛选方式有很多。新手投资人可以选择比较简单的筛选工具，另外也有很多较深入的筛选工具可供专业的投资组合经理使用。该书前几个章节主要讨论什么是筛选流程，以及讨论到哪里能找到适合的筛选工具，并一一检视筛选流程的优势和劣势；此外，该书也介绍了有哪些财务资



料可供筛选器使用。接下来作者还将告诉你如何筛选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该书将举出许多筛选作业的例子，并解释筛选流程中常用的一些主题。同时作者也试图通过该书让投资人了解，在列出股票和其他投资标的的清单后应该进一步采取哪些步骤。在该书的后几个章节中，还将会讨论如何针对股票筛选结果进行逆向工程。最后作者将与你讨论未来的筛选趋势，以及筛选流程是如何使你成为一个更有知识、更为成功的投资人。

本辑丛书还为读者展示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顶级金融市场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华尔街五十年**》以作者自己在华尔街耳闻目睹和许多亲身经历，用鲜活语言史料翔实地再现了自 1857 年开始到 1907 年发生的历次恐慌真实情况，并披露了著名“黑色星期五”的史实本末，揭开了对于华尔街发展和转型极其重要的历次重大垄断案的内幕。该书初版于 1908 年，2006 年由国际著名出版商约翰·威利公司再版。如果读者阅读了《**戈尔康达往事——1920~1938 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就可以全面了解华尔街在战争期间惊人崛起、全然崩溃和痛苦新生的生动编年史。通过聚焦于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交易商、银行家、跟风者和诈骗者的生活与经历，作者约翰·布鲁克斯描绘了鲜活的生活场景：20 世纪 20 年代牛市无情、贪婪、蛮勇和轻率的欣喜，1929 年大崩盘前的绝望，以及之后几年间的苦难。布鲁克斯以权威、充满神韵和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将华尔街从美国贵族的宫殿圣地变成平民场所的各种力量角逐。虽然该书首次出版于 1969 年，但这则极富吸引力的故事探究了对当代投资者深具意义的永恒主题。该书于 1972 年、1997 年、1999 年重版。在另一本《**铁血并购——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中，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详细介绍了美国历史上 10 起并购案，并且理性分析了这些案例之所以成败的动机。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该书中强调了并购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因素，这种综合性的理解无疑为我国企业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市场并购将愈来愈多地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相信该书的推出，会有很好的市场预期。《**先知先觉——如何避免再次落入公司欺诈陷阱**》一书则是针对公司诈骗而对投资者的警示之作，为读者揭开了资本市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书中列出了 8 个投资者应当尤其警惕的方面，涉及超乎寻常的业绩报告、家族企业、有不良历史纪录的首席执行官、收购狂热、庞杂的组织结构、会计欺诈、怀疑论调及过度关注股价。作者盘点了发生在 20 世纪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欺诈事件，正如其所言，历史总会重

演,而该书的写作宗旨正在于提醒投资者不再为天花乱坠的报表、夸夸其谈的企业家和一时飙升的股价等所蒙蔽。

投资者也许会问:我们向投资大师、投资历史学习投资真知后,如何在中国股市实践应用大师们的价值投资理念?

事实永远胜于雄辩。中国基金行业从创立至今始终坚持和实践价值投资与有效风险控制策略,相信我们十年来的追求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基金行业成立十年来的投资业绩充分表明,在中国股市运用价值投资策略同样是非常有效的,同样能够显著地战胜市场。2005、2006 和 2007 年我们旗下基金的优秀业绩,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价值投资最基本的安全边际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坚守价值投资,肯定会有良好的长期回报。

其次,我们的经历还表明,在中国股市运用价值投资策略,必须结合中国股市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勇于创新。事实上,作为价值型基金经理人的彼得·林奇,也是在反思传统价值投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业绩的。

最后,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比巴菲特、彼得·林奇等人更加幸运的是,我们有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我们有一个经过改革后基本面发生巨大变化的证券市场,我们有一批成长非常快速的优秀上市公司,这将使我们拥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不断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中国基金行业必将能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较好投资回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十余年前,当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阅读过大量海外经典投资书籍,获益匪浅。今天,我们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起,精挑细选了上述这些书籍,力求使投资人能够对一个多世纪的西方资本市场发展窥斑见豹,有所感悟;而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亦可为我所鉴,或成为成功投资的指南,或成为风险教育的反面教材。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本辑资本译丛出版之际,国内证券市场正经历着一场由春入夏的颇为剧烈的阵痛。“辉煌源于价值,艰巨在于漫长。”对于投资者来说,注重投资内在价值,精心挑选稳健的投资



品种,进行长期投资,将会比费尽心机去预测市场走向、揣测指数高低更为
务实和有意义得多。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站在东方
大国崛起的高度,何妨看淡指数,让自己的心态从容超越股市指数的短期
涨跌,让我们一起从容分享中国资本市场的美好未来。在此,汇添富基金
期待着与广大投资者一起,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基金业的不断发展
发展,迎来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张 晖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08年8月8日

戈
尔
康
达
往

总
序

前 言

《戈尔康达往事》是一本经典著作，每位读者，尤其是股市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受益匪浅。这本 1969 年初版的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20 世纪 20 年代牛市时期华尔街的魔幻岁月，以及 1929 年股市崩盘及余波之后的艰难时期。即便是在那个年代，这些故事也显得遥远而富于传奇色彩。约翰·布鲁克斯将道一琼斯指数的涨涨跌跌编写成了一个有关人类梦想和幻想的故事。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纽约证交所总裁及证交所保守派的首领。他一定是一个勇敢、无情抑或心智不健全的人。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股市崩溃，惠特尼在试图阻止恐慌的过程中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出现在证交所交易厅，代表一个由美国大银行家组成的联盟，买入了价值 2 000 万美元的股票。然而，这位英雄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投资一些“浩渺的蓝色远方”式的股票，并因而身负巨额债务(到 1932 年，他的净负债至少达 200 万美元)。1937 年，他挪用了纽约证交所退休补助基金(这是为过世会员的家庭设立的一只共同基金)的大量资产。是什么令惠特尼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难以理解，但是，没有人比他更能代表股市的起伏、保守派以及证交所这个机构。

《戈尔康达往事》描写了令人着迷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股市轶事，并实事求是地透视了当今股票交易规则的由来(尤其是新政改革者是如何通过《1933 年证券法案》和《1934 年证券交易法案》的)。尽管如此，如果这本书

没有让我们一窥自己内心渴望快速致富的牛市梦想的话，那么，它对当代读者来说就无甚意义。就这一点来说，布鲁克斯的故事具有警示意义，正如其标题“戈尔康达往事”所强调的。戈尔康达曾是印度东南部的一座城市，传说穿过这座城市的人，都会变得富有（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或 90 年代大部分时候的华尔街）。在马可波罗的年代，戈尔康达是世界大型钻石市场之一。戈尔康达附近的钻石矿出产了希望钻石、凯瑟琳大帝的黑色奥若美和英国王室的皇冠钻石。这些熠熠生辉的财富造就了许多王国，也毁灭了许多王国。今天，戈尔康达已是一片废墟，这象征着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对财富的渴望和我们实际所掌握的财富都是暂时的。

从人类心理上来说，戈尔康达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它是一个神奇的传说，也可能是我们从晨报金融版的新闻中所获得的希望。利润猛增、1：2拆股、新产品公告、就任 CEO——这一切和另外许多事情都包含着我们对财富和未来幸福的梦想。当我们思考理查德·惠特尼这个人或其他许多渴望财富却最终一无所有的人时，我们不由得想知道是什么使他如此坚定。是什么令他如此确信佛罗里达腐质煤公司、美国胶质产品公司和蒸馏酒公司会成为赢家？或者，在失去了这么多后，他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冒险，结果却输得更多？

问这些问题是为了弄清楚我们的财富梦，尤其是快速致富梦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冷静成熟能让我们即便在欣欣向荣的牛市中也理性投资？如果股市下挫——某些股票分析师称之为“修正”，似乎先前的上涨纯粹是因为技术错误而非群起抢购——什么样的智慧能让我们摆脱担心失去或担心拥有得不够多的群众心理？即便是财富也阻挡不了这些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源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担心或欣喜而有所改变。但是，目睹着财富逐渐减少，我们投资的愿望会减小，而利润和股价则会加速下跌。

“牛市心理”和“熊市心理”是最常被用来描述股市投资者心理的词语，但是很少有人能圆满地解释这种用法的起源。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为什么牛和熊代表着股市和人类心理的两种不同力量，那么，我们可能会以更敏锐的洞察力，更镇定自若地参与股市。在《金钱的秘密》中，我探寻了牛和熊与股市心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和神话原因。举例来说，“股市”（stock market）一词代表着出售牲口（livestock）的地方。因此，“割肉”（taking a cut）和“掺水股”（watered stock，也解释为出售前灌以盐水的牲



口。——译者注)这样的词就带有那个以牲口为主要财产形式的时代的特征。“动产”(chattel)一词意为可移动的财产,与“牛”(cattle)密切相关;“金钱的”(pecuniary)一词则来源于拉丁语中的“牲口”(pecus)。

当然,如今很少有人会与牛有接触,因此,我们难以理解牛对过去的人们或许多生活在工业不发达地区的人们的重要性。一头公牛能让牛群中所有的母牛怀孕,因此,长期以来,牛不仅象征着力量,也象征着多产。早期的很多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都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础,每种文明都以牛神为其主神之一。

在印度,雅利安人唱着赞歌膜拜众多牛神,其中包括巨牛因陀罗(Indra),他的雨能够使大地肥沃、牛群受孕。古老的闪族人崇拜牛神恩利尔(Enlil),他驾驭水的力量使他成为了风暴和繁殖之神。埃及人这样称颂阿蒙—拉(Amen-Ra)神:“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城,在今开罗的北部,曾是古埃及太阳神的朝圣中心。——译者注)的公牛,众神的统领……神灵之父,人类之创造者,兽群牲畜之创造者,万物之主宰,食物之创造者……”从克利特岛到迦太基,对牛的崇拜跨越了地中海地区。从宗教形象回看股市,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牛象征着对股市上涨的希望。崇拜牛就是崇拜富饶和多产。

那些仔细审查账本底线的投资者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体内蕴藏着神牛的力量。趋势线、价格收益比率、资产清算价值是有用的工具,但却会令我们看不清社会为发展和繁荣采取的大举措。当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关注股价的起起伏伏时,我们可能会忘记股市反映的是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股票和金钱一样,只是繁荣和共享大进程中的工具。沉迷于个人成功的牛市投资者可能会认为只有股市的增长才有价值。但是,我们如果拥有开阔的眼界,就会发现我们还必须尊崇其他许多必要价值。我们必须记住,股市体现了我们对富饶的渴望、对贡献家庭和社会的渴望。要拥有这样宽广的眼界,我们必须将牛和熊做个对比。

对熊的崇拜也同样历史悠久、广为流传。尼安德特人将熊的头骨安放在可能是祭坛的地方,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一种祭拜。许多狩猎部落都会举行仪式,以保证被杀死的熊的灵魂会希望回到世间、被再次捕猎。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熊通常是英雄的灵魂帮助者。根据神话,熊的冬眠意味着走入地下,在大地深处自我休养,在春天到来时获得重生。熊就像勇于闯入地狱、闯入未知世界的人类英雄。膜拜牛是以牛为祭品,使

大地复兴。而熊每年春天都会从地底深处走出来获得新生——熊不必成为祭品。

认为熊市投资者只相信股票或股市会下跌，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深刻理解成为一名熊市投资者的意义。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熊市投资者真正关注的是自然世界，我们无法通过耕耘开垦来驯服这个世界，令其为我所用。熊市投资者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时必须要保守，必须要将从牛市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再循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熊是一位医者，他要求我们控制自己无尽的欲望，转而追求和获取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像熊一样退出，耐心等待，默默思考，同时又保持警惕，直到重生的季节来临。

想到股市的循环周期，我们脑中就出现一幅自左向右的波动曲线图。曲线的高度代表市场的价值，曲线的向右运动代表时间的流逝。但是，让我们将股市的循环周期想象成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这将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意识曲线。在某一层面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参与股市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或输钱；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可能会发现，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供他人使用是有益处的；而在另一个不同的层面上，我们可能会发现，与自己的天性作斗争，将使我们发挥出更多的潜能。因此，深入理解牛市和熊市的意义，是对我们自己的投资，让我们能够更镇定地面对这个由我们创造、服务于我们的股市。

泰德·克劳福德
(Tad Crawford)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戈尔康达往事

——1920~1938 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

戈尔康达曾是印度东南部的一座城市，
传说穿过这座城市的人，
都会变得富有。
但现在，那里已是一片废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华尔街，
也有类似的传说。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序幕：暴行	1
第二章 股市专制	16
第三章 几近贵族	32
第四章 与猿猴如此相像	51
第五章 土崩瓦解	67
第六章 白衣骑士现身	90
第七章 摇摇欲坠的金本位	114
第八章 华盛顿磨难	137
第九章 白衣骑士落马	159
第十章 形势恶化	174
第十一章 大灾难	189
第十二章 结局	205
致谢	219
资料来源	220

第一章 序幕：暴行

1920年9月16日，星期四，圣三一教堂的大钟刚敲过正午12:00，曼哈顿地区怡人的秋色（天气晴朗，气温21摄氏度，股市也略有上涨）突然被一阵巨大的、毁灭性的爆炸声震得支离破碎。爆炸声是从华尔街上传出的，具体位置在华尔街和布罗德（Broad）街交叉口东面几码的地方，位于摩根公司的大理石大厦和全新的美国鉴定局围栏正门之间，那里不论是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都是美国和全球的金融中心。一股巨大的青烟在这一地区笼罩了好几分钟。爆炸点燃了街边大楼12层以下的遮阳篷，震碎了附近的每一扇窗户，就连半英里以外的一些窗户也难逃厄运。数以百计散弹般的小铁片飞溅到各处，据事后调查，这些小铁片可能是吊窗锤的碎片。坐落在华尔街23号、十字路口东南角的摩根大厦，其庄严的表面变得斑斑点点，北面的窗户全部破碎，大量的玻璃碎片落到了下面的银行楼内，砸在那里的人们身上。华尔街北侧、国库分库旁边那些保护着鉴定局的结实围栏也被炸弯了；但是，鉴定局大楼的内部却基本逃过了一劫，因为这座大楼原本是被设计成一座堡垒的。爆炸冲击了华尔街圣三一教堂的地基，但不知是因为奇迹还是巧合，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圣三一教堂距离爆炸点仅一个街区之遥，位于教堂侧翼、古老而著名的墓地中埋葬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遗骨。如果圣三一教堂哥特复兴式的尖顶倒塌的话，其后果将等同于摩根大厦被损毁，象征着局势的混乱。

布罗德街上的纽约证交所，地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交叉口西南角的附近。证交所内数以百计的经纪人和交易者听到爆炸声后，争先恐后地涌向交易厅的中心，试图躲避厅内巨大的窗户被震碎后掉落下来的玻璃。但是，就像是从锡拉巨岩逃到卡律布狄斯漩涡一般，他们又面临着巨大玻璃穹顶坍塌的毁灭性威胁。所幸的是，穹顶并未坍塌。美国信孚银行的西北角，碎玻璃像狂风中的落叶一般飞旋，有一块铁片呼啸着穿过了总裁斯沃德·普罗塞尔(Seward Prosser)办公室的窗户，再差几英寸就会击中普罗塞尔的头部。

其他人就没有普罗塞尔那么幸运了。30人在爆炸中当场死亡，300余人受伤，其中10人不治身亡。但是，罹难者中没有金融巨头或高级官员，他们都和普罗塞尔一样幸运，如有神佑。华尔街最著名的人物、权力的象征——J. P. 摩根(J. P. Morgan)此时正在英国的乡村小屋里度假。他的5位合伙人在爆炸发生时都在场，但除了摩根的儿子朱尼厄斯(Junius)受了轻伤外，其余人均安然无恙。30名当场死亡的人之中，没有经纪业的合伙人，也没有银行高级经理，只有1人被确认为经纪人。其余大部分死难者都是华尔街的侍从或低职位者，年轻、年老的都有，包括速记员、书记员、簿记员、传信员和搬运工，为了早些吃上午餐，他们在不恰当的时候比往常提前了一两分钟走出大楼。死难者中有3人是妇女，4人是十几岁的书记员或传信员，1人是25岁的年轻银行家，还有1人是68岁的退休商人。骚乱中损失的证券价值微不足道，至于两三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大厦所有者或保险公司也可以轻松承担。不管这次爆炸意味着什么，华尔街的权威并未受损。

二

1920年时，华尔街成为世界首要的货币中心才不过6年左右。它的成功是在最令人感到丢脸的情况下获得的——它不战而胜，在它仰面平

躺、大口喘气的时候成功就从天而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伦敦充当着整个世界的银行家，操纵着全球的货币业务；大型美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金往往是从伦敦或从欧洲大陆经伦敦获得的，而仅在美国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华尔街，在国际业务中主要充当美国公司与跨大西洋资本之间的经纪人。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前几周，英国实行了一项震惊世界的措施：暂停用黄金兑换英镑——在金本位盛行全球的时期，这一举措就好比玩纸牌游戏时最令人敬畏、最受信赖的玩家突然宣布退出游戏，并拒绝兑换筹码。随后，英国财政部做出了禁止一切海外投资的决定。由此，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承认的那样，放弃金本位意味着“暂时放弃我们作为国际货币中心所享有的历史权利”，不可避免地使“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国际业务转移到了……美国”。伦敦《泰晤士报》毫不留情地宣布，美国“有能力承担这些业务”。

如果说美国确实有能力的话，那也只是勉为其难。英国在美国金融界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英国的退出使得华尔街近乎瘫痪，就好像费城或底特律已经参战似的。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纽约证交所的股票病态大跌；从第二天开始，证交所暂停交易，时间长达近9个月，而在此前的历史上，证交所连续关闭的时间从未超过10天。此外，纽约银行界也几近恐慌。在国际商务中，美国商人都是净债务人，债务总额超过30亿美元，而债权人则几乎都来自于参战的欧洲国家；这些债权人不仅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还根据战争时期债权人的悠久传统，要求他们用黄金偿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惊慌失措的银行储户纷纷涌到银行提款，事态因而进一步恶化。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周内，美国银行流失了大量资金，局势几乎变得和1907年金融大恐慌时期一样动荡不安。那年秋天，黄金以惊人的速度从国库中流出，其中大部分经加拿大流到了伦敦。美国国内的商业遭受了冲击，对外贸易也由于德国军队对海上通道的监控而停止，华尔街几乎成了一座鬼城——银行朝不保夕，证交所和经纪事务所停业，只有少数“非法经纪人”违抗证交所的命令，在新街维持着一个“非法”的露天股票交易市场，在那里，他们以惊人的价格买卖少量股票。这就是全球金融界的新赢家。

但是，华尔街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非但没有因战争而破产或毁灭，反而起到了为战争提供资金和补给的作用。1914年11月，黄金外流开始减缓，12月停止，到1915年1月，黄金开始反向流入美国。证交所在1915年4月恢复了正常交易。美国对协约国的贷款额



不断增加,眼看就要达到数十亿美元;美国的出口贸易以战争补给品为主,还包括大量食品、饲料和棉花,一直到 1917 年,这些贸易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同时,欧洲国家即便不用黄金购买枪支,也会将黄金运往纽约保管。1915 年初的这一小股黄金流在 1 年左右的时间内变为一股洪流,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入美国;1916 年 3 月这一个月,美国的黄金输入量就几乎达到了过去一整年的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的财富似乎一夜之间从一家银行转移到了另一家银行——而且不是暂时性的转移,因为到 1925 年英国终于有能力恢复黄金兑换之时,她已经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到 1920 年,华尔街承担起过去属于伦敦的业务已经绰绰有余了。1 年半以来,美国主要通过内部销售债券的方式,筹资参与战争,她已经从一个 30 亿美元的国际债权人摇身变成了 30 亿美元的债务人。美国国库坐拥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货币黄金供应量的 $1/3$ 。战后的全国性萧条如期而至,但没有原先预计的那么糟糕,没有出现公司纷纷破产倒闭、随处可见领取救济的队伍的情况。华尔街甚至在无意之中从战争中赢得了大批新客户——因购买自由公债而对投资保有长久兴趣的公民。华尔街稳坐江山,但是仍然缺乏它那没落的前任所拥有的帝王般的自信。

在应对 1920 年 9 月 16 日中午的爆炸事件之时,这种自信的缺失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

自然,最先对爆炸事件做出反应的既不是社会力量也不是政治力量,而是华尔街上的人们。幸存者先是慌乱地逃离爆炸现场,他们不断被死者和伤者的身体绊倒,空气中弥漫着尖叫声,几分钟后,好奇心战胜了对再一次发生爆炸的恐惧,幸存者与周围大厦内冲出的数以千计的人们一起,又潮水般地涌了回去。五分钟内,这一地区聚集了上万人。脚下,没有得到第一时间援救的伤者为了自我保护而大声叫喊。一位年轻的收款员身受重伤,却还像卡扎比昂卡(Casabianca, 1762~1798 年,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阿布基尔对英一战中,舰只受到致命损伤,他先安排水手下船脱险,自己留在舰上将舰炸沉殉国。——译者注)一样尽忠职守,他请求别人看管好他携带的一叠证券,以求在死前完成任务——他的确死了。华尔街

36号舒侯特(Schulte)雪茄店里的一名店员,听到爆炸声后像拍钢盔一样拍了拍头上的毡帽,这是他在法国军队中养成的习惯。证交所总裁平静而迅速地在他所站的地方走到(证交所内禁止奔跑)俯瞰着交易厅的演讲台上,敲响铜锣,在爆炸发生后的一分钟内结束了当天的交易。布罗德街上距离爆炸点几百英尺的纽约场外交易所,无需敲响铜锣就结束了交易,因为那里突然乱作一团,许多受惊或受伤的经纪人为了获得身体上而非财务上的庇护而大打出手。成批的警察和附近医院里的医生奋力挤到跌倒的受伤者身边;几分钟后,联邦军队从总督岛赶至,很快清理并封锁了这一地区。

J. P. 摩根公司巨穴般的办公室损坏得最为严重,室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翻倒在地桌子、散落的纸张和扭曲的钢丝纱窗残片。无疑,这些不久前才安上的钢丝纱窗及时防止了更多流血事件的发生。摩根公司的一名员工丧生,另一名在第二天因伤势过重身亡,还有许多受了重伤。朱尼厄斯·摩根当时正坐在一楼靠北窗的办公桌前,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他向前甩了出去,随后坠落的玻璃划伤了他。媒体报道称,他的伤口在手上,但这可能只是1920年新闻报道的一种委婉说法;幸存下来的几位前合伙人坚称,他伤在背部。不管到底伤在哪儿,他在接受了布罗德街医院的治疗后豪迈地宣称,他“没有受伤”。另一位年轻的摩根人威廉姆·埃文(William Ewing)被击晕,几分钟后他苏醒过来,却发现自己的头被卡在一只废纸篓里。

摩根公司的二把手、高级合伙人亨利·P. 戴维森(Henry P. Davison)当时恰巧不在大楼内。另外4位在楼内的合伙人幸运地躲过了灾难。他们分别是:托马斯·W. 拉蒙特(Thomas W. Lamont),他很快就将接替戴维森成为摩根的得力助手;德怀特·W. 莫若(Dwight W. Morrow),他后来成为驻墨西哥大使和美国的政治领袖;艾略特·培根(Elliott Bacon),摩根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在国内事务方面影响力很大;乔治·惠特尼(George Whitney),培根的姻亲,摩根公司迅速崭露头角的一位年轻人,也是华尔街上另一位大有前途的债券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的哥哥。他们4人当时正在二楼老摩根的房内开会,这个房间恰位于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街角上;房间的窗户朝西,北面只有一堵没有窗户、堡垒般的墙,因此,他们都毫发无损。由于事发突然,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是进攻时躲在安全碉堡里的懦弱将军;但是,他们之中一位真正的将军倒是有此嫌

疑——这位来访的法国高级将领是莫若的客人，在爆炸的回声渐渐减弱、外面浓烟滚滚、到处都能听到玻璃碎落之声时，他向这几位合伙人问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整个下午，警察、联邦军队以及大约 500 名志愿帮忙的退伍军人忙着第一时间抢救伤者，把他们送上救护车，并控制迅速集结的人群。人群很快就增加到了 4 万人左右，许多人一直呆到晚上，或者也可能是下班后从上城区赶来的人们替代了原来的人群，他们看着在弧光灯照耀下进行着的残骸清理和破窗封闭工作。当晚，一种倔强的、严阵以待的精神在纽约金融界的领袖们之间传播着，而且感染了华尔街上的群众；这种精神的精髓是：“明天就回去上班，赤色分子将受到蔑视。”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炸弹是某个激进组织的成员安放的，尽管第一手证据其实并不肯定。目击者对爆炸前发生的事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即 11:55 左右一辆古老的单顶马车——红的、黄的或绿的，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颜色——被一匹看上去更为古老的栗色马拉着行驶在华尔街上，最后停在了鉴定局门前。有的目击者还说，他们看到马车上载有可能装着炸药的桶和箱子，但是那些自告奋勇的人没有一个说得出车夫的模样以及车夫在停车后做了些什么。在这一地点找到的残骸证实了马车的存在：被炸碎的马匹肢体，其中包括两个钉着马掌的马蹄，以及马车轮轴和轮毂的残片。但是并不能根据这些证据断定或推测爆炸究竟是由炸弹引起的还是一次意外事故。一方面，一位遇难者在临死时说，他看到一辆马车翻倒在街上，车上清晰地印有“杜邦”字样；其他一些人或多或少证实了他的证词，但却都不是很肯定，他们都在马车上看到了知名炸药公司的名称，但具体什么名称却五花八门——有的说是赫克力士(Hercules)炸药公司，有的说是底特马(Dittmar)炸药公司，还有的说是埃特纳(Aetna)炸药公司。假定马车确实属于某家炸药公司，那么爆破工程所需的炸药在运输过程中意外爆炸，这确实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测。市中心地区有好几个爆破工程正在进行中，其中一个项目恰好位于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证交所的扩建工程就在那儿。但可惜的是，上述所有炸药公司都能证明，它们的马车当天没有经过这一地区。杜邦公司的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一辆印有杜邦标志的运货卡车在当天上午早些时候驶经距离华尔街几个街区的地方，车上装的是涂料，而不是炸药。这可能混淆了目击者的视听。

戈尔康达

第一章 序幕：暴行

炸弹说的证据主要是散落在周围的吊窗锤碎片，这些碎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严重的伤亡。警方最终收集到了 500 多磅这种破坏性的碎片，一辆无恶意的炸药运输车装载这么多炸药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是，对许多身处这样紧张气氛中的人来说，更有说服力的是爆炸发生的地点。这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事发当天，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价值 9 亿美元的黄金正从国库分库大厦的储藏室中被搬运到隔壁鉴定局的储藏室中，这些黄金被铸成小金条整齐地安放在一个木箱中，每条重 25 磅。工人们抬着黄金，沿一段木质斜坡穿过两座大厦之间的狭窄小巷，而爆炸发生的地点差不多正对着这条小巷。爆炸发生时，搬运工和警卫刚刚干完活准备吃午饭，他们回到大厦，关上了身后装有栅栏的侧门。他们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也许还阻止了一场针对美国国库的大规模抢劫。如果国库内所有或大部分黄金丢失的话，全球金融界可能会立即出现骚乱。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情节激烈的小说里，生活中则很少发生。

许多美国人相信，这种由暴力引发的混乱正是激进派所希望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笼罩在赤色恐惧之中，这有些类似于麦卡锡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的极端时期。——译者注）的后期。在 1920 年，“炸弹”意味着“赤色”，而且常常是“外来赤色”，反之亦然。但是，这一时期与麦卡锡时代不同的是，1919 年的许多起爆炸事件都是真实的。那年 4 月，炸弹被装在邮包里寄给了 18 位大人物，邮包一旦打开就会爆炸。这些大人物中包括有着反工会记录的西雅图市长，美国移民委员会委员长，因将两名激进派领袖送上断头台而出名的法官，美国司法部长 A. 米切尔·帕默（A. Mitchell Palmer），工党秘书威廉姆·B. 威尔逊（William B. Wilson）以及金融界的两位巨头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 J. P. 摩根。（大部分炸弹都没有到达目的地，其原因只有一个：这些炸弹邮包因邮资不够被耽搁在了纽约邮局中，最终被发现了。）几天以后，投放在克利夫兰、费城、匹兹堡、纽约等地的炸弹发生了爆炸，帕默的一个匿名反对者——一个固执的、有着巨大的政治野心和狂热的信仰、立志成为全国头号激进派战士的贵格会教徒——再次袭击了帕默，但这次不是通过邮局；帕默在华盛顿的住宅遭到了炸弹的严重破坏，但没有人受伤，只有这名反对者自己被炸死了。帕默任命美国最著名的两位侦探威廉姆·J. 弗林（William J. Flynn）和弗朗西斯·P. 加文（Francis P. Garvan），担任司法部两个主要的警务职位——调查局局长和赤色追捕助理。1919 年秋，帕默

发起了一场针对激进分子的反恐战役。这场战役在 1920 年 1 月 2 日晚达到顶峰。那晚，在一场精心策划的搜捕行动中，39 个城市超过 4 000 名激进派嫌疑分子同时被捕。民众普遍拍手叫好，把帕默看作国家的救星，虽然事后大部分嫌疑分子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时代报》这样报道：1920 年 9 月 16 日晚，“联邦、州及市的政府官员一致认为，这次毁灭性的爆炸代表着赤色分子长久以来一触即发的暴行”。显然，全国上下都这么认为。警方的封锁线很快围住了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的金融区；各个城市的警局、金库和大人物们都受到了严密保护；30 名侦探围住了 J. P. 摩根在麦迪逊(Madison)大街上的住宅，尽管他并不在家；联邦调查局局长弗林已经乘坐特快列车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正在指挥调查员们工作。此外，从华盛顿传来消息说，帕默和加文正在赶往纽约的路上。

第二天，9 月 17 日，联邦政府官员透露，他们发现了——或者还不如说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条线索。尽管这条线索无法证明罪犯的身份，但却说明了犯罪的性质。纽约邮局在雪松(Cedar)街和布罗德街交叉口的邮箱里发现了 5 张没有地址的散页纸，这个邮箱距离布罗德街和华尔街步行仅需 2 分钟。纽约邮局把这 5 张纸交给了联邦政府。纸上用橡皮图章很粗糙地印着一些字，虽然页面污迹斑斑，拼写错误屡屡发生，语句也不甚连贯，但是意思却还明确：

记住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

放了那些政治犯

不然你们都得死

美国无政府主义战士

邮局的官员告诉司法部，这些信件是在爆炸当天 11:30 和 11:58 这两个邮班之间的某个时候被投递到邮箱里的。由于信件是在爆炸前而不是爆炸后投递的，因此，无政府主义分子不可能冒揽他人的所作所为。而且，1919 年某些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也曾发现过一些几乎完全相同的信件，因此，凭着这些信件差不多能够确定引起爆炸的炸弹是由无政府主义分子安放的，除非它们是有人为了转移注意力而故意投递的。但是，就如 1920 年



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所显示的一样，公共场所的暴力行为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激愤情绪，令他们无法接受无可争辩的事实或显而易见的解释——这就可能导致他们拒绝接受犯罪真相，而臆想出另一种更符合他们心中所愿的解释。在这次事件中，华尔街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许多人似乎都希望炸弹是无政府主义分子安放的，这没有问题，但他们是不会让问题如此仓促随便地了结的；华尔街以言行表明，它有心证明这是美国以外势力的阴谋。这就是华尔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四

17日黎明时分，最后一盏弧光灯熄灭，华尔街又将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人们的心情不再是“照常工作”，而充满了蔑视和爱国主义精神。与街对面证交所的浮华不同，摩根公司具有典型的英式风格，代表着华尔街的沉着坚强，损坏的窗户上挂着大块帆布，脚手架支撑着银行业务层岌岌可危的穹顶，管理人员拿缠着绷带的胳膊、腿和脑袋相互打趣，职员们用没有受伤的手操作打字机和加法机。整个公司就如一间事故病房，人们静静地接受着职业疗法。在工程师们确认没有安全隐患以后，证交所按时开市了，但是，经纪人和交易者没有再开粗鲁的玩笑，据《太阳日报》报道，他们脸色凝重，下巴紧绷。为了消除恐慌，经纪事务所在证交所开市前一小时通过电报向客户发去了保证函。但是恐慌并没有发生；开市后的第一个小时内，交易价格上涨，成交量达到一个多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股票上涨了10点之多。随着时间的推进，股市依然强劲，人们的信心也渐渐增强。一家大型经纪事务所把发给客户的保证函改成了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独立日呐喊。“60年的连续战争，上百万人丧生或残废”，这些话通过无线电信号传到这家事务所的各个分部。

在这片可怕的土地上，一些心灵扭曲的人鼓吹激进主义，迎合了某些道德败坏的人。他们本应受到惩罚却得到了殷切的关注……他们在高层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激进分子在美国金融中心肆意摧毁生命和财产的结果还能是什么？……努力工作维持生计的年轻人成了这起肮脏阴谋的牺牲品。至于对股市的影响，我相信，这起阴谋只会让股市愈加坚挺。法律和秩序将会取胜，我们的事业也将不断前进。

当天晚上的《太阳日报》这样写道：“华尔街的公众舆论在这份电报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恰巧，美国革命之子组织计划在那天举行《宪法》颁布 33 周年纪念庆典。因此，当天正午——《时代报》称之为“谋杀时刻”，数千人聚集在国库分库大厦前的乔治·华盛顿像下，几英尺外的人行道上有一个被炸弹炸出的浅浅的缺口。他们把硬草帽贴在胸前，唱起了《美国》。之后，79 师一位准将慷慨陈词：“昨天，就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反社会暴行。作为美国公民，我们能够对此视而不见吗？我说，不，一千个不！”

“不！”人群愤怒地回应道。

准将继续说：“做出如此暴行的人罪该万死。他们应该像蛇一样被处死！”

“对！”人群怒吼道，其中一人一跃而起，冲到前方带领人们唱起了国歌，这是仪式安排中所没有的。人群渐渐散去的时候，人们注意到，除了基座上有一两个缺口外，华盛顿像没有遭到破坏，有人说，这是一个奇迹。总之，这是华尔街上伟大的一天。

五

爆炸发生后的多日内，新闻媒体、神职人员和各种政治力量认为，从“嗜血的无产阶级”到威尔逊政权，每个人都应该对这次“暴行”担起责任，这已经是人们所公认的了。纽约市悬赏 1.05 万美元，搜寻对逮捕罪犯有用的信息。伯恩斯(Burns)侦探所也开出了 5 万美元的奖金，据说，这家侦探所是受摩根公司之托调查此事的。星期日上午，圣三一教区举行了一次集会，集会规模出人意料地庞大，教区长威廉姆·T. 曼宁(William T. Manning)牧师借布道的机会吐露了心声。他说，除了爆炸事件的策划者以外，“还有一种人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号称不支持武力，以求明哲保身”。可以想象，集会的人们一定都严肃地点头表示赞同。

美国激进组织活动发言人似乎把整件事情当成了笑料。势力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下设纽约防御委员会的秘书立即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的组织对死伤那么多人感到非常遗憾，他还宣称，无论别人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会怎么说，世界产业工人组织“除了掺和这样的事情以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俄语报纸《俄国之声》在爆炸发生后几天称：“18 世纪的人们曾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必须造一个上帝出来。到了 20 世纪，人们认为，如果没有炸弹阴谋的话，就必须制造一些出来。他们确实在这么做。”

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警方、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没有在爆炸案的调查方面取得特别的进展。爆炸发生后的数天内，警方、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主要成绩就是列出了一长串嫌疑人名单，其中大部分人都有外国名字和确凿的不在场证明。警方审问了卡罗·特瑞斯卡(Carlo Tresca，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后来惨遭暗杀)，但毫无结果。他们还审问了一个名叫亚历山大·J. 布赖洛夫斯基(Alexander J. Brailovsky)的人，因为他拥有俄罗斯血统，而且“据说是托洛茨基(Trotsky，俄国革命领导者。——译者注)和列宁的密探”，有匿名信举报说，爆炸发生后不久有人看见他在派恩(Pine)街和拿骚(Nassau)街交叉口与三个人交谈，更糟糕的是，他还大笑。然而，因为布赖洛夫斯基能够证明他当天没有到过任何靠近派恩街或拿骚街的地方，所以他被释放了。之后，一个名叫弗洛里昂·泽伦斯卡(Flo-rean Zelenska)的布鲁克林人被捕，因为他私藏激进派读物，还曾经在赫克力士炸药公司工作过，并且在 9 月 16 日上午 11:00 左右，带着一个红黄色的包出了家门。但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他是要去他工作的裁缝店，包里装的是他的午饭。23 日，帕默手下的弗林这样总结一周的工作：“我们坚信，华尔街的灾难是一次意外事故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任何有关邻近地区有炸药运输车之类的传言或报道都不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会阻碍我们的调查。这是一次罪恶的暴行。”停顿了片刻后，他又说：“政府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会退缩。”

六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政府官员不眠不休，坚持不懈，审问了一批名叫卡鲁索(Carusso)、阿巴托(Abato)、法罗(Ferro)、法素罗(Fasulo)、路吉欧(Luigio)和德·菲利普斯(De Fillipos)的嫌疑人。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有罪。渐渐地，一些线索浮出了水面。在离华尔街不远的新钱伯斯(New Chambers)街上有一家店面的蹄铁匠认出，被炸碎的马是在他



店里钉的马掌,但是,他记不起这位顾客的模样;之后,另一位伊丽莎白街的蹄铁匠坚持说马掌是他钉的,还说顾客是一个年轻的西西里岛人,个子不高,胸肌发达,行色匆匆。一位目击者说,他在爆炸之前看到了那辆马车和车夫,他觉得车夫看起来像是犹太人。他看到车夫放下缰绳,从车座上爬下来,匆匆忙忙往西面的拿骚街走去,最后消失在了国库分库大厦的后面。另一位目击者是一个犹太小贩,他声称,车夫有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其他号称看到马车的人证词各不相同,他们看到的车夫有不同的国籍、宗教信仰,逃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那些似乎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对这一事件给出生动描述的人中间,有一位华尔街的领袖人物——塞缪尔·B. 惠灵顿(Samuel B. Wellington)。他年过七旬,是西印度贸易公司的总裁,他的证词代表了华尔街人的普遍看法。爆炸发生后4天,惠灵顿告诉警方,9月16日他从街南侧、距离摩根公司东面几扇门之遥的华尔街37号出来,当时的时间是11:58——他说,他很容易就记住了这个时刻,因为当他走到人行道时,看了一眼圣三一教堂的钟,紧接着,他听到有人喊道:“快点!快离开!离开这儿!”他环顾周围,看见华尔街和威廉姆街交叉口有两个像是“东部贫民区小贩”的人正对着第三个人招呼,这第三个人身材肥胖,60来岁,正站在停在鉴定局门前的马车旁。整个画面突然动了起来,三个人开始朝威廉姆街奔去,接着又沿着威廉姆街向北奔跑。随后,爆炸发生了,惠灵顿被炸晕了过去,他脑中的画面也就此中断。虽然没有人能够证实惠灵顿所说的话,但是这个故事却正是华尔街所需要的,而且这位圣人在看到了一切后陷入昏迷的事实,非但没降低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反而使之更为可信。但是,这对警方找出罪犯毫无帮助。

几天内的头号嫌疑人既不是西西里岛人、犹太人、东部贫民区小贩,也不是什么身材肥胖的家伙,而是一个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在华尔街的高层中拥有朋友。他名叫埃德温·P. 费希尔(Edwin P. Fischer),42岁,毕业于城市大学和纽约法学院,是一位名列前茅的网球运动员,曾在全美排名第九,并三次获得纽约市单打冠军。他还曾两次进入精神病院,并在华尔街爆炸的前几天做出了精确预言,精确程度令人毛骨悚然。爆炸前大约两个星期的一天早上,费希尔很早就到了那时位于93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交叉口的西部网球俱乐部,与一位名叫托马斯·迪里汉提(Thomas Delehanty)的管理员交谈了起来。费希尔先是对华尔街,特别是摩根公司,抨击了一番,他的语气迪里汉提非常熟悉,

因为费希尔以前也常常这么说话。接着，费希尔又神秘地说：“汤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要在 15 日炸了华尔街。”或者，根据迪里汉提后来的证词，费希尔说的是“他们要炸了华尔街。”迪里汉提对这一点不十分肯定，但他非常明确地说，他对这件事没有多想，因为他觉得费希尔虽然招人喜欢、举止优雅、聪明能干，但却有点“头脑不清”。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哈得逊地铁上的一位乘客遇到了一个背着网球拍、模样很像费希尔的陌生人，这位陌生人突然向他探过身去，说：“16 日之前不要去华尔街。他们弄了 6 万吨炸药，准备炸了华尔街。”这似乎是费希尔唯一说对日期的一次，但是在之后的一周内，他一直重复他的预言——有时候还写下来，而预言的时间却总是差一点。9 月 11 日，他从多伦多给他在华尔街的一位经纪人朋友乔治·F. 凯特里奇(George F. Ketledge)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问好。15 日星期三，时钟一敲过 15:00 就赶紧离开华尔街。祝好运。埃德温”。13 日，他又把类似的明信片寄给了另外几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其中包括莱昂斯·阿诺德(Léonce Arnaud)和谢普达·霍曼斯(Sheppard Homans)。阿诺德是布罗德街 65 号法国特派使节团团长，一个月之前费希尔还在那儿工作，霍曼斯是一名出色的保险人，还是即将受到惊吓的信孚银行总裁普罗塞尔的前合伙人，也是费希尔的老朋友。在这两张明信片中，费希尔都警告说，9 月 15 日下午华尔街将发生爆炸，在给阿诺德的明信片中，他还轻松地写道“这也许完全是无稽之谈”，并且更为神秘地加上一句“可能只是发发牢骚”。与迪里汉提一样，收到明信片的人都没有把他的警告当一回事。

这些明信片是从多伦多一家酒店里寄出的，有人在那里听到费希尔小声嘀咕着“该死的百万富翁们”。9 月 14 日，他离开酒店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16 日爆炸当天的晚上，他在那儿遇到了他的姐夫罗伯特·A. 蒲柏(Robert A. Pope)。蒲柏当时并不知道费希尔的炸弹警告，但是当他得知费希尔在酒店里的喃喃自语后，就立即断定他的这位亲戚头脑出了问题。第二天早晨，不知是听费希尔自己说的，还是看到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蒲柏得知了炸弹警告的事情。他劝费希尔陪他一起去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他们俩在那儿都有朋友。他还说服费希尔向当地警方自首。当警方问费希尔是怎样预言爆炸的，费希尔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讯息，我想可能是空中传来的吧……当有可怕的事要发生时，我就会知道。”他还把华尔街描绘成“世界的罪恶中心”。奇怪的是，头脑清醒的蒲柏毫不犹豫地

证明费希尔确实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在他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似乎特别准确。

在等待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办理引渡手续之时,费希尔被关押在汉密尔顿监狱中。在那里,他被形容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模范囚犯。20日,周一,美国政府官员坐火车把他押送到纽约,进行进一步审讯。火车到达中央车站时,一大群记者和闲杂人员正等在那里迎接费希尔,费希尔不失时机地向人们显示了他的怪癖。当被问起他的衣服为什么看上去那么肥大时,他回答说因为他穿了3层衣服,外面2层是为了保暖而穿的西装,里面则是网球服,以便为打网球做好准备。随后,穿过候车厅时,他拣起扔在地上的3支雪茄,把它们放进口袋里,他说:“我不抽烟,但我要留着它们。”(雪茄立刻就被他的看守没收了,并被送到了警方实验室,检验其中是否暗藏信息,但是什么也没发现。)警方对他进行了详细审问,还把他送到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检查。审问和检查的结果是,费希尔和爆炸毫无瓜葛,他有精神病。10月2日,费希尔被送入了艾米提威镇(Amityville)疗养院,2个月,他有了明显恢复,因而被释出院。他的朋友霍曼斯说:“阴谋策划者只要和费希尔谈上10分钟,就绝对不会让他参与密谋。”就华尔街而言,这是关于费希尔事件的最后一句话。费希尔一再重复的预言与事实如此接近,这至今仍然是一种不正常的巧合,当时这种巧合显得格外蹊跷,而现代概率分析家很可能会宣称这种解释难以让人接受。

不论费希尔是否参与了密谋,他肯定是疯了。但是,他的华尔街朋友也不比他清醒多少。他们拒绝接受爆炸事故论,这可能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那封威胁信,更可能是因为事故论暗藏了对自由企业体制完美性的质疑;他们认为费希尔不是嫌疑犯,这可能是因为警方说他不是,更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即使疯了也绝不会参与这种事;他们急切地接受了激进派阴谋论,因为这与他们所持的偏见不谋而合。阴谋论还起到了别的作用;这种理论让他们严阵以待,提高了他们对道义的兴趣。此后的几个月内,金融界的重要人物在公开露面时都有警卫保护,证交所内人人都紧绷下巴,经纪人在午餐时交换着各自在爆炸中的经历,还表现出一副老兵般身经百战的漫不经心。以证券换钱——华尔街的基本业务——从一种单纯的谋生方式变为了对国家敌人的挑战,成了一种道德行为。华尔街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十年,在这个十年中,华尔街感到自己的行为既宣扬了正义又有利可图,这种感觉奇妙而令人舒心。



七

十几年来，当地警方和联邦警方的调查一直没有终止，这是历史上范围最广、历时最长的调查之一。为了找出马的主人，他们走访了大西洋沿岸4 000多个马厩；为了确认马掌的出处，他们拜访了东芝加哥的所有铁匠，甚至还问遍了每份铁匠行业杂志的编辑；为了寻找铁片的来源，他们寻访了全国所有吊窗锤生产商和经销商。这些努力均毫无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候会有人认罪，每次都轰动一时，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可信的。认罪者中有一位满怀怨气的伯恩斯侦探所前侦探，他后来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并给出了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据，也许他只是想间接报复一下自己的前雇主。1924年，又有一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全责，但最后证实，爆炸当时他正被关押在圣昆廷(San Quentin)监狱。到20世纪30年代，纽约一位警长偶然会指派一名聪明的年轻警探调查此案，希望新人能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但是破案已经无望了。那时再寻找答案已为时过晚，而且华尔街也已经有了新的问题。

在本故事发生的20年间，爆炸的印记触目惊心。这些印记中包括被保留在华尔街23号北墙上的斑驳疤痕。这些疤痕参差不齐、引人注目，集中在大厦东头第二扇窗户的窗台之下，很多地方深达一英寸，如果透过望远镜看的话像是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人们没有挂起铭牌来解释这些疤痕，没有这个必要；路人驻足观看，很快就会明白发生过什么，脸上也会展现出国人接待游客时的微笑。这座大厦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疤痕究竟为何没有被清除，人们并不清楚，摩根公司也保持缄默。20世纪30年代时有人认为，疤痕保持了那么久，让摩根银行看起来像一个老派的顽固分子，标榜着自己从远古战役中获得的勋带。但是，摩根人却在别人拿这件事开玩笑的时候坚持说这是顺其自然。“疤痕留在那儿并不是为了表示殉道，”一位年迈的合伙人解释说，“这是很实际的事。毕竟，如果要换掉这些巨大的砖块，花费会很大，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且疤痕留在那儿是正确和恰当的。”

不管正确与否、恰当与否，这些疤痕提醒着华尔街它曾经有过的英雄式殉道，也让华尔街意识到它是一个演绎重大事件的舞台。至今，这些疤痕仍起着这样的作用。

第二章 股市专制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纷争比战争更严酷无情；在战争中，敌友之间界限明确。”1932年B. F. 温克尔曼(B. F. Winkelman)在描写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位精明的费城律师，与华尔街有业务关系。华尔街的斗士们无论身处哪个阵营，其着装在任何时候都差不多，只有少数刚到华尔街的乡下人才会穿扎眼的奇装异服，如宽边帽或者两种颜色的鞋子。当某个朋友暗中叛变成了敌人时，战斗就会变得异常惨烈。对华尔街乃至全美国来说，这是一个从个人统治向机构统治转变的时代。J. P. 摩根及其重要合伙人这样有权有势的银行家，仍然能够通过出资和撤资来建立或击垮企业；只要有W. C. 杜兰特(W. C. Durant)或杰西·利维摩尔(Jesse Livermore)这样的知名投机者操纵股市的消息传出，整个股市仍然会大幅震荡。但是，机构的影响力开始迅速显现出来，其中，权力和影响力增长最快的一家机构就是华尔街上的证交所，它渐渐替代摩根公司成为了全美国金融权力的中心。

实际上，1920年的证交所刚刚大权在握，尚未意识到重责在肩，它可能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专断、更傲慢。任何公共规章制度都约束不了它，

它自己制定规则，还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迅速更改规则，以此进行恶意报复，并轻蔑地以极其荒谬的言辞向公众解释。就像 30 年后最大公司的经营者一样，证交所的经营者也身居幕后，从机构中获取力量和勇气。他们可能是第一批“组织人”。然而，他们与真正的“组织人”之间仍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早期的“组织人”，虽然同样争强好斗，他们却更有魅力，更固执己见，更急于讨好朋友而非其他人，他们自私得更坦白，社会责任感也不强。他们更渴望被认为，也自认为是绅士。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证交所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白手起家者、知识分子、西部人，甚至犹太人；但毫无例外，他们都是过去东部人的后裔，而且成长环境比较优越。他们上过新英格兰最好的小学，主要目的是学习礼仪、参加运动，当然还有结交合适的朋友——但肯定不是为了上大学，因为那时上大学并不是进入华尔街的必备条件，人们常常不上大学，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他们并不是非常聪明，但却都有一种倔强的敏锐。他们的生活以城里的俱乐部为中心，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他们完全不了解美术、文学、音乐、历史、理论经济以及生意以外的任何事情，可以说除了手头的事和运动以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廉耻地迷恋金钱，而且从不试图掩饰这一事实，也不以为耻；他们胸无大志，一心只想赚得更多、爬得更高。他们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们想对政府指手画脚，但却不愿为政府工作——这是另一类华尔街人所希望做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愿意的话，他们会表现得非常讨人喜欢，他们从不会粗鲁失礼，除非有意为之。华尔街上那些高雅的人，尤其是律师，看不起他们，但在华尔街上努力奋斗的新人——如来自偏远地区或爱尔兰贫民区的年轻人——却把他们奉为偶像，而那些高雅的人则永远得不到这样的崇拜。新人们远远欣赏着他们傲慢的作风，又常常从他们父亲般的恩泽中获益。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尽相同，但他们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批民主主义者。

他们自负的作风和保护性的冷酷在证交所得到了庇护，但这种庇护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此前，最剧烈、最典型的金融冲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抗，此后是行业与政府之间的对抗，而 1920 年则是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对抗。

那一年，唯一一个对证交所发起鲁莽挑战的人虽然不是证交所的管理者，却是证交所的成员——艾伦·A. 赖安(Allan A. Ryan)。他的父亲，老赖安，属于另一种快要绝种的人。老赖安名叫托马斯·福钱(Thomas For-

tune)，他那住在弗吉尼亚州内陆、穷困潦倒、有着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父母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富有预见性的名字。老赖安最初是一名纺织品商店店员，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遇见了威廉姆·C. 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一位运输行业的企业家以及一个著名王朝(惠特尼家族，以铁路和军火产业著称。——译者注)的奠基者。老赖安成了惠特尼的被保护人，后来，又成了他的合伙人。在惠特尼的描述中，老赖安是“美国金融界最机敏、最温和、最安静的人”。两人从马车起家，渐渐控制并整合了纽约市的公共交通。1904年惠特尼去世时，两人通过股票掺水和特许权购买的方法，不仅收购了跨区快速地铁公司(Interborough Rapid Transit Company)、控制了全市的交通系统，还积累了后来被历史学家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称为“整个金融疯狂时代最快、最大的两笔财富”。1908年，有陪审团认为惠特尼和老赖安的股票掺水和特许权购买行为“具有欺骗性质，可能触犯了法律”，但却仍然无法提起诉讼。1886年，老赖安还一文不名，但到了1905年，他的代理人估计他的身价已达5 000万美元。但是，老赖安非常温和安静，媒体对他的报道极少——据说，他一生中仅有两次对着记者讲话，两次都只是为了发表简要的正式声明，但是，媒体仍然十分钦佩地称他为“伟大的机会主义者”。最终，他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了银行、烟草、铁路、人寿保险、钻石、石油、橡胶、煤炭、焦炭、铅、电力和打字机；他的财富超过了1亿美元，1924年上缴的个人所得税金额高达79.185 1万美元，在美国排名第十；他成为了美国民主党的主要赞助人，还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天主教教堂捐助者，他在第五大道建造了一座宅邸，内有一间私人礼拜堂和一间艺术陈列室，陈列室中安放的都是他自己的半身像，其中有3座是罗丹的作品。

二

这样一位大资本冒险家的儿子却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他身体羸弱，常常受到道德的约束，在媒体面前滔滔不绝；同时，他又继承了父亲的顽强意志、独立性以及操控金融的天赋。与父亲不同的是，他拥有良好正规的教育背景，曾就读于多家私立学校以及乔治敦大学；而且，在这错综复杂的金融世界中，老赖安还亲自指点他，并在1915年将自己在证交所的席位传给



了他。那年，艾伦 35 岁。3 年后，这个年轻人遇到了一位同样强大的导师——查尔斯·M. 舒瓦布(Charles M. Schwab)，美国钢铁公司的首位总裁以及后来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总裁。“托马斯·F. 赖安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舒瓦布很久以后对一个熟人解释道，“他退休时带着儿子艾伦来找我，告诉我艾伦是他未来的希望，问我愿不愿意照看艾伦。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照看艾伦。”在这样的教导下，同时又有父亲的大笔财富作为起步资金，赖安和他的公司——艾伦·A. 赖安公司，成了华尔街上不可小瞧的力量。他成了一个著名的买空操盘手，聪明而强大，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尤其擅长向悲观的卖空者(卖空者向别人借股，随后以未来交货的方式卖出，希望日后再以较低的价格买回，以偿还贷款、获取利润)施压这种玄妙而残忍的手段。1919 年股市行情大涨，证交所的股票流通率(股票总销售量占上市股票数量的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此后多年也未超过这一水平。赖安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强大的买空操盘手；只要有传言说他要买进，股价就会普遍上涨。某天，在与一位银行家驱车前往上城区时，他无意中透露，其身价已经达到了 3 000 万美元。他的业务涉及很多领域，如石油、纺织品、化学、糖果、生产工具等，但他最大的一笔投资却是对美国斯图兹(Stutz)汽车公司的投资。斯图兹汽车公司生产过著名的“熊猫”汽车，赖安收购了该公司的控股权，并在 1916 年登上总裁之位。

1920 年初，赖安不到 40 岁，他严肃刻板，留着显眼但不夸张的胡子，眼神忧郁而有穿透力。他和妻儿住在默里山一座豪华但并不浮夸的宅邸内。据说，他对赛马情有独钟，除此以外，他是一个保守的金融家。尽管当时市场上的汽车品牌多达上百种，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斯图兹公司的运营状况良好。“熊猫”这种赛车轮廓低而且圆滑，有些车型驾驶员几乎要平躺在车轮上，这些赛车就像浣熊皮大衣和随身小酒壶一样，很快成了激情四溢的年轻人的标记。除了赛车以外，斯图兹公司还生产一种外形经典气派的高价位、长车篷家用车，这种车在广告中被夸耀为“唯我独尊”。赖安估计，斯图兹公司 1920 年的净利润将达 500 万美元左右。总的来说，赖安的生活似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憾就是他与父亲之间常常会发生激烈争执。1917 年 10 月，托马斯·福钱·赖安再次结婚，当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即艾伦的母亲，去世还不到两星期。华尔街和上城区的会所传言，父子俩的争执就是由老赖安的再婚而引起的。对于这样的传言，父子俩从来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过；到 1920 年初，两人已经不再

说话。

1920年1月，在视察斯图兹公司印第安纳波利斯厂的途中，赖安因流感而住院治疗了两个星期。长期以来，他一直饱受呼吸道疾病的折磨；年轻时，他的父亲曾以为他得了肺结核，因此把他送进丹佛的一家疗养院，而且有一段时间对他的康复不再抱有希望，近年来，朋友们为了他的健康着想，不断劝他放下工作，或者至少停止紧张的股票投机。疾病和劝说只是让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回到纽约后，流感转变成了肺炎。2月期间，他一边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边从合作者的所作所为中认识到他必须亲自管理自己的业务。1920年初，斯图兹公司股票在证交所的价格大约为每股100美元，1月份，股价稳步上涨，到2月2日，股价突然从120美元上涨至134美元；此时，赖安得知有组织的卖空行为出现了，那些觉得股价过高的投机者在他们认定的风险暴露仓位上发起了猛攻。这是一次卖空性攻击，据后来透露，攻击者中有一些是证交所的重要成员，对于身处证交所统治圈以外的赖安来说，这些人不能算是朋友，但他却常常在证交所或证交所的午餐俱乐部里与他们玩笑戏谑。在从斯图兹公司股票中牟取暴利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让公司瘫痪，并抢走赖安的财产，相反，他们也可能输得身无分文。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在竞争的过程中和竞争过后，对手之间都不会翻脸，他们会继续开着玩笑，相互打趣。这就是法则。

不管怎么样，赖安最擅长应对的正是卖空性攻击，这得益于他的经验、性格以及战斗和征服的天赋。他从默里山的病床上爬了起来，赶赴华尔街投入战斗，起初还有一名护士陪同照顾他。他的目标是以不断攀升的价格买下斯图兹公司发售的全部股票，从而越来越紧地钳制住卖空者，因为他们最终必须买回自己售出的股票。为了打赢这场战役，赖安需要巨额现金。人们后来了解到，他向个人和银行贷了大笔资金。显然，他是以自己和家庭的财产作为抵押品。1921年，大通银行的总裁——那时已经是前总裁了——对华尔街的记者克拉伦斯·巴伦（Clarence Barron）说：“我们对他皮毛生意的贷款从来没有超过150万美元。”

最初，赖安处于劣势。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卖空压力实在太太大，斯图兹公司的股票在3月初跌回了100美元左右，但随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改变。3月24日上午，斯图兹公司的股票上涨至245美元；当天股价继续飚升到282美元，一周后又暴涨至391美元。在这令人吃惊的涨价过程中，除赖安以外的所有斯图兹股东、赖安的公司及家庭成员，都决定抛售股票、

从中获利——这些股票均被赖安抢购到手；同时，如此暴涨的股价对卖空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卖空者抛出越来越多的股票，而赖安同样也买入了他们的股票。将近月底的时候，卖空者抛售给赖安的股票都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因为那时已经没有其他人拥有斯图兹公司股票了。赖安已是胜券在握，他兴高采烈地继续出借、购买股票。股价不受控制地疯狂上涨，3月31日涨至391美元，这标志着他的胜利。很显然，卖空者大大低估了赖安的实力；他们被压垮了，只能以他开出的价格，买回他们所欠的股票，他们因此不是蒙受巨额损失，就是面临职业生涯的毁灭，还有可能因为违反合同而坐牢。此时，赖安病情已经大为好转，他对斯图兹公司的所作所为被华尔街称为垄断性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3月31日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由于近一段时间以来，赖安是唯一出借股票的人，因此，他已经了解了大部分卖空者的身份。他知道其中大多数人像他一样，是证交所的成员，而另一部分人则与他不同，是证交所几个主要委员会的成员。3月31日上午，证交所商业行为委员会传唤赖安，要求他就斯图兹公司股票的大起大落做出解释。他本可以把这个问题抛回给某些质问者，因为他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卖空者；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向委员会解释道，斯图兹公司股票稀缺是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控制了股票——而且由于记录失误，合同中的股票数量比实际存在的数量要多一些。随后，他提出了与卖空者和解的条件，但仍然很有策略地对坐在他面前的卖空者的大名避而不提。他说，他会以每股750美元的价格，向卖空者出售股票。

听到这个条件，在场的卖空者可能会脸色苍白，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相当于每卖空1股将损失350~650美元，有些人甚至卖空了数百股。但很显然，这是赖安的权利，卖空者是自作自受；另外从理论上来说，一个成功的垄断者可以把价格定得无限高，因此，不管价格定得多高，理论上来说都是便宜的。正如公司及其股东的毁灭是成功的卖空攻击的必然结局，垄断则是成功的买空反击的必然结局；证交所在当时统治一切，它虽然不鼓励这两种结局，但也不加以禁止，因此，失败者的唯一权利就是乞求同情。证交所过去发生过的垄断，如著名的1901年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垄断，垄断有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灾难，但最后的结果总是卖空者向他们的征服者偿付昂贵的代价，其中没有任何官方干预；没有《日内瓦公约》这样的条约来减轻金融战争的残酷性。但在此次事件中，被征服者却不愿乞求同情。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商业行为委员会得到法律委员会的支持,再次传唤了赖安,就好像遇到麻烦的是赖安一样。这次,证交所的人发起了进攻,他们以各种借口,提议将斯图兹公司股票撤离股市。赖安明白,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次重击,因为斯图兹公司将会因此失去市场。他大胆地回答说,如果委员会采取此种行为的话,那么斯图兹公司股票的结算价将不再是每股750美元,而是1000美元。如此相互威胁之后,会谈不欢而散,证交所的这两家委员会向具有最高权威的管理委员会汇报了结果。从会谈结束到当天证交所交易结束之间的半个小时内,事态又有了非同寻常的进展。一些因卖空而受困的证交所成员虽然明知自己已被赖安逼入了绝境,却继续向他借贷股票,再抛售出去,他们因此越陷越深。闭市后不久,这种显而易见的自杀式行为似乎不再那么不合逻辑了:管理委员会宣布,通过无记名投票,证交所决定无限期暂停斯图兹公司股票的所有交易。当有一名记者提醒说,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也没有这样的规则时,证交所一位发言人轻描淡写地答道:“证交所可以做任何事。”

三

失去了市场,又有巨额债务缠身,赖安此时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垄断地位;借出去的股票仍然可以收回,不管何时,只要他要求,卖空者就必须想法偿还。而且,斯图兹汽车公司生产的“熊猫”赛车和其他“唯我独尊”的车型仍然有利可图,而他已经是公司唯一的所有人。几天内,赖安组建了自己的委员会,收集法律建议、制定策略。那时,斯图兹事件已经成了华尔街最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话题。公众对卖空者的身份一无所知,流言因此而四起。有人不禁毫无根据地猜测,赖安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他希望打垮赖安,解决两人之间的争执;还有人说,罪魁祸首是舒瓦布,但当赖安十分顺利地重新选入舒瓦布的伯利恒钢铁公司董事会之后,谣言不攻自破。(舒瓦布后来说,他和赖安之间确实有一段时间关系不好,因为他在一次晚宴上随口说了些轻视斯图兹公司的话,而一位热心的女士把他的话传给了赖安;但是,舒瓦布绝对不曾卖空斯图兹公司的股票,相反,他借给了赖安整整100万美元,助其渡过难关。)另一种说法是,整件事情起源于一次打赌,这是金融巨头们之间一种略显血腥的运动,



而赌本只有区区 5 万美元。证交所的发言人们显然相信，赖安不会透露借股人的姓名，因为他不敢违反华尔街的私人合同保密规则，因此，他们的说法是最奇怪的。他们一本正经地说，卖空者大多是些中等收入的投资者，他们来自于坎卡基(Kankakee)和皮奥利亚(Peoria)这样的偏远小镇。这也就是说，美国的普通妇女都成了证交所行情室的常客，参与着卖空这样的复杂操作，但实际上，这些妇女在战争结束的 2 年后才得知股市的存在。这种说法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无人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4 月 15 日，证交所法律委员会宣布赖安的合同无效。委员会宣称：“对于那些因无法获得斯图兹公司股票而未能偿还股票者，证交所不认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合同。”这句话否定了证交所所有操作的基本原则。在这一令人吃惊的声明的最后，委员会建议道，如果赖安对此仍感到不满，他可以采取“法律行为”。（为了强调诉诸法律是没有用的，证交所的一位成员向媒体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证交所 128 年的历史中，其裁决只有 2 次被法院推翻。）赖安接受了挑战，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证交所建议他采取的行为，而是在第二天高傲地向管理委员会发出了针锋相对的最后通牒。他冒失地（也可能是机智地）对证交所前一天的行为置之不理，只是声称他的合同是有效的，并提出了结算条件。除此以外，他还说，证交所应该代表所有参与卖空的成员，与他进行价格谈判，省得他与卖空者一一谈判，他还要求斯图兹公司股票立即重新上市。对此，证交所不屑回答。

至此，双方陷入了僵局，结局不是赖安破产就是证交所大丢颜面。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出现了。精通证券交易法、隶属于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之父的多斯·帕索斯兄弟(Dos Passos Brothers)公司提出了一个深奥的观点：赖安的合同可能无法执行。一家保护委员会被指派为卖空者的代理——委员会很巧妙地对卖空者的身份避而不谈，其法律顾问是 4 年前与美国总统一职擦肩而过的查尔斯·伊凡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比较而言，赖安的法律顾问名不见经传，他雇佣了斯坦奇菲尔德和利维(Stanchfield and Levy)公司的律师。4 月 9 日，保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A. 莫尔斯(Charles A. Morse)说：“我们认为未清的股票偿还合同……是无效的。我们将为此原则战斗到底，即使这场战斗持续整个夏天。”3 天后，赖安还击道：“我认为战斗还没开始。”此时，这场战斗已经成了金融界的公共消遣。人们围在经纪事务所的新闻布告板前，关注着赖安及其对手的最新声明，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报以掌声或嘘声。与

后来的股票经纪人相比，赖安也许不能算是革新者或英雄，但他确实起到了一个革新者或英雄的作用——他单枪匹马对全国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发起了挑战。

4月13日，赖安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午刚过，他拜访了证交所的秘书，向他递交了辞呈，并附上一份很长的解释书。他在解释书中说：“既然你们的机构只对自己负责，既然你们能够自行制定规章制度并立即执行……既然你们允许有财务问题的人参与你们的评议、判断和裁决……那么，我无法再不顾尊严地继续作为你们中的一员。”然而，除了是出于良心之外，他的辞职还是一种战术行为，因为辞职能让他不受证交所规章的约束，而且，在他自己看来，他也不必再受华尔街传统的束缚。当天晚上，他向《世界报》的记者透露了证交所9位成员的姓名，暗示说他们还欠他斯图兹公司股票，因此手头很紧。这些当时在华尔街以外并不出名的人正是证交所的顶梁柱，其中多人还是委员会委员，曾经面对面审判过赖安。第二天，名单就被公之于众了。名单中的人被如此张狂的行为所震慑，多数人一回过神来，就立即否认他们或他们的公司卖空斯图兹公司股票，而只说可能代表某些客户进行过卖空——这种说法让他们的否认几乎成了笑料，因为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卖空，替客户卖空也丝毫不会减少他们的责任。

除了在这一点上输给了赖安以外，证交所当天还受到了两次打击。人们被赖安的暗示激怒了，纷纷开始议论应该进行一次司法调查，以决定是否需要对证交所实行国家甚至联邦层面的政府监管；而这，正如一位观察员婉转所言，“是大多数重要的证交所朋友所极力避免的”。此外，这份刊登了名单的《世界报》还在不起眼的地方登出了一两行有关托马斯·福钱·赖安的消息。老赖安的名字已经悄然远离了斯图兹事件，不再是报纸讨论的热点，虽然他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但《世界报》却宣称他“很欣赏儿子的战斗精神，会在此次纷争中全力支持儿子”。《世界报》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如果消息属实，这就意味着家庭矛盾已不复存在，老赖安的老谋深算和上百万的财产都将归他儿子所有，那么证交所和那些摇摇欲坠的顶梁柱们就又有理由担惊受怕了。

证交所确实显得有些紧张，因为两天后它就发布了一份详细的辩解书。对于暂停斯图兹公司股票的事，证交所解释道，这是为了保护公众不在因垄断引起的股价起伏中蒙受损失；“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卖空者的利益，这完全不是事实”。对于赖安的借股合同，证交所不再坚

持原先合同无效的说法，而采取了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合同如何结算“完全取决于签约双方谈判的结果”。在辩解书的最后，证交所还洋洋自得地写道：“证交所管理委员会坚信，在所有针对斯图兹公司股票而采取的行为中，他们均以维护证交所和公众的最大利益为己任，以此为唯一的指导思想。”

通过收回借出的股票，赖安仍能触动陷阱；如果无法收回（显然，收回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来这些股票都被他自己回购了），那么，根据证交所的规章，赖安就有权“大宗买进”斯图兹公司股票，也就是说，赖安可以代表欠他股票的人，按照自己开出的价格，从自己手中购买股票，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不幸的借股者承担，这样能够防止愚蠢的人继续卖空，虽然此类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在市场游戏的规则下，这就是卖空和被垄断的结果，除非垄断者的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委员会在4月20日黯然让步，宣布愿意接受对议定结算价格的公正仲裁。（至此，保护委员会已经承认它是58家欠股公司的代理，这些公司总共欠赖安5500股斯图兹股票。虽然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数量，但是保护委员会的承认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双方都认可的仲裁委员会成立了，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于赖安贷款的银行。正是向这些银行贷了数百万美元，赖安才得以实施反击。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家委员会谨小慎微，听任事态发展，很快就处于停滞状态。为了等待仲裁结果，赖安推迟了“大宗买进”的计划，然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却始终没有结果，赖安也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终于，他宣布了最后期限，他将在4月24日早上10:00整买进卖空者欠他的所有股票。他说：“我已经耐心等待了很多天。”他会在哪个交易市场进行这场自己与自己的有趣交易呢？当然是场外交易所，只要是出现在布罗德街的人都可以成为场外交易所的成员，在那里，交易全天候进行。他的定价会是多少？赖安没有透露。23日，保护委员会急切地希望与赖安协商达成结算价格，但却无功而返。

4月24日是周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周六对华尔街来说算半个工作日。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上午，成群的经纪人和金融迷聚集在布罗德街上，等着看赖安对卖空者施以致命一击，卖空者与证交所统治层的密切关系也让这次“大屠杀”更为刺激。书记员们如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临街的窗户前，等待下面的经纪人以手势传达指令，他们都非常兴奋，就差点从楼上跳下去了。此时，保护委员会正躲在附近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内，抓紧最

后的时间商议是否要做出让步。委员会的非正式首领、一个名叫约翰·W. 普伦蒂斯(John W. Prentiss)上校的经纪人,力劝聚集在那里的卖空者说,现在早已过了谴责赖安的时候了,如果他们看重自己的金融生涯的话,最好在 10:00 前仅剩的这几分钟内对赖安做出妥协。片刻的纷乱过后,他的劝告占了上风。一项委托保护委员会全权代表 58 位卖空者的决议通过了;随后,在某人的适时建议下,大家在纸条上写下各自希望的结算价格,并把这些纸条递交给了委员会。计算出了平均价格之后,莫尔斯主席宣布,委员会已经做好出价的准备了。接着,由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在 9:40 到达了位于布罗德街 111 号的艾伦·A. 赖安公司。“你们想见什么人吗?”赖安的接待员天真地问道。代表团成员给出肯定回答后就被带到了赖安面前。代表团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卖空者,提出以每股 550 美元的价格偿还所欠的全部股票。赖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立即撤销了大宗买进的命令。10:00 差 2 分的时候,普伦蒂斯上校走出赖安的办公室,对记者说:“斯图兹事件解决了,结算价格是每股 550 美元。”

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除了布罗德街上聚集的金融迷们,因为他们失去了看表演的机会。所有人都认为赖安在与卖空者和证交所的战斗中大获全胜,虽然结算价格低于他先前宣称的每股 750 美元和 1 000 美元,但毕竟他从这桩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据保守估计也有 100 万~150 万美元,而且他仍然是斯图兹公司的唯一所有者。他对普伦蒂斯上校称赞了几句,说他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智谋、判断力和礼貌”,随后他就动身去了弗吉尼亚的温泉。卖空者们失去的就是赖安得到的,他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指责;他们的代理人莫尔斯简单地说道:“斯图兹纷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了结了这件事。”

四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高兴,纷争也并没有结束。赖安欠银行的债务是他在垄断中获利的数倍,其中大部分债务将在秋天或更早一些时候到期。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抛售部分斯图兹股票来筹资。但是,由于斯图兹股票尚未在证交所复牌,这些股票很难卖出,如果经济情况恶化的话,这些股票很可能根本无法卖出。斯图兹事件解决后不久,赖安就兴



高采烈地对他年迈的导师舒瓦布说，他的身价在理论上已经达到1亿美元，和他的父亲不相上下。也许赖安希望舒瓦布能够像《金钱的寓言》（《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译者注）里的主人一样对他说“做得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他确实这样希望的话，那么他就要失望了，因为舒瓦布用怀疑的语气回答说，如果赖安认为斯图兹股票每股值1 000美元的话，他的身价可能确实到了1亿美元，但是他打算怎么兑现如此大的一笔财富呢？赖安无言以对。

绝对不愿默默承受羞辱的证交所并没有放过赖安。整个5月期间，有传言说证交所“正在调查”赖安及其业务。而赖安有一次对记者克拉伦斯·巴伦说的话也表示他的怨恨并没有减少。他说他绝不会再成为证交所的成员，即便他的不妥协态度可能会令他损失上百万美元，他还说，在他看来证交所应该受到华盛顿政府的监督。这种说法虽然离经叛道，但却非常有预见性。证交所先是在出售他的证交所成员资格一事上拖拖拉拉，如果他的成员资格售出的话，赖安将获利约10万美元。随后，证交会突然在6月宣称，赖安4月份递交的辞呈并未被接受。为何此时才公布这一消息？原因在几天后大白于天下：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控赖安“违反了公平和平等交易的原则”；委员会特别指出，他对斯图兹股票实行了“独断和虚假定价”，并“强求负债方支付过高且不合理的债务”。此案将在非公开听证会上审理，并邀请赖安出席为自己辩护。这样看来，证交所不接受赖安的辞呈是为了将他驱逐出门。

先前，证交所曾明确表示结算价格与己无关，而现在却又宣称定价过高且不合理。面对这样的事态发展，赖安根本不屑于指责证交所在结算价格问题上态度的大转变，而只是将这些指控形容成“荒唐可笑”，他集中火力攻击这场即将举行的审判的形式以及那些审讯他的人的动机。他说：“你们邀请我出席秘密法庭、为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献上桂冠，并把我自己装扮成牺牲的羔羊，对于这样的邀请，我满怀敬意地予以拒绝。‘有罪’的判决现在只缺我的正式签字和一场草草的审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证交所是国家商业体系的基础。没有人比我更尊重证交所的理想和传统……但是这个庞大的机构竟然沦为实现个人目标和公报私仇的工具，对此没有人比我更痛心疾首。这的确是可悲的一幕啊。”审判按照计划进行了，但是被告缺席。在经过了5个小时的审议后，管理委员会认为对赖安的指控属实，并一致投票决定将他开除出证交所。第二天，顶楼清场

之后，证交所就在演讲台上公布了这一判决。交易厅里人们的反应平静。赖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道：“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根本就不在乎。”随后，他就离开了，据说是去了牙买加的赛马场。

但是还有些其他事让他无法视而不见。整个夏天，银行都在催他还贷。同时，除了斯图兹公司以外，他重金投资的另一些股票——斯特朗堡汽化器(Stromberg Carburetor)、大陆糖果(Continental Candy)、芝加哥风动工具公司(Chicago Pneumatic Tool)和海登化工(Hayden Chemical)——也非常神秘地突然大跌，这似乎暗示着他的敌人，也就是那些卖空者们，又开始发起进攻了。一次，他的某只股票在增发新股的当天突然暴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卖空者的所为。雪上加霜的是，国民经济恰巧在此时崩溃。消费者突然罢工抗议物价飞涨，他们组织了“工作服俱乐部”和“旧衣日”；货币变得紧缺，以致一些大银行难以维持其清偿能力；世界贸易几乎回到了战争时期的停滞状态；对赖安来说至关紧要的是，股价普遍大跌，到年底的时候，证交所所有股票 3/4 的价值将不复存在。金融之神站在了赖安敌人的一边。

8月，赖安以诽谤罪起诉证交所总裁和管理委员会，要求索赔 100 万美元。他又一次对身为证交所成员的斯图兹股票卖空者指名道姓。(证交所立即回应道，被指控的成员在“审判”时并不在场——这就等于是暗中承认，当然也可能是因一时大意而承认，他们的确对斯图兹股票抱有兴趣。)严格来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名誉而复仇，而更可能是为了筹钱。但是，赖安发现这 100 万美元的赔偿金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而且就连他以证交所席位所换来的一小笔钱，也无法得到。证交所在 7 月就以 9.8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的成员资格，但直到 11 月仍以技术问题为借口，拒绝把这笔钱支付给他。同时，银行的人也盯上了赖安，华尔街开始有传言说他即将破产。11 月，雪茄店老板乔治·J. 维兰(George J. Whelan)对克拉伦斯·巴伦说：“艾伦·赖安已经身无分文了。”波士顿一位经纪人，也是巴伦的另一位线人，十分肯定地说，赖安无法偿还的债务达到了 1 400 万美元。这位线人还说：“他知道自己被打败已经有一个月了，现在他完全受他们的控制。”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赖安不去找他的父亲——他也确实不愿意去——那么他的债主们就会去。11 月的某一天，贷款给赖安的银行(包括大通银行和保证信托银行)的代表与老赖安进行了一次非直接接触。他



们找到老赖安的老朋友和老合作伙伴维兰，但维兰却没有给他们希望。维兰向他们指出：“你们向艾伦·A. 赖安发放贷款的事和他父亲毫无关系，你们知道艾伦和他的父亲互不理睬。我认为你们无权向托马斯·F. 赖安提出任何要求。”让事情愈加复杂的是，老赖安是保证信托银行的最大股东，而且正如维兰所说的，是这家银行的最终老板。因此，从反面来讲，他年初的时候没有反对保证信托银行向赖安发放巨额贷款，已经算是插手此事了。也许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没有迹象表明他有意用自己的钱去解救儿子，否则他早就这么做了。

艾伦·赖安在证交所的敌人知道，他们最终击败了他；他们可以休息一下，让银行来承担刽子手的角色。11月末，银行宣布成立委员会来“负责”赖安的业务。银行的人十分谨慎地说，他们相信赖安仍有几百万美元的盈余，他们有信心收回所有的钱。但显而易见，他们事实上已经预见到了赖安的失败。他的信用被毁了，除了名字以外，他一无所有。20个月来，他卷入了一场争斗，进行无望的背水一战。只有舒瓦布似乎还在支持他，尽可能地为他说上一两句好话。赖安试图联合货币总监、老道的银行（尤其是银行贷款制度）批评家约翰·谢尔顿·威廉姆斯(John Shelton Williams)，但却没有成功。（对此，银行表示又痛心又惊讶。他们声称，在为赖安做了那么多事后，赖安应该对他们抱有好感才是。大通银行的总裁抱怨道：“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卑鄙。”他还暗示，银行的贷款部门是在进行一种社会服务，而并非是在做生意。那时，大通银行还没有打出那句著名的广告标语。）赖安让塞缪尔·乌特梅耶(Samuel Untermyer)担任他的律师。乌特梅耶在1912年成为普约委员会顾问，是美国反银行及“货币信托”政策的标志性人物。为了赢得政界的朋友，或是为了提高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抑或是两者皆为，赖安东拼西凑地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赠了4万美元。但是，一切都是徒劳。1922年7月21日，他提出破产申请，列出了高达3 243. 547 7万美元的债务和区区64. 353 3万美元的可用资产。唯一能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者之一，尽管之后的计算显示他的债务并没有那么多。

破产声明就像是一座遭受了轰炸的房屋，突然向冷漠或好奇的公众展示了支离破碎的私生活中的所有细节，这是多么地可悲和令人震惊。赖安的债务包括：欠百思特公司(Best & Company)儿童服装费157. 75美元；欠布莱克·斯达·弗罗斯特(Black, Starr & Frost)公司珠宝费3 260. 25美



元；欠巴克利学校(Buckley School)学费 60.36 美元；欠查尔斯公司(Charles & Company)食品费 768.68 美元；欠 E. P. 达顿公司(E. P. Dutton & Company)书本和文具费 134.08 美元；欠布鲁克林的蒙托克俱乐部(Montauk Club)会费 13.75 美元；欠广场酒店(Plaza Hotel)戏票费 207.80 美元。债务还包括欠特拉华州人 T. 科尔曼·杜邦(T. Coleman du Pont)的 6.6 万美元；欠舒瓦布的约 30 万美元，100 万美元借款中的其余部分已经还清了；欠他父亲老搭档的儿子哈里·佩恩·惠特尼(Harry Payne Whitney)的 100 多万美元；欠大通银行的约 350 万美元；欠保证信托银行的 866 万美元。现在，这些银行到底在担心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赖安的处境并不像破产声明里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因为银行没有给赖安所持有的大约 13.5 万股斯图兹股票赋值，而是将这些股票作为贷款的抵押品。这些股票将被公开拍卖，如果它们能卖个好价钱，赖安就有希望逃脱破产的命运。保证信托银行的律师埃伦·沃德威尔(Allen Wardwell)在拍卖前的几天说，如果斯图兹股票卖到每股 50 美元的话，那么这些股票加上赖安的其他财产就能使他具备偿付能力。之后，他又把这一价格上调到了 60 美元。不管怎么说，只要斯图兹股票能卖到 1920 年初纷争开始前的每股 100 美元，赖安要还清债务就没有问题。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幻想。1921 年间，斯图兹股票以 50~100 美元的价格在场外交易所出售，但是赖安的破产和其他困难彻底打击了这只股票，到 7 月中旬的时候，股价跌到了 5 美元。只有发了疯的大富豪才会以 100 美元、60 美元或 50 美元的价格，买进这 13.5 万股股票。

8 月 2 日，公开拍卖在维希(Vesey)街的证交所拍卖场举行，保证信托银行的副总裁以每股 20 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斯图兹股票。第二天，有消息公布，这位投标者是代表舒瓦布出价的，舒瓦布因此成为了斯图兹公司的老板。这样，银行收回了部分贷款，赖安的破产被确认，卖空者们报了一箭之仇，证交所也维持了最高统治权。证交所下一位坚定的挑战者出现在 10 年以后，但他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受到无数人民支持的国家政府。

五

比起经营钢铁企业，舒瓦布经营汽车企业就不太在行了。斯图兹汽车

戈尔德达

在速度测试中不断创造着新的纪录，但斯图兹公司却几乎年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这家公司并没有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汽车行业大发展中分到一杯羹。（那个年代备受推崇的敞篷单人座“熊猫”赛车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它已经是旧车了，1920 年以后就不再生产。）1932 年，斯图兹公司成为了一家只生产杂货车的公司。1938 年，舒瓦布去世的前一年，赖安去世的前两年，斯图兹公司悄无声息地破产了。

斯图兹股票拍卖的时候，有人问舒瓦布，赖安是否会重新站起来。舒瓦布回答道：“我希望，也认为他会。”但是，赖安没有东山再起，虽然他做了几次尝试。他要重新进入华尔街，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父亲。老赖安是最后一批金融强盗之一，但是根据他的慈善行为判断，他也是最为“慷慨大方”的。他在 1928 年 11 月去世，之后他的遗嘱被宣读——他把财产都留给了别的继承人，其中包括艾伦·赖安的儿子。老赖安在遗嘱中仅两次提到艾伦，一次是赋予他在另外两名继承人之后购买逝者艺术收藏品的权利，另一次是“把我的白珍珠衬衫纽扣赠予我的儿子艾伦·A. 赖安”。

第二章 股市专利

第三章 几近贵族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形势发生了改变：1921 年秋，美国经济画卷在 60 天内发生了逆转。战后大萧条突然终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全新的、更为持久的繁荣。人们所熟悉的经济晴雨表开始一起上升。经济复苏得到了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官方首肯和鼓励。从 1921 年起，联邦储备银行系统逐步把贴现率从战后最高值的 7% 降低到了 1924 年的 3%。贴现率通过影响银行和个人放贷者所收取的利率，决定从大公司到买房者这些需要抵押贷款的人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如此突然的资金解冻导致了大范围的扩张、冒险、投机和挥霍无度——这些都是自由企业的杂花野草。自由企业在战后早期迅速发展，又在 1921 年的经济萧条中受到重创。如今，在 20 世纪 20 年代余下的几年中，自由企业又经历了一次大发展，规模扩大到了不可控制、令人恐惧的地步。同时，工业界的老朋友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在辞去了他在不下 51 家公司的管理职务后，于 1921 年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财政部对自由企业的信心不断增强，并启动了一项有效的、系统化的计划，以削减公司税款，从而提高了公司的利润。

企业对国家的掌控达到了南北战争后铁路大扩建以来的最高程度，而

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汽车——引领着这些企业的发展。仅 1921~1923 年间,汽车厂商乘用车的年销售量就从 150 万辆增加到了 360 万辆以上,美国道路上机动车总数也从 1 050 万辆增加到了 1 510 万辆;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美国机动车总数几乎达到 2 700 万辆,汽车行业的工资总额在制造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到 1/10,而产品价值却超过了制造行业产品总价值的 1/10。在 20 世纪 20 年代,汽车股对股市的作用,就相当于 50 年代电子股对股市的作用。到汽车市场真正经历大发展的时候,通用汽车、费希博德(Fisher Body)、杜邦和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被称为大发展中的“四大骑士”,华尔街也戏谑地把汽车市场统称为“通用汽车的产物”。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繁荣。农民的处境最为危急,战争年代的巨额出口贸易无法继续进行,急躁的脾气和落后的技术使得他们无法避免自杀式的过剩生产,而且那时他们也得不到政府的援助。1920~1921 年间,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到 1927 年也仅有小幅回升;农民人均收入在 1919~1920 年间减少了 62%。这些灾难性的下滑是美国农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味着抵押拖欠以及持有这些抵押的农业银行的破产;在 1923~1929 年的大繁荣年代,美国银行不断破产,速度几乎达到了每天两家。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1/3 的人每年的收入低于 2 000 美元,1/5 的人低于 1 000 美元。但是在那时,既没有扶贫计划,更没有联邦农产品价格支持计划。)

哈丁(Harding, 1921~1923 年任美国第 29 任总统。——译者注)在 1923 年 8 月 2 日逝世,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923~1929 年任美国第 30 任总统。——译者注)随即继任。早在哈丁逝世之前,美国就已经迎来了“柯立芝繁荣”,而 20 世纪 20 年代的其他标志性事物大多也已经确立起来了。1920 年 1 月生效的禁酒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1920 年全国酗酒率创下最低纪录,但随后又慢慢上升,回到了先前的水平),地下酒吧风靡全国。《巴比特》[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所著的小说,主人公名为巴比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市侩。——译者注]出版了,其主人公的原型在任何一家商会都随处可见。在“本土主义”的呼声中,新的移民法关闭了通往美国的“金门”。对于华尔街来说,在这样一个甘愿被企业所掌控的国家中,它发现自己与华盛顿处在一种对立的境地。在公众的眼中,华尔街的伦理规范、重要人物以及社会阶层都被光环所包围,而在以政治为重的年代这种光环通常是与那些控制着国家资本的人与

事联系在一起。

二

小 J. P. 摩根——杰克，有着和蔼的眼神、白色的胡子和黑色的眉毛，他的身上有一种英国绅士般的风格和气质。他是华尔街领袖人物的象征和化身，他的公司位于街角那幢曾受炸弹袭击的斑驳大厦中，是华尔街领导阶层的根据地。确切来说，这家公司已经失去了其过去在国内业务中的部分影响力。1913 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终结了摩根公司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实际地位，而老摩根也恰恰在这一年去世。同时，随着那些能够从留存收益中获得企业发展资金的大公司的崛起，摩根公司逐渐失去了对其他公司业务的财政控制权。另一方面，战争及其对欧洲造成的破坏又使摩根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摩根公司与杜邦家族在 1920 年共同收购了最热门的新兴产业巨头——通用汽车，这显示了这个老牌统治者尚未失去其在美国国内的活力。但是，20 世纪 20 年代，摩根公司在华尔街的势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金钱方面，它同时还是潮流的引领者和终极法院，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华尔街的道德中心。

摩根公司的这些特质是由摩根本人和他所选的合伙人确立的，同时又在摩根和他的合伙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小摩根 1889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不到 3 年就成了一名合伙人，在他父亲死后，他又成了数百万美元资产的继承人和公司的管理者。他出身名门，而且从来不愿以不顾尊严、不负责任的态度炫耀他的身份——这至少出自于他的价值观，包括世俗化了的清教主义、阶级意识以及 19 世纪后期美国新教主义的自以为是。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不允许公司内部出现分裂——合伙人不能搞分裂，公司员工也不能。老摩根曾坚持认为，商业信用的根本不是金钱也不是所有物，而是一个人的品格。在 1912 年普约委员会成立之前，他就令人难忘地在他的商业哲学中融入了宗教思想。他明确表示，品格是比聪明才智更重要的商业财富。他的儿子杰克最喜欢的座右铭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只是措辞略有不同：“做好工作；诚实正直；遵守诺言；尽力助人；公平公正。”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反对特权，他曾动情地说过，他情愿因为过分信任一个人而赔钱，也不愿因为过分不信任一个人而赚钱。他的合伙人托马斯·W.

拉蒙特(Thomas W. Lamont)称,老摩根那“敏捷、敏锐的思维”被“他的儿子很好地继承了,而他的儿子又在其中加入了更为清醒的判断能力”。小摩根从小娇生惯养,不喜欢抛头露面,但他十分勇敢,而且身体强壮。1915年他曾在峡谷海湾(Glen Cove)的家中,近身制服过一名破门而入的刺客,当时这名刺客身上携带着两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和一管炸药。尽管他是一名专业人员而不是有钱的外行人,但是他对银行业仍然抱有或者假装抱有一种挑剔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和他的合伙人从来不去证交所,而是把他们在证交所的业务委托给外部经纪人。(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甚至值得称道的机制,但却不符合他们的作风。)他总是公开表示对银行业的形式和实质的担忧。一次,一家参议院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把他对委员会的证词中一个重要部分读给他听,并问他是否要做修改时,他仅仅回答道:“我希望把我的回答中结结巴巴的那部分给删掉。我不习惯这样的审问。”

有时,摩根和他的公司似乎瞧不起金钱和与金钱相关的事务。他们认为自己是金融界的政治家(他们确实是政治家)而不是敛财者(尽管他们确实也是敛财者)。但是,哪怕有人仅仅暗示他们的政治才能使他们成为了国家政府的一部分,那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原谅的失礼,因为在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杰斐逊(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译者注)式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式的对政府及所有政府工作的偏见。哈罗德·尼科尔松(Harold Nicolson,英国的外交官、作家和政客。——译者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写道,摩根公司“已经不再是一家私人公司,而几乎成了一个政府部门”。对此,摩根在他拿到的手稿上以草书写道:“我无权要求你做出更改,但是这样的写法似乎把我们降级为了一个从属于政府的部门。”在尼科尔松看来,银行家们都是些“低层次的家伙”,因此,他认为他的描述是对摩根公司的高度恭维;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摩根的贵族身份。恭维利己主义权贵的人就要自己承担风险——在这件事上,摩根的合伙人比摩根的态度更为强硬,最终尼科尔松更改了这段不讨好的文字。

不管这些合伙人其他时候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美国金融界最高级、最具影响力的俱乐部的成员;华尔街23号二楼私人办公室里摆放了燃木壁炉、用旧了的安乐椅和安乐沙发,营造出一种俱乐部式休闲安逸的氛围。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华尔街的绅士传统在南北战争中消磨殆尽,如果事实确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实如此的话,那么这种传统在摩根大厦内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这些合伙人是 J. P. 摩根人格的延展和装点。和摩根一样,他们都是亲英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蒙特曾说:“我们的公司从来都不中立,我们不知道如何中立!”),有着一种超脱的气质(不管是真的还是假装的),而且都是共和党人。他们都属于老派的美国新教徒,是自命不凡的精明商人,自然不会欢迎拥有别的血统或信仰的人加入其中。他们对首领和公司无比忠诚,这种忠诚有时会因为自作多情而令人尴尬,甚至在那些玩世不恭的人看来,会因为褊狭而显得可笑。(1912 年,当普约委员会向摩根公司一名主要合伙人询问摩根公司的某项举措是否正当时,这位合伙人热切地答道:“我不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做,但既然它做了,就一定是最正当的!”后来,这句话被公之于众,而且受到了摩根公司下一代主要合伙人的完全赞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摩根公司都不会拒绝接受一个合格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成为其合伙人;自学成才者的美国梦因此得以实现。事实上,尽管这些合伙人在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上都非常相似,但他们除了属于同一个社交群体之外,可能还属于同一个种群,他们不仅仅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和志趣,更可能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一般来说,他们都高挑苗条、相貌英俊、肤色白皙、头发浓密但早白。早在世纪之交时华尔街就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当上帝的天使与人类的女儿结合时,他们所生的后代就是摩根合伙人。”这并不完全是一种讽刺。和稀有的狗或马一样,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特有的气质,对于他们所承担的角色来说,这种气质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由成功商人及其继承者领导的社会中,他们自称不是成功商人的继承者,而是注定要凭智慧统治社会的人。他们试图创造一个美国贵族阶级,而贵族就是他们自己。

亨利·P·戴维逊(Henry P. Davison),宾夕法尼亚卖犁人的儿子,他没有上过大学,却是老摩根的最后一任得力助手,直到 1922 年去世前不久他还在工作。战争时期他曾担任美国红十字战争委员会(American Red Cross War Council)主席,任职期间的一件事体现了他的摩根气质和对摩根行事方式的推崇。在底特律的一次集会中,他正倡导人们为红十字会基金运动捐款,一个粗鲁而沙哑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摩根公司为红十字会募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我们想知道摩根公司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些捐款的!”人群安静了下来,戴维逊停顿了几秒钟,最终问道:“你觉得这个问题公平吗?”那人十分清晰肯定地回答说公平。戴维逊说:“很好,我这样告诉

你吧，公司与基金的关系是：公司合伙人捐献了 100 万美元，而这些钱不允许被存在公司中。”摩根公司先前一直出于谦逊而没有公开这一消息，也有可能是有意留到这样的时刻才公开。消息一公布即大获全胜，掌声和捐款接踵而来。将成功和正义相结合，这就是摩根合伙人。如果说这其中有一丝挑剔者所认为的“占便宜”的话，这也可以在美国新教教义中找到根源。有趣，可能也有一点令人惊讶的是，戴维逊的合伙人托马斯·W. 拉蒙特此后曾写道，这件事让他感到触动的地方在于戴维逊“没有试图使用演讲诡计”。

拉蒙特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最典型的摩根合伙人，戴维逊死后，他成了老板的日常发言人。人们这么说：“摩根先生有话会先对拉蒙特先生说，拉蒙特先生再向公众公布。”拉蒙特与大部分摩根合伙人一样英俊，一样拥有贵族气质。他有时被称为“体面的化身”。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大人物一样，他成长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是纽约克拉弗拉克(Claverack)的一名贫穷的卫理公会派牧师。他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信仰：在星期日玩纸牌游戏、跳舞甚至散步都是罪恶的。从哈佛毕业后，他来到纽约寻找财富，并在 1911 年成为了摩根合伙人，那时他 40 岁。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他被认为是摩根公司的首脑人物，除了是公司发言人之外，他还是贷款和金融顾问方面的首席外交特使，曾被派往中国、日本、墨西哥和埃及等地。菲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在 20 年代曾写道，拉蒙特“比其他任何人行使的权力都要多，实施的最终决策也更多”。伦德伯格这么写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拉蒙特的公共工作，而是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他在胡佛(Hoover, 1929~1933 年任美国第 31 任总统。——译者注)当政期间与白宫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富有而不庸俗，是哈佛和埃克塞特大学等著名机构的主要捐助入。如果说这位“体面的化身”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可能就是他想成为文人的秘密愿望。他最初是一名报刊记者，身边总有许多文人朋友，他赞助了一份文学杂志，有段时间还试图收购纽约的《晚间邮报》。如果说他的模范人格中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大部分摩根人的共同弱点——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用事。在他对合伙人戴维逊完全崇拜式的传记中，拉蒙特尖锐地批判了那些根本不认识老摩根却为他著书立传的作者。随后，他又愉快地写道：“摩根先生从来不会见报纸杂志的记者。”这话有悖于一个伟大银行家的冷静逻辑。为了使人们对摩根品格有正确的认识，拉蒙特讲述了 1911 年他成为摩根合伙人第一天发生的事：当纽约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一家拥有 3 万中小储户的银行面临倒闭的消息传来时，他听到老摩根立即提出要无条件地担保所有的存款，老摩根还说：“必须想办法帮助这些可怜的人。”拉蒙特解释说，他提起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摩根先生头脑中固有的一种特殊冲动，即不计个人利益地帮助他人脱离困境”。

确实，摩根公司担保了这些存款，并因而损失了 20 万美元。但是，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 即老摩根)，这位最不感情用事、最不讲平等的人究竟有没有说过“必须想办法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社会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皮尔庞特·摩根的狂热研究者——对此表示不相信。其他研究者认为这句话倒像出自成吉思汗之口。“穷人哭泣的时候，恺撒也会流泪。”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在恺撒葬礼致辞时如是说，但是听者并不需要过分执著于演说者的字面意思。

20 世纪 20 年代，摩根合伙人中更为不可思议但却十分典型的一位成员是德怀特·W. 莫若。在成为摩根合伙人后，他年轻时期对财富的鄙视发展到了极致，他曾经常常因为梦到自己变成富翁而大叫着惊醒。年轻时他曾做过律师，那时他这样告诉妻子：纽约律师的庸俗生活不适合他，在挣够 10 万美元之后，他就希望辞职去教历史。但是，他在 1914 年离开律师界而成为了摩根合伙人，并且变得富有，那年他还不到 40 岁。到 1925 年，他的噩梦似乎变成了现实，他极力想逃离华尔街，寻找一个更为高尚的环境。最终，他在政府工作中如愿以偿。他曾被委派为驻墨西哥大使，充当过大学同学卡尔文·柯立芝的幕后顾问，1930 年他去世前一年还出任新泽西州议员。但是，他的心灵却很少得到过安宁。

在为莫若所做的传记中，哈罗德·尼科尔松乏味而过分地赞美了他摩根式的高尚品格，这与尼科尔松此后出版的日记大相径庭，其中的差异很有说服力。传记和日记是同时写的，尼科尔松自己后来也非常鄙视这本乏味的传记。他在日记中这样描写莫若：“他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他的性格中带有一丝疯狂……或是不近人情和反常……他有着恶棍和圣人的双重性格。”在匹兹堡，有些愚蠢的俱乐部女会员会用莫若一贯受人尊敬的公众形象来对尼科尔松施压。对此，尼科尔松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希望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你们知道这一点。德怀特·莫若是一个精明自私的暴发户，死于酗酒。’”

至少，这话也和尼科尔松写的传记一样不真实。但是，这仍是尼科尔

松渴望对那些女士们说的,可能也是他希望写进书里的。和一般公众尤其是华尔街的人们一样,尼科尔松总是希望推翻摩根合伙人永远正直的形象,或者发现他们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莫若确实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在高雅的、具有绅士风度的贵族表象之后,他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自身又充满了矛盾。摩根合伙人到底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直的人,还是自高自大的家伙?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两者皆是。天真对于那些地位很高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而假天真则是他们的武器。出生于克拉弗拉克牧师家庭的拉蒙特,在20年后当然会认为他听到了皮尔庞特·摩根为可怜的银行储户而哀叹;同样,莫若当然也不会怀疑自己对财富的厌恶和鄙视。在摩根财团的全盛时期,甚至在今天,人们都无法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摩根精髓的一部分,可能也是令那不羁而多疑的华尔街着迷的精神支柱。

三

沿街而下就是昆恩里尔布(Kuhn, Leob)公司,这是华尔街的第二大公司,但地位却远远不及摩根公司。昆恩里尔布公司比摩根公司早4年成立,它与J. & W. 塞利格曼(Seligman)公司、雷曼(Lehman)兄弟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公司等德国犹太籍同行一样,是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第一批投资银行。当新兴的摩根公司轰轰烈烈地闯入这一行业后,昆恩里尔布公司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它卷入了一系列纷争,最激烈的一次当数世纪之交为争夺北太平洋铁路控制权而引发的混战。混战的一边是摩根公司和詹姆斯·J. 希尔(James J. Hill, 美国铁路巨子。——译者注)组成的联盟,另一边则是昆恩里尔布公司和E. H. 哈里曼(E. H. Harriman)的联盟。那场混战之后,两家公司进入了武装休战时期,有时还会联合起来驱逐新的入侵者。渐渐地,这两家公司之间悄然形成了大致的市场区划:根据实力,企事业融资归摩根公司负责,铁路归昆恩里尔布公司负责。20世纪20年代,昆恩里尔布公司的经营规模与摩根公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名声和影响力却都不如摩根公司。在这一点上,昆恩里尔布公司无法与复杂却不可避免的本土主义、美国作风和新教主义相对抗,而华尔街23号的人们却完全体现了这些主义,并且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这些主义。

但是,昆恩里尔布公司自有一种精心培养的惊人的优越感。后来,哈

罗德·米迪纳(Harold Medina)法官这样描述这家公司：它有一种“自命高雅和排外的特质”，这种特质来自于公司的创始人，他们之间几乎都有着血缘或姻缘关系，并一致选择了从商。第一位外来合伙人是在1911年进入昆恩里尔布公司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家公司尽管业务量庞大，但仍然是家族企业，合伙人一共只有4名。公司最根本的经营准则是“橱窗政策”，首席合伙人奥托·H.卡恩(Otto H. Kahn)以他特有的优雅描述这条准则：“我们不会去寻找客户，要求他们与我们做生意。我们希望我们的声誉能够起到橱窗的作用，从而吸引客户。我们希望以此作为我们的标志……我们不会去追逐客户。这可能有点自大，但是我们不会那样做。”而且，当有企业毕恭毕敬地找到昆恩里尔布公司时，它绝对不会参与价格竞争，也绝对不会为了拉拢客户而抢其他银行的生意。昆恩里尔布公司颇以此为荣。有趣且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是，正是这条让卡恩如此引以为豪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公司和联邦当局的冲突。联邦当局坚持认为，拒绝与竞争对手抢生意证明了公司有限制贸易的非法阴谋。这样，绅士的价值观与官僚民主起了正面冲突。

把昆恩里尔布公司带上成功之路并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掌控着公司命运的是金融天才雅各布·谢夫(Jacob Schiff)，他死于1920年秋，华尔街大爆炸的几天之后(但并非因爆炸而死)。新的统治者奥托·H.卡恩是一位更为出众的人物。他是美国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我必须为我的财富而赎罪。”他说道，将此作为道德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德怀特·莫若也曾因为这种负罪感而噩梦连连。摩根公司的美国佬们不想办法为他们的财产而赎罪，而是急切地证明他们的财产是正当的，这是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卡恩的赎罪方式特点鲜明。摩根公司的美国佬们可能会收集稀有的书本，或与文人促膝长谈；在清教传统中，书本一直受到高度的尊重，但戏剧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摩根合伙人很少涉足表演艺术。卡恩则成长在曼海姆(Mannheim，德国西南部城市，18世纪成为重要的音乐和戏剧中心。——译者注)，被那里以音乐为主导的欣欣向荣的欧洲文化氛围所感染。托马斯·拉蒙特可能会收购《晚间邮报》的控制权，并且资助《星期六文学评论》。卡恩则买下了大都会歌剧院，并为之引入了托斯卡尼尼(Toscanini，意大利指挥家，1867~1957年，大提琴演奏家。——译者注)和加蒂-卡萨查(Gatti-Casazza，1908~1915年出任大都会歌剧院经理。——译者注)，因而将大都会歌剧院带入了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每年，

卡恩都自掏腰包填补歌剧院的赤字,直到 1931 年去世,他一直都是歌剧院的总裁和大股东。他让美国观众欣赏到了俄罗斯芭蕾和巴黎学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向许多博物馆捐赠了画作和金钱,资助了很多艺术学校、歌剧公司和戏剧项目,甚至还为黑人艺术家提供奖金。但同时,卡恩又能够满怀钦佩之情地描写 E. H. 哈里曼——一位冷酷至极的人,就连粗犷且毫不挑剔的皮尔庞特·摩根都十分讨厌他。这恰恰体现了卡恩的刚毅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银行家。卡恩这样评价哈里曼:“他天生是一位征服者,他的统治地位来自于粗暴的力量、铁一般的意志、不可抗拒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勇气。”

卡恩和小摩根都生于 1867 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均正当壮年,却在华尔街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两人都非常注重个人举止,不喜欢公开他们的慈善行为,并且是毫无顾忌的亲英派。但是,摩根精力充沛、崇尚户外运动,是一位热情的运动爱好者;而卡恩则过着温室花朵般的生活,高贵而脆弱。摩根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乡绅式的反知性主义;而卡恩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知识分子和城里人。摩根是美国人,但说话时带有英国口音,因为他曾经在英国居住,后来还经常前往英国;而卡恩则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年轻时曾在伦敦从事银行业,并获得了英国国籍,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保留着这个国籍。摩根在办公室里沉静而严肃;而卡恩则喜欢在办公室放声歌唱。在这个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的世界上,摩根和卡恩堪称他们那个年代的双杰。他们既是盟友也是敌人,对对方都充满了一种既尊敬又轻蔑的微妙情感。

四

在金融世界中,人们的价值观往往是以价格这种直白的形式呈现的,一些在社会其他地方被隐瞒、混淆或避讳的事,在这里有时却一目了然。华尔街上美国基督教徒和美籍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19 世纪中期,大量犹太人从德国迁往美国。之后,在犹太人大批涌入华尔街之初,华尔街上就多多少少有着一种公开的反犹太情绪,特别是在恐慌时期、人们急于寻找替罪羊的时候。华尔街上的人们常常把长相丑陋的大骗子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称为夏洛克的后代,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甚至把他描写为“复杂的犹太人”，而事实上，古尔德的祖先在 1646 年就定居于康涅狄格州，而且其中很可能没有犹太人。休战之前皮尔庞特·摩根对昆恩里尔布公司的敌意，更多地源于业务竞争而非宗教偏见，但是后一个问题也是摩根从未忘记的。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 美国钢铁大王。——译者注)在自认为击败了摩根、成立美国钢铁公司之后这样吹嘘道：“皮尔庞特觉得他能够做成任何事，因为华尔街上最出色的犹太人都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打败犹太人的是美国人，而打败美国人的则是苏格兰人！”卡耐基和摩根对犹太种族特性以及他们自身优越性的乐观假设，无疑是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的典型现象。然而，不那么典型的是，摩根对他的犹太对手有着一一种崇敬之情。这些犹太人是值得一战的竞争者；在北太平洋铁路事件后，摩根也不再那么自信地认为他“能够做成任何事”了。通过承认雅各布·谢夫及其公司是他的平等对手，摩根勉强认可了华尔街上的犹太人或其中一小部分在美国社会上的地位。这发生在 20 世纪初，比美国其他犹太人获得同等待遇早了许多。

老摩根和昆恩里尔布公司的武装休战，是 20 世纪 20 年代华尔街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关系的基础。认可犹太人在商界的地位并不代表认可他们的社会地位。1925 年的情况与 1900 年相同，无论多么有教养、多么有成就的犹太人都别想进入摩根公司的美国人及其同僚们的俱乐部和客厅。(一些被“基督化”了的、拥有英国名字的犹太人是例外，他们已经被当时重要的新教徒完全接受了。)你可以和任何人做生意，老摩根颇有预见性地说道，但是你只能和绅士一起驾艇出游。也许有人会说，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对绅士的定义；华尔街上受过良好教育、卓有成就的犹太人都不会觉得这样的排斥会毁掉他们的生活。

但是反犹太现象另有其严重的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很早就成功进入华尔街最核心、最高阶层的犹太人，没有为他们的后继者打开方便之门，而是坚定地堵死了这条道路。他们对大胆、成功的外来者越来越心存畏惧和憎恨，因而尽其所能采取了排斥手段。于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虽然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已经比世纪之初时翻了数番，但是华尔街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根本不雇佣犹太员工，十之八九的大银行也同样如此(少数银行至今仍然如此)。据一项估计，在证券经纪行业中，60% 的公司严格遵循反犹太的雇佣原则，15% 的公司偏向于雇佣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客户多是犹太人，而其余 25% 的公司则不带偏见。众所周知，证交所拥有一套非

正式的限额系统，以防止犹太人在其权力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华尔街及周边地区还有一些办公楼始终不允许犹太人进入。这些情况虽然与旧时激烈的商业竞争分不开，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当时的国民状态——当时，业绩出色的公司只是象征性地雇佣或提拔犹太人；度假胜地的酒店公开宣称不对犹太人开放；纽约和其他地方一些犹太人公寓的所有者也出于一己私利而拒绝犹太租户。美国社会似乎没有觉得把主人赶出他们所居住的屋檐有何不妥。

最后，为了让数字更加生动，并且更好地描述华尔街上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为矛盾的关系，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15年5月7日早晨，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 英国海军舰队后备巡洋舰。——译者注)在爱尔兰海岸线上被德国潜水艇击沉，许多美国公民因而丧生。那天，昆恩里尔布公司的创始人、胡子花白的雅各布·谢夫亲自来到了摩根公司的主办公室。J. P. 摩根和他的合伙人正好在办公室中，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当时，由于出身和长期业务合作的关系，昆恩里尔布公司和谢夫被怀疑具有亲德情结，但事实上，他们，尤其是谢夫，一心一意支持盟军，唯一的例外就是他们不支持沙皇俄国，这个曾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国度。带着一丝不常见的羞涩，谢夫走近摩根，小声表达了他对“这一非常不幸的事件”的遗憾。摩根简单粗鲁地做了回答，随后十分唐突地转过身去，留下谢夫——这位唯一与摩根那强势的父亲平起平坐的银行家——独自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大楼。

片刻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摩根对他的合伙人说：“我想我做得有些过分了。我是不是应该道歉？”接下来是一阵更长、更令人痛苦的沉默，随后德怀特·莫若在纸上匆匆写了些什么，然后递给了他的上司。摩根读道：“不是因为你的名字，而是因为你的名字，哦，以色列之家！”摩根赞同地点了点头，随后拿起帽子，前往昆恩里尔布公司向谢夫道歉。

试探性的接近，粗鲁的怠慢，旋即的自责，几乎在不涉及宗教的地方引起宗教问题的《圣经》引语，以及迟到的道歉，这些都体现了曾经饱受折磨的华尔街从战争年代带入20世纪20年代的敌对情绪。

五

除了少数历史久远、地位稳固的德国—犹太投资银行之外，华尔街企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业普遍以摩根公司而非昆恩里尔布公司的模式运转。社会历史学家艾伦整理了一份 10 年间华尔街 50 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他发现，这些大人物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出生在美国西部或中部，但接受的通常是东部式的传统教育；名单上的 11 人曾就读于哈佛，4 人曾就读于耶鲁，3 人曾就读于康奈尔和阿默斯特等。他们不同于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译者注)“巴比特”时代和 H. L. 门肯(H. L. Mencken, 美国编者、作家和批评家。——译者注)“愚民大众”时代华尔街以外的美国商界领袖，他们有着绅士的装扮和风度。艾伦指出，华尔街自有一套礼仪，在那里，良好的风度或者伪装的良好风度具有不容置疑的商业价值。50 位大人物中大约有中 1/4 生来就属于金融统治阶层，而为挤进这一阶层付出最大努力的不是那些吵闹不休、惹人注意的标新立异者，而是那些勤勤勉勉、坚忍不拔的模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曼哈顿的上东区(只有 4 人在冬季往返于郊区和华尔街)，在新泽西或长岛的北岸拥有乡间房产。在那里，他们打高尔夫、饲养和训练赛马或者驾船出游(超过半数的人拥有游艇)。通常来说，他们是城里大都会俱乐部和乡村风笛磐石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的业余优秀作品被大学或教育机构保管，很少会落到艺术或社会革新活动的赞助人手中。50 人中大约只有一半公开拥有宗教信仰，而其中的许多人也只是在名义上或形式上信教。尽管如此，社会学家并不难按照宗教身份来对他们进行分类；确切地说，他们是没落的新教徒。名单上只有 7 人有犹太血统——除了投机商伯纳德·M. 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之外，其余 6 人都是投资银行家——而信奉天主教的则更少。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天主教徒被排斥在了核心金融集团之外，其被排斥的程度更甚于犹太人，尽管天主教徒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核心集团。

在那个时代，华尔街仍然聚集了全国的青年才俊。从顶级大学毕业的聪明小伙子来到华尔街从事律师或银行职业，因为不论是在律师界、金融界、公务员界甚至政界，这都是一条致富创业之路。那些毕业于同样大学的不太聪明的小伙子，如出身良好、风度翩翩、善于交际但却资质平平的运动健将和花花公子，也纷纷涌向华尔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儿也是最容易谋生的地方。特罗洛普(Trollope, 1815~1882 年，英国作家。——译者注)笔下那些维多利亚时代从牛津或剑桥毕业后来到伦敦金融区的富家子弟中有一位这样说道：“我总是觉得在伦敦挣钱并不需

要什么智慧。”对于 20 世纪 20 年代那些毕业于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大学、在华尔街做证券生意的体面年轻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从事证券业，”那个时代的典型小说《伟大的盖茨比》中的耶鲁毕业生尼克·卡拉维(Nick Carraway)说道，“所以我认为证券业再多养活一个人也没有问题。我的叔伯阿姨们都反复谈论这件事，就像是在为我选择预备学校一样，最后他们说道：‘嗯，好吧。’”确实如此，尼克·卡拉维发现，在证券业中，关系完全可以取代智慧；人们只需要拥有好的客户即可，而好的客户总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和学校里的阔气朋友。像尼克·卡拉维一样，人们不会把工作时间当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新泽西或长岛的长时间晚宴上，他们才会恢复生气。他们熬夜到凌晨三四点，随后小睡一会，再到市区的办公室里昏昏沉沉地度过一天。这些年轻华尔街人的生活重心大大偏向于休闲而非工作，这一点与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同。

甚至在竞争格外激烈，市场起伏与出身、教养或教育均无关系的证券经纪业中，关系仍然是一项优势。证券交易中成功的关键是内部消息。各个社会阶层都非正式但却小心翼翼地传播着各自的消息，有大都会俱乐部消息、沙丘俱乐部消息，甚至还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消息以及威廉姆斯—阿默斯特消息。掌握这类消息的人不会轻易向圈外人士透露消息，也不会向圈内人士隐瞒消息，就像黑手党不会轻易将同伙出卖给警方。

阶级等级制度——一个相当软弱无力、令人厌倦的等级制度——要让自己永垂不朽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他们是一群混蛋，他们那一帮人全都放在一起也比不上你。”卡拉维最后这样对白手起家的杰伊·盖茨比说道，再次肯定了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真理。）但是，还有些别的东西。与那些懒散、外表迷人的势利小人共同存在的，是一些近乎真正的贵族；这个国家最有才气、最有公德心的人通常会出现于华尔街，而不是华盛顿或大学校园。那些年间，在福顿(Fulton)街南边的狭小商业区工作，意味着即使自己不能成为大人物，也有可能见到那个时代的大人物或即将成为大人物的人；如果说一个国家培养领导人的学校竟然是一个专门进行金钱交易的地方非常奇怪的话，那么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表现出的领导力如此强大简直就令人不可思议。

回想一下那些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在华尔街金融圈积极工作的人。他们已经或即将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功成名就。



那些年长的政治家们从政多年,尽享荣誉,在他们面前的是更长的岁月、更多的荣誉和更重的责任。他们之中有查尔斯·艾文思·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1930~1941 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译者注)和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 美国政治家,曾任战争部长、菲律宾总督和国务卿。——译者注)。除了更广阔的天地任职外,这两位都曾在华尔街担任过律师。1925 年时,休斯 63 岁,他差一点被选为美国总统。尽管那时的总统是柯立芝,但休斯毫无疑问是美国的第一公民。他曾是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担任国务卿一职 4 年后,他在华尔街工作了 5 年,之后又回到法院成为了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史汀生曾经被塔夫脱总统任命为战争部长,年届 60 时又成为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最终,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不可思议地回到了战争部,成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决策者。1925 年时的他脚步轻快地走在华尔街上,满脑子想着吞并、房地产或是一两次离婚,那时他并不知道晚年会有如此艰巨的任务落在肩头。

在 50 多岁的人中间,除了拉蒙特和莫若之外,还有一个同样拥护国教的人——出生于西弗吉尼亚的公司律师、保守民主党人约翰·W. 戴维斯(John W. Davis)。在 1924 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柯立芝之后,他随即回到了华尔街。1925 年活跃在华尔街上的 40 多岁的人之中有摩根合伙人拉塞尔·W. 莱芬韦尔(Russell W. Leffingwell)和赫伯特·雷曼(Herbert Lehman)。前者做过挂牌律师,曾在 1917~1920 年间担任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后者曾是著名家族企业雷曼兄弟公司的积极合伙人,不久后成为了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之后又成为了一名议员。那时金融界还有一位不太突出、年过 40 的律师。他在华尔街 52 号拥有事务所,曾出任过海军副部长,后因患病而致残,但最终还是重新站了起来。10 年之后,他成为了华尔街最强硬的敌人。他的大名——弗兰克林·D. 罗斯福,很少有人不知道吧。

1925 年时,尚处于而立之年的华尔街人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名有前途但并不十分杰出的律师;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与雷曼一样是一家家族银行的合伙人;詹姆斯·佛莱斯托(James Forrestal)和费迪南·艾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迪隆里德公司(Dillon, Read & Company)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布朗兄弟公司的罗伯特·A. 洛维特(Robert A. Lovett);约翰·麦克洛伊

(John McCloy)和托马斯·K. 芬莱特(Thomas K. Finletter),凯威(Cravath)律师事务所的新进员工;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一个从高盛公司勤杂工起步的布鲁克林人,那时他已是证交所的新成员,最终成为了福特家族的首席顾问,他在许多蓝筹公司中担任董事,其头衔之多可能甚于当今世上的任何人;约瑟夫·P. 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一位大胆的股票投机商,1924年他离开波士顿来到华尔街中心,并且在之后的近40年内设法留在了美国生活的中心。

从整体来看,这些人组成了华尔街上前所未有的璀璨星系。但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尔街人,那些出生于世纪之交、1925年时还是金融新手的人,之后却鲜有在公共服务事业中有所作为的。个中原因并不难猜。由于某些不可控的环境因素,他们那一代的金融业经受了一次早期打击。紧接着,国家政府的角色突然并可能永久地改变了: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1932年后政府雇用的大多是大学和商业界的人士,而非金融界人士。不知不觉中,华尔街已经渐渐丧失了其作为政治家摇篮的地位。

但是,有两个年轻人是不可忽视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公众人物。

詹姆士·保罗·沃伯格(James Paul Warburg),华尔街巨头——昆恩里尔布公司合伙人、联邦储备系统之父保罗·M. 沃伯格的儿子。他机智、热情、温文尔雅,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最聪明、最有趣的青年银行家之一。他1896年出生在德国,童年往返于欧美两大洲,生活在双语环境之中。在哈佛大学就读时,他的学业成绩和社交能力都非常突出。他曾是战时美国海军飞行员,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国际承兑银行的副总裁,而这家银行可以说是昆恩里尔布公司在商业银行界的一个分支。确实,这家银行是他的父亲创立的,但詹姆士·沃伯格即便不依靠亲缘关系也能获得成功,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举例来说,赫伯特·胡佛曾邀请25岁的他出任商务部副部长,但他却认为自己太过年轻,因而没有接受。此外,他属于那种凤毛麟角的人:除了是一位严肃的职业银行家之外,他对艺术和娱乐非常感兴趣,与有关人士的交情也绝不一般。他是业余的人体画家;有时会与著名的阿尔冈昆(Algonquin)集团成员玩牌(结果他使他们认识到银行业是一门高智商学科);他在东70大街的宅邸成了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美国作曲家、钢琴家。——译者注)和西蒙德·罗姆伯格(Sigmund Romberg,美国轻歌剧作曲家。——译者注)之类的人时常出入的沙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龙。毫无疑问，他确实是艺术和娱乐界的行家。他曾经出版过诗作，而且不是自费出版，他还曾经为一些颇为成功的流行歌曲填词。没有人知道詹姆士·沃伯格会走哪条路，但无疑他是在走自己的路。

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比沃伯格年长，1925年时已经年过30。他与沃伯格是截然不同的人，在成功之路上走得更远。实际上，他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点不足为奇；他拥有完美的人际关系，受过美国最好的教育，而且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世纪之交的运输大王、托马斯·福钱·赖安的合伙人——纽约惠特尼家族与他毫无血缘关系。他的先人在17世纪乘坐五月花号之后的阿尔贝拉(Arbella)号来到马萨诸塞定居，他的父亲是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叔叔是原摩根合伙人之一。在格罗顿(Groton)学校就读时，他曾担任过棒球队队长、足球队代理队长、校剧团经理以及最令人敬畏的学生干部——级长；几十年后，校长恩迪科特·皮博笛(Endicott Peabody)仍然对这位他最喜爱的学生记忆深刻。在哈佛，他的学业并不是非常突出，他后来说，他对提高智力不感兴趣，却十分喜欢历史这类“事实性”学科。他是大学划船队队员，并且顺理成章地被波斯廉(Porcellian)俱乐部吸收为会员。他对他的哈佛班级充满了热情，而且记忆力超群，多年后仍能背出班里每个人的前名、中名和后名，这让他的朋友们备感有趣，也深觉惊讶。从哈佛毕业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经纪事务所工作了一年，随后动身前往华尔街。1912年，他在证交所买下了一个席位，1916年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理查德·惠特尼公司，专门从事债券业务。同时，他的哥哥乔治(同样毕业于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同样是波斯廉俱乐部会员)娶了一位摩根合伙人的女儿，并在1919年成为了最出色的摩根初级合伙人之一。至于理查德，他的岳父是华尔街人所钟爱的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前主席、皮尔庞特·摩根昔日的生意伙伴。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摩根经纪人”。挑剔的摩根合伙人们都不愿亲自光顾证交所，当他们在证交所有交易时，理查德通常就成了执行者。当华尔街23号的神明们要在街对面的尘世市场上世俗化时，他们会以迪克(理查德的昵称。——译者注)·惠特尼的肉身形象出现。

理查德·惠特尼令人难忘。很显然，单是这样的身份已经使他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还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力，但是，他还具备一些引人注目的个人特质。如果说他的身份让他有些像数年后尼克·卡拉维，而他的个性实际上更像是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

者。——译者注)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势利、傲慢的运动员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美国上流资产阶级冒险家。——译者注)。他身材高大健壮,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只是稍稍有些发福;他一向打扮得体,严肃的表情掩盖不了英俊的面容;他喜欢穿正装上班,在华尔街上显得十分抢眼。他高傲自大,对待那些他认为社会地位不如他的人,即大多数人,他既能够做到诚实平等,但同时又能明白无误地让对方了解他对他们的看法;他熟练地掌握着一种霸道的待人方式,表面上奉承对方,让对方觉得和他是平等的,同时又不忘记提醒对方他们并不平等。但是,尽管他十分势利,他还是结交了形形色色的生意朋友,与其他许多公司不同,他的事务所没有反犹太情结。他在纽约有一座豪宅,在新泽西的远山附近还拥有 500 英亩的地产,他在那里纵马打猎,饲养一流的艾尔夏牛,还有着一群户内佣人和 12 名户外雇工,包括牧工、马夫和 1 名司机。

华尔街上有两类大有前途者,大致来说,一类是昆恩里尔布人,另一类是摩根人,他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六

……华尔街的尽头是圣三一教堂,哥特复兴式的尖顶犹如僧侣的帽子般高高耸立着,高坛延伸出来悬于整个圣三一地区之上,青翠的墓地中埋葬着汉密尔顿的遗骨。与那个地区相配的是那里的所有者——新教徒(特别是圣公会教徒)和富人(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一教区以房地产为主的年生产性资产达 1 400 万美元,除去所有支出和税金后的年投资净收入超过 70 万美元;同时,据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估价,教堂所在的这 1 英亩土地价值约 4 000 万美元)。1921 年接替未来的曼宁(Manning)主教成为圣三一教区长的凯莱布·R. 斯泰森(Caleb R. Stetson)教士,20 年代末在教区年鉴和登记簿中写道:“圣三一教堂如今完全被高楼大厦所包围着,这些大厦通常比教堂更高,有些还是世界上最高的。”

贪欲就像一群贪婪的狼,伺机扑向这片唯一能够见证尘世圣殿精神的土地上仅剩的一块空地。但是,早在美国诞生之前教堂就矗立在那儿了,那时华尔街还是一道保护城市不受印第安人和野兽进攻的墙……

他接着写道,过去教区的常住人口是海员,他们主要来自于中欧,也有

少数来自于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但是随着新办公楼逐步取代老住宅区，海员的数量正不断减少，最近已经减到了5 000人以下。通常，参加星期日集会的人主要不是住在附近的那小部分人（他们大多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是从城外赶来的人。集会所在的广场是圣三一教堂的传教地。在斯泰森看来，传教的对象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还包括大量在那里工作、使华尔街成为华尔街的人，每天早晨他们成百上千地涌入这片尘世圣殿之地，夜晚又成群离开。每个工作日的中午，圣三一教堂都会为在市区工作的人举办半个小时的宗教仪式。仪式上，教区长或是他的助手规劝那些沉迷于金钱交易的人不要忘了精神追求。除此以外，一位真正的圣三一传教士威廉·威尔金森(William Wilkinson)每天午餐时间都会在华尔街上举起一只盒子进行简短的布道，将上帝的讯息直接传递给异教徒。户外布道一般会有不少人参加，尽管参加者可能并不十分虔诚，教堂的宗教仪式通常都是这样的。

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华尔街有一种说法，走进圣三一教堂的人一定都遇上了麻烦。如果有人急于祈祷，别人就会嚼舌头，认为那是信用危机的征兆。“可怜的琼斯！他去了圣三一教堂——他一定是要被解雇了。”但是，圣三一教堂还将迎来它的全盛时期。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四章 与猿猴如此相像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一个春日，一小群美国人沿袭着古老的传统，秘密会面谋划如何挣到快钱。他们选择的方法是操纵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的股份，这是当时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之一。根据一份律师认可的正式合作协议，他们购入了 100 万股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这些股票当时的总价值为 9 000 万美元。随后，他们高价聘用了证交所成员迈克尔·J. 米亨（Michael J. Meehan），作为交易无线电公司股票的专家会员商，米亨是操纵股价的最佳人选。最初，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每股价值 90 美元。在使用了一系列精心设计、欺骗投资公众的虚招后，米亨几天内就吸引了上千毫无戒心的普通买家买进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从而将股价推到了 109 美元。此时，那一小群人抛出了手中的股票，而公众买家则继续握有股票，直至股价跌回至 87 美元。这一切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在此期间，米亨和他的操盘助手共赚取了 50 万美元的“管理费”。这一周内，那一小群人除了呆在办公室里满意地看着见证米亨能力的股票行情机，其他什么也没做。他们瓜分了近 500 万美元的净利润。

这类事情在当时是合法的，其手段和意图与 20 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

欺诈把戏并无很大不同，只是金额上有所不同罢了。说到底，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盗窃，它需要的是过人的智商和灵活的头脑，而不是暴力。但是，参与无线电公司股票操纵的人不同于“黄衣少年”威尔（Yellow Kid Weil，即 Joseph Weil，美国最出名的骗子。——译者注）等臭名昭著的骗子。相反，他们是富有显赫的美国人，是为人所熟知和受人尊重的领军人物。他们之中有克莱斯勒公司的创始人沃尔特·P. 克莱斯勒（Walter P. Chrysler）、钢铁圣人查尔斯·M. 舒瓦布（Charles M. Schwab）、无线电公司总裁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的夫人、约翰·D. 洛克菲勒的侄子珀西·A. 洛克菲勒（Percy A. Rockefeller）、《纽约世界报》的著名编辑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美国民主党主席约翰·J. 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以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前助手和心腹约瑟夫·塔姆蒂（Joseph Tumulty）。

二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投机，是一种以冒险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交易行为。自从1602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以来，这种行为就从未停止过。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从本质上来说，证交所相当于赛马场或是轮盘赌的赌桌，为货币风险交易提供了一个自然平台。更进一步来说，商品投机在1602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远远早于对那些代表着货物储备或获取货物的愿望的轧花纸的投机。在被问到投机的动机时，多数人都不会回答是那源于人类的冒险精神、占有欲以及追求刺激的心理，但是，英国社会学家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却对此做出了一个更为有趣、新颖的解释。他写道：“交易的本质是以一物换取另一物。”

一只手紧紧握着一件物品试图吸引陌生人，另一只手则伸出去试图以自己的物品换取别的物品。一旦得到了想要的物品，第一只手就会放开手中的物品，但这只手绝不会提前放开，否则就可能一样也得不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交易者都时刻保持警惕，仔细观察对方的每一个行为。人们普遍在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这部分是因为交易是一种原始行为模式的非物质形式。如今，人们在进行交易时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接近猿猴。

20世纪20年代后期，华尔街上的股票投机行为已经达到了格外激烈

和难以捉摸的程度，公众参与度之高可能是古往今来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匹敌的。也许，投机者都不会意识到他们正重复着自己那在树枝上荡来荡去的猿类祖先的行为模式。同样，投机行为的辩解者和拥护者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这些以纽约证交所权威人士为首的辩解者和拥护者，都极尽所能地热切宣扬着投机和投机者们所取得的创造性的甚至是超乎寻常的成功。“在改革家所钟爱的大刀阔斧的革新浪潮中，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比美国人更不能承受对投机的谴责，”证交所的官方经济学家这样写道，“伊莎贝拉女皇皇冠上的珠宝可能间接资助了美洲大陆的发现……为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提供资金、希望他能够发现神秘的日本国，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保守的投资’。”读了这样的文字，可能就连某些投机者自己都会惊讶于他们行为的伟大性。这些文字使得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塔格·劳伦斯(Joseph Stagg Lawrence)做出了如下的评论：“证交所是这样一个场所：那些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企业，其价值都能得到最明智、最精明的评价。美国的高智商精英很可能出现在这个场所中。”

在这个生意至上的年代中，批判过度投机的声音相对较少，也较弱，但批判者们却对上述论点的事实根据提出了质疑。他们坚持认为，股票投机事实上对美国企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他们又进一步质疑了投机的道德性，认为投机侮辱了那个年代奉行的基本道德观——公平竞争。从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与德鲁(Drew)之战到摩根和哈里曼之战，再到艾伦·赖安和证交所之战，华尔街早期的争战都发生在旗鼓相当的圈内人士之间。但是现在，大量公众首次涌入了投机战场，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城镇、村庄中盯着报纸的金融版和股票行情机，以求发现一些征兆，但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一丝希望战胜证交所内或附近办公室中那些见多识广的华尔街专业人士。正如约翰·T. 弗林(John T. Flynn)在数年后所说的：“投机是三四千圈内人士对五十万左右圈外人士的游戏，游戏规则完全不平等。”他说，圈外人士“只被允许看到部分自己的牌，而他们的专业对手却能看到所有参与者的牌，包括他们自己的牌”。

投机是否是赌博？这是两派最常争论的。绝对不是，证交所这样说道——它有充足的理由：除了不道德之外，赌博在纽约州是非法的，赌债依据法律是不能执行的，因此，如果投机被认定为赌博的话，那么证交所将会立即瘫痪。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论点，对具备华尔街思维方式的大学教授情有独钟的证交所经济学家，重新将耶鲁大学的老教授亨利·C. 艾默里



(Henry C. Emery)推了出来。这位老教授曾在1908年提出了投机和赌博之间的一系列细微差别。对于这一问题，证交所的领导者在他们的声明中往往只进行简单的断言，而非逻辑推论。当被要求说明投机和赌博的区别时，证交所的首席发言人曾这样回答：投机是“有益的”，因为它“创造了这个国家”，而赌博却相反，是“有害的”。看吧，问题就在这里。

华尔街圈内人士在证交所的许可下，将集合基金(无线电公司股票操纵案就是经典的一例)作为剥削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大众羔羊的主要手段。集合基金的操作非常简单，引导证交所行情机纸条给出错误信息，用以欺骗公众。随后，行情机纸条(与道一琼斯金融新闻显示板纸条不同，虽然这与我们无关)上不出现任何消息或评论，而只有每笔交易的价格、成交量和具体的股票代码。由于这是所有投机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可以让他们了解任何特定时刻所发生的事情，因此，聪明的投机者只使用这类信息来发财致富。同时，这类信息也是非常公平的，对华尔街圈内和圈外人士都是完全一致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认为“行情机纸条是不会骗人的”；但事实上，行情机纸条确实会撒谎。尽管纸条仍然一如既往忠实、公正地记录着每笔交易，但是交易者可能会刻意改变交易的种类和次序，这样，看到纸条的人就会因无知和贪婪而买入“假金砖”。

最初，那些绞尽脑汁的资本家们会选择一只符合他们目的的股票，这只股票一定要能够吸引公众，而且市场上流通的股数也必须相对较少，这样才能便于操纵。然后，他们会在数周或数月内悄悄购入股票，或者通过时常参与集合基金的公司管理层，在大约3个或6个月内随时以市价购入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积聚大量股票。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与证交所的专家会员商合作，即便不能，也会取得他的支持；通常来说，这位专家会员商会以经纪人或交易商的身份参与这只股票的大部分交易，手中应该掌握着一份秘密清单，记录着这只股票所有未完成的买入和卖出订单。正如弗林所比喻的，他能够看到所有参与者的牌。最后，资本家们会聘请一位关键的人物——被称为集合基金经理人的操纵专家(在无线电公司股票操纵案中的专家会员商可能就是这样的关键人物)。随后，一切就准备就绪了。

作为集合基金的代理人，集合基金经理人会以经纪人的身份，以不同的形式频繁买入和卖出股票。他常常会在集合基金成员之间，或集合基金成员和他们的亲戚之间反复买卖股票。在专家会员商的支持帮助下，这些事实上虚假的交易得以完成，并促使股票价格略微上涨。用投机者的行话

来说,这只股票开始“积极上扬”——这一情况将会得到行情机纸条关注者的注意,因为这只股票的代码会频繁出现在记录着每笔交易的行情机纸条上。这样,公众就会关注这只股票,并且相信投资该股票会赚得快钱。渐渐地,急切的行情机纸条关注者会购入股票——先是谨慎和试探性地,之后,随着股票价格持续上涨,他们的购买行为会变得越来越大胆。此时,集合基金经理人会开始一些较为复杂的操作。某些日子,他会突然卖出股票,目的仅仅是混淆视听;然后,就在公众即将认为“野餐结束”时,他会重新开始大量买进,让一切疑虑一扫而光。最后,在一次非常有技巧的操作之后,事情就会自动持续运转下去了;事实上,公众将会接手,疯狂地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买进股票,这样,根本无需集合基金经理人插手,股票的价格就会被越推越高。此刻,股票操纵进入了最后阶段——集合基金将自己所持的股票兑现,这一阶段俗称“拔插头”。经理人开始向市场抛售股票,其低调的程度与他开始买入时的大肆宣扬形成鲜明的对比。股价开始下滑,最初还比较缓和,但随着集合基金经理人抛出的数量越来越大,下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公众回过神来之前,大规模的撤资就已经完成,集合基金抛出了所有的股票,从中赚取了利润,而公众却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股票突然贬值。在这样一次成功的“过山车”式的操纵最后,股价会跌至最初水平,只有那些参与操纵的人才能分享战利品、满意而归。

集合基金经理人自认为是艺术家,这有一定的道理。少数为大师级经理人所不齿的低层次经理人会在经纪事务所的商情报告书上宣传他们所操纵的股票,或者故意传播假消息,或者买通新闻撰稿人编造利好消息。这些做法相当于在诈骗时采用暴力。但是,正如最高明的骗子不屑于使用暴力一样,顶级集合基金经理人也鄙弃这些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粗俗的做法。他们的工具就是行情机纸条;仅仅通过这些纸条,他们就能精确地对目标公众施加影响,他们对此备感自豪。假如——当然,这不太可能——这些纸条艺术家中有人恰好读了劳伦斯教授对投机的赞美,看到了其中有关证交所中美国高智商精英的言辞,他一定会认为他们就是劳伦斯教授所指的人,也会点头赞同教授的话。他们都会这么认为。

现实中的集合基金案例有:1928年3月,无线电公司股票集合基金(不是前文提到的无线电公司股票操纵案)在4天内将股价推高了61点;1928年晚些时候,哈得逊(Hudson)汽车公司股票小规模集合基金单为其中一名参与者就带来了105 467.29美元的利润(数据来自于之后公开的集

合基金经纪人汇款单)，哈得逊汽车公司的幕后老板是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的总裁；1929年初，阿那孔达铜业（Anaconda Copper）公司集合基金为另一家备受尊敬的银行——花旗银行的总裁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当时，他恰巧是阿那孔达股票的主要公开赞助人；等等。

有钱有势的人秘密调动大量资金和技术资源，来迷惑那些被快钱所吸引而投身股市苦苦挣扎的中产阶级，甚至还有常常被呼来喝去的擦鞋匠和送报人这样的穷人，这听起来不是过于容易和不公平吗？但是，这也有风险；有时公众会不配合，从而导致一些集合基金以赔钱失败告终。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公平性。诈骗并不是集合基金唯一的祖先。1929年无线电公司股票案这样的大型集合基金有着与狩猎相似的吸引力。在狩猎时，衣着优雅的社会名流骑上良种马，带上训练有素的猎犬，追捕和围猎一只毫无戒心的狐狸或兔子。杀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狩猎这个仪式，以及参与狩猎所带来的身份上的认可。集合基金中的商人就是衣冠楚楚的骑手，社会地位较低但技术出众的集合基金经理就是训练有素的猎犬，而公众当然就是那只兔子。一位评论员写道，促使商人加入集合基金的是“战斗和快钱的诱惑、搏斗的刺激、追捕的魅力……被接纳入小圈子的荣耀、神秘事业的吸引以及精英合作带来的社会光环”。

再重申一遍，集合基金事实上毫无违法之处。过去，明令禁止“独占”、“囤积”和“垄断”的普通法曾认识到股票操纵的罪恶，但在美国，这些指控长久以来已被废弃。股票操纵是否构成普通法欺诈的问题，在1930年之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对华尔街权威的否定只是名义上的，而且很容易就被消除了。“洗售”——自己与自己的交易，以制造股票活动的假象——被纽约州和证交所章程所禁止；因此，有人就与合伙人进行虚假交易，这样既不违法，又能达到相同的目的。证交所不允许专家会员商参与集合基金，因此，他们就以妻子的名义参与其中，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集合基金本身并不被认为是不当行为；证交所的总裁后来曾宣称，他的员工调查了1928年的阿那孔达集合基金案和1929年的无线电公司集合基金案，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违规之处。有人问他，如果不是股票操纵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无线电公司股票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涨涨跌跌。他一脸困惑地答道，无线电公司的股票是一只“神秘的股票”。

那么，有没有官员对此表示反对呢？在1928年之前，根本没有。对于“不受控制的股票投机绝对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这一观点，柯立芝总统和他



那热衷于商业的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给予了完全的支持。只要经济有一丝衰退的迹象,或是某位重要的公众人物对商业流露出一点悲观情绪,他们两人或其中的一位,就一定会挺身而出,宣扬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样,市场就会相应地反弹。仅仅有一次,而且是非常短暂的,柯立芝的脑中曾出现过“控制之手可能会带来益处”的想法。1927年,哈佛大学的威廉·Z. 莱普利(William Z. Ripley)教授出版了《主街和华尔街》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虽然没有将集合基金单独列出,但却详尽描述了公司用来误导持股者、股票操纵者用来误导投资者的许多其他手段。“首先我们要面对‘出了问题’这一事实,”莱普利写道,“我知道事情不对。房屋不会倒塌,这一点无需担心!但是我们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小声音,就像墙壁有老鼠或是木头里有蛀虫。”柯立芝邀请莱普利到白宫进行会谈。他仔细地听着教授的话,不时地点头表示他也同意事情出了问题。莱普利说完以后,柯立芝取出嘴里的雪茄,身体向前倾,问道:“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吗?”莱普利回答道,在目前的法规下,总统也无能为力。听了这话,柯立芝往后靠去,舒了一口气——这件事可以从他的脑中卸下了。

公众对集合基金的反对程度,也没有超过他们对两个零的轮盘赌转轮的反对。公众喜欢集合基金,因为他们认为那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受骗上当的则会是别人。不受集合基金经理人控制的真正的商情报告书,会向经纪事务所的普通客户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如通用汽车公司或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将在下午14:00“被大宗吃进”。客户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会匆忙跟进,希望在短时间内赚取利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十分聪明冷静,而且有足够的自控力得以在“插头被拔掉”之前脱身。集合基金操纵者在早期严格保守集合基金活动的秘密,但由于公众热切地渴望了解有关集合基金活动的消息,操纵者们最终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这种热情。他们只需要稍稍暗示有集合基金正在运行中,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一半。最后,当有报纸像报道体育赛事一样报道正在操作中的集合基金时,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华尔街日报》在不透露消息来源的前提下,每天都会对经典的无线电集合基金进行报道,并评论每天的股票涨跌,它从未用过“集合基金”一词,但却使用了不会让行家误会的语言。3月21日,无线电集合基金操作结束的第二天,该报上出现了一条公正明确的消息:“据悉,100万股无线电公司集合基金业已结束,认购人获得的净利润为5个点。”这5个点,或者说500万美元来自于公众的口袋,已经学着自己操纵股票的公众却最终自取灭亡。

由于所有人——欺诈者、被欺诈者、政府当局——都认为集合基金与7月4日的庆典一样重要，因此，很显然，集合基金的组织者、操作者和参与者要想认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罪恶的，就必须具备超人般严格的自省精神。

克莱斯勒、洛克菲勒、舒瓦布、民主党主席、纽约主要银行的总裁，他们是否在精神上与“黄衣少年”威尔有相通之处？1928年和1929年的股市高潮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

关于20世纪20年代大师级投机者和操纵者对投资大众、对彼此、对国民经济做了些什么，我们写得已经够多了，但是，我们所要讲的是有关人的故事，附带着介绍时代背景，因此，我们主要讲述的是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杰西·劳里斯顿·利维摩尔(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是他们的中心人物。1920年时，他已经是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股市舞台上的领衔主演，尽管当时他还未到40岁。在此之后的多年中，他还仍然保持着金色的头发、光滑红润的面容，这使他看上去出奇地像一名大学生。他的言谈之中有大量旧时的乡村俚语，如“那些家伙”、“好，先生”、“像小狗一样恼怒”，让人想起过去的年月。他是典型的美国农场男孩——在世纪之交来到城里，在交易找到了赚钱的诀窍和热情。出生在他那个年代(1877年)的美国哲学家把这种追求当作一种宗教信仰来谈论，利维摩尔也几乎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信仰。他十几岁时就离开学校和父亲在马萨诸塞的农场，来到波士顿的投机商号中小试身手。在19世纪90年代，投机商号在波士顿及其他城市风行一时。投机商号为那些满怀希望的装阔投机者们充当经纪人，但却篡改账目，使得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赔钱。这些机构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卑劣的盗窃行径，而国家却以自由企业为名，对此视而不见。利维摩尔——一个未经雕琢、从未改变过口音的年轻人，几乎立刻就帮助那些假阔佬们实现了翻盘的梦想。他对股票短期活动的判断出奇得准确，以至于投机商号很快就开始拒绝向他支付奖金，也开始拒绝接受他的账户。15岁时，他成了一个公认的“冒名者”。为了让投机商号接受他的下注，他



戈爾康達

第四章 与猿猴如此相像

不得不使用假名,并乔装打扮,但却常常白费功夫。太多的成功让他有了失落感,因此在世纪之交的前夕,他来到了赫赫有名的华尔街。起初,他在陌生的环境中遭遇了几次挫败,但之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前夕,凭着直觉卖空了联合太平洋股票,从中赚取了一大笔钱;1907年金融大恐慌时,他对整个股市发起了适时的、大规模的、破坏性的卖空攻击,以至于傲慢的摩根公司也注意到了这位30岁的外来暴发户,并派使者告诉他收敛一点。第二年,他在试图垄断棉花市场时赔了一大笔钱。之后的10年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最终在战后大萧条时期的一次卖空中成为了一代富豪。这是他第三次大发国难财,由于这次卖空行为被充分如实地报道,他成了众矢之的,他因而备感疑惑。买空是合法的市场交易,难道卖空就不是吗?如果不是,市场怎能存在?为什么会有伦理问题牵涉其中?如果你接受市场体制——就像那些指责他的人宣称的那样——他就是对的。

20世纪20年代,利维摩尔是股市中的一个隐形精灵,人们害怕他、羡慕他,他的电话有时会被窃听,他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但是他的面容却很少有人见过。股市上涨时,人们就会有传言,报纸也会报道说利维摩尔正在大量买入,进行买空攻击;股市下跌时,就会有传言说他在重操卖空的旧业。传言时真时假;利维摩尔始终不露声色。他常常独来独往,秘密行动。虽然他曾在20年代初为别人操纵过集合基金,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加入他们、与他们联盟,而是喜欢自负盈亏。20年代后期,他的营运基地是第五大道某栋大厦18楼上的一套秘密办公室。办公室就像是一家大型经纪事务所,装备了私人电报、多部电话以及由年轻职员实时更新的标准行市记录板,还有一群训练有素的统计员向他提供即时信息。对于人们的询问,门卫和电梯操作员会回答说并没有这样的办公室;电话公司则回答那些查询他电话号码的人说,他的名字没有登记在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进行他的个人投资。

这样,利维摩尔传奇出现了,但是注重事实、痴迷于金钱的利维摩尔并未故意助长传奇之说;传奇并不适合他。他偶尔写下或说出的话有着华尔街少见的坦率,他把股市称为游戏,在谈到利润时也会不说什么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这样的老生常谈,而只是说“赚钱”。对于自己利用行情机纸条来“操纵”或“宣传”股票的行为,他毫不避讳;在他看来,只要不是“故意误传信息”,操纵就合乎游戏规则,而他也确实从未故意误传过信息。

他的业余生活也和他对金钱的痴迷息息相关。他拥有游艇、专车和漂亮女人，还在好几个国家拥有华丽的房产；但是当他在棕榈海滩(Palm Beach)、杜维(Deauville)或是戛纳时，曾一次又一次受预感的驱使而冲向最近的电信局或经纪事务所，随后缩短他的假期匆匆回到他唯一的家——华尔街。他从来都没学会都市社交的优雅举止，显然，他也没有试着去学过。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对他的胃口。他喜欢说这样一个故事：当有人问一位股票交易者：“你怎样看巴尔扎克？”这位交易者回答道：“我从来不在场外交易股票。”这位股票交易者很可能就是他自己。他对刻板的宗教不感兴趣，但有一次，在他向一位朋友解释某次失败的原因时，新英格兰加尔文教在他身上残留的影响表现了出来：“这可能是上帝对我的磨炼。”这样说来，他的成功当然也可能是上帝的安排。

为什么这样一个诚实而简单的人会有如此消沉的一面？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他对金钱的痴迷是一种严重的缺陷；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喜欢幻想的欧裔美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而真正的原因则是他几乎实现了当时盛行的美国梦，却最终功亏一篑。然而，我们同情他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他的鬼魂可能会跳出来指责我们是伪君子，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称呼他。

其他来到戈尔康达的出色投机者都有着不同的自然和社会背景。其中有来自于汽车行业或芝加哥谷物交易场的西部人：威廉姆·C.（“比利”）·杜兰特[William C. (“Billy”) Durant]，他是南北战争时期密歇根州州长之孙，通用汽车的创始人，但却早已离开了这家公司，到1925年，他在股市中已经赚了3笔、赔了两笔，他与百万富翁费希尔兄弟（“费希尔团体”）[Fisher Brothers (“Body by Fisher”)]及其他西部人组成的大规模买空集合基金被戏称为“富有男孩”；亚瑟·W. 库顿(Arthur W. Cutten)，他在谷物交易场精确的、近乎学究般的运作使他成为了美国名列前茅的富人之一，尽管他像忠诚的中古边境地区的人一般，对纽约怀着无情的强烈憎恨，但他还是在1925年来到了华尔街，以期征服新的领域。但是，他们之中最团结的非来自于东部城市的爱尔兰人莫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

四

这些人一直被旧时的华尔街贵族、新教徒和犹太人看作是奴仆。但现

在,情况当然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这些爱尔兰人参与大城市的政治和民主党派,并积极反对禁酒令,阿尔弗雷德·E. 史密斯(Alfred E. Smith)就是他们之中的斗士。1928年,他在总统大选中因宗教问题而被击败,这场恶斗显示,新教统治下的美国并不欢迎爱尔兰人的崛起。华尔街的爱尔兰人以身为爱尔兰人和信奉天主教为荣,从未梦想过成为摩根或昆恩里尔布合伙人。他们发挥自身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指挥所,团结一致对华尔街上早期的开拓者发起反攻和嘲笑。对他们来说,华尔街上最容易的奋斗之路是股票投机,他们选择的也正是这条路。

他们为股票投机带来了热情、诙谐和活力,这是抑郁的利维摩尔,严肃的、积极推行禁酒令的杜兰特,以及带着夹鼻眼镜、穿着硬领、很早就上床睡觉的库顿所缺乏的。他们的“发家”通常需要依靠那些认为他们有价值或有趣或既有价值又有趣的成功人士施以恩惠,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迈克尔·米亨,无线电公司集合基金的策划者,从戏票经纪人起家,曾在1917年为摩根、雷曼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及管理人员争取到百老汇热门歌舞剧的上座。这些合伙人 and 管理人员都非常喜欢这个胖乎乎、脸色红润、性格坚毅的年轻人。在其中一些人的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场外交易市场经纪人。他干得十分出色,几年后进入了证交所。他的事业就这样走上了正轨。10年后,他住在雪利-荷兰饭店,他的公司在证交所拥有8个席位,他是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约翰·拉斯克博(John Raskob)等所有民主党巨头的亲密好友,他的办公室墙上排放着小牛皮装订的莎士比亚著作。但是,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吵闹而玩世不恭,摩根、雷曼和高盛公司都极端敬畏他。米亨首先提出了在远洋班轮上设立经纪事务所分所的想法,他的公司在不来梅号、白兰盖里亚(Berengaria)号和利维坦(Leviathan)号航轮上设有办事处。有时,在决定进行卖空或买空操作时,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和他的助手会结队走入证交所,队伍中有迈克尔·米亨、埃斯蒙德·欧布莱恩(Esmonde O'Brian)、约翰·莫伊兰德(John Moyland)和J. P. 麦肯纳(J. P. McKenna)。在大量买进他钟爱的无线电公司股票的过程中,他在公司没有支付任何红利的情况下,将股价从1928年的不到85.25美元推高到了1929年的549美元。这无疑是个年代最轰动、可能也是最不光彩的股票操纵;一些评论员认为,正是米亨让公众爱上了股市,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年代种下了“人民资本”的种子。

被朋友们称为“本”的伯纳德·E. 史密斯(Bernard E. Smith)出生于世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纪之交,成长在纽约偏远的西五十区那破旧的爱尔兰居住区内。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卖报、流浪、卖车他都做过。后来,他成了经纪事务所的一名职员,并与事务所的富有新教徒客户交了朋友,被认为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确实,他没有经过雕琢——他一直是一个务实的、爱开玩笑的人,在他后来的岁月里,他大肆攻击了他过去的资助人所坚持和珍视的一切,这令他的玩笑具有了一种刻薄和尖锐的意味。他身材短小,肩膀宽阔,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张凯尔特人式的诚实的脸。战后初期,他回到股票经纪事务所,做了事务所经理,他讨好权贵的能力又有了用武之地,使他们在接受他帮助的同时喜欢上了他。1926年,在出身名门的司徒维森特·菲什(Stuyvesant Fish)的资助下,他成了证交所的成员。他早年在做汽车销售员的时候结识了珀西·洛克菲勒,如今,洛克菲勒成了他忠实的朋友以及集合基金中的合作者。史密斯参与过1928年和1929年的多次大型买空集合基金,其中的一些正是由他积极运作的。然而,虽然他在这些集合基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好斗的人。在1926年一次短暂的市场萧条中,他因为买空而破产,这次经历让他记忆深刻。本·史密斯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从来不沾烟、酒、茶和咖啡。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冷漠,你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或愤世嫉俗,透过柯立芝时代的繁荣,他看到了潜在的脆弱;对那些让他获得财富的轧花纸,他有一种鄙视,就像他鄙视那些制造繁荣景象、帮助他达到目的严肃、虔诚和有身份的富人。那时,知道他的人还不太多,但是他出名的日子即将来临。

波士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 Patrick Kennedy)与史密斯同岁,成长环境也有些相似,但成名和致富的时间却更早一些。他更有野心,更变化多端,可能也更无情。而且,与史密斯不同的是,他本质上是一个拥护国教的人,只等合适的机会表现出来。在辞去了海登斯通公司的卑微职务后,他在1922年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事务所的门上赫然写着“约瑟夫·P.肯尼迪,银行家”。作为一个进攻性的股票操纵者,他很快就出了名。1924年,由约翰·D.赫兹(John D. Hertz)经营、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黄色出租车公司,请他帮忙抵御一场严重危及公司所有者经济地位的卖空攻击。赫兹筹集资金组建了买空集合基金,而在波士顿接受过训练、凭借一台行情机和一组电话在纽约沃尔多夫—奥斯特瑞尔(Waldorf-Astoria)酒店出名的肯尼迪,十分精明地操纵着集合基金,击败了进攻者,终止了股价的下跌。他对这一切驾轻就熟,在月底就把所有的钱还给了集合基

金，还赚了一大笔佣金。几个月后，黄色出租车公司的股票突然又开始下跌，赫兹怀疑这次的卖空进攻者就是肯尼迪本人，因而威胁说再次见面的时候要对着他的鼻子来上一拳。这一拳始终没有兑现；也没有证据证明肯尼迪实施了这次背叛，但是为他作传的作家理查德·J. 威兰(Richard J. Whelan)却认为：“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1926年，肯尼迪带着他的一群正处在婴儿和少年时期的孩子(其中，约翰9岁，罗伯特还不到1岁)，和妻子一起搬到了曼哈顿北边的里弗代尔(Riverdale)，这样，他就不用每天穿越长距离来到华尔街工作。在之后的几年内，他成为了华尔街上重要的股票操盘手之一，专攻电影公司股票。

史密斯将金钱看作生活的均衡器；肯尼迪则不太在乎金钱，而将权力作为目标。威兰认为，除了技巧和无情以外，他最大的资产是他人所罕有的社会适应能力，这使他与米亨、史密斯和杰里迈亚·米尔邦克(Jeremiah Milbank)这样的华尔街贵族以及通用电气的欧文·D. 扬(Owen D. Young)这样的公司最高管理人员一样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华尔街希望爱尔兰人继续从事警察、消防员、走卒或酒吧招待这样的职业。与大多数勤勤勉勉、思维敏捷、在这个不友善的环境中奋力创业的爱尔兰小人物相比，他有着他们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但是，肯尼迪也有自己的局限。到1929年初，他已经成为华尔街上有钱、有势、有名的人物，甚至还因为不插手轻率的集合基金而赢得了明智谨慎的名声。此后的一天，他闲逛着走进了华尔街23号，漫不经心地要求见J. P. 摩根。他一定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精心谋划后才做出这样的举动的；他是一个老谋深算、不愿受到他人轻慢的人，他一定认为他的影响力已经足以让摩根有兴趣接见他，即便不是这样的话，也足以让摩根不敢冷落一个拥有如此地位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失算了，他很快就被告知，摩根先生没有时间见他。

五

与此同时，华尔街中流砥柱的心境却发生了改变。他们是华尔街上的尼克·卡拉维，是有着良好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来到了华尔街，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很可能成为华尔街和美国的领袖人物。那些下等投机者所取得的、被广为宣传的成功并没有将他们腐蚀；相反，他

们的改变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容易，因为职业生涯中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妥协，因为原本以为需要全力投入的事情其实那么容易就能做好。

他们的举止发生了改变。美国开国时期通才和泛才的传统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过去，人们不会在社交场合谈论生意，特别是不会与女人谈论生意。但如今，女人们自己也突然开始经常谈论生意，更确切地说是谈论股市。20世纪20年代初时，社会习俗发生了改变，性成为了人们最喜欢的谈资，但现在，有关性的玩笑已经变得令人生厌；又一次的社会变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同样令人着迷的话题。谈论股市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女投机者的数量如今已经达到了数十万。经纪事务所为她们设立了单独的行情室，这样她们在关注行情机纸条、讨论行情时就不会受到男性的干扰了；如果女性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很大的赌瘾，那么她们终于迎了解放，从此可以公开真正地放纵这种激情了。华尔街的年轻格拉海德们（在亚瑟王传说中，他是圆桌骑士中最纯洁的一位且独自一人找到了圣杯。——译者注）为她们出谋划策，并接受她们的赌金——在餐桌上，当所有的女士都希望谈论无线电、钢铁和阿那孔达股票时，他们怎么能把谈话转移到更传统、更高雅的话题上呢？而且何必要这么做呢？过去一直被这些年轻经纪人心虚地当作行话的语言突然间变成了时尚的社会流行语。

不论是在低级沙龙还是高级沙龙里，随处可见这样的谈话。一位敏锐的英国记者在来到纽约之后写道：“你可以谈论禁酒令、海明威、空调、音乐或是马匹，但最后你一定会谈到股市，只有到了这时，谈话才会变得严肃。”多样化的传统在美国社交谈话中暂时消失了。

比行话更糟糕的是年轻华尔街人不断膨胀的绝对正确感。让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人——我们叫他利兹。他是新英格兰教士的后人，成长于教士管辖区。他毕业于哈佛，战争时期是一名勇敢的空军战士，之后成为了一名经纪人。他谦虚、坦率、可爱，很快就在这一行崭露头角。他的姨妈以及哈佛的朋友们把自己的钱委托给了他，最初金额还不小，之后股市的上涨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大方，对他们来说，利兹是一个新兴的金融天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繁荣的逐渐显现，利兹为客户赚取了越来越多的钱，甚至是大笔财富，他自己也因为收取了佣金而变得富有，但他总是以礼貌、严谨的态度，将自己冷静审慎的判断提供给客户，让客户受益。有些经纪人可能不会这么做（当然会有这样的经纪人）；但对他来说，这是他的原则。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他喜欢诙谐、自嘲地解释说，他比较欣赏那些自己不喝酒的酒吧招待。因此，他与生俱来的道德心不仅得到了宽慰，还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渐渐地，在利兹的心里，生意几乎成了一种社会服务、一种生活准则。随着他为别人赚取的金钱越来越多，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拥有非凡的天赋，认为自己对客户贡献越来越大。

大多数其他经纪人也为客户挣了大笔的金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纪人想不赚钱也难。尽管如此，那些在股票交易中获得成功的人，甚至是专业人士，几乎总会认为他们的成功差不多完全是靠自己出众的才华赢得的。现在，利兹的朋友和客户开始发现他的绅士风度渐渐变成了傲慢。他们开始注意到，他对待他们的态度中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有时在他喝多了以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他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令人生厌的家伙。在人们膜拜股市的年代，他把自己看作是大祭司。之后，这种改变完全渗透到了他的性格之中；他渐渐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的行为准则开始腐化，自制力也开始降低。他们不得不承认，利兹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利兹了。他们本应该对他说：“邪恶在大地上蔓延，急切地搜寻猎物，大地上堆积着财富，而人类却在堕落。”但是他们却没有。

但是，即便人人都参与股市，财富也不会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因此，大繁荣时期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包含着失望、后悔、恶意的指责以及眼看着别人发财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往往会忘记，有喜必有悲，有自负必有自卑。只要有一个买入者，就会有一个卖出者；只要有一次挣钱的买入，就会有一次赔钱的卖出。许多人更关注自己近期抛出的股票，而不是那些仍然握在手中的股票；因此，他们沉溺于幻想之中，而不顾现实，热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过去的举措是正确的，而不去规划未来。简而言之，这就是人性。想一想那些在1926年或1928年时退出股市的人吧，在整个（或几乎整个）1929年间，他们每次浏览报刊的金融版时，都会咒骂自己因为愚蠢的谨慎而使财富从手指缝中溜走。

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们和约翰·J. 雷克伯(John J. Raskob)们在电台、畅销杂志和畅销书上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抛售股票就是小瞧美国，这不仅是愚蠢的行为，更是彻头彻尾的不爱国行为，而且还可能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行为。（巴顿的《无人知晓之人》是柯立芝时代最畅销的书之一，书中提出耶稣是“第一位商人”，他的布道是所有时期最有效的广告。）但是人们的脾气并没有因此而变好。那些错失了机遇的人怀着一种



焦虑和损人不利己的情绪,这种情绪与拥护者的冷漠谴责一样,都是当时美国人的普遍心理。听听精明的地产律师巴尼·温克尔曼(Barnie Winkelman)是怎么说的吧:“少数交易者能够不带任何感情地进行金融游戏,无论赔钱还是赚钱,他们都能迅速平静地接受。但是普通人却不适合做这种决断……只要有买卖发生,就会有许多后悔和懊恼。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只要证券或地产的抛售价格略低于最高价,就足以让他们在追悔中度过余生。”大繁荣时期退出股市的许多输家都期待着股市崩盘,以便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从而结束自己对他人的嫉妒。那个时代的人们就处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绪之中。

1929年踏上美国土地的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在描写他眼中的美国时,否认美国过于现实主义。他发现这片“奇异的景象中”蕴含着一些“悲壮甚至高贵”的精神,“这是古老的美国梦的一种简要体现……如果说美国人对股市繁荣的态度证明了什么的话,它证明的是美国人相信奇迹……他们相信,如果你足够努力的话,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但是,几年前,另一位聪明的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较为阴郁的文字描写了那些令人尊敬、有责任心的人们在过度投机时代所遇的事:

随着财富的快速上下波动,商人丢失了保守的本性,他想得更多的是立即大赚一笔,而不是利润较少但却较持久的常规业务。在他看来,企业较长时期内的稳定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快速赚钱、随后撤资的想法让他激动不已。他的巨额收益是意外获得的,他并没有过错也没有存心设计过,但是一旦得到了,他就不会轻易放弃……有了这样的冲动,商人的内心隐隐感到焦虑。对于自己的社会关系、作用以及在经济系统中的重要性,他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作为最值得尊敬、最令人称赞、最重要的人和阶级中的一员,他……现在正渐渐成为一名唯利是图者,对此,他自己也有些负罪感。

当然,凯恩斯并不是特指美国人。但是,在1928年和1929年的华尔街上,从有身份的人直到最高阶层都有一种半罪恶的感觉。

第五章 土崩瓦解

一

最理想的金融巨头公开论坛是跨大西洋游船上的会谈。在那个年代，华尔街的上层人士每年夏季都会赴欧洲进行商务休闲旅游。由于没有跨大西洋航空服务，人们前往欧洲必须乘坐远洋班轮。乘客名单是唯一能够向公众提前透露某位大人物行踪的常规渠道，也是记者们随时都可以轻易获得的。因此，每年的6月和7月，随着夏季逐渐将这座城市变为一个直至劳工节（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或之后都断断续续冒着热气的大锅炉，随着北河码头上回荡着巨轮远去的汽笛声，报刊记者们从名单中挑选出摩根合伙人、证交所官员或知名集合基金操纵者的名字，怀揣着纸笔，在开船前一刻想方设法登上甲板寻找这些大人物。

而大人物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拒绝采访或躲在特等舱中。但是，他们往往不愿这么做。相反，他们有时会在离开或到达时发表公开声明，而媒体总是称之为“罕见”。由于他们上船的事是公开的，因此，他们得以做出一副因无法推托而勉强接受采访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常常在登船前就精心准备并熟记了所要发表的声明。这种情况使他们有机会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同时又对外维持了保守沉默、难以接近和庄重神秘的传统金融形

象。

因此，每年的初夏和初秋，报纸上都登满了这种“通常难以接近”的富豪们所发表的“罕见”的公开声明，有时候股市也会因这样的声明而震荡。大型班轮引起了美国金融界的连锁反应。大人物们前往欧洲，股市回应着他们的乐观言论，喊着“一路顺风”；他们抵达了南安普敦或勒阿弗尔，股市欢呼着“好极了”；他们的巨轮回到了纽约，温克尔曼这样写道：“证交所内传出震耳的欢迎声。”

1926年7月31日，周六，午夜左右，摩根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刚刚登上即将在清晨启航的奥林匹克号班轮，以便在船出发之前睡一觉。他接受了船上一位报刊记者的采访。下一周的周一，中午刚过，道一琼斯财经新闻收报机将采访结果传进了华尔街和全国各家银行以及经纪事务所。据报道，科克伦在采访中说道：“通用汽车目前的价格偏低，这只股票的售价应该也将会上涨至少100点。”

毫无疑问，许多订阅道一琼斯的人都擦亮眼睛再一次盯着新闻显示牌。当一位记者问起股市的走向时，老J. P. 摩根闪烁其词地回答道：“股市将有波动。”显然，时代已经改变了。华尔街23号的领军人物居然屈尊俯就，以经纪事务所里喋喋不休的电话销售员通常使用的言辞，吹捧某只股票，预测它未来的价格。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跌眼镜。事实上，正如《纽约时报》之后所称：“这一事件是华尔街上前所未有的。”然而，科克伦是通用汽车的内部人士，与通用汽车有着一种类似信托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摩根公司则是通用汽车的庄家，持有大量通用公司股份，部分摩根合伙人还是通用汽车的董事。由于通用汽车最近刚刚召开过董事会，又由于摩根合伙人习惯相互交流，因此，有理由相信科克伦知道董事会上发生的事情，他的话似乎就是所谓的“给料箱秘密消息”——尽管摩根公司的圈内人士并不这么说。

数分钟之内，证交所超过半数的经纪人和交易者聚集到了通用汽车股票的公告栏前。当天交易结束之前，这只股票的交易量超过了25万股，价格也从189.5美元上涨到了201美元。第二天的情况也差不多：交易所的其他股票以及其他公告栏都被忽视了，人们疯狂地买进通用公司的股票，股价进一步上涨了12.5点。周三，远在千里之外的海上但却充分了解了此次骚动的科克伦发出一份公开电报，否认在采访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没有“允许”预测股价的言论被发表，但他承认接受过采访。华尔街不难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猜出发生了什么：随船记者违反了摩根合伙人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除非经过特别许可，他们所说的话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与帝王和总统所坚持的原则是相同的。科克伦从海上发来的信息挽回了他 在合伙人面前的颜面，但是，他和他公司的行为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正常一些。不管他承认什么，事实仍然是：他，显然是在合伙人的许可下，大肆宣传了他们所感兴趣的股票。

第二天，通用汽车股票继续上涨，《华尔街日报》称赞了科克伦的率直，表示公司内部人士将内部利好消息透露给公众而不是保留消息为自己所用，这是公共精神的体现。但是，这绝对是一种异端邪说；事实上，科克伦并没有透露任何秘密，就算他确实透露了，这样的“泄密”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操控行为；公司透露利好消息的正规途径理应是公司声明，而不是内部人士泄密。很快，这一秘密消息就体现出了其价值——8月12日，通用汽车宣布50%的股票分红，对于股东来说，总价值相当于6亿美元，这很快就将公司股价推至新高。这样，那些听从了科克伦的话的人都赚了大钱，科克伦这样的内部人士可能也赚取了大笔金钱，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他可能确实可以说是在为公众谋利。但是，更重要的是，摩根公司走下了受人尊崇的宝座。可能仅仅是这一次——记者的疏忽或恶意也许是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摩根公司放下架子哄抬价格，屈服于投机大潮中随心所欲的价值观。

一切都土崩瓦解了；中心已经不复存在；

全世界都处于混乱状态。

二

1927年事态还没有明显恶化；相反，大繁荣在那一年达到了高峰。科克伦采访事件的一年后，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落到了当年最高点的一半。当年5月，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机从纽约飞抵巴黎的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航空股，从而使情况有所好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增加了国民对生活，尤其是美国生活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就算美国或其他国家过去从未有过股市又怎么样？现在也会有一个。大繁荣也并非完全是人们的愿望和幻想；虽然接近年底时出现了一次轻微的不景

气,但是交易情况却非常好,股市因而得到了有力的支撑。人们一致同意以柯立芝总统的名字命名这次大繁荣,要描述这种新的精神,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他在1927年11月17日说道,美国正“进入一个繁荣新时代”。“新时代”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词的意义是,永久的繁荣、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的旧时代的终结、美国人民财富和存款的稳步增加以及股价的持续上涨……

只有一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为了在股市的繁荣中分一杯羹,越来越多的人借钱投资股票。他们向经纪人借钱,这些经纪人允许(或者不如说是鼓励)他们在交纳现金保证金后购买股票,有时保证金非常少,大约是购入股票价值的10%或20%,而其余的金额都是借来的;经纪人转而再在所谓的短期同业拆放市场上向银行借款。多年来,人们一直如此操作,但是现在,银行对经纪人的贷款总额突然猛增,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华尔街的信贷结构开始有些摇摇欲坠。人们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也建立了控制机制。为了通过贷款主利率和银行储备金来规范信贷秩序,国会在1913年设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维持货币的稳定,而不受任何政治指令,包括总统指令的控制。

1927年,作为经济监管者的联邦储备银行本应该通过提高主利率,即所谓的贴现率,来限制股市信贷的大肆扩张。但是,它却背道而驰。在7月27日一次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会议上,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们做出了一项决策,降低而非加大人们借款的难度。这就相当于警方在可能发生暴乱的时刻向街上的人们发放枪支,这一决策被认为导致了日后许多不愉快事件的发生。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者,是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上最接近哲学之王的人。

他就是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奉献精神的中央银行家。他高大英俊,鼻子很大,眼神冷峻,一副典型的摩根合伙人形象,深藏不露的忧伤、糟糕的健康状况和苛刻的自我驱动折磨着他。他1872年出生于哈得逊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他的家族来自于美国北部,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商业和贸易,但并不富有。他想到普林斯顿读书,却一直未能如愿,反而从16岁就开始在华尔街上工作。1898年,结了婚并有了4个孩子的他,举家搬到了英格伍德市郊,当时那儿是摩根合伙人的聚居地。在那里他结交了一些大人物,包括



亨利·戴维森、托马斯·拉蒙特，后来还有德怀特·莫若。要不是情况特殊，他原本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成为一名摩根合伙人。1900年，他被任命为英格伍德医院的财务主管，医院的院长是比他年长5岁的戴维森。1904年，戴维森任命他为美国信孚银行秘书，1909年又任命他为副总裁；这两个职位的前任都是托马斯·拉蒙特。很显然，他乘坐的是驶向证交所的直通车。但是，1913年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了（很大程度上，这是应对1907年金融大恐慌的迟到的对策），其创始人中的两位大银行家——戴维森和昆恩里尔布的保罗·M. 沃伯格，决定任命戴维森的门徒斯特朗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有趣却也在意料之中的是，当人们决定对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的规范时，摩根和昆恩里尔布会选择这样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起初，斯特朗拒绝了。由国会批准的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由地区银行网络组成，受命于华盛顿的董事会，斯特朗与戴维森和沃伯格一样，不赞同这一系统结构；和大多数华尔街人一样，斯特朗认为这样的结构必然会使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受制于政治力量，尽管国会否认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希望仿效英格兰银行，在纽约单独设立中央银行。但现在，在戴维森和沃伯格的坚持下，他的态度软了下来；1914年，他就任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他的生活十分不幸，而且注定要变得更为不幸。1905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自杀了（戴维森把斯特朗的孩子带到了自己家中）。1916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弃他而去。同年，他染上了肺结核，在《魔山》[发表于1924年，作者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译者注]那个年代，肺结核还被称为可怕的“白色瘟疫”；肺结核先是侵袭了他的肺部，随后是喉部，这让他最辉煌、也是最后的12年中有超过1/3的时间无法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但是，他的思想从未离开过工作。情感和身体上的不幸促使他更努力工作，即使是在疗养院中或阳光假日期间，他也无休止地向银行的同事们发出大量圣旨般的便笺。他为中央银行而活，因为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铁了心要做的事情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整个联邦储备系统中拥有实际的终极支配力量，而这正是国会不愿意赋予其的权力。

在很大程度上，他成功了，部分是因为他的银行在美国货币中心中拥有便利的优势地位（其他所有的中央银行理所当然也拥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他人格的力量，还有部分是因为他在华盛顿的大部分对手——早期的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都是一些平庸的、不合格的政治委派员。例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如,1927年的一位董事来自于俄亥俄州的马里恩,是沃伦·G.哈丁的亲信,在银行界没有任何背景。那时,斯特朗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尽管病痛使他很少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但是,作为银行家和领导者,病床上的他拥有至高的权力,是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真正统治者。“联邦储备银行”就意味着“本杰明·斯特朗”;离开了他,联邦储备银行就什么也不是。如今,他把满腔热情投向了欧洲复兴,投向了为此而进行的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也许,热情背后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这个孤独的人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之间的深厚友情。

不论是出自何种原因,孜孜不倦的斯特朗在战后初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国际货币合作——不是由国际联盟实施的一些毫无成效的政治性官方合作,而是一种较为私密、专制的合作,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秘密地躲在紧闭的、由门卫守护的门后,一边品尝美酒佳肴,一边商谈着合作事项。斯特朗和他所钦佩的摩根合伙人一样,本质上都是亲英派。1925年,英国恢复了金本位,1英镑的价值回到了过去的4.86美元——英镑的价值被过高地定位,反映的不是实际的经济情况而是对英国过去辉煌的怀念,斯特朗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甚至可能是关键的作用;若非斯特朗安排联邦储备银行向英国贷款2亿美元,并促使摩根财团向英国贷款1亿美元,金本位可能无法恢复。但是,在1927年,斯特朗发现自己在国内饱受压力。一个受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秘密支持的新兴团体,开始竭力主张提高贴现率并制定更严格的货币制度以打击股票投机。对于斯特朗在欧洲中央银行的朋友,尤其是诺曼来说,这样的制度将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诺曼曾特地前往纽约,要求降低美国的利率,以便阻止欧洲的黄金继续流向新世界的戈尔德康达,从而保护处于危险境地的英镑。美国许多其他官员,不管是支持哪一方,都另有目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大多发生在幕后,贯穿了1927年的整个夏季,很好地体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胡佛,这位严谨的工程师,主张抑制;尽管胡佛敦促柯立芝对联邦储备银行施压,但柯立芝却以联邦储备银行在法律上不受制于总统为由,一如既往地不采取行动找到了法律借口;梅隆,这位热衷商业的财政部部长,完全赞同维持低息贷款来实现持续扩张;而卡特·哥拉斯(Carter Glass)和少数其他议员则强烈抗议说,联邦储备银行政策实际上把所有可用信贷的额度都分配给了华尔街,因而进一步损害了那些苦苦挣扎的美国农民的利益。

斯特朗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屑一顾。他不是“新时代”的人,不是柯

戈尔德达往



第五章 土崩瓦解

立芝或梅隆的傀儡；相反，他自有一套固执的想法，那就是美国必须拥有低利率，以阻止欧洲黄金的流入。这部分是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美国的影响，部分是为了挽救欧洲经济。第二个目的似乎反映了他头脑中的一个执著的想法。与其他中央银行家一样，斯特朗是一个经济国民主义者，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必定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首位。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尚不清楚美国利益究竟是什么，他与英国、与诺曼的关系支配着他的思想。那年春天，斯特朗在北卡罗来纳休养时，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似乎有了变化。夏天，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重返工作，联邦储备银行也开始了行动。8月，联邦储备系统的大多数银行突然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了3.5%。对欧洲的不幸极其担忧的堪萨斯城就有一家联邦储备银行在此之列，当有人惊讶地询问这家银行的行长为何要这么做时，这位行长回答：“是本杰明·斯特朗要我这么做的。”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没有这么做，它行使特权拒不服从董事会的意愿，除非董事会对其下达直接命令。9月初，在斯特朗的要求下，董事会打破先例，直接命令芝加哥银行调低贴现率。对于斯特朗来说，此次胜利的代价是内部分裂。在董事会的投票表决中，他只赢得了7票中的4票，他的统治权正在渐渐削弱；但是，他仍然是统治者，调低贴现率的举措也落实了下去。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股市一路大涨，信贷也以空前的速度扩大。1928年1月初，根据通告，1927年经纪人对股票投机者的贷款额从前一年的32.9亿美元暴增至44.3亿美元。一年之内上涨这么多是前所未有的，当柯立芝说他认为这样的上涨尚不足以引起不利舆论时，就连华尔街也目瞪口呆。那年3月，集合基金操纵达到了最高峰；当月，纽约市凯迪拉克汽车的销量也创下了新高。3月27日，证交所的成交量打破了纪录。4月和5月的情况也一样。5月中旬，证交所的日成交量居高不下，以至于春夜深了，华尔街上的办公室窗户中还透着灯光。布鲁克林高地的圣乔治酒店是离华尔街最近的酒店，每天深夜，那里都会迎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客人，他们都是在金融区工作到太晚以至于无法回家的人。据证交所的医生报告，虽然证交所的成员时常加班，但是最近并没有人精神失常。“他们都在赚钱。”他淡淡地说道。

至于斯特朗，他现在正在伦敦。他最后一次病倒了，有着朋友诺曼的陪伴，他感到十分欣慰，他终于放松了对联邦储备银行的控制。前一年推行的政策达到了目的，这足以让他心满意足了；目前看来，英镑和欧洲经济

都更为坚挺了。但是,当他读到华尔街的新闻时,他一定问过自己: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三

[昨天]华尔街的牛市崩盘了,对全世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声惊雷……热门股下跌了 23.5 点,场外交易股则下跌了 150 点之多……那真是骚乱的一天,意外事件爆发,公众都竭力抛出股票。个人损失非常大。上百个小额交易者被扫出局……

全国上下的股民都在抛售股票。他们从纽约的经纪事务所、从美国各地涌入证交所……

刊登这条消息的是严肃的《纽约时报》,日期是 1928 年 6 月 13 日(再重复一遍:1928 年)。如果说此次崩盘对应的是某一事件的话,那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意识到,虽然大繁荣的支持者柯立芝所说的话都是认真的,但他却无法再在白宫连任。但是,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有其他的事引起崩盘;在这一时刻,股市崩盘需要的是借口而不是原因。

这次崩盘持续的时间很短;惊雷并没有反复。数日内,6 月 12 日的损失都挽回了,股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至新高。到 8 月的时候,道一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 6 月的低谷时期高了 20%,到 11 月,高了 50%。

所有这一切仿佛只是大繁荣的引擎咳嗽了一下,随后又继续像过去一样平稳运转了。问题是:这次咳嗽意味着什么?到底是无关紧要的偶发事件还是停机检修的时间到了?美国上下,包括华尔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存在分歧。如今,人们都像事后诸葛亮一样,指手画脚地说着谁是明智、有远见或幸运的人,而谁是受骗上当或不幸的人。

让我们再回到 1928 年初,一群议员对不断增加的经纪人贷款和股票投机发起了责难。他们所持的是早已渗透到美国生活之中的农业利益和平民主义论点,即华尔街的大亨们正在吞噬美国的货币供应,因而使真正的生产者——农民受到了剥削。毫不奇怪,发起责难的议员大多来自于边境和中部边地的农业州,如爱达荷州的波拉哈(Borah)、艾奥瓦州的布鲁克哈特(Brookhart)、堪萨斯州的凯波(Capper)、威斯康星州的拉·福利特(La Follette)、得克萨斯州的梅菲尔德(Mayfield)以及俄克拉何马州的派



恩(Pine)。这些地区的人们往往还保持着美国初期的生活态度。对那里的许多人来说,一天以日出为开始,日落为结束;禁酒令和更为严厉的新教在那里处于统治地位;那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怀疑东部海岸,尤其是纽约充斥着非法沙龙、怪异的生活方式和放纵的股票赌博。一位评论员写道,这样的纷争体现了“沿海地区富有、高雅、保守的人士与内陆地区贫穷、未受过教育的激进拓荒者之间在利益、道德和理性好恶方面的冲突”;他还继续写道:“农业地区的人们都是清教徒,他们发现,有人“不做任何事”就能得到老实人通过辛勤劳作才能得到的肥沃土地,对此,他们本能地厌恶。”这种漫画似的描述过于简单了。一方面,早期新英格兰有所成就的清教徒农民都是惯赌,他们通过彩票资助了独立战争;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投机者中,有许多既不是有教养的保守派人士,也不是东部海岸人士。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在1928年2月和3月就经纪人贷款问题举行了听证会,期间,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谴责有钱有势的股票投机者,控诉他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两次听证会让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加两极化。自那时开始,人们普遍认为,东部地区认同、促进大繁荣,而西部地区则害怕、怀疑和憎恨大繁荣。尽管有柯立芝、梅隆及其同盟者,自1928年起,美国上下对股市的看法还是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几年后爆发的对股市的仇恨并不是空穴来风。

即便是“富有、高雅、保守”的东部——华尔街本身——也开始分裂。当然,证交所不会出现分裂,那里的权威人士一致为投机辩护,因为投机毕竟是证交所主要的业务,造就了证交所的盛况。但是,在大型投资银行内,甚至是强大、统一的摩根公司和昆恩里尔布公司内,分裂开始悄然出现。在摩根公司,托马斯·拉蒙特是坚定的新时代人,对股市情况不佳的说法嗤之以鼻,而拉塞尔·莱芬韦尔则公开对股市持怀疑态度。在昆恩里尔布公司,奥托·卡恩是大繁荣的绝对支持者,他本人还投资了巨额资金,而1928年和1929年期间与他密切合作的同事保罗·沃伯格则反复预言,除非投机得到控制,否则股市将会崩溃,他因而渐渐有了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布莱姆的一个女儿,能预知祸事。——译者注)的名声。

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的意见也非常不统一,这在惩治任性的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时初露端倪,当时,赞成票与反对票几乎相等。1928年,在政治压力下,由于斯特朗的病情恶化而失去内在动力的董事会逐步废除

佑你，我永远的爱。”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动了一次手术后，斯特朗于 10 月在纽约去世。

上帝保佑本杰明·斯特朗！后来，胡佛曾指责他“犯下了比谋杀还严重得多的罪行”，金融历史学家指责他是 1929 年股市崩溃的唯一主要原因。但是，他比大多数诋毁他的人都要好得多，是命运和他自身悲剧性的缺点诅咒着他；如果他可以多活一年，他一定会全力关注美国的情况，他可能会坚定及时地拨乱反正。但事实上，他像许多大人物一样，留下了权力真空——一个软弱、分裂、缺少大胆领导者的破碎机构。当分裂变得令人无法承受时，一切就真的土崩瓦解了。

四

1929 年初纽约的银行家要怎样做才能赚钱呢？他可以在可能的时候以 5% 的利率向联邦储备银行借款，随后再以 10% 或 12% 的利率在短期同业拆放市场上将这笔钱转借出去。就是这么简单；这两项交易都是老套路了，无需什么商业头脑，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风险，虽然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在 2 月初就开始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是情况却没有任何改变。银行家就像是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皇室，他们只要存在就能获得丰厚的报酬。在他人的栽培、浇灌下开花结果的李子树，却由他们来摇树收获。这种情况无疑是由失误引起的，美国人民和政府都不会有意赋予银行家皇室的权利，但是一种与之相去不远的思想却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说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因素。

具体来说，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虽然联邦储备银行做了一些努力来限制股票投机，但是投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在 1929 年 1 月期间增加了，当月，股指进一步上涨了 20 或 30 点，经纪人的贷款额进一步增加了 2.6 亿美元。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抛售国债的举措 2 月 2 日完全失败了。2 月 2 日，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它所谓的“直接行动”，而外界则称之为“道德劝说”。它公开宣布，它相信“《联邦储备法案》不……考虑运用联邦储备系统的力量来创造或扩大投机性借贷”。换言之，暂且不要再摇晃李子树了。如此突然地对长期以来的标准操作实施禁令，这样的做法几乎是无法执行的，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联邦储备银行又开始呼唤美国银行



家体内的善良天性。或者说,当时软弱而优柔寡断的联邦储备银行只是试图挽回颜面、免除良心上的谴责,就像比拉多(Pilate,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译者注)那样洗净自己的双手。显然,联邦储备银行似乎并不想使它的意愿得到有力的贯彻。三天后,它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它“不打算行使干预成员银行贷款业务的权力,只要成员银行不使联邦储备银行牵涉其中”。声明发表后大约过了一周,联邦储备银行在向众多成员银行发出的信函中,以近乎恳求而非命令的语气提醒成员银行,“尽可能”防止资金流向投机的责任现在落在它们的肩上了。

不管怎么样,投机仍然继续着。当时,美国公司,甚至是受高涨的利率所吸引而进入纽约货币市场的亚洲当权者,使得联邦储备资金大大增加,而联邦储备资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资助着投机。联邦储备银行此番作为的主要结果是股市在3月份又一次暴跌,可算得上是一次小规模崩盘,最后,在一片要求更多短期同业拆放款的呼声中,放贷款利率从12%飞快上升到了20%,股市也在26日跌至最低点。据此,大银行家——强大的花旗银行的总裁查尔斯·E. 米歇尔(Charles E. Mitchell)置联邦储备银行的警告于不顾,冷静大胆地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他简明地宣布,花旗银行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贷了2 000万美元的可用资金,花旗银行乐于即刻将这笔资金借给投机者。反叛成功了。困境解除了,恐慌避免了,短期同业拆放利率跌回至15%,股市也止跌上扬。一夜之间,反叛者米歇尔成为了美国的英雄,他取代了柯立芝一跃成为大繁荣的伟大支持者。受了伤害和侮辱的联邦储备银行,不敢对米歇尔采取任何行动,而只能愤愤地保持沉默。它再一次被击败了。

因此,银行家们又可以继续毫不愧疚、自由自在地摇晃李子树了。政府的“干预”颜面尽失;现在做什么都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会希望银行家们,至少是那些最举足轻重、最有威望、最保守的银行家们能够保持低调,静静地接受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利润,并且利用大好的市场(他们中的一位后来严肃地称之为天赐的市场)来进行娱乐、文化或学术活动。但是,他们大多个性强硬,自学成才,缺乏专业背景,也不进行什么休闲活动。他们是那种不知疲倦、能干却目光短浅的人,是那个时代的体制和精神使得他们的事业在除了摩根和昆恩里尔布等少数几家传统公司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达到了顶峰。他们必须找些事情做,他们也确实找到了。

五

在旧时的美国，银行家小心谨慎地守护着传统的价值观和他人的钱财。但正是这个成功击败了联邦储备银行的查尔斯·E. 米歇尔，在大繁荣时期不遗余力地摧毁了银行家的这一形象。他高大强壮，有着宽阔的肩膀、温和的性情和宽大的下巴，面容显示出的是权力而不是感性，他天生就是超级推销员。在他看来，他的银行——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不是贷款存款，而是兜售证券，包括普通股。这本身就够反传统的了，银行家应该清楚地了解证券，对于除真正蓝筹股之外的其他证券一概持怀疑态度。但是，米歇尔却在反传统方面走得非常非常之远。他不满足于带着银行家惯有的判断力等待客户上门咨询证券，他认为应该主动兜售产品，应该走进城乡寻找客户，必要的话还应该将产品信息反复灌输给人们。法律的确限制银行从事证券交易，但是，米歇尔的银行（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银行一样）却利用“证券分公司”这种很容易识破的诡计，傲慢而轻易地绕过了法律的限制。证券分公司是一家独立的皮包公司，由银行完全所有，其管理人员和董事甚至与银行完全相同。但是，证券分公司却因其名义上不是银行而能够自由随意地进入股市。F. L. 艾伦等人发现证券分公司是“一则出色的法律幽默”。

米歇尔及花旗银行的分公司花旗公司所采取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他只把证券看作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两样，并据此经营证券。他在全国各地雇用了上百名销售员，并要求他们像卖鞋或发油一样不停地兜售证券。根据精心制定的计分制度，销售员之间会举行竞赛，胜者将获得奖金——每售出一股通用磨坊公司普通股计1分，每售出一股MKT铁路公司优先股计4分，以此类推。米歇尔毫不保留他对其业务的看法，他习惯性地把证券交易称为一种“生产”，其过程与其他形式的生产并无二致。他曾经解释道：“我们机构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致力于生产长期信贷，以供公开销售以及其他生产商进行生产分析。”当然，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一张张纸，标价为每张上百或上千美元，象征着并不保证兑现的承诺。米歇尔的工厂生产的许多产品是由那些财政情况不佳的国家发行的债券。1927年，托马斯·拉蒙特不得不尖锐而明确地指出“美国银行和公司几乎

是争先恐后地”出售外国证券。

但是，摩根财团的谴责并没有让米歇尔止步。很快，他的花旗公司成功地售出了秘鲁共和国发行的两只倒霉的债券，这两只债券使得“秘鲁债券”多年来成为了毫无价值的证券的代名词。此时，米歇尔又将主要的工作转向了普通股。1929年，他的分公司推出了超过100万股高风险的阿那孔达铜业股票以及超过100万股他自己的银行——花旗银行的股票。那时，米歇尔的分公司正毫不顾虑地参与集合基金；他正利用银行存款人的金钱进行疯狂投机；他正积极游说花旗银行的其他所有者拿出现金购买银行投资的股票；米歇尔本人尽管基本工资只有2.5万美元，却迫使银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他丰厚的奖金，1929年上半年他的个人补偿金累计超过了100万美元。银行业的所有传统限制都被嘲弄了一番，所有的条条框框都被打破了，而打破这些条条框框的人绝不会屈服于任何责难，他正与金钱一起赢得普遍的认可。看一下中西部农业小镇上的旧式银行家是怎样的吧：与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他很守规矩地远离股票投机，十分谨慎地从事着当地的抵押贷款业务，他从来不会主动拉客，因为他认为推销与他职业中的信托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当人们在经纪人行情室中讨论他的酬劳时，他小心翼翼地离席而去。想象一下这样的人会如何看待查尔斯·米歇尔的所作所为呢？他可能会感到困惑，他可能会觉得全世界都疯了，而他自己则成了伪善愚蠢的老古板。

我们可以把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大通国民银行的老板艾伯特·H. 威金(Albert H. Wiggin)与米歇尔做一个比较和对照。他比米歇尔年长9岁，与米歇尔一样，也出身于波士顿地区的普通家庭。在发展的道路上，两人都曾面临美国成功金融家们所遇到过的标准的环境障碍——威金是一位牧师的儿子，米歇尔大学期间一直勤工俭学；他们都是从最卑微的职位起家的；两人均在早年就成为了大银行的总裁，威金43岁，米歇尔44岁；他们都目光敏锐，积极进取，坚持不懈，很少有运动或文化等业余爱好。但是两人的性情却截然相反。米歇尔有着狂欢节叫卖者般的伶牙俐齿和爽直的好脾气，而威金却作风保守、近乎学究气。在处理大通国民银行的公共事务时，威金比较传统，虽然他的银行也赞成并利用了证券分公司这个法律幽默。但是，在处理他个人账户的交易时，他比米歇尔还要大胆得多。米歇尔通常能让他的惊人之举符合银行股东的利益，因而可以美其名曰为忠实于企业。然而威金则不然，银行可能每年要支付给他27.5万美元的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薪金,但只要有谋利的机会,即使是以银行为代价,他也不会拒绝。

1928年,一位国家银行查账员报告说,威金“支配着银行政策的制定”,他是“华尔街最孚众望的银行家”。前一年,这位深孚众望的独裁者在没有通知银行查账员和其他任何人、但也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组建了几家“私人控股公司”,以便于他不露身份地进行股票投机,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税金。通过这种方式,他在股市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还参与了许多集合基金。但是,他最喜欢的股票是他最了解的国民大通银行股票。任何一家公司的总裁只是股东们名义上的雇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威金对国民大通银行股票的投机是牺牲他名义上的雇主的利益来赚钱的行为。1927~1929年间,他成功地赚取了数百万美元,他做得非常谨慎巧妙,以至于股东们没有感到一丝恼怒。

随后,他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从1929年7月开始,一向精明的威金开始发现整个股市,尤其是国民大通银行股票的前景黯淡。因此,他通过他的一家私人公司卖空了超过4.2万股的国民大通银行股票。这样,在他所领导的机构走向衰弱的过程中,他获得了大笔既得利益,他因此而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境地。鼓励公司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通常会促使他们努力为公司谋利,而威金在国民大通银行股票的空头头寸则促使他努力损害银行利益。这是合法的;他的行为是如此大胆,以至于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用法律来禁止这种行为。再者,他对时机的拿捏也恰到好处。这个账户在当年的11月关闭,而整个股市也恰如威金所料,在那时崩溃了。他的私人公司从中获取了超过400万美元的利润。在之后的几年中,没有人比他更精明。当他在1932年退休时,国民大通银行执行委员会对他在银行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了极大的感谢,并一致同意每年给予他10万美元的养老金。

够了!在这里和其他的地方,米歇尔和威金都受到了过分的侮辱。毫无疑问,米歇尔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最放肆的银行家,威金也不算最背信弃义的;他们只是最引人注目的违规者。甚至,从威金自己那奇怪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天生就会自欺欺人;正是他后来动情地称1929年的股市为上帝的礼物,也是他至死都真诚地认为卖空国民大通银行股票的行为再恰当不过了。作为他们时代精神的牺牲品,他们不仅见证也导致了商业银行业务中旧观念的坍塌以及事态的土崩瓦解。

六

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后果是后来才显现出来的。1929年夏，华尔街从表面上看既平静又疯狂——平均股指屡创新高，而且仍在上扬，反对者暂时被击退了，一些最受信任的领导者也不再让公众有机会猜测他们会进行什么娱乐活动。即使就我们现在所知的来看，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那个夏天发生的事。由于老胶片和老唱片的技术缺陷，当代的人们，也许还有未来的人们，都注定只能通过失真的影音来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和时代氛围。对于此前的年代，我们根本没有影音记录；对于此后的年代，我们的记录在技术上已经十分完善了。20世纪20年代属于过渡时期，如果[正如理查德·阿威顿(Richard Avedon, 美国著名摄影家。——译者注)所说的]一个女人的走路方式能够很好地体现她所处的时代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认识就有所偏差了。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认为1929年时的人们像木偶般僵硬地行走，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但是让我们尽可能试着看一看1929年8月的华尔街，以便找到那个时代的本质。

8月是华尔街的传统假日，即便是最专注、最执著的人也会前往山间海边，一边进行各项活动，一边等待劳工节和重生。但是那年却没人离开。那个 month，证交所的成交量打破了历年来8月份成交量的纪录，与那一年中其他月份的最高纪录也相去不远。从美国西部到东部，有超过50万人用保证金炒股，可能还有更多人在用现金炒股。那些日子大多有如神助般地凉爽干燥，这是出人意料的，戈尔康达的气候居然没有受地狱周期性鼻息的影响。不仅华尔街上的工作人员留在了城中，新人也大量涌入。他们牺牲了假期或放弃了工作，整天坐在或更可能是站在经纪事务所的客户室里，看着行情牌报告激动人心的消息，分享着利益。他们一早就来到经纪事务所阅读“早报”，早报会充满信心地告诉他们当天哪些股票会上涨多少、哪些股票会在何时受到集合基金的“操控”、哪些公司很快就会放出利好消息。到证交所开市的时候，华尔街、拿骚街、布罗德街、百老汇大街以及派恩街上所有的客户室里人满为患——那儿只有站的地方，甚至可能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能够看得到行情牌的位置还要额外收取费用。尽管如此，他们全都确信亲临现场是值得的。他们觉得自己参与了大事件，还觉



得身处华尔街就会让他们变成内部人员，使他们比那些在其他地方做着同样事情的人有一些微弱的优势：理发师、私人司机或出租车司机只能竖起耳朵，从重要顾客口中获得一些无意间透露出来的内部消息，就连这位在精神上、而非实际上放弃了假期的重要顾客也只能远离太阳椅，整天坐在巴尔港、新港、南安普敦或者卡次启尔山酒店的办公室里。经纪事务所突然在每个重要的度假胜地开设了分部，整个夏季，分部与总部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不断。

许多蜂拥至华尔街的人都已经断了自己的后路。他们放弃了工作，一心一意只为获得价值 5 万、10 万或 20 万美元的证券；他们买下了昂贵的房产，又为自己或妻子添置了貂皮大衣，他们希望靠这种简单、有趣的游戏过上休闲富足的生活。此外，在华尔街上度过的这一小段时间已经让他们有了一种归属感；摩根大厦上的瘢痕就是“他们的”瘢痕，圣三一教堂墓地中的汉密尔顿墓就是“他们的”墓。他们过上了全新的生活，如果愿意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吞下这些象征着归属感的标志。最不喜变化的机构——城市中的俱乐部在华尔街上成了大众化的俱乐部；从华丽的餐馆到空房间中的单臂餐桌，到处都有午餐俱乐部，其中大部分成立还不到 6 个月，只要认识俱乐部中的某个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再交上一笔费用，即可成为会员。

午餐时间，这一区域的街面上挤满了人。即便是在上午和下午的工作高峰时间，街上的行人也是络绎不绝，他们交谈着，议论着，或者叫喊着以便让自己的声音盖过随处可见的新办公楼建筑工地上的嘈杂声。但在中午时分，街上的人群越来越拥挤，以至于车辆也无法通过，建筑工地上安静了下来，因为工人们都午休去了。一位来自于英国的游客对这种只会被交谈和脚步声打破的沉寂非常着迷，这使他想起了威尼斯。他发现这样的气氛“极其令人激动”，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不理解这种习俗，因而感到孤独和警觉。他的美国朋友兼向导在向他解释华尔街和美国的商业系统时，含含糊糊地说道：“对此我也不相信。”但是，这并没有使这位游客感到安心。

整个白天直到深夜，谈论，谈论，再谈论。人们之中流传着刚刚创造和即将创造的财富神话——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财富。没有人谈论大恐慌，那年春天发生的危机已经过去了，经纪人的贷款额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着，但这样的增长却被认为是健康的，银根骤紧的情况没有出现，短期同业拆放利率也跌回至 6% 或 7% 的合理水平。股市平均指数比 3 月份的低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谷时期上涨了34%，比1928年初上涨了76%。8月9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其利率提高到6%，但没有人对此表示关注；联邦储备银行沦为了笑柄。人们经常谈论蓝山（Blue Ridge）、阿里范尼（Alleghany）、雪兰多（Shenandoah）和联合公司（United Corporation）等上百家新的投资信托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新近上市的，自1月份以来其股票价值已经达到了15亿美元；只有五六名员工的皮包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持有并买卖其他公司的股票，这样的公司大多精心设计，利用“举债经营”的结构来实现“快速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公司毫无价值且投机性过强，但是怎么会呢？资助阿里范尼和联合公司的难道不是保守派的中流砥柱J. P. 摩根公司吗？阿里范尼的股票价格难道没有从2月份刚刚发行时的20美元上涨到56美元吗？联合公司的股票价格难道没有从1月份刚刚发行时的25美元上涨到73美元吗？人们谈论着约翰·J. 拉斯科布在8月的《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人人都应该发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了15美元的月存款被明智地投入股市后是如何在20年内赚到大钱的，并且讨论了证交所是如何仿效许多上市公司，宣称对其成员派发“股票红利”——每个成员再获得1/4的席位。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流传着有关那些需要5/4个席位的、脑满肠肥的证交所成员的笑话。

金钱至上——但是还有些别的什么。那是一个复杂而疯狂的时代，一个充满着骚动精神和魔法信仰、而非冷静思考的时代，一个戴奥尼夏（Dionysius，叙拉古的暴君。——译者注）、而非阿波罗的时代。与收入和红利相比，人们更多地谈及“机会”和“好运”。他们放弃了湖畔海滩的度假时间，这并非出于“工作第一”或“嗨，继续干活吧”的清教徒精神，而是出于过富足的生活、不错过机遇的快乐主义精神。看来他们几乎都相信，股市是获得幸福而非赚取金钱的工具。

8月17日，法兰西岛号和贝伦加亚号开始了跨大西洋航行，前者往东，后者往西。两艘轮船上都设有流动性经纪人办事处，供乘客进行投机活动。贝伦加亚号在6天的航行后抵达纽约，船上的乘客描述了人们每天是如何挤在办事处的流动办公桌前，以至于行情表的内容只能通过喊话传至那些无法靠近办公桌的乘客耳中。那一周，普林斯顿著名经济学权威约瑟夫·S. 劳伦斯（Joseph S. Lawrence）所著的新书《华尔街和华盛顿》大受好评。书中，他谴责联邦储备银行粗暴地干涉了华尔街（一个受到国会中“那些花言巧语的狂热宗教信徒”无情迫害的“无辜社团”），他还暗示任何

赞成对股市加强监管的人一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教徒，而且可能是禁酒令的拥护者。这就是那些盯着行情机纸条的人最喜欢说的话，这话从一个远离尘嚣的教授口中说出时，就好听得多。临近月末时，证交所决定周六休市，并宣布劳动节那个周末休市3天，还有更多值得庆祝的事。有传言说，秋季有许多大规模集合基金正在形成以支撑股市，据说还有一家经纪事务所收到了不下5只集合基金的邀请，就连《时代》也刊登了这些传言。同时，4只重要的铁路股——圣达菲、联合太平洋、切萨皮克俄亥俄和诺福克西部，似乎在相互竞争，价格都不可思议地接近300美元。这4只股票的价格都会达到300美元，这一点没有人质疑；唯一的问题是哪只股票会最先达到。

因此，假设某人能够订到票的话，他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度过这为期3天的周末假期，但是所有开往波士顿的列车和福特三引擎客机都已被超额预订了。问题是——真的可以相信吗？

七

最终，崩盘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来临了——来得是如此循序渐进，以至于过了大半时有人还可能没有意识到崩盘已经开始了，或者，崩盘刚开始可能就有人认为自己已经安然脱困了。

股市并不是突然崩盘的。一年多来，主要股市板块一直受挫。1929年的大繁荣实际上是有局限性和选择性的。这是道一琼斯指数和《纽约时报》指数每天计算的少数股票的大繁荣，这就是为何这些著名的指数都创下最高纪录的原因。这也是那些交易最为活跃的股票的大繁荣，这些都是最知名的公司的股票，报纸每天都会提到这些股票，行情室的常客每天也要说上上百万次——这就是为何大繁荣被频频提到的原因。但是，这绝对不是众多次级股的大繁荣，而投资这些股票的人可能同样很多。

事实上，股市的大部分在1929年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压制。

平均指数的高涨让人大为惊叹。但是，赛拉尼斯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66美元，而1927年的最高价是118美元。克卢特皮博迪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46美元，而1928年的最高价是110美元。联合雪茄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62美元，而1928年的最高价是100美元。弗里波特硫磺

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43美元,而1928年的最高价是105美元。纽约造船厂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27美元,而1925年的最高价是88美元。百事可乐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10美元,而1928年的最高价是19美元。菲利普莫里斯1929年9月的最高价是12美元,而1927年的最高价是41美元。即使是那些著名的股票,也有许多在此之列。特别是汽车股,正经历一次全行业范围的大萧条。在那个历史上著名的股票大繁荣时期,斯图德贝克(Studebaker)、哈得逊(Hudson)、胡普(Hupp)和格雷厄姆—佩奇(Graham-Paige)却分别比过去的最高价下跌了22%、25%、43%和55%。即便是通用汽车,10年来大繁荣的领头羊,也下跌了10%以上。所有的股票在1929年秋季都大幅上涨,这仅仅是一个神话。

但是,如果是一次缓慢的、部分的、只有受害者感受得到的崩盘,在至少3年的时间内一点点地发生,那么1929年9月3日,周二,就不会是公众普遍注意到崩盘的日子了。那是劳工节休假后的第一天,股市平均指数达到了此后25年都未能超越的顶点。根据惯常的股市推算,那天应该是股市活跃期的开始、就像新一年的开始。当天,纽约的天气极热,最高气温达34摄氏度,湿度也极大,但是这并未阻挡人们冲回市区客户室的脚步,交易量之大创下了9月份的纪录。这样,在桑拿天气中,股市不知不觉登上了20世纪20年代的最高点。第二天出现了一次普遍下跌,但却没有引起轰动。《时代》的每日股评专栏——这一栏目虽然没有署名,但却由该报著名的金融编辑、博学的亚历山大·戴纳·诺伊斯(Alexander Dana Noyes)负责,而且那些天也常常由他主笔——刊登了如下的清醒言论:“过去一周股价上涨的速度太快了,完全不顾货币市场的形势,就连那些坚定的投机者对此也越来越警觉。”又过了一天,9月5日,发生了后来被称为“贝森缺口”的奇怪现象。罗杰·贝森(Roger Babson)是一位远离华尔街、不太出名、甚至迄今也没什么影响力的金融顾问。他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身体羸弱,蓄着山羊胡,外表怪异。在新英格兰的一次常规金融午餐会上,他曾说:“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我在去年和前年的此时说过的话:崩盘迟早会到来。”正如贝森所暗示的,他过去的警告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人们都把他当成疯子。很显然,那天的金融消息传得比较慢,因为贝森的话下午14:00才出现在道—琼斯金融新闻显示板上,随后传遍了全国的经纪事务所。股市立即一蹶不振,在全天交易最后的疯狂一小时内,有200万股股票转手,美国钢铁公司下挫9点,西屋电气(Westinghouse)下挫



7点，美国电话公司下挫6点。微不足道的因和巨大的果，不论从何种逻辑标准来看，都不成比例。

人们一下子认识到过去的有趣预言成为了事实。“贝森缺口”发生后，一个月前还是禁忌的“崩盘”一词突然变成了华尔街上众人议论的话题。几天内，华尔街的保守派人士像接受繁荣永无止境的观点一样，完全接受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崩盘迫在眉睫。当然，贝森立即遭到了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等“新时代”拥护者的激烈反驳。但是，5天后，《时代》的诺伊斯专栏仍然在以一种令人十分不安的方式对“一次损失惨重、破坏力极大的崩盘的观点”进行思考。《时代》发现，当下的情况与1907年有些相似——无法控制的恐慌都不期而至。这份报纸能给人们的最大安慰就是当时已经有了美联储和投资信托公司这些新兴力量，它们在必要时有助于稳定股市。股市一路震荡下跌，直到9月24日又一次大跌。那是一次毫无缘由的大跌，因而被称为“神秘的下跌”。

在一片悲观但平静的气氛中，华尔街迎来了10月。奇怪的是，经纪人的贷款额仍在增加，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进入股市。为什么股价没有因他们的买入而上涨？还是他们都加入了卖空一方？有令人恐慌的传言说，大规模的卖方联合正在形成。杰西·利维摩尔被指责操控了此次卖方联合，但他立刻否认了。随后，股市有了反弹，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到10月10日的时候，平均指数回升到了9月中旬时的水平。15日，乘坐着一艘德国至纽约的海轮的乐观预言家查尔斯·米歇尔坐在轻便折叠躺椅上发表了言论，他说：“目前的股市大抵来说非常健康。”欧文·费雪也亮出了他那永垂青史的观点：股市已经到达了“一个永远也不会跌落的稳定水平”。不可能所有人都接受这些言论。在此之前，米歇尔和费雪的预言一直很准，现在，他们的观点即便被再三重复也无法引起重视了。但是，股市还是保持了一周的稳定。接着，19日，周六上午开市后，股市又一次下跌，历时长达2小时。

到了周一，21日，一系列经典的股市连锁下滑反应开始了：股价下跌导致保证金交易客户必须追缴保证金；客户无力或不愿追缴保证金导致经纪人强行平仓；强行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而股价进一步下跌又导致更多的保证金追缴要求。有人希望那些1907年曾力挽股市的大银行家能够集中财力对股市进行“有组织的支撑”。诺伊斯的专栏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华尔街上的所有人这次似乎都认清了现实，不再高喊着想象中的政

治经济口号和新准则。”其中的意思非常明了：理智回来了，“新时代”过去了。行情室不再像先前那样拥挤，8月份时挤在行情室中那数以千计的新手们即便没有破产，多数也受到了打击，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中。“新时代”的号角仍在吹着，但声音却渐行渐弱、渐行渐远。费雪认为这次下跌只是为了“把那些利用保证金投机的极端分子甩出局”，米歇尔在坐船抵达纽约之后只能说下跌得太多了。那一天还有进一步的下挫，交易混乱，收盘价大幅下跌，行情机在股市收盘后还一直运转，用了1小时40分钟才接收完全部的交易记录。但是，周二，22日，股市又有了强势反弹。

这样到了周三，23日，纽约温暖宜人、秋高气爽，而中西部则天气恶劣，过早地遭受了一场大风雪。这次气候上的灾难就像黑斯廷斯战役（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击败英王哈罗德二世的一战。——译者注）中刺眼的阳光一样，具有其历史意义。纽约的股市一早就开始下跌。随后，暴风雪导致许多电话电报线发生故障，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全国大部分地区只能依靠猜测和传言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慌的迹象出现了并且很快愈演愈烈。当天的交易量达637.496万股，创下了历史第二高。亚当斯快速下跌了96点，商业溶剂下跌了70点，通用电气下跌了20点，奥的斯电梯下跌了43点，西屋电气下跌了35点。虽然没有利空消息放出，但却没人将此次下跌称为神秘下跌。

回想起来，另一个不幸是证交所的副总裁当天不在场。他就是举止文雅的理查德·惠特尼。那年，他41岁，在证交所有着大好前途。证交所的总裁E. H. 哈利·西蒙斯(E. H. Harry Simmons)赴夏威夷度蜜月期间，他担任了代理总裁。作为一个有影响力、有能力的人，惠特尼的名字是如此响亮、声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928年3月胡佛总统希望就投机风险问题征询证交所代表人的意见时，在白宫召见的是他而非西蒙斯。10月23日，周三，惠特尼不在华尔街，而出现在新泽西远山举行的艾塞克斯猎狐犬大会上。那天是狩猎比赛的高潮日，惠特尼是两位主持人之一。那里正举行的可能是美国最时尚的赛马盛事，大约有2000人聚集在那里观看比赛，其中不乏经常出现在报刊社会版上的大人物。斑点美人和普罗普索两匹赛马冲向终点时太过接近，以至于裁判都无法判定胜负，根据惯例，裁决权交给了主持人。惠特尼和另外一名主持人宣布两匹赛马打成平手。还有两匹马在湿滑的赛马场上滑倒并撞在了一起，骑手也被甩了出去。随后，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戈爾康達往事

就错在哪位骑手的问题，两匹马的主人争论不休，主持人再次出面裁决。因此，对惠特尼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尽管之后的几天内他会更加忙碌。

当天晚上，追缴保证金的通知如雪片般飞来，华尔街笼罩在一片阴郁之中。华尔街认为崩盘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继续前进，但却没有想到破产的人数很快将从上千名增加到上万名，也未曾料到第二天将被后人称为“黑色星期四”，其成交量将从 600 万股放大到1 300万股。

第五章 土崩瓦解

第六章 白衣骑士现身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圣三一教堂教区年鉴和登记簿中教区长 1930 年的报告里写道：

过去的一年困难重重……作为教堂，我们要如何安慰和帮助众多因失业而陷入重大困境的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与几位慈善和社会服务专家商议之后，我决心让教堂照顾好教区的人们，这样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社区。教区委员会捐献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我又呼吁人们向专门救助教区穷人的基金捐款。要公开谈论那些得到满足的迫切需求或许多冲出困境的人，这是不可能也不合适的……人类本性中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会在苦难的时代中体现出来。今年，人们开始到教堂寻求安慰和勇气，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教区长继续写道，参加常规主日礼拜的人又多了起来；参加周一至周五午间崇拜的人也明显多了起来。此外，圣三一教堂发现，应该举行专门的仪式来安慰和鼓励金融区的人们。周一至周五，从上午 11:30 到下午 13:30，会有一位神职人员站在教堂入口的桌子前，向人们提供咨询服务。教区长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把我们在哪里所听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告诉你们，你们就会

意识到这种服务的巨大价值；但是，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事说出来。我们不认识的人和不认识我们的人，十分乐意把他们的困难告诉一个旨在尽可能帮助别人、也确实常常帮助别人的匿名陌生人，而不愿告诉他们自己的牧师。

这种新的服务在 1930 年非常受欢迎，午餐时间常常会有一小队人排在圣三一教堂的入口处，依次等待着获得咨询和安慰——他们是等待领取精神救济的人们。

就如圣会常常在《慈光歌》中唱的：

从前我爱沉迷繁华梦里

骄痴无忌

旧事乞莫重提

繁华梦过去了，那让华尔街人远离圣三一教堂的骄傲也被打碎了。

二

崩盘的第一个大日子，10 月 24 日，或“黑色星期四”，住在格林威治村古老的拉斐特酒店的英国来访记者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当时他正与一位美国同伴在酒店餐厅的一张大理石餐桌上共进早餐。他的同伴一直心不在焉，不断起身去看餐厅另一头的行情机，尽管那时离证交所开市的时间还早，行情机上不可能显示任何东西。外国人的身份让柯克本具备了客观的洞察力，他意识到（许多年后他写道）那不是个普通的日子，人们很长时间都无法忘记那一天；只有大空袭才能改变伦敦的社会氛围，他写道，而纽约——纽约则更易受外界影响。那天上午早些时候，行情机开始报出令人震惊的悲惨消息，柯克本向华尔街走去，发现自己身处一大群沉默不语的人中间，这些人的目的地同样也是华尔街。他还发现华尔街上已经挤满了人；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时会传出一两声清晰怪异、歇斯底里般的咯咯笑声。（布罗德街和华尔街街角处的证交所对面就是国库分库，从当天中午时分在国库分库前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分库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家都排着队，目光冷漠地朝前看，似乎是某个机构的成员在拍集体照。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激动、歇斯底里或是气愤。他们眼神与躺在海滩上或鱼篓中的落网之鱼一

般无二。)

柯克本要前往华尔街一位大人物的家中赴午宴。那位大人物就是埃德加·斯派尔(Edgar Speyer),爱德华时代的英国贵族,曾经的埃德加爵士、枢密院官员,而如今则是一个拥有百万身家的美国人,在一家最古老、最顶级的德裔犹太银行担任合伙人。他和夫人住在华盛顿广场北面一座漂亮的希腊复古式粉红色砖房里,家中井然有序,收藏了大批中国画和瓷器,文化氛围浓厚,高雅而祥和。柯克本发现,一个年轻的英国男仆在中年英国男管家的监督下负责上菜。午餐进行得十分愉快,餐桌上的话题不是股市而是新近发表过诗作的诗人——斯派尔夫人就是其中之一——但令人费解和惊讶的是,一切突然就出了问题。关着的门后砰砰作响,人声嘈杂,而这扇门后就是通往厨房的走廊。门把手慢慢被扭开了,随后门开了几英寸。显然,门后出现了某种奇怪的争斗。片刻之后,管家和男仆端着羊肋排走了进来,柯克本瞥见门后的走廊上站着四五个年纪不同的女仆,神情激愤。羊排分完之后,管家和男仆退回了厨房。争斗更为激烈了,之后,柯克本听见一个女人叫喊着威胁道:“过去,照我说的办。”

随后门被突然打开了,管家红着脸,几乎是弹进了房间,似乎有人从后面重重推了他一把……他关上门,尽可能冷静地穿过房间走向斯派尔,他用抱歉的语气低声请求斯派尔出去一会。听到他的话,斯派尔非常吃惊,犹豫了几秒钟之后,他和管家一起离开了房间。斯派尔很快就回来了,表情有些沮丧。他请求我们的原谅,并解释说仆人们在厨房里收到了行情机纸条,他们都在股市中陷得很深……

之后,斯派尔离开了客人,而且没有再回来,他的午餐也没有吃完;他的妻子和客人们“十分困惑,凑合着”吃完了饭。这次午宴是一次不幸、一次社交罪恶。可能仅此一次,斯派尔违反了他所珍视的品味、礼仪和好客原则。柯克本如同一个亲眼目睹他人崩溃的人一般震惊,他有些明白了这次崩盘意味着什么。生活随着股市一起崩溃了。

但是,“黑色星期四”只是序幕。行情机无法跟上交易的速度,直到当天晚上 19:00 才完成早在 15:00 就该结束的交易记录。有银行家结成联盟支持股市,第二天,胡佛总统宣称:“美国的基础商业……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周五和周六股市有所回升,但在周一又继续下跌,周二,10月29日,是证交所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灾难已经无法控制,全国性的大萧条开始了。翌日,老约翰·D.洛克菲勒做了一次著名的尝试,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他自告奋勇地要重建人们的信心(“几天来,我和我的儿子一直在购买业绩良好的普通股”);短暂的反弹之后,股市又继续下挫,一天接着一天,跌幅之大致使华尔街的机构系统几近瘫痪。11月13日,股市跌到了当年最低点,9月份还价值800亿美元的上市股跌掉了300亿美元。杰西·利维摩尔说:“我认为情况不再会进一步恶化了。”就1929年来说,他是对的。但1929年只是悲剧的第一幕。

到12月,华尔街上的人们认为危机和阴霾永远也不会散去了。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那儿的工作人员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就会听到每天聚集在证交所门外的人群在窃窃私语。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在大约30年后回忆道:“这种声音在整个交易时间内都不绝于耳,中午时分最响。这种声音不是愤怒也不是歇斯底里,让人感觉非常不安。我得说,这是一种绝望的嗡嗡声,一种希腊挽歌式的声音。”人们开始积极寻找替罪羊。前一年夏季和秋季发生的股票诈骗突然成为了每天被谴责的对象,华尔街上的元素——投机商号、卖空攻击者、集合基金操作、买入和卖出经纪人、甚至是证交所行情机的滞后——一个接一个被指责为崩盘的原因。同时,此次震荡的第一波浪潮已经开始影响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苏联人得意地说崩盘证明了他们的观点——腐朽的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穿行在纽约人行道下的地铁搭载着一车又一车神情怪异、悲伤的女人。全国上下虽然没有出现领取救济品的队伍,但是被用来为购买股票的贷款做担保的毕生事业和长期保险单却正在失效。年轻人的大学计划被取消了。生活方式正发生变化——有人认为变得更好了;埃德文·拉斐尔(Edwin Lefevre)引用一位聪明的旅行推销员的话说道:“我绝对相信,在美国没有哪座拥有上万居民的城市会连一家夜总会也没有。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去过上百家夜总会,我敢发誓,我在那里见到的人中有9/10花的都是他们在股市中没有兑现的利润。让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人养成了没钱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好习惯。”

然而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富人,尤其是保守派富人,在那些投身股市的人之中所受的伤害是最小的。华尔街的领军人物中常常会发生许多麻烦事,但却鲜有大灾大难。J. P. 摩根、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的合伙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公司在当年早些时候获得的利润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崩盘中的损失。1929年全年,J. P. 摩根及其分公司德雷塞尔公司(Drexel & Company)的净利润增加了2700万美元。年迈的乔治·F. 贝克

(George F. Baker)告诉《纽约时报》说他损失了将近1 500万美元,但是,华尔街有传言说崩盘达到顶峰时他不顾医生的反对,从病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赶往华尔街,并且解释说:“过去 60 年里每次恐慌我都大赚了一笔,我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奥托·卡恩据说损失惨重,事实确实如此,但还没有惨重到让他的雅致生活、对艺术的资助以及冷泉港的展示性房产有丝毫改变。

那些彻头彻尾的投机者,不论他们是否受人尊敬,都是根据运气或喜好行事的。多头们自然是损失最惨重的。中西部“繁荣男孩”集合基金的比利·杜兰特很快就对一个向他提供了错误信息的经纪人提起起诉,他声称这位经纪人让他损失了 7.5 万美元——这是赌徒与情报员之间的争执。作风严谨的集合基金参与者亚瑟·库顿向 2 万名乡亲提供的信息导致他们总共损失了 300 万美元,得知此事后,他发现公开自己也损失惨重的事实对他有利无害。花旗银行的米歇尔,这位“生产者”,在 10 月 28 日这糟糕的一周内,借了 1 200 万美元来支撑花旗银行的股票但却徒劳无功,绝望中的他只得采取了一项最终导致他被控逃税的行动。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大通国民银行的威金在崩盘最为严重的时期内,通过卖空自己银行股票的奇怪举动净赚了 400 多万美元,实际上,这也是托了崩盘的福。杰西·利维摩尔在刚刚开始崩盘的时候曾持多头,但他却以极佳的预见性洞察了先机,并及时改变了立场,因此他百万富翁的身份并未受到影响。曾经参与无线电公司集合基金的迈克尔·米亨在船上经纪事务所工作,他也安然无事。

三

华尔街上还有 4 个人,他们和他们的命运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本·史密斯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这位来自于西五十区、粗鲁、爱开玩笑的爱尔兰人如今成了名人。很快他就在贝德福德村拥有了一幢带有游泳池的乡村住宅,并成为了罗瑟米尔爵士(Lord Ro-thermere)在美国的经纪人,他变得非常难以接近,以至于想要采访他的记者要等上至少一周才能得到答复,而且给出答复的人不是史密斯,也不是他的秘书,而是他的公关代表。但是,他的新名声并非源自于他的财富,而



源自于传闻中他获得财富的方式，他本人对传闻也没有否认。

1929年夏，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他是一名多头，在第一波崩盘浪潮中，他受到了重创。随后他看到了希望之光。他意识到，整个大繁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假象，国人如今都已经回到现实中了。他没有华尔街情结和美国情结，这一特质现在成了一大优势。他无需忠诚于母校，无需忠诚于阶级，甚至也无需忠诚于国家，这使他能够看清真相。正如马修·约瑟夫森所说的，他有着一颗自由的心。有一段时间，他确实相信过“新时代经济”的神话，但这种虔诚却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他自由了；对他来说，“新时代”是一种被抛弃了的信仰——一种与他优秀的判断力和心底最深处的信念相悖的信仰，他只是在尚未强大的时候出于从众心理而暂时接受了这种信仰。对于摩根、昆恩里尔布、梅隆和胡佛等，史密斯实际上一直持“让他们见鬼去吧”或更激烈的态度，如今，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对于他来说，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称心如意。“我一开始就是对的，而且始终是对的！”崩盘之时他这么高喊着。第一波崩盘结束之前，他改变了立场，跻身于最贪婪、最具报复性的卖空者之列，他的大规模卖空行为导致股价下跌，当金融形势最终符合了他苛刻的主张时，他大赚了一笔。

“美国商业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稳定……有些股票可能会上涨，有些可能会下跌，但是美国必定会繁荣。”年长的商业政治家查尔斯·舒瓦布在1929年12月10日如是说道。他阐述的是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美国和美国商业，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的投资业务，有着深厚的感情，以至于无法认同全国性经济崩溃的观点。简言之，他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自由人史密斯却既能相信也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他的反应不是发表正式声明（他从来不这样做）而是卖出、卖出、再卖出。史密斯以及他的行为在美国民众之中引起的反响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报纸让他成了传奇人物，使他的名字成为了懦弱、无爱国之心、利用卖空行为让“非常健康”的股市不断下挫的卖空者的象征，他开始成为过街老鼠。他日复一日地接到许多恐吓电话和恐吓信；他的两个女儿最后不得不带上保镖。史密斯没有被吓倒。他觉得他和他的敌人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不经意中，史密斯自己把他的传奇传了开来，他喊出了一句口号，又让自己得了个外号。有一次——一种说法是在11月29日大恐慌的顶峰时刻，另一种说法是在几个月后——他冲进他任职的经纪事务所行情室，那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里人满为患，他用盖过周围一切喧闹的声音高喊道：“全都卖了吧，那些股票一文不值！”自此以后，他就被人称为“卖了吧本·史密斯”。

约瑟夫·P. 肯尼迪没有史密斯那么“自由”，因为他的权力欲更强（对国民经济系统的义务自然也更大）。显然，他并未在崩盘时卖空，因而没有赚上几百万，但他也没有买进或持有股票，因此，他也没有什么损失。他觉得只有傻瓜“才会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持续持股”，因此，在1929年初他就悄悄兑现了利润。他的传记作者说，那年夏天他“明哲保身，站得远远的”。后来肯尼迪在描写那个时期时这样写道：“那些日子我感到、也表示愿意放弃一半财产，只要我确信可以根据法律和社会体制保全我的另一半财产。”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确实放弃了一半或相当数量的财产。那年冬天，他经济情况良好，心情也不错，因此能够转身离开华尔街前往棕榈海滩。在那个宜人的地方，他与高层人士会谈并继续工作，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或保钱，而是为了结成新的联盟，以备日后之用。当时肯尼迪无需为钱发愁，他的财产非常安全，他开始考虑把金钱转化为权力——国王制造者的权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总统制造者。几个月后，在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的大力帮助下，他前往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的首府。——译者注）的总督府赴午宴，在那里，他开始与总督交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与弗兰克林·D. 罗斯福仅仅是点头之交，甚至有些敌意。午宴结束后，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下一届总统的人选。他就此开始了新事业。

崩盘的幸存者中还有詹姆士·保罗·沃伯格，他的经济状况允许他把注意力放在更高、更大的事情上，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生存问题。崩盘后的初期，他发现自己一直长时间工作，以拯救他自己和公司客户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家国际性银行的高级官员，他不关心美国钢铁或无线电股票下跌2点，而担心崩盘可能会引起的巨大影响，如黄金流出美国以及美国资本市场干涸。1930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国外，为他的银行寻找欧洲客户。回到美国后，他在一次午餐时告诉大通国民银行的威金，他希望自命不凡的阿道夫·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并在掌权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威金随后致电老沃伯格说：“你的儿子疯了。你应该把他关起来。”

肯尼迪和沃伯格这两位幸存者就这样把注意力从赚钱转到了政治上。半个世纪以来，华尔街一直是政治家的摇篮，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两人几乎成了华尔街唯一两个插手国民政府的人。

四

理查德·惠特尼成了全美国的知名人物。与臭名昭著的本·史密斯不同，他被人们奉为英雄。

这发生在一夜之间：10月24日到25日之间的那个夜晚。“黑色星期四”正午过后的几分钟，恐慌达到了顶峰，华尔街上不知所措的人群看到一小群知名的银行家走进了摩根大厦。他们都是当时银行界的英雄式领袖人物，他们的名字立刻在人群中悄悄传开，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的米歇尔、大通国民银行的威金、信孚银行的普罗塞尔、担保信托公司的波特(Potter)和第一国家银行的贝克。在摩根大厦内以主人的身份迎接他们的是托马斯·W.拉蒙特。人群突然看到了希望，他们立即猜到了其中的含义。人们期待已久的对市场的“有组织支撑”到来了。这些银行家会见的目的是讨论出资数百万美元来维持股价，并组建一个以摩根为中心的联盟，使其像1907年的那个联盟一样制止恐慌、拯救国家。

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走进华尔街23号的银行界领袖们在短短数分钟后就离开了，拉蒙特像往常一样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一头银发，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冷静、更高高在上。他戴着夹鼻眼镜，懒洋洋地说了一句有趣而冠冕堂皇的宽慰话：“证交所的交易出了点小麻烦，我们已经召集几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商谈这一情况。”他继续说，引起麻烦的并不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紊乱而是“市场的技术状况”。（这样，新的秩序恰在必要的时候确立了。）拉蒙特没有直接说组建了一个支撑联盟，这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个联盟很快就会以行动证明其存在。到下午13:30左右，股价因为银行家们会见的消息和拉蒙特的采访而止跌上扬，理查德·惠特尼出现在了证交所的交易厅内。他肩膀宽阔，脖子短粗，脸庞因前一天的户外赛马会而泛着红光。这位表链上挂着波斯廉俱乐部金猪标志的摩根经纪人大步走向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交易台，下了证交所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笔订单——出价205美元购入1万股股票，这是前次交易的价格，而那一刻的价格实际上已经远远低于200美元了，因此，惠特尼每股多支付了好几美元。随后，他又走到交易厅内的其他许多交易台前，继续进行这种极其不划算的交易，对其他蓝筹股下了类似的订单，每笔交易的额



度都非常大，价格也都与前次交易的成交价相同。几分钟内，他的订单额累计已经超过了2 000万美元，人人都明白银行家联盟开始行动了，理查德·惠特尼是这个联盟的经纪人。所有的股票都有了大幅反弹，“黑色星期四”结束的时候，形势好了许多。

“理查德·惠特尼遏制股票恐慌”，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标题。那个星期四，惠特尼只是一个扮演了英雄的好演员；他的夸张行为是有意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取得最佳效果。但在随后的几天内，作为证交所的代理总裁以及银行家为建立有序市场而进行的战斗中的战地将军，他真正起到了克努特大帝(Canute，中世纪英格兰、丹麦和挪威国王。——译者注)在海战中的作用，而且还更有战斗力。惠特尼把自己那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有人会将之称为专横)发挥到了极致，他坚定、谨慎、充满想象力地向前进。10月29日，局势失控了，交易厅内一片混乱，许许多多出售股票的订单被抛在脑后没有执行。作为代理总裁，惠特尼召集证交所管理委员会开了一次午间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这次会议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事后也一直未对外公开，以免恐慌升级。为此，会议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气派的管理室里举行，而是被安排在了股票清算公司的总裁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蜷缩在证交所的地下室里，位于交易厅的正下方。应邀参加会议的除了管理委员会委员之外，还有2个摩根合伙人和银行家联盟的另外几个代表；这2位摩根合伙人实际上曾被一名消息不灵通的门卫拒之门外，他们试图悄悄溜进证交所大厦，却引起了这位门卫的怀疑。我们至今还不确定他们到底是谁，但其中一个肯定是拉蒙特，另一人可能是理查德·惠特尼的哥哥乔治。

这些以减轻恐慌为目的而进行会谈的人之中有许多自己也几近恐慌了。实际上，银行家联盟已处于崩溃状态。联盟的资金(据后来报道有2.4亿美元，但有人认为没有那么多)就像投进了无底洞，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不投入更多资金的话，支撑市场的努力无疑将会付诸东流，但银行家们已无力再提供更多资金了；事实上，那天传出了联盟改变主意、开始抛售股票的传闻，而拉蒙特不得不予以否认。惠特尼后来提到这次会议时说：“与会者抽烟的行为透露了他们的心情，他们点燃香烟，抽上一两口就掐灭，再点一根新的，不断重复这一过程。”

放在与会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是否要立即关闭证交所，而且是无限期关闭。在证交所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1873年

大恐慌时期，另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有人坚持说在当前的情况下唯有关闭证交所这一条路可走；以惠特尼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闭证交所“绝对不在考虑之列”。反对派认为，无限期关闭证交所将会导致证券抵押贷款冻结、有价证券总存量不足，而且会进一步激起公众的无端猜想；1914年时出现过的非法马路市场会再次出现，国民银行系统和国民经济将濒临瘫痪。勇气和坚毅是必不可少的；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反对者获胜了。那天，证交所一直到正常的闭市时间才关闭。但是第二天，30日，惠特尼和他的同事做出了妥协。证交所员工已经昼夜不停地工作了将近一周，却仍然无法保证文书工作的及时性，显然，他们的体力已经透支了。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特别假日”计划，以缩短交易时间。周四，31日，证交所的开市时间从往常的10:00点推迟到了正午时刻；周五和周六是“特别假日”，员工们专门处理文书工作，正常交易则在下周一继续。惠特尼周三下午在证交所演讲台上宣布这一计划时，采取了又一种他十分擅长的有力的反恐慌手段。通常来说，证交所总裁向交易厅发表公开声明时，行情机会被关停；但是这次，为了不使公众产生证交所会关闭的印象，哪怕几秒钟也不行，他在宣布计划时让行情机继续工作。

这一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证交所赢得了所需的时间和相对的平静。让人们觉得证交所部分关闭不是由于恐慌而是出于实际和人道主义考虑，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方案实施得非常顺利，因此，证交所的关闭时间又被延长了；11月份的大部分日子里，交易时间缩短了，交易完全停止的“特别假日”也不知不觉多了好几天，却没有引起公众的警觉。然而，股价的恶性下跌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最厉害的那天，成交量不可计数，因为证交所当局停止了成交量的计算。发生危机的几周内，惠特尼的领导能力充分显示了出来。不论他去哪儿，在街上也好、俱乐部也好、公共集会也好，他都会面对那些焦虑的疑问以及恳求、信赖的脸庞；人心涣散，只有他才能把人心团结起来。他后来曾说，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他和他的同僚过着“猎物般的生活”。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性格中的一部分其实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的；掌控一切、被人依赖、拥有格罗顿学校教务长的道德权威和潜在救世主的赤裸裸的权利，这些都需要机智和良好的判断力，而惠特尼有着极佳的贵族风度、高高在上的气质、宽阔的肩膀、坚定的眼神和快乐的笑容，他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角色。“地下室会议”在证交所交易厅之下的房间内不断举行着。华尔街最终还是得到了风声，因此立即传出了无甚根

据的传言：惠特尼和拉蒙特正用一架潜望镜，通过交易厅地板上的洞，监视着上面发生的一切。每次散会的时候，惠特尼总要告诫同僚们抛却自身的感受、做出勇敢的姿态。他总是说：“现在开始微笑吧，男子汉们！”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正是后来弗兰克林·D. 罗斯福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最喜欢用的策略。

男子汉们一直保持着微笑，最终，股市停止了下跌。由于有关卖空攻击的谣言盛传，惠特尼在 11 月份对所有证交所成员做了一次测试，以了解他们在股市中的卖空头寸。结果令他非常满意，卖空攻击“微乎其微，几乎无关紧要”，测试结果公之于众后，股市有所稳定。11 月 30 日，证交所管理委员会通过决议，肯定了惠特尼在危机时刻所做的工作。决议表示：“紧急情况造就了能够处理此类情况的人。”

惠特尼本人将这一荣誉传播得更广、更远，他说，那年秋天发生的事件“增加了我们对伟大祖国的信心”。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增加了美国对他的信心。但是，国人并不知道他本人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他在多年之后说，在这次崩盘中他的个人资产损失了 200 万美元——当然他指的是当时的证券账面资产；但是这已经是笔大数目了，他那年秋天遇到的财政困扰在他的话语中显露无遗。然而，在那些危难的日子里，这些困扰似乎从未让他分心，他尽心尽地行使着证交所代理总裁的职责，而却未因此获得一分报酬。事实上，他做得非常出色：他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五

1929 年的最后一个下午，证交所交易厅里响起了一阵急切的铃声；交易结束前一个半小时，每年一度的新年除夕宴会开始了，这次宴会比往年更为盛大热闹，交易厅正中央的平台上竖起了第 369 步兵团纪念像。无论是证交所成员还是职员，每个人都分到了喇叭或铃铛；午餐时分，地下酒吧聚满了人；当闭市钟最终在下午 15:00 点敲响时，交易厅内的巨大喧闹声一直传到了布罗德街。人们有理由庆祝，不仅仅是“那个”已经过去了，崩盘时期萎缩的交易量也重新放大，这意味着数以千计新的就业机会和上百万美元的佣金。从 9 月份开始，全国的失业人数从 75 万以下增加到了 300

万以上,对那些没有投资股票的人来说,华尔街成了暂时繁华之岛。这并非华尔街的刻意所为,而只是一次意外,一次完美的嘲讽;公众之间的疑虑仍然没有消失。很多人开始不假思索地抱怨华尔街以及华尔街上发生的一切,这种抱怨声将会越来越大。

惠特尼是华尔街的象征,他像电影偶像般出名,媒体都争相报道他的一言一行。1930年1月份的时候,他让他的理发师免费去佛罗里达旅行,这是一次古怪的奖励,奖励的是这位理发师在给他刮脸时保持沉默,《时代》及时报道了这条消息。那年的晚些时候,证交所2号交易台隆重退出交易舞台,被敬献给了惠特尼,他曾在那里下了著名的“205美元每股钢铁公司股票”的订单。他把这座交易台放在了他办公室大厅里展示。西蒙斯,1929年时缺席的证交所总裁,最终在1929年12月结束新婚旅行回到了华尔街,但他早就打算在任满之后退位,因此,1930年4月,新一轮证交所选举来临时,惠特尼毫无意外地被正式推举为证交所总裁,实际上他担任这一职务已经有一年之久了。

那是一个万物复苏、乐观向上的春天。1930年4月,道一琼斯工业指数比11月低谷时上涨了50%之多;没有人料到指数再次达到这一水平时已是1954年。5月,商务部部长表示“商业情况将在两三个月内恢复正常”。之后的一个月,劳工部部长也唱起了同样的论调:“最坏的无疑已经过去了。”同样在6月,胡佛总统本人接见了一群牧师,他们要求开展一项公共工程计划,而总统却高兴地回答他们:“你们来晚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胡佛从未说过大繁荣即将来临;他的这句令人至今难忘的话语可能来自于报纸对他在1月份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言的间接引用,他说他看见了“一些明显的迹象,说明商业和工业已经脱离了暂时的危难”。)

但是,随着经济复苏的步伐在夏季和秋季减慢,公众对证交所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惠特尼开始巡回演说,以维护证交所。至此,在纽约、华盛顿,乃至全国,他都被认为是华尔街的代言人。这样一个生性傲慢、对普通大众毫不关心的花花公子般的势利眼,竟然成了公众眼中华尔街的主要拥护者,这似乎十分荒谬。但是,惠特尼天生具有一种能够跨越阶级障碍、甚至超越个人喜好的领导才能,这一点又与罗斯福非常相像。他喜欢、也有能力与公众沟通;事实上,他的沟通才能远远超过金融才能。此外,在他发迹的那个年代,许多美国人仍然喜欢被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所影响和领导。正是他的冷漠以及不屈服于大众喜好的性格引起了公众的

注意。人们可能不会喜欢他——很少有人喜欢他，但却愿意听从和相信他。

1930年9月，他在纽约商人协会发表演说，主题是生产过剩和人为抬高价格是如何引发“商业不景气”的。“把商业大萧条归因于股市恐慌是本末倒置的。”他如此说道；事实上，股价是商业情况的“晴雨表”，是大萧条的结果而非原因；当前的商业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5月，而不是股市发生崩盘的9月或10月。《时代》的一篇社论发现“这种有趣的分析有许多根据”，并且还预言般地写道，惠特尼的观点将是“不可动摇的”。1930年10月，当苹果贩子刚刚开始出现在美国的大街小巷的时候，惠特尼来到青年俱乐部里那些家教良好且可能充满同情心的女士们面前，为证交所说了些并不过火的好话：“我们努力让正直的人成为我们的成员，并尽力以正当的方式开展业务。”当月，在他的主动请求下，他和副总裁艾伦·林黎(Allen Lindley)在白宫与胡佛共进了晚餐。尽管晚宴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华尔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之间密切关系的象征，但是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林黎后来告诉媒体，那次晚宴是“私人”性质的，他还说：“那天晚上非常愉快。我们聊了许多事情。”

1931年，股市一跌再跌，平均指数降至1929年低谷时期的一半，失业人数在1930年间从300万猛增至700万，又迅速向1000万挺进。那一年间，惠特尼渐渐超越了华尔街拥护者的形象，而成了华尔街的政治家。1931年1月，他告诉波士顿商会，他渴望改变证交所是“一台专断、不负责任的机器”的形象，对运动的爱好使他从棒球和橄榄球运动中得到了启发，他试着把他的想法加以实施。4月，他被推举连任证交所总裁，他向费城商会提出了“商业诚信”。他告诫说，认为证券诈骗是过去才有的事，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证券诈骗仍然像过去一样猖獗，每年使投资者蒙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许多欺诈的对象还是贫困者或近贫者。他说，投机商号、误导性质的公司报告以及过度投机的投资信托公司是欺诈的主要始作俑者。而证交所的成员则无甚可疑的。“证券诈骗犯是懦夫”，他如此宣称，并向听众保证证交所官员正与国民当局合作竭力找出诈骗犯。这是一次激动人心、具有革新意义的演说，是一个以维护华尔街形象为己任的人所做的坦诚的演说，尽管后来这些话又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回到了惠特尼的耳中。9月，他尖锐地批判了那些仍然拒绝承认大萧条的人：“空洞的陈词滥调太多了，坦率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太少了，自欺欺人的态度太多了……”



这位教务长表示,学校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果断地承担了他应当承担的责任。他也可能会承认:国民经济正不断恶化。1931年夏,一系列银行恐慌和银行破产案席卷了欧洲;胡佛6月份提出的政府间一年延期清偿令在7月份得到了采纳,但这只是暂时缓解了紧张的局势,9月,那曾经至高无上的英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货币的支柱,被迫放弃了金本位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经济风暴。由于美国继续实行金本位制——把黄金按需出售给所有需要者以换取美元——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开始流入别的国家和美国国民手中,6个月内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了一半。1931年4~9月这短短的5个月内,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8%,工厂工人的薪水减少了20%,建筑包工合同减少了30%,普通股下跌了40%。

惠特尼仍然有力地驾驭着经济风暴。英国放弃金本位的第二天,9月21日,周一,对华尔街来说又是糟糕可怕的一天。早上,他在开市前45分钟,即9:15,召开了管理委员会会议。除了巴黎证交所外,其他各大证交所都关闭了,纽约证交所是否要关闭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桌面上。这一想法又一次被否决了: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为了坚持神圣的原则,股市必须继续运转。这一次,惠特尼同意摒弃放任政策,而采取了紧急卖空禁令,以防有人对已经千疮百孔的股市加以利用。开市前一刻,他在演讲台上宣布了这一禁令。当天,股票不出预料地大跌,但在之后的两天内又强劲反弹,周三早上,惠特尼宣布,一切已经恢复正常,卖空解禁了。又一次危机被漂亮地化险为夷了:到1931年末,惠特尼的公共事业仍然处于顶峰。

六

但是,惠特尼在肩负这个伟大职责的同时,一直深陷于个人财政困难之中。

这开始于崩盘发生前很久,其根源绝对无法在崩盘中找到。出于个人喜好,并为了维护他和他家庭的社会地位,惠特尼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后来曾说到,由于艾尔夏牛、赛马和社交宴会,即使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他每月的账单也超过了5000美元,这个数字很可能还远远低于实际情况。他的财产无法支撑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最初购买证交所席位的钱是向家

族借来的。摩根经纪公司的业务给他带来的声誉远远大于财富；具体来说，公司每年的总利润大约在 6 万美元左右，但管理费用很高，其他的业务也十分有限，因为惠特尼觉得做少数富有的朋友和亲戚的经纪人比做普通大众的经纪人更适合他。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位摩根经纪人、当前的证交所总裁一直都非常缺钱，有时甚至极度缺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心理上也同样缺钱。他身材高大强壮，意志坚定，出身名门，能力出众（而且是个左撇子），但他也有克星。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摆脱不了哥哥乔治的阴影。乔治是摩根合伙人，而且绝非“普通的”合伙人，因为 1930 年时他已经被推选为拉蒙特的接班人，即将成为摩根的得力助手。乔治比理查德年长一些、英俊一些、风度更好一些，而且清醒得多，在财政方面也精明得多，按照华尔街个人财政价值标准来看，他比理查德要成功得多。兄弟两人的社交圈有些不同，理查德更喜爱运动和娱乐，而乔治则更认真、更聪明。但是，他们同样都是许多城市俱乐部（如纽约人俱乐部、沙丘俱乐部）的会员，在这些俱乐部中，乔治往往更受重视，而理查德则常常被当作一个有趣的淘气男孩。理查德只是在个人声望方面超越了他的模范哥哥，而他的声望则来自于他所承担的新职责。

早在 1921 年，理查德·惠特尼就不断陷入暂时性的困窘境地，他向乔治借了许多钱。最初，他总是按时归还。1926 年，他借了 10 万美元，在不要命的赌徒看来这并不是很大一笔钱。他用这笔钱置下一座豪宅。乔治好像是按时取回了钱。同时，惠特尼还像那些急等钱用的小人物一样，做起了股票投机。1923 年，他开始对佛罗里达腐质煤公司感兴趣，这是一家致力于将腐质泥煤用作工业肥料的小公司。不久之后，他又被另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佛罗里达公司——美国胶质产品公司所吸引。这些都是“浩渺的蓝色远方”式的股票，即使在那些狂热的年代，大多数精明的经纪人也会对这些股票望而却步。但是，这位即将成为华尔街上最著名人物的经纪人，坚定地相信他不会看错，但不幸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绝对是个股市新手。当他第一次对佛罗里达公司的投资失败后，惠特尼对这些公司股票的热情似乎开始随着它们的下跌而不断高涨，他犯了新手常犯的错误：非但没有割肉反而又增加了投入。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后几年，佛罗里达经济大崩溃导致这些公司股票下跌，当他认为跌倒最低点时，他又投入巨资，以期在股价反弹时大赚一笔。这笔资金包括向他哥哥借的钱和向一位经纪人朋友借的钱。1928 年间，他向乔治·惠特尼总共借了 34 万美元，又向一位



戈尔康达往

（此处有模糊小图）

名叫 E. B. 斯莱(E. B. Schley)的人借了 25 万美元,都是无担保借款,理查德·惠特尼用这些钱孤注一掷,希望依靠腐质泥煤和矿物胶体聚敛财富。

1929 年他还没有停手。那年 2 月,他又向哥哥借了 17.5 万美元投资佛罗里达公司股票。3 月,他又借了 50 万美元(这次,他在提出借钱要求之前自己也踌躇不决),这次是为了再购买一个证交所席位,他觉得这对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扩张十分必要。虽然 1928 年的欠款还未还清,乔治·惠特尼还是借给了他,这不仅仅是出于信任和兄弟之情,也是出于更为实际的考虑。说得委婉一点,这位摩根合伙人对他弟弟投资佛罗里达公司并没有信心,他觉得这些投资使得理查德最有价值的资产——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声誉处于危险境地,只有注入新的、更稳固的资产才能化险为夷。随后就发生了股市崩盘,理查德突然声名鹊起。但他仍然不富裕。10 月,J. P. 摩根公司向他提供了 10 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他完成倒霉的银行家联盟每天的巨额交易。他在 12 月的最后一天归还了这笔钱,但是对于其他的无担保借款他却无力归还。他以公司债券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了大笔资金,除此之外,到 1929 年底时他还欠朋友斯莱 25 万美元,欠哥哥乔治 100 多万美元。

这样,这些原本不配在他所领导的证交所上市的股票使他陷入了困境,但由于哥哥的无限慷慨,他那糟糕的判断力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1930 年和 1931 年,这位受人敬畏和崇拜的华尔街代言人徘徊在破产的边缘。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才有人清楚地看到,交易额常常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理查德·惠特尼公司 1931 年 6 月 30 日的实际资本净值仅为 3.6 万美元左右,根本抵不上理查德·惠特尼的个人无担保债务!华尔街上没人或几乎没人想到形势会如此危险。而在 J. P. 摩根公司的办公室内,理查德·惠特尼事件的的确确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 J. P. 摩根公司的经纪人、摩根合伙人的弟弟,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尽管 J. P. 摩根本人对他知之甚少),而且由于他有趣、高效,是证交所这个艳俗的天地与华尔街之间的使者,因而很受欢迎。关于借给他那位无可救药的弟弟如此多钱的事,乔治·惠特尼对他的合伙人只字未提,但他在办公室里曾说过他对理查德的商业判断力没什么信心。因此,在 1930 年或 1931 年,摩根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经过再三考虑找到了理查德·惠特尼的好朋友、出色的经纪人赫伯特·G. 惠灵顿(Herbert G. Wellington)。科克伦说,理查德的麻烦在于他的投资判断力太糟糕。“我们大家都喜欢理查德,”他以摩根合伙人特

第六章 白衣骑士现身

有的、轻松的、非正式的语气继续说道，“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他重组公司。他需要的不是勤杂工式的合伙人。”接着他提出了核心问题：惠灵顿是否愿意考虑将他那兴盛的惠灵顿公司与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合并？

惠灵顿尽管对惠特尼非常忠诚，但也不是傻瓜，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在通过游说帮助惠特尼脱困的尝试失败后，摩根公司开始采取直接行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惠特尼向谷物交易银行贷的50万美元最近到期了，但却仍未归还。根据后来的报告，这件事在摩根公司的办公室内激起了千层浪——人们开始漫无边际地估测惠特尼佛罗里达投资的实际价值，并且对估测结果感到十分震惊，最后，很多人都说应该采取行动帮助这位好人脱离困境。结果是，J. P. 摩根公司在1931年6月29日向理查德·惠特尼提供了50万美元的90天无担保贷款，年利率为5%——顺便说一句，这是1931年的固定利率。

这解了惠特尼的燃眉之急；他用摩根的钱还了谷物交易银行的债，他的债务因而转移到了——一个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债权人手中。（谷物交易银行原本也不会那么咄咄逼人；惠特尼向其贷款的时候还是其董事，这个细节让摩根合伙人十分不安。）但是，惠特尼仍然被损失惨重的佛罗里达投资牢牢套住，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投入了150万美元，90天摩根贷款到期后，他无力归还。贷款期限被善意地延长了，而且在又一个90天之后，再次得到了延长。值得庆幸的是，人们还是很喜欢他，尽管喜欢的程度一定不及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在9月份用自己的证券为弟弟的贷款做担保，因而将风险揽到了自己身上。而理查德每月的家庭开销仍然高达5000美元，他仍被认为是华尔街境况最好的人之一，并且现在全国都知道他整天都在竭尽全力引领证交所走出世界性大萧条的危机。1931年末，他的债务几乎达到了200万美元，但却根本无力偿还，只有债权人无止境的纵容或者佛罗里达的商业奇迹才能帮助他摆脱破产的厄运。

七

1932年初：失业人数超过了1000万，并向1200万发展，接近美国公民劳动力的1/4；全国工业生产速度降到了1929年的1/2；证交所工业股票的价值仅仅是1929年顶峰时期的1/5左右；美国黄金以每周1亿美元的



速度流向国外,受到了惊吓的美国人囤积了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货币和硬币,这些硬币大多以黄金铸造——简言之,美国正经受着经济灾难。胡佛政府应对危机的核心手段是复兴银行公司,设立该公司是为了向银行和企业注入联邦资金,使这些银行和企业免于破产,进而提供就业机会,并让就业机会“渗透到”贫民和新贫民之中。由于联邦政府没有拿出一分钱直接救济失业者,而私人慈善机构实际上也处于破产状态,复兴银行公司被称为大企业领取救济粮的地方,这种说法非常恰当。1932 年 11 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胡佛和共和党急需为经济大萧条找个替罪羊。他们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华尔街,而且特别选定了华尔街最令人头痛的证交所卖空行为。

反对和支持股票交易卖空行为的理由非常复杂,但都可以简单概括。显然,反对者的中心论点是有组织的卖空攻击会人为挫败股市,进而对公司及其股东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譬如卖空攻击者对斯图兹公司和艾伦·赖安造成的伤害。另外,卖空行为是建立在他人不幸的基础上的,正如睿智细心的奥托·H. 卡恩曾经说过,卖空的根本目的使得这种行为“为任何思想健全的人所不齿”。卖空成了政治攻击的主要目标。令卖空拥护者们感到沮丧的是,为卖空辩护必须利用较为复杂、较为难以理解的概念。首先,卖空等同于抛售期货——在几乎所有形式的商业中,这都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普通交易,禁止期货交易大多被视为一种损害自由市场的行为,令人无法容忍。还有一些需要说明的。例如,每次卖空都意味着卖空者今后还会买入,因此,可以认为卖空行为蕴含着潜在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最终将起到支撑市场而非打压市场的作用。而且卖空是交易专家和商人广泛采用的行为,他们保持了市场的流畅性,如果没有卖空,股票涨跌将更加不受控制,从而增加那些轻率的投资者的风险。卖空支持者们在 1930 年和 1931 年提出的这些理论论点,似乎得到了实际经验的证实。有记录证明,在 17 世纪的荷兰、18 世纪的法国、19 世纪的英国以及 20 世纪初的德国,禁止或严格限制证券卖空的措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卖空就像蚯蚓一样,虽然外表不起眼但作用却不容忽视。

但是,这些论点尚不足以让总统及其政党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当时流传着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他们宣称罪恶的华尔街使美国屈服于个人利益,而罪魁祸首就是共和党人理查德·惠特尼。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惠特尼曾被指派去调查 1929 年崩盘之后紧接着发生的卖空攻击(其用意是维护卖空行为)。1930 年初,股市重又开始上



扬,抗议卖空的声音突然减弱。(批评市场方法的声音总是在股市上扬之时神秘消失。)但是1931年初,这种声音再次响起,而且十分紧迫。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证交所根据惠特尼的命令,在当年5月制定了一条法规,规定成员公司在每个工作日都必须提供一份公司或客户卖空股票的记录。这条强有力的措施能够监视什么人在卖空、卖空额是多少,但却丝毫没有起到限制卖空的作用,因此,批评者们对此并不满意。10月,英镑危机后的一个月,卖空行为突然被禁两天。惠特尼和证交所又更进一步,制定法规永久性禁止对正在下跌的股票进行卖空。

由于卖空攻击的基本原则是让正在下跌的股票进一步下挫,因此,这条迟到的法规有力地阻止了卖空攻击——顺便说一句,这条法规在证交所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对于资源丰富的股市操纵者来说,这并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大选一天天临近,股市仍然大幅下滑,抗议声持续不断,而且越来越响。12月,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所有的证券市场,尤其是纽约证交所和卖空行为,进行大规模调查。推动这一措施的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共和党议员,他听到传言说华尔街的一群民主党人正计划在1932年总统大选时实施一系列大规模卖空攻击,以便让胡佛难堪。这位议员对华尔街太不了解了,他认为股市操纵者,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会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冒险投入大笔资金。但是,这位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们愿意相信任何事。1932年1月,惠特尼及其部分助手又一次前往白宫。这次他是受了胡佛的召唤,会见似乎不像15个月前的那次那么亲切。惠特尼没有公开此次会见的内容,而胡佛则在多年后回忆道,他“警告理查德·惠特尼……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清理内部的话,他将会让国会根据联邦管制法调查证交所”。这不能算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面”;联邦管制是华尔街10年来的梦魇,总统的威胁很可能标志着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合作的终结,双方开始了痛苦、激烈、有时又可笑的长期对峙。

3月初,参议院正式授权金融与货币委员会调查华尔街和卖空攻击,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南达科他州的彼得·诺尔贝克(Peter Norbeck)。华尔街的幕后人物立即跳了起来。4月初,距离听证会还有一周多的时间,以托马斯·拉蒙特为首的华尔街顶级银行家向胡佛递交了一份受损抗议备忘录,但胡佛却自以为是地予以否决。否决的当天,胡佛就听说华尔街转而采取了较为含蓄的游说方式。一个由财政部部长米尔斯(Mills)促成的、由纽约有权有势的共和党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一直在组织集合基金,以

支撑严重受挫的债券市场，进而帮助胡佛政府脱离困境。现在，委员会谈话给胡佛说，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拒绝加入集合基金——除非参议院的调查被取消。

这下，轮到华尔街发出威胁了，而威胁又暗示了华尔街有所隐藏。这是一个支离破碎、背水一战的华尔街，大大不同于拉蒙特在黑色星期四对着记者们温文尔雅地挥动夹鼻眼镜时的华尔街，也不同于崩盘刚结束时惠特尼向全美国生动描述的那个无畏的、严阵以待的华尔街。拉蒙特不得不辗转恳求不在媒体上露面，惠特尼则像被校长训斥的学生一般站在胡佛面前，而那些有头有脸的银行家则试图勒索，1932年春的华尔街失去了往昔的繁荣和责任感。沃尔特·哥特曼(Walter Gutman)把大萧条高峰时期的华尔街比作11月的鳕鱼岬海滩——栖息在那里的动物大多离开了，地貌也受到了飓风的肆意摧残。发生恐慌的日子里，业务几近停滞，丢了工作的苹果贩子站在证交所门前，经纪事务所重要职位的工资仅仅是一周10美元，全国的青年精英像躲瘟疫一般躲避这个地方，华尔街就像一头困兽：它的精神只体现在那阴郁危险的自我保护之中。胡佛或参议院是否认真考虑过取消听证会，历史没有记载；但1932年4月8日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使得听证会势在必行，取消甚至是推迟都是不可能的。

那天，周五，欧洲有传言说一些法国投机者将对美元发起联合攻击，其目的据说是迫使美国像英国一样放弃金本位。不知是由于攻击还是由于传言，外汇市场上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大跌，已经非常严重的黄金外流加速。如果这一传言及其后果发生在当今这个时代的话，那只能表明国际货币业务的某些方面正承受着压力。但是，在1932年4月，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欺诈。同样在8日，周五，法国警方突然没收了所有的《力量》杂志。这是一份充斥着谩骂的金融周刊，发行者是一位名叫马塔·哈瑙(Marthe Hanau)的人。她是金融界的玛塔·哈丽(Mata Hari，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女间谍。——译者注)，其银行和经纪人业务从事大规模投机活动的事实被曝光后，于1928年被捕入狱。如今刑满释放了，她又开始散布各种似是而非的利空谣言，扰乱美元市场。同时，在美国本土，有不明出处的传言说有人计划在第二天，即9日，周六，对纽约证交所实施一次百万美元的卖空攻击——一次商业性而非政治性的卖空攻击。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已经持续大幅下跌了两周的股市崩溃了；在这种危机和病态的形势下，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开始行动了。听证会被匆匆安排在下周一，4

月11日的早晨。周五晚上，惠特尼在纽约的家中意外收到了传票，他被要求作为第一证人出席听证会。

周一早晨，他出现了。如此匆忙地安排听证，让人摸不着头脑。听证室里挤满了听众，其中一些坐在档案箱上，另一些没有座位的就靠在惠特尼的证人席背上。美国上下对听证会都抱着浓厚的兴趣。让议员们，可能也让胡佛伤脑筋的是，似乎有许多群众支持惠特尼。在公众看来，他依旧是无所畏惧的华尔街骑士——造成股市崩盘的真正罪魁祸首是那些愤世嫉俗的守财奴和股市操纵者，而他则与他们不同，是个贵族，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元帅，可以带领美国及踌躇不前的人民走出阴影。他的名字和照片在报纸杂志上随处可见。两周前，美术新闻记者 S. J. 伍尔夫 (S. J. Woolf) 在《世界作品》上将惠特尼描述为一个冷静、能干的人，他评论道：“理查德·惠特尼身处(华尔街的)一片喧嚣之中，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一周，约翰·T. 弗林带着勉强的敬意在《矿工》上写道“惠特尼代表了华尔街最顶级的经纪人”——同样是这个约翰·T. 弗林，他以激烈抨击华尔街出名，一年后又为参议院委员会工作，积极调查证交所。

对惠特尼和华尔街的事业有利的另一个因素是，议员们没有经过充分准备。他们之中只有詹姆士·库曾斯 (James Couzens) 和卡特·格拉斯 (Carter Glass) 两人通晓金融；还有一人认为证人是摩根合伙人，他显然是把理查德·惠特尼和他的哥哥混淆了起来。他们的无知正中惠特尼的下怀，他把本应进行审查的听证会变成了一堂经济课。惠特尼风度翩翩，措辞精准，语法严谨，带着格罗顿口音向他们发表演说，并一丝不苟地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觉得麻烦的是，这次调查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证交所有能力也确实做到了自律。虽然没有明确的法规来禁止卖空攻击，但证交所禁止并惩罚任何企图“挫败市场”的行为，而“挫败市场”正是卖空攻击的目的，因此卖空攻击实际上受到了有效的禁止。惠特尼冷淡地指出，按此逻辑来说，传言中上周六的卖空攻击完全是无稽之谈。惠特尼以教育人的口吻说道：“卖空攻击违反了纽约证交所的法规，因此，不会发生卖空攻击。”

究竟卖空攻击是像独角兽一样从未存在过，还是像渡渡鸟一样灭绝了，他并未说明。他对华尔街密谋给政府难堪的说法嗤之以鼻。在详尽阐述的过程中，他还不忘显示自己。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务实的农民，并且还举例说他在新泽西州有一头有望在奶牛大赛中得奖的奶牛。他以标准的说法为卖空辩护，还总结道，一个没有卖空的市场就像一个少了一条腿

的人。他解释了证交所监控卖空者的体制，并同意递交一份当时最大卖空者的名单。他大方地承认，那些在卖空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方面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可能非常聪明，“但是他们错了”。

听证会最初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一天天过去了，惠特尼依然坐在证人席上，依然连一小步也不肯退让，他渐渐失去了耐心。人们开始看到他专横的一面。一次，议员库曾斯提出经纪人可能会利用客户的股票来挫败市场时，这位证人平静的脸上蒙上了阴云，他厉声说：“我否认这一点！”随后他立即恢复了平静，微笑着说道：“没有经纪人会这么做。”来自农业州艾奥瓦的议员布鲁克哈特断言：“你们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慌之中。”惠特尼冷冷地回答道：“先生，我们通过投机确立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4月21日，惠特尼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的第9天，委员会公布了惠特尼递交的350名最大卖空者的名字。这些名字又一次让委员会失望了，名单上没有什么出名的人物，除了著名的“卖了吧本·史密斯”，他对1.35万股通用汽车股票、1.5万股通用电气股票、5000股阿那孔达股票等进行了卖空。“这其中的许多名字显然是假的。”一位气恼的委员如此评论道。那天下午，这种毫无结果的沟通让诺贝尔克主席失去了耐心，他突然愤怒地对惠特尼吼道：“你不承认股市有任何违法的地方。你什么都不承认。你真是不可救药。”惠特尼温和地笑了。片刻之后，诺贝尔克态度生硬地让他离开，并要他随时服从传票召回。惠特尼及其律师罗兰·雷德蒙(Roland Redmond)非常吃惊，他们抗议说要把所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诺贝尔克回答道：“哦，你们会被传唤回来的。”——这既是承诺又是威胁。

惠特尼和证交所就这样毫发未伤。很显然，他赢了，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事后，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评论道，惠特尼是他见过的最傲慢、最不合作的证人。惠特尼故作正直，自恃高出议员们一等，议员们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供认，他让他们看起来像傻瓜一样，这一切都让议员们十分沮丧和恼怒，他们都渴望一雪耻辱。

惠特尼回到华尔街后，又有其他证人出庭，听证会开始有了些成绩。5月和6月，听证会一直进行着，之后由于政治运动和总统大选而休庭6个月，随后又在次年1月继续，一直延续到罗斯福就任前夕。听证会期间，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的许多阴暗面首次展现在了人们面前。本·史密斯和一个名叫托马斯·E.布拉格(Thomas E. Bragg)的投机者带着一丝挑衅的兴奋，解释了1928和1929年无线电股票集合基金和阿那孔达股票集



合基金的来龙去脉；克鲁格(Kreuger)火柴王国和英萨尔(Insull)公用事业王国的浮浮沉沉得到了详尽说明。很少有人注意到听证会记录中还有一件奇怪的、有着预示意味的小事，理查德·惠特尼和J. P. 摩根公司之间的关系从中可见一斑。1928年，纽约海兰的一位名叫格雷斯·范·伯拉姆·罗伯茨(Grace Van Bram Roberts)的女士写信给证交所，她指出，1920年海登斯通公司的经纪事务所被纽约高级法院宣判犯有诈骗罪，但证交所却从未对其实施过制裁。惠特尼代表证交所回信说，他与高级法院的意见恰恰相反，因而永远不会对海登斯通公司进行制裁。1932年11月和12月，罗伯茨小姐写信给华尔街道德诉求的终极法庭——J. P. 摩根，向他抱怨此事：

贵公司肯定不会害怕理查德·惠特尼先生或查尔斯·海登先生；如果您不制裁他们的行为，那就表示您赞同他们。海登被判犯了诈骗罪，而您没有提出上诉。惠特尼是海登的支持者……一个维护诈骗的金融区将会受到广泛的责难。如果这家公司的成员在纸牌游戏或游艇比赛中作弊的话，他们的俱乐部会把他们扫地出门。在证券交易需要信任的时候，惠特尼先生的错误言辞能让公众树立起信心吗？

一个多月后，罗伯茨小姐收到了回信：

亲爱的女士：

摩根先生已经收到您11月16日和12月12日的来信，他让我告诉您他非常尊敬您提到的两位先生，他觉得您一定是搞错了。

您真诚的

V. 艾克斯顿(V. Axten)，秘书

罗伯茨小姐的抱怨和纽约高级法院事件就到此为止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她提到了游艇比赛实在是奇怪！

八

那年冬天，胡佛政府迅速走向了黄昏。在大选中失败后，胡佛不断要求新当选的总统在危机时期与他合作，以维护国家利益。但是罗斯福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胡佛所要求的是废弃新政中的大部分计划。政治领导人争论不休的时候，美国经济摇摇欲坠。人们认为罗斯福会让美元贬值，这使得货币投机商和有着国际利害关系的公司纷纷将大量美元兑换成

黄金和外币，从而造成国库黄金飞快流失。同时，普通公民也担心银行存款的安全性。为了提款，数十万人在银行出纳窗口排起了长队；一些实力较差的银行无法满足这么多需求，不得不关闭；这导致更多的人从尚未关闭的银行中提款，使得这些银行最终也只得关闭，这样恶性循环，恐慌不断加剧。1932年10月初，内华达州州长不得不宣布银行休业，随后，银行休业像瘟疫一般在西部各州迅速蔓延开来。1933年2月初，由于控股公司的结构不稳定，好几家底特律大银行关闭。事态一发不可收拾。2月14日，密歇根州州长宣布银行休业8天，阻止了近100万人从银行提走15亿美元的存款。随后，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阿肯色州和俄亥俄州也分别在23日、25日、27日和28日宣布银行休业。整个2月期间，那些有幸及时从银行提出存款的人一共提走了9亿美元，接近2月初流通货币额的1/6。美国市面上的金币都囤积到了个人手中，直至最后一枚5美元金币也销声匿迹。

总之，硬币和纸币，信贷和信托，整个系统都瘫痪了，因为信任不复存在，结果，混乱、变革和专制一触即发。3月3日，新总统就职前一天，全国只有10个州的银行没有休业，金库的黄金已经不足以支持货币，财政部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政府人员的薪水，美国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浩劫期间，理查德·惠特尼再次被传唤到了参议院委员会面前。此时的惠特尼已经与过去不太一样了。危机和批判改变了他；他那令人恼火的、难以改变的率直渐渐变成了乖僻。在证交所的管理方面，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坚定，但现在，他希望不受限制地表达他的社会 and 道德态度，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他所表达的并无吸引力。他坚持认为，要恢复民众的信心首先必须平衡国家预算；要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步就应该降低政府人员薪水，并取消对退伍军人非战争残疾的补贴，以削减联邦开支。

回看这个时期的惠特尼，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私人困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在公众面前，他是富人的领袖，在私底下，他欠了一屁股债！对于一个扮演危机时刻领导者的人来说，这个事实令他十分不安。但是，正如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一样，人类的宽恕心也是有限的。1933年2月，议员们和美国人都不知道这个鼓吹平衡国家预算的人竟然过着如此不体面、不平衡的私人生活。但是，他们知道，这个说话像贵族、生活像富豪的人非但不要求和他一样的富人做出让步，反而要牺牲那些地位远远低于他的人的利益。不论从哪个标准来看，他都不算是个英勇的骑士；这不是贵族应有的品质。长期以来华尔街创造贵族的努力看来是付诸东流了。

第七章 摇摇欲坠的金本位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新总统就职前夜，托马斯·拉蒙特(哈佛 1892 年毕业生)致电给他的老朋友弗兰克林·D. 罗斯福(哈佛 1904 年毕业生)，建议他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银行危机贸然采取行动。那是周五的晚上，拉蒙特相信，那些尚未休业的银行——多数是纽约市的主要银行——能够撑过周六的半天营业日；一天半后，国人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大转变，到周一早上开门时，人们又会重拾信心，危机就会随之过去。

罗斯福当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当权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银行“休业”4 天(实际的休业时间长达 8 天，许多银行甚至更长)。毫无疑问，拉蒙特早就希望罗斯福的就任以及新政的实施能让国人恢复信心。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处于绝望之中的华尔街不仅相信新政具有复兴经济的能力，其信任程度尤胜于新政对自身的信任，这一点十分奇怪。

华尔街渴望有人把它从一片混乱中解救出来，因而无心对其拯救者的性情挑三拣四。这种信任的情绪一直持续甚至盛行到新政府庆祝其 100 天纪念日之时，就在此时，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颁发了《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农业调整法案》、《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计划》、《联邦房屋所有者法

案》、《农业信贷法案》以及一些普通时期不可能在华尔街激起太大热情的措施，例如《银行法》和《证券管理条例》。前者要求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目的是打破长期以来的财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包括神圣的摩根财团），后者则要求新证券的发行者向公众详细说明购买该证券的风险。休业了8个工作日后，银行危机最严重的部分过去了，证交所在3月15日早晨恢复了交易。当理查德·惠特尼在他的总裁演讲台上宣布重新开市之时，交易厅内早已厌倦了休假的经纪人们欢呼雀跃，在当天的交易中，股票价值上升了约15%，比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任何一天的涨幅都大。经纪人们立即开始谈论“罗斯福市场”，虽然这种说法有着数年前“柯立芝市场”般的衰败意味。几周内，这两个时期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了。4月20日，证交所三年来最大的一个交易日，行情机的记录速度远远赶不上交易的速度，就像1929年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到4月底，数千名在过去一年、两年或三年中被解雇的经纪事务所雇员——秘书、书记员和传令员等——纷纷被召回原来的岗位。华尔街又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白宫里那个人富于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精神。他的一位助手曾说过，他“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子，从来不知畏惧”。到7月中旬，工业股平均指数比总统就职日时翻了一番还多，这4个月中的上涨幅度是证交所历史上最大的。

二

然而，在这个令人欣喜的时期内，华尔街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起初几乎无人注意，但后来却越来越令人不安，最终演变成了噩梦。华尔街的不落之星——金钱，偏离了其原本在天空中的位置，开始徘徊、跳跃、摇摆。好几代以来，金本位一直相当于天文学的自然法则，而美元在银行界的地位与金本位同等重要——特别是，财政部承诺任何人都可以每盎司20.67美元的比率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兑换数量不限。如今，随着这条政策在危急时刻的暂时取消，国际市场上的美元就像某些地位较低的货币或不值钱的普通股一样，因为投机者的心血来潮而自由浮动。新政府当权的100天标志着一个独特的、令人恐惧的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持续了近一年，美国人最安全的财产不再包括黄金，而是土地和货物。除了工业用途

或珠宝以外，人们不允许以金钱的形式持有黄金，每个拥有黄金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赌博游戏。华尔街的天塌了。

罗斯福在到任的第二天就宣布暂时停止黄金输出和囤积。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闲话，但从那时起天就已经开始塌了。这一举措从技术上违背了金本位，当时，恐慌导致国库的黄金迅速流向国外或国内的囤积者手中，但其重点在于“暂时”两字，因此，就连最固执的银行家也没有怀疑此举的好处。随着银行的关闭，黄金禁运似乎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银行再次开业之时或之后不久，禁运自然会被取消。“要说我们取消了金本位，这是非常荒谬且容易引起误会的。”财政部部长威廉姆·伍丁（William Woodin）在总统颁布禁令后不久如此安慰国人。英国在一年半前就取消了金本位。伦敦《泰晤士报》声称，美国步英国后尘，其前景“十分不妙，可能会完全失败”。

让每个华尔街人以及几乎所有涉及新政的人，包括与罗斯福关系最密切的货币顾问都没有想到的是，罗斯福对金钱事务摇摆不定的态度背后，是他固执坚定的意志。前一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在与胡佛竞争之时曾宣布支持“健全货币”，这意味着金本位；但在1月，即当选总统的2个月后，罗斯福对一位记者说，如果大萧条继续的话，“我们可能不得不让美元通货膨胀”，这与金本位背道而驰。他的密友一致认为，他对货币事务一窍不通，但却坚持认为他那不成熟的观点要比专家的学识更为高明；他把金钱看作一个随意、有趣的游戏，时而使他厌烦，时而又使他着迷；这个游戏往往会激发他幼稚的幽默感。正如其中一位顾问、一个公认的聪明人所说：“你所面临的情况是：你非常想在这个时代做些事情，但却无法让这个人对你要做的事发表意见，无法让他对此加以认真考虑。”

罗斯福的货币顾问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其中有财政部部长伍丁，他精明、友好，曾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业家，当然不会有什么非正统的经济理念。有预算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再没有比他更顽固的健全货币拥护者了。有副国务卿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公法教授，著名的大选“智囊团”主要人物，他是一个野心勃勃、以自我为中心的行动主义者，眼神中带着些许讽刺，与其他人相比，总统更愿意听他的话。（“莫利，莫利，莫利，全能的大主宰！”会唱赞美诗的华盛顿智者这么唱道。）有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他机敏、正统，从1931年起任国务院经济顾问，是唯一从胡佛政府沿用至新政



时期的两朝重臣。有当年晚些时候任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罗斯福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老邻居和朋友，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外交世家，与总统一样对货币事务一无所知。还有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和农场经营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沃伦(George Frederic Warren)，他喜欢幻想，不爱抛头露面；有关政府对物价和美元黄金价值之间关系的管理，他有一些奇特、新颖的想法。凭着沃伦同罗斯福、摩根索的关系，他得以把这些想法灌输给他们。他与摩根索的交往开始于摩根索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期；而与罗斯福的相识，据摩根索夫人所说，则要归功于摩根索把他和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同事介绍到海德公园，就如何栽树提供专家意见。摩根索夫人多年后说：“如果富兰克林和亨利没有遇到这些树木专家的话，生活会有多大的不同啊！”

最后，顾问之中还有华尔街的两个人，其中一人自愿担任顾问，另一人则是环境所致。

詹姆斯·沃伯格，这位20多岁、勇敢、爱写歌的华尔街年轻劳勤瓦[young Lochinvar，苏格兰小说家、诗人沃尔特·斯科特的长诗《玛密恩》(Marmion)中的人物。——译者注]在36岁时成为国际承兑银行的总裁。他与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有过几年的交往，并通过詹姆斯结识了莫利。1933年2月，莫利带领沃伯格和另外几名可能成为罗斯福助手的人来到总统在纽约市的住所。根据沃伯格后来的回忆，罗斯福在见面时问道：“你们之中谁是伊克斯？”这位未来的内政部部长走上前去，就像一个被点到名的士兵一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羞怯地纠正自己名字的读音。之后，罗斯福又对沃伯格说：“雷蒙德·莫利告诉我你是华尔街好人。”一向才思敏捷的沃伯格谦虚地回答说，这种说法更适合他的父亲，而就他所知，好人不一定会有好儿子。罗斯福十分喜欢他的回答，不久之后就邀请沃伯格出任财政部副部长。沃伯格出于个人原因拒绝了。但是，他还是冒着被他的事业所在地、到处都是坏家伙的华尔街排斥的风险，辞去了银行的职务，并且搬至新政所钟爱的华盛顿卡尔登酒店，担任白宫的非正式、无报酬货币顾问，这样，他最终成了最后一个承袭华尔街人为国家服务的高尚传统的人。

另一个华尔街人——继本杰明·斯特朗之后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乔治·莱斯利·哈里森(George Leslie Harrison)，不能算是坚持这一传统的人，他参与新政既不是出于自愿，也不是受人指派。他的工作表面看来与政治无关，也不受政治任免的影响，但却是唯一一条将金融中心

与政治中心永远、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的办公室位于华尔街地区的中心,在该地区最雄伟的建筑——自由大街上纽约联储的佛罗伦萨大厦之内。他的职责包括担任政府的银行家,处理所有对外交易,因此,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和新总统被绑在了一起。哈里森毕业于耶鲁和哈佛法学院,曾担任著名的霍姆斯(Holmes)法官的法律秘书,是一名谨慎的官吏、老练的外交家。他强壮英俊,抽着烟斗,眯缝着眼睛,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他那条因儿时事故而致残的腿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信赖。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他不得不在罗斯福及其激进的追随者、脾气暴躁的华尔街银行家、高贵重要的欧洲银行家之间进行周旋裁断,他的外交才能经受了可笑而痛苦的考验。

三

1932年4月,西部传来不安之声,华盛顿的回声不绝于耳。美国的农民已准备公开反抗。农产品的价格低得可怜,农产品批发指数是1926年的40%左右,农民因此身陷绝境。即使他们卖了所有的农作物,所得的钱还不够偿还抵押贷款,他们被剥夺了数十万美元。暴力事件开始出现;4月末的一天,艾奥瓦州勒马尔(Le Mars)的一群蒙面农民把一位法官拽下法官席,拖到一个十字路口,几乎以私刑迫使他答应不再签署取消抵押物赎回权的文件。但是,暴力殴打法律人员是毫无意义的;农民需要的是以身处困境的债务人为对象的标准补救措施——由政府推动的通货膨胀,就像布赖安(Bryan)一直极力鼓吹的一样,提高农产品价格,并让农民以低息还清他们的高息贷款。有关通货膨胀的讨论在国会盛行开来,俄克拉何马州议员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提出修正《农业调整法案》,要求赋予总统自行决定采取加印纸币或其他通货膨胀措施的权力,这将讨论推到了高潮。

对于那些在华尔街进进出出、支持硬通货的人来说,托马斯修正意味着金融混乱。修正一旦被采纳就表示国家将废除其1879年以来的货币体制——金本位。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罗斯福想要实行托马斯修正,政府似乎也不会采取任何类似的大举措。相反,4月份上半月期间,虽然有禁运令,但政府仍然向几家银行颁发了黄金出口许可证,这显然表明金本位正

戈尔德康达往事

第七章 摇摇欲坠的金本位

渐渐恢复。接着在 18 日晚，罗斯福召开了白宫会议，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即将到来的国际货币与经济大会，这是胡佛政府时期就开始筹备的大会。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财政部部长伍丁、全能的莫利以及货币顾问道格拉斯、沃伯格和费斯。大家发现，除了国际货币与经济大会之外，总统还想着别的一些事，他出人意料地告诉莫利为托马斯修正获得国会批准以及他的签字做好准备。接着，罗斯福转向其余的人，愉快地告诉他们美国刚刚“废除了金本位”，并要求他们祝贺他。

他们没有祝贺总统；相反，据莫利所说，“情况乱成了一锅粥”，三位货币专家对总统如此轻率地采取这样一个重要的举措感到绝望，他们花了整整 2 个小时，发疯似地向总统讲述通货膨胀的隐患和危险，最后还举出了德国 1923 年通货膨胀的可怕例子。那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一片混乱，技术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他们一小时的工资仅相当于 8 美分，午餐肉的价格不断上涨，前一天还是每份 60 万马克，第二天就涨到了 150 万马克。但罗斯福却不为所动，强硬依旧，他似乎被他所引起的骚乱逗乐了。后来，道格拉斯与沃伯格在街上逛了大半个晚上，道格拉斯阴沉地说：“西方文明结束了。”

第二天，罗斯福公开宣布美国废除金本位，华尔街上有些令人惊讶的反应。股市成交量骤然放大。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美国要被贬值了——废除金本位只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么，人们把美元迅速转化为股票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华尔街完全没有出现痛苦或愤怒的抗议。如果是几年前，威金和米歇尔这样的大银行家一定会愤怒地指责总统，但如今，大萧条和恐慌显然已经大大挫伤了他们的自信心，当白宫随意一推将他们的世界颠覆时，他们只能卑微地保持沉默。事业初期就身为中间人的乔治·哈里森小心翼翼地向联储官员解释说，罗斯福采取行动是因为“必须做些事情以防止国会行为超限”，官员们温顺地接受了这个解释。最让人惊讶的是，最大的银行家很快就果断地认可了罗斯福的举措。华尔街 23 号发出了一封由 J. P. 摩根署名的公开信：“我十分欢迎总统的举措……我清楚地觉得要走出萧条就必须防止和克服通货紧缩。”显然，除了在 1931 年英镑贬值后发表过一次声明之外，这是摩根仅有的一份正式声明。

“23 号”已经表明了立场；异端邪说成了正统，结果，华尔街保持了平静。不论摩根声明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它代表了政企之间的一次重大合作。但是摩根究竟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声明呢？难道这位硬性货币的支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持者、这位债权巨头有所转变，一夜之间变成了华尔街的布赖安——饱受压制的债务人阶级中的通货膨胀论者？这完全不可能。那么，难道摩根财团与白宫暗中合作，达成了某种协议，就像它在柯立芝和胡佛政府时期经常做的那样？有趣的是，在那次重大的白宫会议召开的当天早上，报纸上出现了由大名鼎鼎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写的专栏，专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维持金本位会令萧条进一步恶化。众所周知，李普曼与摩根财团的关系密切。摩根财团与白宫暗中合作这样的假设让人十分感兴趣但却缺乏说服力。毕竟，罗斯福在竞选时曾尖刻地批评过胡佛与摩根财团的关系，甚至还拒绝让他的朋友、摩根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出任财政部副部长，理由是“我们绝对不能与23号扯上关系”（这是在很久之后才传出来的）。这次声明是摩根一生中最令人费解的行为，在摩根财团的悠久历史上，可能也是最令人费解的，莱芬韦尔几天后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比较可靠地解释了这一行为，他在信中写道：“您取消金本位的措施把这个国家从全面崩溃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这表示，“23号”感到一个依靠异端邪说的时代来临了，只有这样它这座殿堂才不会与周围的事物一起坍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摩根的声明就是一次政治行为，标志着华尔街优良旧传统的顶峰——可能也是终结。

现在，美元成了一种投机证券；任何持有美元的人都面临着不稳定的行情。美元再也不能被兑换成黄金了，但是在欧洲国家首都城市的外汇市场上，它通常仍然可以被自由兑换成与黄金挂钩的法郎。过去，美元与黄金挂钩时，美元与法郎的汇率是固定的，而如今，这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上下波动，根据新汇率与过去固定汇率之间的关系，每天都可以计算出美元的黄金价值。罗斯福宣布取消金本位后，美元立即跌到了88.5美分，并在这一水平上维持了一段时间，随后，总统在5月签署了托马斯修正，在全国正式实施了通货膨胀，致使美元进一步下跌，6月初，跌至83美分。同时，国内物价上涨，这令农民感觉好了些。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货币专家感到十分震惊——英国人担心美元贬值会危及他们赖以生存的贸易，而法国人则害怕这会使法国也取消金本位。罗斯福在考虑了所有的国内问题后，在货币民族主义和货币国际主义中选择了前者。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同意美国参加国际货币与经济大会，6月12日到7月23日，大会在伦敦肯辛顿的地质博物馆内召开了。

66个国家的代表团以及大量工作人员和专家共1 000多人参加了大

戈尔德达往事

第七章 摇摇欲坠的金本位

会，这是凡尔赛时期以来最庞大的国际性集会，但却虎头蛇尾，最终成了一出乱糟糟的闹剧。根据胡佛和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最初的计划，这次会议将讨论世界货币稳定性和减少贸易壁垒的问题，但现在，其议程却没有有限制。美国代表团尤为混乱。代表团主席是国务卿霍尔，他固执地坚持互减关税，但却不清楚大会是否会讨论这一话题。代表团成员中有詹姆斯·M. 考克斯(James M. Cox)，前俄亥俄州州长，19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货币正统派和低关税的支持者；有内华达州议员齐·皮特曼(Key Pittman)，老西部残留者，白银狂热分子，高关税支持者；有密歇根州议员詹姆士·库曾斯，曾是亨利·福特的合伙人，也是一位高关税支持者，由此代表团成员在关税问题上形成了2：2的两派；有拉尔夫·W. 莫里森(Ralph W. Morrison)，一个没什么才能的得克萨斯人；有田纳西州的代表塞缪尔·D. 麦克雷诺德(Samuel D. McReynold)，他是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但却是个货币盲。这群龙蛇混杂的人中间无人参加过国际会议，而且罗斯福对自己的主张“深藏不露”，因此他们在动身参加这次大会之前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指示，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代表团中的确还有一些专家——一群货币保守派，其中包括联储的沃伯格、费斯、哈里森以及财政部的奥利弗·M. W. 史璞兰(Oliver M. W. Sprague)。

甚至是在驶往伦敦的船上，代表们就常常争执不下，船上的记者预言此次大会将变成一次灾难，并把这艘船成为“葬礼之船”。大会召开之时，在以法国为首、疯狂支持金本位的国家，与以英美为首、取消金本位寻求更大灵活性的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世界性争论。由于没有华盛顿的指示，美国代表们渐渐变得古怪蛮横。霍尔一直顽固地为低关税辩护，但是几乎没有人听他的。在赞同白银铸币的演说中间，皮特曼常常与人争论不休，而且经常喝得烂醉；一次他把上布鲁克街上的路灯打碎，借此以西部人的方式自娱自乐，还有一次他被告知，不论天气如何恶劣，穿着雨衣晋见皇室贵族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他还是穿上雨衣出席了皇宫花园宴会，并且大声宣布：“我不会为了见国王和王后而把自己淋成落汤鸡。”(国王和王后看见他穿着雨衣十分高兴，或者装作十分高兴。)麦克雷诺德很少出席会议，他一心只想着安排女儿进宫觐见。有代表为了投机而把大会上的内部消息传给了纽约的同僚。大会召开期间，罗斯福出人意料地突然将莫利派往伦敦，到达伦敦后，已经是死对头的莫利与霍尔发生了一系列有损尊严的争

吵，他们还十分可笑地比谁给罗斯福的电报更阿谀奉承。同时，在幕后，沃伯格、哈里森、史璞兰以及欧洲国家的货币专家正做着大会唯一的实事——试图稳定（即使是暂时稳定）货币关系，从而结束外汇市场的混乱状态。

只能靠报纸上的伦敦电讯获得消息的华尔街惊慌失措。当有传言说稳定货币的协议即将达成时，美元就会升值，而股票则会下跌；当有传言说有关稳定货币的讨论进展不顺利时，美元就会贬值，而股票则上涨；没有新的传言时，人人都屏息静候。6月底，据传与会的主要国家已经就稳定货币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且正准备公布。就在协议即将达成之时，罗斯福在从大西洋沿岸出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游艇上亲手给大会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把稳定货币的建议称作一个以“似是而非的谬论”为基础的“绝对武断的权宜之计”，谴责了“所谓的大银行家的过时盲崇”，并清楚地宣称美国不准备签署任何稳定货币的协议。他的信无疑是一枚炸弹，将大会炸得支离破碎。虽然大会又持续了三周，但却已经名存实亡了。

金本位支持国的代表们目瞪口呆。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感到十分不安，国王在提到罗斯福时安慰他说：“我不会让这些人这样困扰我的首相。”除了不赞同稳定货币的皮特曼之外，美国代表团的所有代表都因努力化为乌有而受到重挫。经验丰富的金本位反对者、著名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声称罗斯福“完全正确”的大经济学家。对于大吃一惊、备感失望的沃伯格来说，罗斯福的信似乎“不可能出自一个我所敬爱的人之手”；3天后，就在启程离开伦敦前往纽约之前，他辞去了代表团金融顾问的职务，理由是：“我们即将起航，而我却没有航线图，因此，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领航员的工作。”2天内，外汇市场上美元十分不稳定，其黄金价值跌至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73.4美分。

四

罗斯福的疯狂举动在之后的3个月内一直让华尔街大感不解，7月，罗斯福最亲近的顾问开始渐渐了解其背后的意图。他似乎是故意破坏那次伦敦大会的。现在回想起来，他实际上可能在大会召开之前就考虑这么做了，因为他后来的举措清楚地表明他不想让美元与英镑或法郎挂钩，就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像他不愿意美元与黄金挂钩一般。(7月中旬,大会召开之前,他私下里曾提议把美元兑英镑的汇率稳定在每英镑4.25美元的水平,但这显然是欺骗,而且他的欺骗没有受到谴责。)罗斯福反对稳定货币是因为这会限制他在国内的行动自由。稳定货币会让外汇市场恢复秩序,但他却会失去在国内实施通货膨胀的权力。我们现在本能地认为通货膨胀是非常令人头疼的,很难想象那时通货紧缩是个问题,而通货膨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货再膨胀——则被多数人认为是很有价值,也十分必要的。罗斯福认为通货膨胀是值得花任何代价去获取的。

人们开始发现,罗斯福的国内规划与康奈尔大学沃伦教授的理论密切相关。沃伦在7月底成为了罗斯福最亲近的经济顾问之一。他是,或者装作是个典型的美国乡巴佬,绝对的实事求是者。他1874年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场上,后来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并获得了农场经营学位。他写了许多书和小册子,主题多与土地相关,如《苜蓿》、《奥尔良县苹果园调查》以及《给希望务农的城市人的一些建议》。从1920年开始,他在康奈尔大学任农业经济学和农场经营教授。1933年时,他年近60,身体强壮,脸上没有胡须,戴着一副窄边黑框圆眼镜,眼神坚定而空虚,有些像卡尔文·柯立芝,大衣的前胸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把铅笔,笔端露在外面。他衣着随意,言辞朴实诙谐,他说的话精练且令人难以反驳,例如:“这儿是座农场,这儿有个农民,这儿是些事实。”他是美国经典乡村格言的大师。这类格言的创作者都自命不凡,似乎他们说闪烁着智慧火花的警世良言,对于城里的听者来说,这类格言因为没什么大意思而令人麻木;这类格言看起来是要表达些什么,但最终却什么也没说。例如:“给粮仓顶刷上油漆是为了保护。给房屋刷上油漆是为了出售。而给粮仓的侧墙刷上油漆是为了好看——如果你负担得起的话。”(微笑以及聪明、欣赏地点头。)沃伦本人在伊萨卡镇外有一座大农场,在那里养了大约4000只鸡,他喜欢把自己称作“自耕农”。

令罗斯福着迷的沃伦理论在一本题为《价格》的书中有阐述。该书是沃伦与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年轻同事弗兰克·A. 皮尔森(Frank A. Pearson)共同所著,书中所采用的推论十分简单。沃伦和皮尔森假设,物价会自动随着以纸币表示的黄金价格的变动而上下浮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举出了一系列凌乱的历史数据和图表,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一直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大征服甚至更早。他们因此得出结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论,要控制物价就必须控制金价。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应该走向市场,一步步抬高价格收购黄金,从而迫使美元的黄金价值逐步降低,并且——如果这一理论正确的话——达到提高物价的目的。最终的目标是“商品美元”——在金本位体制下,美元的价值以黄金来计算,而“商品美元”的价值则以商品来计算,通过政府对金价的操控,这种美元的价值将保持稳定。

正统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大部分经济顾问,都认为沃伦理论中的推论是错误的。他们承认,物价确实常常随着金价而变动;但这其中的陷阱是:在这一关系中,物价是因,金价是果。试图让金价来影响物价,颠倒了因果关系,就像大厦大厅里的人试图通过推动指示表来移动电梯一样,起不到任何作用,最终可能会毁了整个机器。对于正统经济学家来说,沃伦只是个鲁莽、固执的货币狂人,这类人在美国多得惊人。当然,正统经济学家们无法根据经验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因为还没有这样的理论被实施过,或者说没有被很好地实施过。1869年,被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称为华尔街的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歌德所作《浮士德》中的恶魔。——译者注)的杰·古尔德(Jay Gould),企图贿赂格兰特总统的姐夫,让其帮助他垄断美国的黄金供应。他虚伪地辩称,炒高黄金价格的市场操作会带动西部谷物价格上涨,因而必定会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古尔德真正关心的不是农民的福利,而是他自己的非法所得,这次阴谋产生的主要结果不是公众利益而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货币恐慌。

而且,古尔德的所作所为是私人操纵而非政府行为,说他早就采取了沃伦理论,这只能算是一个托词而非理由。至于政府政策,许多国家在1933年之前和之后都常常干预市场,目的是维持其货币的价值;同时,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这些国家多年来还常常故意贬低其货币的相对价值。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仅仅为了在国内制造通货膨胀、借此帮助债务人,而在黄金储备充足的时候对其货币发起系统性的、有计划的攻击。没有国家这么做,因为这种想法实在太古怪,它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就算有国家想到过,它们的经济部长也会认为这无异于用锤子不断敲击自己的头,这样,停止敲击时就会感觉好些。

罗斯福对沃伦(没人会怀疑,也不可能怀疑他的真诚)的着迷早在他就任之前就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到就任后的第一个月。莫利后来在那年3

戈尔德康达往事

第七章

摇摇欲坠的金本位

月写道，“各色主张政治改良的人”都把新政当成了“一次十字军东征，任何心怀不满的人均可以应邀加入其中”，而华盛顿则成了他们的麦加(Mecca，在沙特阿拉伯西部，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译者注)。他没有明说沃伦是主张政治改良的人中的一员，但他心里无疑是这么想的。4月和5月间，沃伦的幸运之星似乎有些黯淡，而之后又再次闪耀。6月中旬，纽约联储银行的外汇部主管弗雷德·I. 肯特(Fred I. Kent)觉得必须要发表演说来警告世人：以降低美元的黄金价值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想法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如果这种想法得以实施的话，国家将会陷入灾难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肯特一定会竭尽全力攻击这一当时尚未在政府圈子内流行开来的理论。到仲夏时期，沃伦虽然没有官职，但他在总统心中的地位一定非同一般。康奈尔大学放假期间，他就在华盛顿商务部大厦内的办公室里研究图表，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不接电话，有人敲门的话，他会坚决而自相矛盾地回答：“没人！”有人说他凭借特异功能从白宫飘进飘出；但不管怎么样，从来没有人看到他这么做。

5月和6月间，随着美元市值的自动下滑，农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罗斯福对少数几个助手表示，他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十分高兴。他没有说明究竟为什么如此高兴，但助手们恐怕能够猜到。事实证明，他的新宠理论像预期的那样奏效了——至少前半部分奏效了。但是到了7月中旬，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逆转。突然，纽约股市遭遇了一年多来最严重的下挫，除了伦敦大会的失败以外，找不到什么具体原因，这让“罗斯福市场”走到了尽头；美元对黄金小幅上涨；最糟糕的是，物价突然开始下跌了。从7月18日到21日，小麦价格从1蒲式耳1.24美元下跌到90美分，是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下跌，棉花价格也从1磅11.75美分下跌到8美分。西部再一次出现了煽动性的言辞。很明显，此时罗斯福摆弄美元的决心更坚定了。无法再继续依靠自由市场来压制美元的黄金价值了。有必要把沃伦理论中积极的第二部分加以实施，即有必要让美国财政部对美元发起卖空攻击。

当时，没有人清楚地了解罗斯福的计划。沃伯格尽管已经不再参加伦敦大会了，却仍然热切地想让政府采用他在银行业方面的专业知识，毕竟，在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中，他是唯一一个具备实际银行专业知识的人，他认为他至少可以稳住那些野心勃勃的理论家。在从伦敦大会回家的船上，他第一次读到了沃伦的书。（这些书并不是罗斯福寄给他的，而是国家委员会寄给他的。这个委员会是狂热的通货膨胀组织，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内,沃伦与该组织有些联系。)沃伯格毫不惊奇地发现他对沃伦理论的看法与伟大的凯恩斯不谋而合,就在他离开伦敦之前,凯恩斯告诉他,他认为沃伦理论是“胡说八道”。(尽管凯恩斯自己也有些倾向于通货膨胀。)7月底,沃伯格前往白宫赴午宴,他被引入了总统办公室,发现总统正与沃伦以及将沃伦理论稍加派生的耶鲁大学的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教授在交谈,沃伯格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罗斯福愉快地向两位理论家介绍了沃伯格后,理论家们就离开了,沃伯格于是开始抗议罗斯福写给伦敦大会的信。罗斯福开始十分生气,随后又变得漫不经心。“他根本没把货币问题当回事。”沃伯格痛苦地在日记里写道。

沃伯格离开时,罗斯福指示沃伯格在下周与沃伦和罗杰斯碰头,并且于8月初在海德公园向他汇报。于是,第二天晚上,沃伯格只得咬牙与两位教授在纽约见了面。对于“联邦储备系统之父”的儿子来说——这种家庭关系似乎让他和联邦储备系统成了亲兄弟,这个晚上就像是在地狱里度过一样,唯一的安慰就是魔鬼没有想象中那么邪恶。沃伯格发现,沃伦和罗杰斯并不像他担心的那样极端。而且,据他事后写道,他发现沃伦“认真,没有恶意”,“非常希望帮上忙”,而且“并不教条,也不傲慢”。10天后,沃伯格按照总统的指示来到了海德公园,除了沃伦和罗杰斯之外,有些畏畏缩缩的沃伯格还会看见别的什么人和总统在一起呢?尽管有他们在场,这个场合对沃伯格来说还是十分有趣的。让罗斯福感到着迷的是,沃伦“在无数卷餐巾纸上画了各种曲线和图表”,而罗杰斯则一直高深莫测地微笑,还不断地点着头。三位经济学家因观点不一致而反复争论着。结果,总统说他想让沃伦和罗杰斯去欧洲呆一个月左右,看看美国货币政策在那里会引起什么反应。另外,一个特别的、高层总统货币研究团队正在筹备之中,沃伯格将成为这个团队的关键成员。这是对沃伦和罗杰斯的流放,还是对沃伯格的搪塞?他们都不知道。之后,沃伯格和沃伦共乘一辆出租车前往火车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反映了那时始终支配美国经济生活的两股敌对势力,金融家和农民。沃伦沮丧地对沃伯格说:“唉,我想你毁了我的计划。”“恰恰相反,”沃伯格回答道,“你赢了。”华尔街上,不了解情况的股市依然保持稳定,它并不知道哈得逊河上游的主宰们把它的命运视作儿戏。

同时,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9月份的上半月,罗斯福计划推行通货膨胀措施的传闻愈演愈烈,美元因此大幅下跌,在18日创下新低,黄金价

值为 63.75 美分，农产品价格再次上升，但是这还不足以让总统感到满意。9 月底，沃伯格前往白宫，最后一次请求罗斯福不要采用沃伦理论。对于他的抗议，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们不抬高小麦和棉花的价格，农民就会游行。”随后，罗斯福又让沃伯格说明他会怎样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沃伯格不得不承认说他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大复苏是唯一的办法，而只有消除令人头痛的货币不稳定问题，才能实现大复苏。罗斯福对此不感兴趣。那么，沃伯格接着问道，如果他设法通过大银行和大保险公司来煽动公众反对通货膨胀的情绪，总统是否会反对？这也就是说，罗斯福是否想让一群资金充足的公众来攻击他最中意的经济政策？尽管沃伯格没有这么说。总统强硬但不失优雅地答道，这样的行为“只会制造混乱”。沃伯格走出了白宫，他觉得他不会再见总统了；虽然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反新政者，他现在是一名走在前列的鼓手，代表了华尔街上脾气暴躁的罗斯福仇恨者，他即将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民族人物。沃伯格那天离开罗斯福的办公室，有着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摔门而去的象征意义。

从那时起，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罗斯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早在 8 月中旬，海德公园会面后一周左右，他对那时已成为农业信贷行政官的朋友摩根索提起，他想让财政部在公开市场上收购黄金，以便力挺金价上涨。（摩根索问这是谁的主意，罗斯福泰然自若地答道“我的”——这个回答显示了他在坚持声名狼藉的沃伦理论之时的自卫意识和底气不足，因为他们两人都十分清楚这是谁的主意。）现在，他开始奋力向前推进，他不打算让财政部直接出面收购黄金，而安排了复兴银行公司代表其进行收购，从而扫除了一些妨害计划实施的重大法律障碍。美元在 10 月份又难以控制地重新上涨，达到了 72 美分左右，此时，事情到了紧要关头。10 月，罗斯福不顾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坚决反对，告诉他的助手们复兴银行公司收购黄金的计划即将开始实施，艾奇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愤然辞职。3 天后，在一次以简介沃伦理论为目的的“炉边闲谈”电台节目中，罗斯福向公众宣布了这一计划。他说，为了下压美元、提高物价，复兴银行公司将收购美国新开采的所有黄金，“收购价格实时确定”，必要时，复兴银行公司还将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国际市场上收购黄金。“这是政策而不是权宜之计”，罗斯福接着说道，似乎存心要让那些固执的国际银行家及其资金伙伴不舒服。这样，整个美国经济就成了沃伦教授的试管，凯恩斯后来把这一时期描述为“摇摇欲坠的金本位”，《纽约时报》也

同时声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不真实感”，5年后，《纽约时报》又补充道：“历史上可能再也没有如此大胆的经济试验了。”

五

总统的宣布在国民中激起的第一个反应是普遍的混乱。与这一计划密切相关的人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例如，主要的通货膨胀论者托马斯议员大喜过望，而在芝加哥一位朋友家中收听了“炉边闲谈”的沃伯格则万分失望。但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和报纸则有着很大的分歧，混乱不堪。就连华尔街似乎也只感到迷惑而非愤怒——事实上，华尔街异常吃惊，陷入了一种暂时的恍惚。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大银行家“承认他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计划的意义”。如果银行家都不能理解，那还有谁能理解呢？其中一位银行家说，他“没有发现总统的宣布有任何背离正统金融原则的地方”——这一评论具有某种禅宗的特性，似乎这位银行家寻找的是一种与挑战极不相称的回应，他确实找到了。摩根财团保持了沉默；不论是托马斯·拉蒙特，还是理查德·惠特尼，还是奥托·卡恩，纽约金融界的知名代言人没有一个能说得出来。这是一个特殊的、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异常现象，因为罗斯福的计划实际上并非那么难以理解；很清楚，这一计划直接攻击的就是华尔街最珍视的健全货币。的确，谨慎是有实际理由的：关于联邦政府规范股市的问题，华尔街和新政正快速进入一种正面冲突的状态，当下的政治环境不适合拉开第二条战线。华盛顿因此了解到：一片萧条的华尔街是可以被击败的，虽然那儿有许多著名的老顽固。

10月25日，大试验开始了。那天早上，以及之后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罗斯福、摩根索、复兴银行公司的负责人杰西·琼斯(Jesse Jones)，有时还有沃伦，在总统的卧室碰头，当天的黄金收购价就在总统用早餐之际被确定了下来。起初，收购只在国内市场上进行，不涉及国际市场，他们希望国际市场的价格能自动与美国政府的价格保持一致。罗斯福卧室里的这一小伙伴颇有些随心所欲地在前一天的价格上加上几美分，如此确定下当天的收购价格。商议完毕后，他们就向世界宣布复兴银行公司准备以多少资金收购美国所有新开采的黄金——这也就是说，美国所有的待售黄金都不允许被私人囤积。

第一天早上，价格被定为 31.36 美元一盎司，比当天的国际价格高出了 27 美分。（过去的金本位价格是 20.67 美元；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量就是美元自 4 月份以来的贬值量。）物价如沃伦理论预期的那样上涨了。第二天，金价又涨了 18 美分，但是物价却下跌了。怎么回事？这肯定是试管里的干扰反应吧？抑或只是暂时的反常；政府官员声称他们并不气馁。接下来的一天，金价涨了 22 美分。物价又再一次上涨。但是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现象：国际外汇市场看来根本不顾复兴银行公司的收购价格，而是每天另外计算黄金的美元价值，很明显，复兴银行公司的国内收购价格无足轻重，不会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现在就有了两种美元，一种是沃伦美元，另一种是外汇美元。这非常令人担忧，因为这样一来，复兴银行公司就有可能打破仅在国内操作的严格限制而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英国和法国可能将这种行为理解为全面经济战争。随后的一天，周六，金价再次上涨了 6 美分，而物价又一次下跌。我们不知道沃伦教授有什么举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有理由相信他一定在抓耳挠腮了。

同时，华尔街依然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负面消息影响着人们的情绪：最新的企业收益报表糟糕透顶，但美元的稳定性前景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更让人不放心，股市因此有了一些起色。华尔街上的每个人闲下来时都会猜测每天金价的上涨量是如何确定的。那些热衷于这项有趣活动的人如果知道真相的话，一定会忧心忡忡。多年后，他们可以从摩根索的日记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某日，他参加早餐会时建议金价上涨 19~22 美分，罗斯福提议上涨 21 美分。“这是个幸运的数字，”他愉快地解释道，“因为 3 乘以 7 得 21。”这一计划可能只需要一点数字命理学知识。

然而，私下里与沃伦进行商议时，罗斯福似乎没有那么高傲；看来，他的确问过沃伦他的理论到底为什么没有奏效。沃伦固执地答道，要让这一理论奏效就必须把黄金收购的范围扩大到国际市场。10 月 29 日，收购战开始的第 5 天，罗斯福宣布他打算这么办了，复兴银行公司每天将通过通常为财政部代理外汇交易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伦敦和巴黎收购黄金。这将把一种十分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一种可能具有爆炸性的物质引入试管。英国和法国立即传来了痛苦的抗议声，这两个国家的货币无疑将失去竞争优势。“如果情况变糟的话，那么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英国前财政大臣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爵士这样提醒纽约邦德俱乐部。他还说：“相信我，我们不会报复，这一点你们不必担心。

但是，我们一定会保护我们的贸易地位。”这位机敏的前财政大臣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英国可能被迫进行自卫，对其货币发起类似的卖空攻击。用锤子敲自己头的游戏不是只有一个人会玩。

中间人乔治·哈里森的痛苦就这样开始了。作为一个称职的官员，他有责任贯彻这一奇怪的政策。同时，他又必须试着向愤怒的欧洲银行家解释和维护这条政策，尽可能平息他周围那些手足无措的华尔街银行家的怨言，并利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总统终止和放弃这一政策。至少，他在执行最后一项职责时是认真的；他是一个正直传统的银行家，就个人来说，他憎恨这条政策。此外，由于沃伯格被排斥在外，他几乎成了罗斯福身边唯一一个支持健全货币的人。

11月2日，国际市场上的黄金收购拉开了帷幕。为了取得最大影响、避免投机者了解情况，收购价格和收购量都是机密。正如计划的那样，美元在国外市场上贬值了。自由大街上，哈里森一直在打国际电话，他试图稳住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放弃报复的念头。法兰西银行的罗伯特·拉克盖特(Robert Lacour-Gayet)在电话里告诉哈里森，法国人不知道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他愤愤不平地说，他被要求向法国媒体解释美国的新政策，但是他自己也迷惑不解，摸不着头脑。哈里森只能安慰他说，黄金收购将尽可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至于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他4天前听说这一计划时，就像哈里森在办公日志中描写的那样“暴跳如雷”；现在，他平静了下来，但却仍然万分担忧。11月的情况一直如此，期间偶尔会有一天的中止，政府继续攻击美元，定期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收购黄金，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国际市场的黄金收购开始后一周，美元的黄金价值跌到了63.4美分，创下了南北战争后的又一个新低；巴黎和伦敦紧张不安，事态的变化无常使得国际贸易最终瘫痪；欧洲和美国的股市仍然混乱不堪，不知何去何从；贤明庄重的《纽约时报》金融编辑亚历山大·戴纳·诺伊斯把美国进入国际市场称为“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侵”，让“国内外那些严谨的银行家无从了解华盛顿的用意”，他为此感到痛心。同时，农产品价格并无明显提高，艾奥瓦州的农场罢工者烧毁了一座铁路桥，还向一辆经过那里的列车开枪射击。沃伦教授不接电话。

11月9日，事情到了关键时刻。由于投机者加入了美国政府对美元的攻击，国际市场上的美元价值突然跌倒了62美分。国内谷物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当诺曼行长看到英镑兑美元创下新高、突破5美元大关时，他又



一次大发雷霆，虽然英国还坚持不采取报复行动，但是英国的商业银行家开始频频给美国商业银行家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可怜兮兮地请求他们解释清楚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美国的银行家们同样也不知情，因此，他们没办法提供任何帮助。那个周末，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尽管介入了国际市场，但是沃伦理论仍然没有很好地奏效；黄金收购开始以来，美元的国际价格被迫下跌了大约 7%，而国内的小麦价格仅小幅上涨，涨幅不到 2%，棉花价格仅上涨了 1.55%。

罗斯福还没有死心。（当然，对远隔重洋传来的抱怨声，他并非无动于衷；当他从摩根索那里听说被他称为“粉红胡子”的威严的诺曼行长发疯似地表示抗议时，两人都恶作剧般地大笑不止。）12 日，周日，他在白宫召开了一次货币会议，摩根索、哈里森和沃伦出席了会议。罗斯福表示他相信农民起义已被避免，并宣称到目前为止自己对黄金收购计划的成果十分满意，之后，哈里森大声预言说，美元继续贬值的话将毁坏政府信用，他极力主张至少要把贬值的速度降下来。罗斯福回答道，问题有其两面性；不管怎样，如果美元真的跌得太多，复兴银行公司也能改变行事方式，向国际市场抛售部分黄金。哈里森抓住这个想法大加赞赏。没问题，他说，让我们开始抛售黄金吧，越快越好。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切实决策。接下来的一周内，在应付英国和法国银行的不断抱怨的间隙，哈里森几乎成了罗斯福的全职顾问——这个职位没有什么报酬，因为他的建议很少被采纳，但是对于华尔街的银行家来说，这个与新政有关的职位十分难得。

第二天早上，哈里森回到了自由大街，他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外汇市场的情况怎么样？总统想知道。这证明，总统开始想了解外汇知识了。哈里森对此十分满意，他回答了总统的问题，并且抓住机会再次提出抛售黄金的想法。罗斯福对这一问题闪烁其词，但是他告诉哈里森说，现在他要哈里森每天向他汇报市场情况。因此，第二天下午很早，哈里森就致电白宫汇报情况：美元兑英镑、美元兑法郎都大幅下跌，现在抛售一部分黄金怎么样，或者，由于欧洲的交易日已经结束，明天一早抛售怎么样？罗斯福出乎意料地回答，这是个好主意，他提出抛售 20 万美元的黄金。哈里森答道，这点金额只是杯水车薪，他提议在巴黎和伦敦市场上各抛售 50 万美元的黄金。罗斯福同意了，哈里森心情愉快地挂了电话；看来，货币市场即将恢复理智。

但是，当天下午 16:20，杰西·琼斯致电哈里森说，总统想让他知道，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美国明天既不会收购也不会抛售黄金，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弄明白在国外市场上抛售黄金是否合法。性格保守的哈里森在办公日志中写道，他感到“十分惊讶”。首先，总统自己取消了他 3 个小时前做出的口头指令；其次，法律问题已经充分讨论过了，可能早在海外收购计划开始之前就解决了，没有人比哈里森更希望法律问题得不到解决。煎熬了 3 个小时后，哈里森在 19:15 打电话给罗斯福。白宫的接线员向联储接线员解释说，哈里森必须等一会，因为琼斯先生排在哈里森之前，事实上，他已经在和总统通话了。几分钟后，哈里森终于和罗斯福说上了话，像往常一样，罗斯福的委婉回答平息了他的愤怒。罗斯福说，琼斯对美国在海外抛售黄金的相关法律问题完全没有把握。哈里森回答时只能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收购交易差不多已经进行 2 周了，没有遇到什么法律方面的异议，抛售黄金和收购黄金适用的法律应该是相同的。罗斯福回答说他会给他回电话的。但实际上，几分钟后给哈里森回电话的是琼斯，他通知哈里森，总统暂时口头撤销了抛售黄金的授权，他还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哈里森为什么要抛售黄金——这话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画蛇添足。

哈里森在其东端大街的公寓里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他试着往白宫打电话，以便了解最新的指示。但那时恰恰很难找到罗斯福。他的助手都推诿搪塞，一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哈里森才找到了摩根索。摩根索告诉他，总统正在穿衣，因而无法接电话。然而在此期间，外汇市场再一次濒临恐慌：美元跌到了 60 美分以下，正面临着大崩溃，诺曼和拉克盖特又打来了越洋电话。与摩根索通话完毕后，哈里森立刻转换到了安慰者的角色，他向两位欧洲人逐一解释说，有迹象表明，罗斯福的通货膨胀动力即将减弱。（这些迹象应该包括哈里森从白宫感受到的越来越明显的困惑和优柔寡断；不会再有别的迹象了。）最后，在中午时分，琼斯打电话告诉哈里森说，他赢了，法律问题又一次被扫清了，而且总统再一次授权他在巴黎和伦敦市场抛售 100 万美元的黄金。（同样，那天要在欧洲市场上进行这样的交易又已经为时过晚了。）那天下午，哈里森终于联系上了罗斯福，总统竟然向他询问华尔街的经纪人对他的计划有什么看法。这让他大为高兴，他可以以此来安抚诺曼和拉克盖特了。哈里森回答说，他已经尽力向六七个经纪人解释了总统的计划，解释完后，“他们似乎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很好，”总统亲切地说，“继续好好干。”

哈里森的胜利并不可靠。接下来的一天，11 月 16 日，黄金按计划被

拋售了出去，美元因此得到了巩固。为了稳定市场，罗斯福答应了哈里森的要求，他公开表示，他对这一计划所取得的成果相当满意。但是，当哈里森要求总统答应第二天在伦敦和巴黎市场再拋售至少 100 万美元的黄金时，总统拒绝了。实际上，18 日又恢复了黄金收购。但是，罗斯福的态度确实有了转变。他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部分原因是哈里森小心翼翼但持续不断地向他施加压力，部分原因是看到了他在外汇市场上造成的混乱，而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国商业团体发起了大范围、有组织的抗议。他发现他正进行一场恢弘的杂技表演，如果将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国内农民的困境”这只球上，那么他就会接不住其他的球，如“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他本人与美国大大小小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等。11 月 21 日，他和摩根索离开华盛顿前往佐治亚州的温泉。距离产生美，哈里森几乎成了罗斯福的依靠。一种远距离的亲密度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之间产生了，他们在性情、兴趣方面截然相反，除了两个重要的方面——风度翩翩和身体残障之外，两人毫无共同之处。

21 日，摩根索被哈里森说服，力劝罗斯福几天内不再在海外市场上收购黄金，理由是法郎如今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摆在法国面前的是取消金本位，这可能导致重要货币都与黄金脱钩，国际货币市场的前景将完全不可预知。劝说起了作用。哈里森欣喜地发现，那天他没有从复兴银行公司收到拋售黄金的命令。第二天一大早，哈里森还在东端大街的家中呼呼大睡时，就被罗斯福的电话唤醒了。总统说，摩根索把哈里森的话传达给了他，还说，考虑到法郎的不确定性，他很高兴自己听从了建议。这当然是一个全新的罗斯福。当天下午，哈里森从自由大街打电话至温泉进行每日的市场汇报，他发现总统陷入了沉思，于是两人开始讨论沃伦理论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哈里森指出，尽管美元贬值了，但国内小麦和棉花的价格水平仍然与 11 月初时持平。确实如此，罗斯福反驳道，但是看看橡胶和锡，它们的价格上涨了。哈里森解释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美国的橡胶和锡主要依靠进口，它们的国际价格与黄金挂钩，因此，金价上涨自然意味着橡胶和锡的价格上涨。罗斯福显然被这种推理方式打动了，他同意在当周剩余的 3 天内不再插足外汇市场。

还有很多类似的谈话。“很奇怪，价格有时不按规则涨跌。”总统在其中的一次谈话中若有所思地说道，显然他感到十分困惑。长途电话变成了经济研修课——这表示，作为教师的哈里森渐渐占了上风。23 日，尽管美

元坚挺、小麦价格下跌了3美分/蒲式耳，但罗斯福履行了当周不再收购黄金的承诺。两人又争论了起来，罗斯福说他有图表证明价格按照计划上涨了，哈里森则重申了他前一天的观点——涨价的商品多是进口商品，因此不能算数。哈里森在办公日志中写道，他现在觉得罗斯福正逐渐理解稳定原则。“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谈话。”他这样写道。毕竟，他那位尊贵的学生最终可能会理解基本概念。

六

在研修班继续进行的同时，全国各地的抗议声不断增强。11月18日，美国商会振臂高呼，要求早日恢复金本位。20日，罗斯福最忠实的支持者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在《星期六晚间邮报》上发表文章称，黄金收购引起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抵消新政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绩。21日，奥利弗·史璞兰为了自由攻击罗斯福的计划而辞去了财政部的职务。（“史璞兰是个讨厌的家伙。”罗斯福对他的一位助手这么说。）同日，一份重要的商贸期刊公开指责沃伦为“美国的金融独裁者”。此前，沃伦几乎完全躲开了公众的视线，甚至很少有人谈起他。23日，杜邦、通用汽车和梅西公司的首脑加入了反对者行列，24日，阿尔弗雷德·E. 史密斯——罗斯福曾在一个和谐的场合称他为“快乐的斗士”——也投入战斗，宣称他“支持黄金美元而反对劣质美元”，并且谴责华盛顿的“狂想者和发号施令者”把所有美国人都当成试验小鼠。华尔街受到了这些坦率直白的同盟者的鼓励，可能也感到了一丝羞愧。它虽然仍然谨慎地保持沉默，但已经开始在幕后系统地策划反对活动，并默默地表示，对8个月前还热烈欢迎的新政，它的态度已经改变了。虽然纽约的所有银行和经纪事务所都承认国家复兴总署的规章，但是11月24日，一位新闻记者跑遍整条华尔街却只看见三扇窗户上贴了蓝鹰标志。被遣返回华尔街的变节者詹姆斯·沃伯格，在抗议者中地位很高。9月份与罗斯福意见相左后，他默默地开始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反通货膨胀运动。“商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各地，互通有无，”沃伯格后来写道，“我参与组织了一场由芝加哥商人和经济学家发起的抗议活动，还号召许多朋友采取行动。鲍勃·洛维特(Bob Lovett)帮助纽约的报纸了解情况。约翰·谢夫(John Schiff)向纽约商会发出警报……我自

己则与一些重要的人寿保险公司总裁进行了交谈。”11月22日，沃伯格在费城的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公开露面了。出于情感或外交原因，沃伯格没有对他过去的偶像——总统发起人身攻击，而是抨击了沃伦理论，谴责了国会和政府中向罗斯福推荐这一理论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尔街最终找到的代言人是过去的新政代言人。

几乎每个小时都会有抗议黄金收购的新团体和新委员会出现；最终，在27日晚，他们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健全货币”集会，集会的主办方之一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实际上，当天晚上，音乐厅往南13个街区以外的赛马场内举行了一场更为盛大的、支持黄金收购计划的集会（1.5万人，包括在外面街上闲逛的人，参加了集会），摩根索、托马斯议员以及罗斯福的狂热支持者、电台布道牧师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是集会的主角。但是，罗斯福的后盾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集会适得其反。善于蛊惑民心的反犹太主义者考夫林情绪激动地抨击了“下曼哈顿地区亲英派银行家对英国的宣传”，还说通货膨胀只是个“迷惑人、吓唬人的词”。他表现得过了头。尽管考夫林的诚实几个月以后才受到质疑，因为人们发现他的小花电台联盟组织一直为了私人利益而抛售黄金、收购白银（他主观地声称白银是一种“基督徒”的金属），但是，正如沃伯格后来总结的，考夫林在赛马场的差劲表现是致使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沃伦计划的唯一原因。不管怎样，金价在11月28日上涨了9美分，在11月29日又上涨了8美分，这似乎是最后的挑战，之后，罗斯福只能放弃了。12月5日禁酒令的废除将货币问题从人们的脑中和报纸的头版上挤了出去。9日，罗斯福向哈里森吐露心声说，他现在希望“各个领域都保持相对的平静”，哈里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知道，这代表着试验结束了。确实如此。12月剩余的日子里，金价只上涨过一次，之后的上涨速度极其缓慢。

在1934年1月中旬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正式放弃了沃伦理论，他建议把美元兑黄金的比价稳定在当时公开市场的水平附近。1月的最后一天，国会通过授权立法后，他将美元稳定化付诸实施，宣布恢复金本位，但对金本位做了一些修改，美元价值被定为过去的59.06%。选择这个奇怪的百分比是为了让35美元/盎司的高价成为黄金官价。在这奇怪的一个月以来，每天在总统的早餐桌上被随意更改的金价，如今得到了确定，而且可能是长久地确定下来了。究竟会有多长久，没有人能够预见。30多年之后，1968年，国家首脑们将跨过半个地球进行会面，一位女王将与大臣

们商议至凌晨，中央银行将付出巨大努力，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 35 美元 / 盎司的黄金价格。

七

最大胆的经济试验结束了，金本位戒酒了，美国又恢复了金本位。尽管最高点比过去低了大约 40%，但是股市已经恢复正常，并开始明显上扬。沃伦教授悄悄溜回康奈尔大学，去照看他的见习农民和 4 000 只鸡。当年 10 月，他回到华盛顿呆了一天，与罗斯福共进午餐，谣言因而四起，说美元要进一步贬值。那时，当有人问起他与政府的非正式关系是否有可能继续时，沃伦回答道：“就我所知，我在商务部工作的地方从未关闭过。”这条消息让国际外汇市场一落直下，但不论是美元贬值还是沃伦回政府工作都没有成为现实。在生命最后的三年半时间内，他默默无闻，既然实践证明他的理论不可信，他只能懊恼地看着它被差不多所有经济权威剖析嘲笑，却不能再为之辩解。但是，如果说他不是成功的金融独裁者的话，那么，这位伊萨卡镇的自耕农自然也是历史上最不像自耕农的自耕农。

华尔街赢了，但却付出了代价。它与新政之间的蜜月期结束了，新娘犯了致命的错误，她证明新郎最钟爱的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双方都输了。最初，华尔街近乎卑微地支持和依赖新政，但现在，新政面临的是一个华尔街：它不再相信华盛顿那些极端的想入非非者，在一年内完全改变了立场，坚定地站到了新政的对立面，而对华尔街来说，它面对的是一个以牙还牙的新政。

回顾往事，该怎样来评价罗斯福在当政的第一年间对美元的胡乱调整呢？的确，他对整件事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态度也是非常随便的；的确，他蔑视任何博学可信的货币医师提出的建议，却接受一个庸医的建议。然而，不管怎么说，农民既没有挨饿，也没有闹革命，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事情过去以后，美元在 30 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稳定。最主要的是，受了惊吓的聪明的华尔街人没有提出任何方案；而沃伦理论虽然站不住脚，但却也没有造成长远的危害，它至少给出了方案措施，带来了希望。

不知是凭着偶然的运气还是天赋的才能，罗斯福带领美国渡过了难关；这一点，华尔街能够做到吗？

第八章 华盛顿磨难

一

几乎所有人都记得那张一个侏儒坐在 J. P. 摩根膝上的照片，但几乎没有人能记得或知道故事的悲惨结局。

事情发生在 1933 年 6 月 1 日上午，参议院集会厅里，摩根坐在皮椅上，等待向参议院和货币委员会作证，周围是他的合伙人、律师和助手。记者、摄影师和旁观者们忙得团团转，突然，玲玲兄弟巴尔默姆芭蕾舞马戏团的一个宣传员显然是受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记者雷·塔克(Ray Tucker)的怂恿，把马戏团的一个侏儒塞到了摩根膝上。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来不及制止。一时间，摄影师们有的爬上椅子，有的推开人群，抢占有利位置连连拍照。

那时，摩根 60 多岁，是一位庄重的长辈式的人物。而马戏团的这位名叫莉娅·格拉芙(Lya Graf)的女士则身高 27 英寸，身材丰满匀称，长着一对忽闪闪的黑眼睛和一头褐色头发，有着农家女子般的鲜活漂亮，她穿着一身缀着荷叶边的蓝色缎子连衣裙，戴着一顶红色的网状薄帽子。摩根的合伙人都惊呆了，而摩根却没有。他那张因一周以来委员会的敌意质问而僵硬的脸松弛了下来，随后变得不安，继而又满脸慈祥，浓密的眉毛和整齐

的白胡须下荡开了一抹温暖的微笑。

“我孙子的个子比你大。”他说。

“可我的年龄比他大。”格拉芙小姐说。

“你多大了？”

马戏团宣传员说她 32 岁了，但格拉芙纠正说：“不对，我才 20 岁。”

“噢，还真看不出来。”摩根说。

摄影师们鼓噪着还要拍一张，马戏团宣传员让格拉芙把帽子脱了。“别脱，这样很漂亮。”摩根说；随后，他把格拉芙从膝上抱起，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那些惊呆了的合伙人长出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负责现场的理查德·惠特尼粗暴地将马戏团宣传员和格拉芙赶走。摩根的脸上仍然挂着一丝微笑，只是比先前更不易察觉。第二天，摩根和侏儒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传遍了全世界。

摩根乃至整条华尔街从这件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从那天开始直至他 10 年后辞世，在公众的眼中，他不再是一个贪婪、无情、几乎毁了整个国家的魔鬼，而是一个慈祥的老头。公众的态度瞬间转变了，摩根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本能所致，他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显得“人性化”。第二天，对他的人格产生新兴趣的记者让摩根对这件事说点什么，摩根若无其事地说，这件事“很不寻常，有点让人不高兴”，但他并不怪那些摄影师，他们也只不过是在做他们该做的事。当有人问到他戴着月牙形镶金鸡血石表坠时，他变得絮絮叨叨起来：“噢，那件东西。让我来告诉你吧。我父亲的母亲是 J. 皮尔庞特的女儿，表坠是她让人做的，有一面刻有皮尔庞特家族的徽章。她把表坠给了她父亲。他天天都戴着。我从没有见过他不戴那东西的样子。我父亲又把它给了我。我说清楚了吗？”

“你父亲的父亲把它给了你母亲的兄弟……”一个记者迷惑不解地说。

“不，不。”摩根笑了起来，又讲起了他冗杂的家族历史。“我还是不——”这个记者又说，但摩根已经挥挥手大模大样地走了。还有谁会怨恨这样一个人呢？

但是，莉娅·格拉芙却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好处。她羞涩、敏感，对她来说，凭自己的技艺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马戏团畸形人是很合适的，但是做一个出了名的畸形人却不行。2 年后，由于名声太大，她不得不离开美国回到家乡德国。她有一半犹太血统，于是，1937 年，她遭逮捕，理由是她



是个“无用之人”。她被送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从此音讯全无。地球上没有她的立身之地：新大陆利用她，旧大陆则令她消亡。她赠给一个富有、著名的老人的礼物最初让她失去了心灵的安宁，继而又让她失去了生命。

要不是那张照片，这会是一个温馨的童话。照片里，格拉芙自豪地微笑着，张开胖乎乎的小手抓住摩根的衣袖以保持平衡。两人看起来都很幸福安详，这是整个故事中最令人难以承受的一部分。

二

早在3月份，就有传言说仍在调查股市的参议院委员会新来了一名律师——一个名叫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的年轻人，出色的纽约市助理地方检察官，他是冲着J. P. 摩根公司来的。托马斯·拉蒙特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摩根合伙人J. 帕克·吉尔伯特(J. Parker Gilbert)有一天来到自由大街拜访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他们的行为也许有些鬼鬼祟祟，与摩根式的行事方式不同；人们很快就清楚地发现，他们的使命非同寻常。摩根家族失去了与白宫的密切联系，与国会的联系也断了；拉蒙特和吉尔伯特拜访的正是在华尔街和新政府之间充当着尴尬联络人的哈里森。皮科拉曾在前一周去过华尔街23号，他想要查阅一些私人文件；有传言说传票已经发出了。那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现在，拉蒙特称，最近J. P. 摩根公司已经根据惯例将其与联邦储备银行之间最新的资产负债表归档了。如果要求联邦储备银行不要把资产负债表交给皮科拉或其他任何与调查委员会有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合作？

哈里森回答说，他无法做出这样的保证。

哈里森当天的办公日志流露出了一种震惊的情绪，这不足为奇。摩根财团竟然要求另一家银行为它的业务保守秘密，而这家银行20年前成立时，摩根财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巨人竟然堕落至此！在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的最后，哈里森不得不主动承诺不向外界透露谈话的内容。拉蒙特露出了摩根式的微笑，说道：“当然。”

委员会还是得到了资产负债表；调查按计划进行着。到5月底调查开始时，J. P. 摩根公司已重拾自信和高傲。摩根合伙人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华盛顿接受调查，他们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接管它的征服国一样，对



任何带有自卫甚至自责性质的节俭不屑一顾，每天仅宾馆费用就达2 000美元。听证会上，他们鄙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行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们气派非凡，愿意坦率地回答最令人尴尬的问题、递交对他们最不利的文件，而没有任何保留和丝毫后悔。这种超乎寻常的道德之举，使他们在被盘问时表现出来的坦白变成了一种傲慢，一种位高权重的姿态。

摩根是第一证人，一周多来他与皮科拉之间时断时续的冲突有着一种朴素的美。这个大人物站在证人席上，公众对他的兴趣十分强烈，毕竟，自1912年J.皮尔庞特受到普约委员会盘问以来，摩根家族中还没有人出现在公众面前。奇怪的是，这种兴趣自相矛盾；摩根时而被当成一个国王，时而又被当成一个大盗，有时又被认为是国王和大盗的综合体。但他自己却表现得既不是国王也不是大盗，而是一个绅士和商人，而且必要时首先是个绅士。而童年时代从西西里移民到美国的皮科拉则反映了美国生活的另一面。他矮小结实，而摩根则高大威武；他皮肤黝黑，而摩根则皮肤白皙；他精力充沛，野心勃勃，而摩根则懒懒散散；他是非分明，诚实睿智，而摩根则气度高雅。他俩谁也不怕谁，两人之间进行着一场吉卜林(Kipling，英国作家。——译者注)式的对抗。

在回答提问时，摩根冷静地述说了约束他公司的合伙条款。合伙人之间的任何争端都必须交由高级合伙人，即摩根本人来裁决，“裁决具有最终效力”。高级合伙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强制要求任何合伙人退出，或者解除合伙关系。每年的利润五五分成，也就是说，一半归摩根，一半归其他合伙人。新合伙人不必出资。

当皮科拉和参议员们询问公司的经营方式时，摩根变得津津乐道起来。公司有没有做过广告或向公众和银行界宣传过自己？“我们的门上有公司的名称，仅此而已。”除了名称以外，就没有其他什么说明公司业务的了？“没有，只有名称。”

皮科拉：摩根先生，公司办公室门向外的一面上都有公司名称吗？

摩根：不是在向外的一面，而是在向内的一面。

皮科拉：行人从街上看不见吗？

摩根：看不见。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公司的地址。

皮科拉：公司不向银行家做广告，你难道不觉得这会让公司在银行界缺乏声望吗？

摩根：好像不会。

公司的财务状况向储户报告吗？不。“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银行向任何能够提供抵押品的人贷款吗？不——只向公司的客户提供贷款，也只接受他们的存款。

主席[议员邓肯·U. 弗莱彻(Duncan U. Flecher)，75岁，来佛罗里达]：你们对客户没有选择吗？……

摩根：我们有选择。

主席：噢，你们有选择。

摩根：是的，确实有选择。

主席：假如我去你们那里存1万美元，即便我没有见过你们公司的任何人，你们也会接受的，是吗？

摩根：不，我们不会。

主席：不会？

摩根：不会……除非有人介绍你来，参议员先生……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

主席：这么说来，我想要借1万美元肯定也不行了？

摩根：没人介绍就不行。

后来，他更详细地解释了这条严格的规定：“我们确实发放贷款，我们借钱给别人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这笔钱；如果这些先生（公司的客户）需要，我们就会提供贷款。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

这套过时的等级制私人银行理论，依赖的是受社会约束的经济信用，这标志着摩根和皮科拉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出身经济世家的贵族，一个是地中海农民的民主党儿子，他们可能会相互交换观点，甚至对对方的观点产生兴趣，但却无法真正沟通，因为他们的道德基础不同。但后来，摩根在对朋友说起皮科拉时，丢开了他的王者风度，轻蔑而且有些无礼地评价说：“皮科拉有点诉讼律师的样子。”而皮科拉在他1939年出版的书中写道，证人席上的摩根“非常有礼，态度也很合作”，表现出一副“毫无隐瞒的样子，而且明显流露出对自己公司及其运作的自豪”。至少，在此次交锋中，谁能否认农民的儿子赢了贵族？

皮科拉与摩根的这次交手只是一场幕间戏，起到的主要是象征作用。对摩根公司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一点上：1929年阿里范尼公司股票问题。

回答皮科拉的问题的，主要不是摩根，而是他的合伙人，其中大多数是乔治·惠特尼回答的。惠特尼身材修长，衣着整洁，和平常一样烟不离手，也像往常一样风度翩翩，他简直就是摩根公司的完美问答提词员，随时准备提供各种事实和数据。一次又一次，每当证人席上有合伙人发现自己说不出某些细节时，解决办法就是“去问乔治”。他的公文包里似乎总是装着相关文件，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记着相关数据。他不厌其烦、毫无怨言地提供信息，即便有时因失望而备感疲倦，急于寻找替罪羊的委员会和公众对他所说的并没有完全理解，反而对这些掌管私人财产的贵族的尴尬处境幸灾乐祸。

三

1929年1月对于1933年的华尔街来说已经非常久远了。那个，克利夫兰的范·斯威林根(Van Sweringen)兄弟建立了一家控股公司——阿里范尼公司，以巩固他们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铁路王国的地位。在他们发行的350万股普通股中，范·斯威林根兄弟握有225万股，其余的125万股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转给了J. P. 摩根公司，J. P. 摩根公司自留一部分，另一部分向公众发行。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投机性很高的股票发行，摩根公司通常不做这样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摩根公司接受了转让，并采用了一种奇怪的折中方式发行股票。摩根合伙人认为，让公众承担这么巨大的风险是不对的，因此，他们决定不直接向公众发行，他们留下了大部分股票，而将剩余的约57.5万股卖给了富有的朋友和客户，共170人，这些人都有充足的资金，“能够承受风险”。正是这种“风险”的程度和本质，令1933年的皮科拉、参议员乃至整个国家备感兴趣。1929年2月1日刚一宣布发行，这只股票就在场外以“发行时交割”(即到正式发行时再进行交割)的形式开始交易了，而那时距离正式发行还有三周。在狂热的投机气氛中，股票的价格立刻窜到了每股35美元。摩根公司提供给朋友和客户的20美元的股票，立即可以35美元的价格卖出。说得直白一点，摩根公司送出去的就是钱，以当时的价格计算，它等于送出了800多万美元。

细数起来，摩根的朋友和客户中得到这笔意外之财的，都是当时美国的重要人物。华尔街的大人物都名列其中，有第一国家银行的贝克，花旗



银行的米歇尔，大通国民银行的威金，他们每人获得了1万股可随时兑换的股票，毫无风险地获利15万美元。摩根自己留了4万股（可获利6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也各留了一些，其中最多的是托马斯·拉蒙特，他留了1.8万股；摩根的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分得了1000股，摩根的私人顾问、华尔街律师界公认的领袖约翰·W.戴维斯分得了400股。美国各大公司的首脑也都有份。两党的权贵们也都分得一杯羹，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2000股，共和党国家委员会财务主管约瑟夫·R.纳特（Joseph R. Nutt）3000股。还有过去和将来的内阁官员：前财政部长威廉姆·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acAdoo）（500股），前陆军部长纽顿·D.贝克（Newton D. Baker）（2000股），即将就任海军部长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1000股），后来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威廉姆·伍丁（1000股）。（在向委员会解释为什么亚当斯也在其中时，乔治·惠特尼表现得愤愤不平，他说，亚当斯被包括在其中并不是因为他即将在胡佛内阁中出任要职，而是因为他是摩根儿子的岳父。根据摩根准则来看，惠特尼的表现是正直的。）还有一些国家的英雄人物：查尔斯·A.林德伯格和约翰·J.潘兴（John J. Pershing）将军每人分得500股，前者大概是因为他娶了德怀特·莫若的女儿，而后者大概是为了表示对过去的纪念。

摩根合伙人在1929年2月初向被选中的人员寄出的通知信和电报，在1933年夏美国已发生很大变化时，成为了委员会的案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信件不知不觉变得极具讽刺意味。例如：

亲爱的伍丁先生：

……虽然我们不销售阿里范尼股票，因为我们不希望公开销售此类证券，但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以我们买入的价格，即每股20美元，购买一部分。

我相信，这只股票的市价在每股35~75美元之间，对于不想投机的人来说，这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愿意，我们会为你保留1000股，每股20美元。

这些股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抛售出去……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想着你……

你真诚的

威廉姆·伊文（William Ewing，摩根的一个合伙人）

除了人的投机欲望之外，伍丁是否还从这只股票的市价上发现了什么“意义”，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他接受了摩根公司的提议，开出一张 2 万美元的支票，购进了 1 000 股。与伊文给伍丁的电报相比，托马斯·拉蒙特给艾伯特·威金（当时他正在黄金州列车 27 车厢的 A 包间内，目的地是亚利桑那州的道格拉斯）的电报比较简短，语气也随意一些。电报中没有提到摩根公司对公共风险的担忧，而强调了乐观的市场情况：

克利夫兰的范·斯威林根兄弟刚刚组建了阿里范尼公司……我们虽然不销售普通股，但却为你和你的副手保留了 1 万股，价格和我们的买入价一样，每股 20 美元……市场价格是 35 美元。请立即回电告知你的决定。我今晚就要坐船去巴黎。顺致问候。汤姆。

威金立刻回电说他很高兴购买这只股票；的确，被选中的 170 人都爽快地接受了提议。几乎所有人在回复时都一本正经地明确表示或暗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是小投资者无法承受的。但是有一个人，拉斯科布却没有这么想，他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不同理解。比起金融界的谨慎，他更习惯于政界的直白，他从棕榈海岸给惠特尼回了一封信：

亲爱的乔治：

非常感谢你的好意。随信附上购买阿里范尼股票的 4 万美元支票……我由衷感谢你和你的合伙人，衷心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回报……这里的天气很好……

祝好运

约翰

“人人都应该发财”，这是拉斯科布那年夏天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标题；至少他没有理由不发财。

皮科拉和委员会公布的阿里范尼股票首选名单，在公众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骚动；摩根财团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有些事每个人都能看明白。人人都知道，华尔街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公们广布恩泽，是希望未来有所回报，就像那些最卑贱、最势利的竞选走卒一样。全国上下都拿这份名单开玩笑，就连共和党的报纸上也充满了嘲讽和幸灾乐祸。但是，皮科拉他们有点过头了。事实上，摩根公司对阿里范尼股票的处理并不像看起来这样应受谴责。首先，事实证明，购买这只股票确实需要承担一定风险。1929 年夏股价冲至 57 美元的最高点后，阿里范尼公司瓦解了，股票最低跌到了 1 美元；因此，首选名单上那些以 20 美元买入却没有立即抛出的人遭受了惨



重的损失，威金就声称自己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那些推荐信的语气很清楚地表明，摩根财团不仅仅是允许，而实际上是建议购买者立即抛出股票兑现，因此，这一点对辨方没有多大作用。比较而言作用大得多的一条理由是，整个操作过程没有越雷池一步。1929年时所有投资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过后向公众大规模发行股票以来，一直都在这么做。事实是，摩根财团的生存支柱并不是时代精神，而是自身严格的道德准则；摩根公司一般不销售投机性质的公共普通股票，或者说不销售任何普通股票，在阿里范尼问题上，它没有理由打破惯例，这也是事实。摩根公司所做的是，以它的朋友和客户为中间人，公开发售股票，从而令这只股票取得在证交所上市的资格。设想一下，如果首先发售股票的是一家不直接向公众发售股票的公司，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合理的。向孤儿寡妇们发售这只能让人暴富的股票不太可行。

皮科拉当然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尽管他才华出众、目标专注、斗志昂扬、具有政治抱负，他所起的作用只是倡导而非裁决；他尽可能地把对手描黑，愤怒、失落的国民要他描多黑他就描多黑。在这件事上，同样也在其他事上，他夸大其词。大萧条的早年，摩根合伙人的所得税低得离谱，却又让人抓不到把柄。皮科拉毫不留情地将这件事公之于众，他后来解释说：“1933年，国家还不懂得区分‘逃税’和‘避税’。”这也就是说，美国还分不清违法和守法。硬币翻了个面；1929年时荒谬的商业崇拜走向了反面，其程度同样荒谬不稽；在多数情况下，皮科拉是一位正直民权的保护者，但有时又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调查员。

四

除了调查摩根以外，皮科拉和委员会在那年夏天把米歇尔、威金、英萨和范·斯威林根兄弟过去那些令人反感的事情都抖落了出来——集合基金、股票操纵以及各种欺诈行径。内幕一层层被揭开，下曼哈顿地区的这个污水池看起来像是个无底洞。但是，听证会并没有因为这些卑劣的行径而始终笼罩在压抑沉闷的气氛之中；主客易地、老鼠拷问大象之类的有趣事件常常令听证会轻松起来，尤其是某些证人对“操纵”、“集合基金”等词的态度更令人好笑。到1933年，这些词成了美国把经济萧条归罪于华

尔街的标语，也成了受到严格盘问的华尔街人竭力避免的词。

对于大通证券公司的副总裁默里·道奇(Murray Dodge)来说，出问题的不是“集合基金”，也不是“操纵”，而是人人都懂的术语——“好处”。1931年4月，道奇给他的老板威金写了一份密信，而这封信最终落到了皮科拉手中。道奇在信中提到了某家电影公司股票包销的谈判，他写道：“哈尔西(Halsey)和斯图尔特(Stuart)退出了，我就有可能再次和昆恩里尔布公司讨论筹资问题。分摊好处会让我觉得难受，除非不得已，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于是，皮科拉冷冷地问，道奇先生说的“好处”究竟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道奇想了一会后回答道，“我料想哈尔西和斯图尔特退出后，我们去昆恩里尔布公司就要谨慎一些，因此，我所说的‘好处’是指一定数量的……”

道奇犹豫不决，他感到十分无助，再也解释不下去了。“很难解释，是吗？”好心的库曾斯参议员插话说。

“是很难解释。”道奇表示同意。他浑身冒汗，结结巴巴地又说了些什么，一番搜肠刮肚之后，他终于成功找到了一个词“威望”。“我想说，好处就是指威望——我一直在想这个词，我的意思就是威望。”

“我想你还是没有说清楚，”库曾斯参议员说，“你还是别说了吧。”也许，道奇先生也不想再说了。

在其他人之中，威金本人也觉得“集合基金”这个词是个麻烦，或者至少对这个词有点疑虑。当皮科拉问到参与过的集合基金时，他并没有予以否认，但他请求皮科拉不要使用“集合基金”这个词；用“投资账户”行不行？为什么不要用“集合基金”？皮科拉想要知道。“这个词名声不好。”威金可怜巴巴地说。皮科拉不依不饶地问，是不是这个词隐含着某些应受谴责的东西？“我不知道，”威金说，“不过，人们对这个词的确有一种反感情绪。”在之后的讯问中，皮科拉出于礼貌而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个词，但他还是忍不住将一封1928年的信放到了记录中。这封信是W. E. 赫顿公司(W. E. Hutton & Company)写给威金的一家私人公司的，全文如下：“随信附上一张105 467.29美元的支票，这是您的认购额以及哈得逊汽车公司集合基金账户盈利的总额。”威金说，他收到信时并没有觉得那张支票或信中的措辞有什么不妥。

尽管如此，威金对于“集合基金”这个词的奇怪态度与另一个证人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他名叫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是证交所专

家，曾经操作过名目繁多的集合基金，其中有一次还受到一个白俄罗斯王子所托。当皮科拉问他“集合基金”和“集合基金账户”的定义时，赖特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词我不懂，皮科拉先生。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然而，他紧接着就开始详细解释集合基金是如何运作的，甚至还非常专业地区分了不同种类的集合基金。

赖特：有些集合基金账户是有权限的……有些是直接买入股票，再抛售出去，其他的则可能是为某人收集股票的累积集合基金……

皮科拉：那么，集合基金对其所交易的股票通常是有购买权的，对吗？

赖特：不错。

皮科拉：那么，由什么人来决定购买权呢？

赖特：有时是个人，有时是公司的管理层，有时是大股东，有时则是企业，这些企业可能持有大量股票，同时又想抛售出去……

皮科拉有着爱出风头的名声，但他还是忍住没有咬文嚼字地提醒赖特开始说过的话，从而避免了把这出真正的滑稽戏演砸。全国上下把华尔街大大嘲弄了一番；如果说过去华尔街以阴险的花招拿走了人们的钱财，那么现在，它在不经意间给大家上演了一出热热闹闹的马戏。

然而，那年夏天笑到最后的是华尔街。那几周，皮科拉正耐心地寻找集合基金和股价操纵的真相，把华尔街过去的劣行暴露在公众的愤怒和嘲讽之中；那些天，奥托·H. 卡恩正以证人的身份，代表华尔街最有责任感和公德的人宣称，通过集合基金操纵股价是“弄虚作假的、反社会的非法行为，轻信使得这些行为屡见不鲜”。在那样的日子里，就在皮科拉这群坚决的调查员以及具有责任心的华尔街人的鼻子底下，一只最奇特、最异乎寻常的集合基金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这是社会恶行的力作，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银行抢劫犯。——译者注）可能对此非常欣赏。此集合基金的始作俑者和受益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名叫拉塞尔·R. 布朗（Russell R. Brown）。他是美国商业酒精（ACA）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位于马里兰州，在纽约市设有行政办公室。由于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译者注）的取消正等待国会批准，这只酒业股票在那年夏天交上了好运。除了防冻剂以外，这家公司很快就能大规模销售饮用酒了，布朗和他的助手看到了出击的机会。他们首先掌控了25 000股公司股票，然后以每股20美元左右的价格抛售出去。在此期间，他们耍了一连串花招，其中包括成立两家专门从事股票交易的傀儡公司，一家是以范根（Phagan）为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首的梅斯特实验室公司(Maister Laboratories Inc.)，另一家是以卡普狄维尔(Capdevielle)为首的诺克森公司(Noxon Inc.)。(外人并不知道，K. B. 范根实际上是布朗的一个会计朋友，而 C. C. 卡普狄维尔则是糖蜜代理人；甚至还有梅斯特先生，他是美国商业酒精公司雇佣的德裔发酵师，曾经发明了一种制造维生素的秘密工艺。诺克森则并无其人。)为了操纵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票，布朗和他的助手们组建了一只集合基金。为了实施操纵，他们把这25 000股股票的购买权授予了臭名昭著的市场操纵者汤姆·布拉格(Tom Bragg)。布拉格又雇了谁来做集合基金的经理呢？非著名的“卖了吧本”莫属。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的头几个月里，这位吵吵闹闹、一夜暴富的卖空分子成了公众最喜欢的华尔街恶棍。他向调查委员会承认了他在1932年春经营过的集合基金，他的坦白令人钦佩，但毫无悔意就不那么让人钦佩了。

这一次，1933年5月3日，史密斯用他与生俱来的手段，开始了市场操作——如果他看到了报纸上或国会议事录中皮科拉委员会的证词，他一定会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通过拉高股价和让这只股票频繁出现在行情机上，他吸引容易轻信的公众购买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票。后来公布出来的交易记录令人头晕眼花。举例来说，5月4日，他卖出3 700股；第二天买入600股；5月8日买入500股，卖出1 000股；之后的3天，他的买入量大于卖出量；12日，他突然卖出1 100股；16日和17日的卖出量均超过了1 100股，分别为1 600股和3 300股；随后，他又开始买入，5月29日达到顶峰，他在那天买入了8 200股，卖出了4 800股，从而使行情机上的价格一路攀升。到月底，他总共买入了13 300股，卖出了22 100股。如同他的外号一样，他的卖出量大大高于买入量，但他还是成功地引导公众将股价从20美元推到了30美元。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布拉格、布朗以及参与集合基金的其他人也开始自行炒作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票。整个6月，史密斯不停地搅和，股价逐渐上涨，超过了40美元。随后，在7月份的前半月，他又像是个正在演奏渐强乐章的小提琴家，把公众推向了一个购买狂潮，集合基金的操作达到了顶峰。到7月18日，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票彻底疯狂，涨到了89.875美元。史密斯在那一天拔出了插头。碰巧的是，就在那一天，伦敦大会的破裂导致了共同市场的崩盘。各种情况凑在一起，使得事态有点失控。严格按照计划上涨的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票，其下跌速度之快，令史密斯和集合基金的其他参与者有些措手不及。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

票专家、集合基金参与者查尔斯·赖特后来说：“每次一想起这只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后来涨上去的价格，我就会浑身发抖……那真是一场噩梦。”由于集合基金不再买进，公众突然幡然醒悟，整个市场分崩离析。7月18日后的3天里，美国商业酒精公司股票从89.875美元跌至30美元，集合基金账户关闭了。噩梦缠身的专家赖特个人盈利138 000美元；布拉格和“卖了吧本”作为基金经理人得到了丰厚的佣金和交易利润；8位参与集合基金的人也都获利了，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其中包括范根和卡普狄维尔，因为即便是傀儡也应得到奖赏。终于，这件事让皮科拉知道了，他打算传唤布拉格和史密斯，但还是晚了一步：那时布拉格已经去了檀香山，而史密斯则更谨慎，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从股市操纵方面来看，美国商业酒精公司集合基金的存在时间很短，就像是聚会的人们在被警察驱散前的最后行乐。然而，这件事情的时间安排非常精确，人们对它感兴趣的理由有两个：它比任何言辞都更有力地表明了华尔街上的放纵投机势力对皮科拉委员会及其强烈愤慨的回应；它也是一出少见的滑稽戏。

五

这次调查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公众发泄怒气；它的目的是要促使，后来是明确要求，国会采取行动，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股票市场。早在1933年的那100天里，罗斯福就已经悄悄安排德高望重的塞缪尔·乌特梅耶，20多年前普约调查的主角，来起草一项法案。但是，乌特梅耶的草案并没有令罗斯福满意，因而未被采用。如今，到了12月份，随着皮科拉委员会揭示出来的耸人听闻的事实，制定新法案的工作切实展开了。此次，负责起草的是新一代人：哈佛法学院的詹姆斯·M. 兰迪斯(James M. Landis)、内政部的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系出名门的智囊团成员艾萨克·牛顿·费尔普斯·斯托克斯二世(Isaac Newton Phelps Stokes II)、纽约律师本杰明·V. 科恩(Benjamin V. Cohen)以及复兴银行公司的托马斯·G. 柯克兰(Thomas G. Corcoran)，这些人都只有二三十岁，头脑灵活，精力充沛，是被罗斯福新政的活力和光明前景吸引到华盛顿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华盛顿市区预先租下了一间毫不起眼的公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寓，在那里苦干了一个冬天。期间，他们常常请教皮科拉和他的主要调查员——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充满斗志的记者约翰·T. 弗林。最终稿主要由科恩和柯克兰确定。1934年2月初，国会重新开议，弗莱彻议员突然向他们索要草案，立刻就要。这群头脑聪明的年轻人还没完成，但是，聪明的年轻人总能以理想驱使自己完成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完成了草案。2月9日，先前从未在公开场合对皮科拉委员会调查到的事实做出表态、也从未说过支持对证交所进行规范的罗斯福，写信给国会要求立刻向他递交这份草案。很快，这群聪明的年轻人孜孜不倦的劳动成果作为《弗莱彻—雷伯恩法案》(Fletcher-Rayburn Act)被国会采纳了。这是一份长达50页的复杂技术文件，将所有形式的股票操纵都列为非法行为，声称联邦政府有权控制股市诚信，并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管制华尔街的巨大权力。联邦政府控制股市的意图终于公开化了。

理查德·惠特尼主意已定。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联邦政府对证交所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管。在经历了10月份的一系列事件后，他刻板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变得更加刚毅。皮科拉给惠特尼写信，要求他向证交所的所有成员发一份调查表。这份调查表的目的是获取一些令人尴尬的信息。惠特尼总是敷衍搪塞。为了加紧事情的进行，皮科拉找寻机会与惠特尼进行私人会晤。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每当皮科拉要去见他时，这位证交所总裁总是忙得脱不开身。皮科拉想要在周六或周日去见他，但也总被告知惠特尼有社交活动，无法见他。那么，周一行不行？也不行，因为他有商务活动。最后，惠特尼总算在他的好友、证交所法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罗兰·雷德蒙的陪同下，接见了皮科拉的2名使者，其中之一是约翰·弗林。

正是这个弗林，一年半前曾在《科利尔周刊》(Collier's)上把惠特尼描述为“华尔街顶级经纪人”。在之后的一年半里，弗林成为了皮科拉最精明、最具攻击性的调查员。可能就是这一年半，让惠特尼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弗林。同样可能的是，他一直都瞧不起记者对个人的吹捧。总之，看到弗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惠特尼脸色铁青，嘴里不知嘀咕了些什么，离开了办公室。几分钟后，他很快让自己平静下来，回到了办公室，但是他却没法让自己的谈吐保持谨慎。他挺直了身体，以最冰冷、傲慢的语气说：“你们在犯一个大错，证交所是个完美的机构。”他的敌人们后来让他对自己的这句话永世难忘。

“我们原以为能得到证交所的合作，”皮科拉在几天后的委员会听证会

上说道，“很明显，我们没有。”他们确实无法得到证交所的合作。10月16日，惠特尼正式致信皮科拉，拒绝发放调查表。他在解释时引用了雷德蒙的法律观点：“调查表所要获取的信息与市场行为或证交所成员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公开场合坚称证交所并未拒绝合作。他指责道：“皮科拉先生想要证交所强迫其成员填写调查表。”并说，这样的程序剥夺了他们宪法所赋予的沉默权。作为反击，皮科拉向证交所一些成员公司的首脑发出传票，意欲直接向他们询问惠特尼不愿替他问的问题。

华尔街的第一条裂痕出现了。被传唤的人中有一位名叫 E. A. 皮尔斯 (E. A. Pierce)，是 E. A. 皮尔斯公司的老板。这是一家著名的经纪事务所，最近才收购了颇为成功的查尔斯·E. 梅里尔 (Charles E. Merrill) 公司，后来还收购了新奥尔良的芬纳比尼 (Fenner and Beane) 公司。人们后来发现，皮尔斯和惠特尼虽然业务关系密切，但私人关系并不亲密。这两人个性不同，走的路也不同；他们俩都是俱乐部会员，但属于不同的圈子；除了在证交所的午餐俱乐部，他们极少见面。皮尔斯生于缅因州，毕业于缅因州引以为豪的鲍登 (Bowdoin) 学院，他家境一般，年轻时做过 5 年的伐木工，来到华尔街后从最底层做起。他没有可炫耀的高贵血统，在一般所说的“社会”上也没有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与惠特尼有些相似的特性：他们都喜欢穿正式的服装上班，显示出一种怀旧的奢华，都想要成为华尔街政治家，举止都十分威严。惠特尼具有运动员的果断，而比惠特尼年长 14 岁的皮尔斯有着一口干脆利落的缅因州口音和一头白发，让人觉得阅历丰富，充满智慧。当皮尔斯从皮科拉的一位工作人员口中得知弗林与惠特尼之间的冲突后，他判定惠特尼有点不讲道理。成熟的智慧是他和惠特尼之间的不同之处，他决定做委员会和证交所之间的调解人，做华尔街的理智之声。

皮尔斯大旗一举，其他人都以他的马首是瞻。毫无疑问，有些人是因为不喜欢惠特尼，他的魅力并不能打动所有人，但是，更主要的是，这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公众大量涌入股市后华尔街上逐渐产生的功能性分裂。一方面是保守派，即专家会员商和场内经纪人，这些人实际上是面对面地进行股票交易，谁被吃了、谁吃了谁，他们都一清二楚。这些人与古尔德、菲斯克 (Fisk，美国金融商和投机商，于 1869 年和杰伊·古尔德一起试图垄断黄金市场，引起“黑色星期五”，即全国范围的金融大恐慌。——译者注) 和德鲁 (Drew) 之类在 19 世纪撑起了美国也败了美国的卖空和买空者

一脉相承，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大胆和贪婪。这些人仍然控制着证交所，惠特尼是他们的头儿。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远距离、多分支的经纪事务所，它们主要服务于那些从未进过证交所交易厅、也从未面对面交易过股票的普通公众。事务所的业务包括代人交易，它们中的大多数远在别的城市，靠着一条电报线与华尔街相连。它们靠普通公众为生，因此当然不能像保守派一样置普通公众于不顾。华尔街的这股新势力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其领军者后来成为华尔街巨头、著名的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奠基者。

皮尔斯对皮科拉说，他认为，对股票交易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可行的。惠特尼自己则争取到了在白宫与总统会晤的机会。这两名格罗顿和哈佛毕业生——总统比证交所总裁年长 6 岁——商谈了 45 分钟之后，惠特尼出现在媒体面前，简单地告诉记者说，他们讨论了股票投机问题，“互相交换了看法”。12 月中旬，当有传言说股票交易规范法案正在起草之中时，惠特尼感到有必要出面否认证交所正筹备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而借以反击的传言。

毫无疑问，他否认的时候是信心十足的，因为罗斯福 2 月 9 日要求立法的信以及后来《弗莱彻—雷伯恩法案》的采纳，着实让他大吃一惊。但他很快就缓过气来。他立刻鼓动证交所抢在联邦政府之前，自行制定几条控制投机的规定。随后，惠特尼又立即召集证交所 30 家主要成员公司的首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和波士顿组织抵制股票规范法案的运动。同时，他又以证交所负责人的身份，向所有成员公司和 80 家上市公司的总裁发出通告。他坚称，《弗莱彻—雷伯恩法案》是“国会采纳的、对证交所及上市公司影响最大的立法”，它将给证交所的成员公司及其客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他对公司首脑发出警告：“（法案所赋予的）权力如此宽泛，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支配和控制每一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他并没有建议成员公司和上市公司首脑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只是在最后说如果他们需要， he 可以提供通告和法案的副本。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托马斯·柯克兰正代表科恩—柯克兰法案起草小组，向皮科拉委员会详细解释法案的复杂之处。

这些通告只是惠特尼领导的反对运动的开始。很快，这场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罗斯福不得不亲自出面，他严正声明：“在我所同意的立法之中，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证交所规范立法遇到的反对最直接、最具组织性。”各种委员会和联盟相继成立；反《弗莱彻—雷伯恩法案》代表团乘坐专列向华盛顿进发；大学教授也被卷入其中。证交所又向全国 43 个城市的成员公司发出信函，这一次的语气更为紧迫，甚至带有些许威胁性质。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请你们弄清楚并告知……”

你们当地的储蓄银行、上市和非上市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在有组织的反对运动中采取了哪些联合行动……你们的雇员有没有认识到一旦法案通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失业？他们给议员和代表写过信吗？如果没有，他们就应该立刻行动起来，用自己的信纸而不是公司的信纸，以自己的方式……请告诉他们。

此类信件如雪片般地飞向华盛顿。

同时，由于参战者众多，惠特尼公开反驳柯克兰的时机到了。就像摩根财团一年前所做的那样，证交所堂而皇之地搬到了华盛顿。惠特尼带着他的所有战将，在一幢漂亮的宅子里建起了司令部。皮尔斯和他的温和派在卡尔顿(Carlton)俱乐部建起了独立司令部。在公开场合，温和派与惠特尼保持着相当牢固的统一战线。皮尔斯的一位盟友告诉媒体，这项法案会让政府拥有摧毁企业的权力。他的另一位律师盟友插话说，他怀疑这项法案的合宪性。皮尔斯本人则表示，他与惠特尼一致反对这项法案，“因为我确信惠特尼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是诚实的”。但是在私底下，卡尔顿小组却与政府合作，对法案进行修正——他们夜以继日地同雷伯恩一起工作，帮着修改法案，使其金融措辞更为复杂，同时摒弃那些他们认为对华尔街过于严厉或不公平的条款。发现了皮尔斯的行为后，惠特尼大发雷霆，他让他的一名律师在凌晨 3:00 点打电话给皮尔斯，对他严加指责。这次指责带有强制性，毕竟，他是证交所的独裁者，管理委员会完全听命于他，他手中握有的权力足以剥夺皮尔斯的成员资格，断了他的生路。那位律师没有明确地发出这样的威胁。即便如此，要理解这次夜半训斥中所含的令人敬畏的傲慢，就必须把事情看得远一些。那时候，惠特尼个人欠了皮尔斯公司整整 10 万美元。

六

证人席上的惠特尼庄重、冷静，言辞有力且有说服力，同时又显得通情



达理。“通过详细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运作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开始陈述理由。《弗莱彻—雷伯恩法案》给予了政府“绝对的权力来管理和操纵”股票交易。他耐心地对法案进行逐条驳斥，说明他为什么认为法案弊大于利。他再三强调了华尔街在金融技术方面的能力以及华盛顿在这方面的无知：“这项法案擅自认为起草者具有极其丰富的金融知识，而我们则都愚昧无知。”他暗示说，他不反对自由观念：“我不相信自由主义会要求联邦政府来操纵我们的股票交易……改革应该矫枉扶正，而不应该采取不明智的限制来延缓经济复苏。”他承认，“完美的机构”并不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我并不想让人们产生我们的成员是纯洁的百合的印象。”他煽情地说：法案“违反了人性”，“几乎是腐朽的、不值得哀悼的禁酒令的同胞兄弟”。那么，被监管的股票市场几乎就像是一个滴酒不沾的清教徒。惠特尼的审讯终于在3月中旬结束了。“谢谢各位先生，”他彬彬有礼地对皮科拉和议员们说，“我们随时听候你们的安排。”

“华尔街的老家伙们正进行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以阻止政府在他们身边安插一个警察。”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在惠特尼证词结束后不久这么说道，以他一贯的精准表达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的确，他们是在进行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并且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大部分大企业的支持。政府在他们的进攻下退却了，《弗莱彻—雷伯恩法案》被废止了。科恩和柯克兰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温和得多的新法案，这份法案不但考虑到了皮尔斯温和派的反对意见，也考虑到了惠特尼不妥协派的一些反对意见。新法案的妥协激怒了弗林那样的激进改革派，他们将新法案视作变节。新法案也没有让惠特尼满意，他声明说，这个东西并不比前一个更具可行性，其复杂性甚至更高。“当然喽，”皮科拉评论说，“如果满足了惠特尼的所有要求，就根本不会有法案了。”

证交所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着。攻击这项法案的各种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奇怪的是，他们的长篇大论与理查德·惠特尼的非常相似。就连华尔街的好几百名电话接线员也在2月23日组织起来表示反对，理由是如果法案通过，金融区的街道上就会长满青草，他们就会失业。与此相仿，3月25日，有报道称两天后布罗德街和华尔街街角处将举行一次经纪事务所雇员大集会，参加人数达数千名。同时，这样的大型集会还将在新泽西、康涅狄格、长岛和威彻斯特的十几个华尔街雇员居住区内举

行。奇怪的是，这些集会实际上并没有举行。其含义非常明显，证交所走出了虚张声势的最后一着棋，华尔街的小人物们已经不再站在证交所这一边。这是失败的标志：士兵们默默地反抗着将军。

惠特尼最终被击败了。5月5日，白宫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法案。大约一周后，参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稍有不同的法案。6月初，这两项法案被合并在一起，6月6日，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法案正式生效。不管是出于风度还是作为权宜之计，惠特尼欣然接受了失败，但是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他宣布说，证交所“愿意尽力合作……服从法案的监管”。他还说：“我真诚地希望，如果执行得当的话，法案将是一项建设性的措施。”但是，惠特尼终究还是有些高兴事的。5月14日，就在运动失败的最后阶段，经口头表决，他和保守派老朋友们被推选为证交所的新一届负责人。战争失败了，但是败军却不会溃退或遣散。

新法案体现出的妥协性实质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并赋予其完全监管权。由联邦贸易委员会来实施监管这一遭人憎恨的想法被摒弃了。经国会批准，总统将指定一个5人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负责这项工作。先前草案中详尽的反投机、反操纵专门条文也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指导性条文，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根据情况制定管理细则。弗林在不久之后发表评论说：“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委员会考虑采取和颁布细则前，还没有一部监管证券交易的法律。”然而，对于华尔街的未来极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委员会存在着，而且权力宽泛。一个历史性的时代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现在了华尔街街角上。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确定的是，谁来当警察。罗斯福打破政党界限，指定了2名新政拥护者——皮科拉和兰迪斯，以及2名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威斯康星州的乔治·C. 马修斯(George C. Mathews)和佛蒙特州的罗伯特·赫利(Robert Healy)，为委员会成员。对于华尔街来说，后2位也是新政拥护者。最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对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有人猜测他会任命皮科拉或兰迪斯，甚至莫利为主席；人们普遍认为，出任主席的人应该与华尔街毫无关联，并且绝对忠于新政。但是，除了约瑟夫·P. 肯尼迪外，难以捉摸的罗斯福还会指派谁呢？肯尼迪不仅是华尔街人，还是与臭名昭著的“卖了吧本”不相上下的投机炒作者。罗斯福的忠实支持者们大吃一惊。肯尼迪这个人参与集合基金的能力似乎要大于其监管集合基金的能力。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在去年夏天，他就参与了一个令人眼

花缭乱的集合基金,对利比—欧文斯—福特股票进行操纵,并从中赚了一笔。指派他担任联邦政府工作(更别说是管理股票市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曾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对罗斯福鼎力相助。整件事看起来就像是最乏味的权术手段。“我觉得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茫然失措的弗林写道。不仅是弗林这样的不妥协者,就连那些新政拥护者也无一例外地义愤填膺。新共和派哀叹道,总统的所作所为“超出了那些最想看 he 倒霉的人的预料”。华盛顿新闻评论说,总统不能“在给了他最忠实、最有力的支持者一记耳光后而不受任何惩罚”。然而,罗斯福那冷静的实用主义洞察力最终证实,对肯尼迪的任命是正确的。如果说总统是为了偿还政治债、安抚华尔街,而以看似最讽刺、最令人失望的方式,将一名强大高效的公仆扶上台,那么,这位公仆将把华尔街带上一条不归路。

《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于7月1日生效。几天后,当5位委员第一次踏进证交所大门时,真的就有警察站在了华尔街街角处。双唇紧闭的理查德·惠特尼领着他们正式视察证交所。交易厅周围首次安排了保安,以防经纪人们做出出格举动,对委员们造成身体伤害。经纪人们冷漠地看着委员,交易几乎停止。在这种压抑的敌对气氛中,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帷幕。

七

我们曾经提到过,惠特尼的财务状况处于危险境地,1932年来临之际,他仍然过着百万富翁的日子,所有人都把他当作华尔街的象征,但实际上,他已是“百万负翁”,欠下了大约200万美元的债而无法偿还。之后的几年中,他的境况稍有好转。他不再奢望糟糕的佛罗里达腐质煤公司股票会出现反弹,转而开始了一项新的投资,起初收益相当不错。在禁酒时期,新泽西州山区最受欢迎的私酒是“新泽西闪电酒”——一种苦涩但正宗的苹果白兰地。在禁酒令颁布前,这种酒在当地已经盛行了好几代,禁酒令颁布后,尽管没有法律许可,人们仍然偷偷在树木葱茏的偏远山谷中大量生产这种酒。惠特尼的乡村庄园就在那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老练的城里人认为,在禁酒令废止后,新泽西闪电会风靡全国,会像苏格兰威士忌或波旁威士忌那样成为美国的标准饮料。更具投资吸引力的是,这种酒几乎无需陈化就能饮用,因此商业优势极大。于是,早在1933年,禁酒



令即将废止之时，惠特尼和他经纪事务所的一位助理就买下了一连串新泽西州和缅因州南部的老酿酒厂，并组建了蒸馏酒公司，以便在禁酒令废除后立即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自然就是苹果白兰地。惠特尼本人以及理查德·惠特尼公司以每股 15 美元的价格，认购了蒸馏酒公司 1 万~1.5 万股股票。

这自然意味着惠特尼需要更多的钱。我们今天非常熟悉这样一个噩梦：贷款接连到期，要么延期，要么用新的贷款来偿还旧的贷款。其实这个噩梦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了。现在，惠特尼就等着新的资本投入了。1933 年 9 月 22 日，惠特尼找到了他所信赖的老友赫伯特·G. 惠灵顿（“公爵”），他是惠特尼在证交所管理层中的亲信，经营着一家与惠特尼的公司差不多的经纪事务所。据惠灵顿几年后的回忆，惠特尼对他说：“公爵，这件事真的不好开口。我曾经答应今天还一笔贷款，但我手头不方便。本来我今天应该有一笔进账，别人这么答应过我的，可是临了他却反悔了。我保证过要还钱的。你能帮帮我吗？”随后，惠特尼要求惠灵顿借给他 25 万美元，借期 30 天，无担保。

在接下来的商谈中，惠特尼提到了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些投资，但是，他没有说起新成立的苹果白兰地公司。他也许认为他的冒险投资很难让惠灵顿放心。惠特尼还提到他有一个富有、成功的亲密哥哥。他对惠灵顿解释说：“乔治对我一直很好，我不能再去向他借钱了。”然而，惠灵顿后来说，他总觉得，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的话，理查德·惠特尼会把他的骄傲吞到肚子里，去华尔街 23 号找他的兄弟，那是他的最后一招。无疑，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惠灵顿虽然没有同意借 25 万美元，却还是拿出了 11 万美元，无担保借给了惠特尼——名义上借期是一个月，而实际上双方心里都明白，直到惠特尼有钱的时候才会还。（要说明的是，按照华尔街的不成文规矩，借贷利息在商谈借贷的过程中是不会被提及的，而在以后的账目上，利息为 2%。这是当时的名义利息，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借贷双方对此都不会有异议。利息问题微不足道，无需讨论，因为即使出现什么问题，一年也就是 2 200 美元。）

一个半星期后，10 月 2 日，惠特尼又向罗杰·D. 梅利克（Roger D. Mellick）无担保借了 10 万美元。梅利克不仅是惠特尼在市中心的老朋友，也是他在新泽西州的邻居。很久以后，梅利克解释说，他之所以借钱给惠特尼，是因为他“认识理查德·惠特尼很久了，很欣赏惠特尼的为人，觉得



他是个好人”。(摩根曾经对皮科拉说过：“我们确实发放贷款……我们借钱给别人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这笔钱……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过了不到2个星期,惠特尼做出了当年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借款之举。10月14日,E. A. 皮尔斯公司向惠特尼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延期贷款,抵押是惠特尼及其公司在纽约证交所和场外交易所的席位。而就在这一星期,惠特尼正式拒绝为皮科拉发放调查表,E. A. 皮尔斯成为了惠特尼的坚决反对者。皮尔斯在当时不可能认为惠特尼是个好人,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或许是因为抵押品太可靠了,皮尔斯是个很实际的人,他讲究“生意归生意,政治归政治”。或许是因为皮尔斯想通过债权和抵押品来获得对惠特尼的控制权,虽然对于一名直爽的前伐木工人来说,这不太可能。或许是因为惠特尼又一次运用了他那著名的魅力。

不管怎么说,这笔交易做成了,这是惠特尼借贷史上一个不祥的转折点:他在向亲戚和朋友之外的人借钱,向可能会伤害他的人借钱。不过,他到底有了钱,并且运作起来。禁酒令在12月被废止,蒸馏酒公司像一匹冲出围栏的赛马,全力奔跑起来。酒类股票不停上涨,到1934年春,直接交易价格已经达到45美元。同时,惠特尼不停地为自己和他的经纪事务所聚敛股份,按当时的价格,他持有的股份市值已经大大超过了100万美元。

此时,如果换一个人的话,他会把股份全部或部分抛出,把除了欠他哥哥和摩根公司——说起来应该算是家族债务——以外的所有债务还清,并且重新开始。但是,信心十足的惠特尼要在蒸馏酒公司上赌一把,他已经无法做出判断了。因此,他继续持有股票,继续欠债不还,他满怀信心地企盼着有朝一日新泽西闪电会行销全国,被烦恼的上班族在从办公室到火车上的5分钟内抢购一空,被温文尔雅地端上高级餐厅和乡村俱乐部的桌子,而他自己则终于有钱过他一直过的生活了。也就在这个春天,当他在华盛顿因证券交易法案而遭受重大失败时,他离这个商业奇迹已经很近了,这将把他从乱糟糟的私人事务中拯救出来。但是,这个奇迹最终却没有实现。

第九章 白衣骑士落马

1934年，华尔街几乎是一座幽灵之城，行情室的工作人员在打瞌睡，经纪人整天无所事事，在证交所里插科打诨消磨时光，交易量与1933年相比减少了至少一半。新政未能带来明显的复苏，“罗斯福市场”最初的喜悦也消失了，市场冷了下来。即使有股票交易，也是无精打采、随随便便，价格也是死水一潭。职业投机人袖手旁观，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公众则没钱更没兴趣投资。经纪事务所又开始裁员，每四周就有一周停业，不向员工支付薪酬，在这一周内员工可以去卖苹果，有些人也确实去卖苹果了。投资银行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没钱进账，资本市场几乎死了。全国几个月才会发行一次新的工业股或债券，总量也就一二百万美元。1933年的银行法强制那些同时进行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公司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大通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就不得不将臭名昭著的“证券分公司”剔除。从华尔街的社会结构方面来看，意义更加重大的是，这些公司都一分为二，就连摩根公司也不得不如此。摩根公司服从法律，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它的特权看似毫发无损，但是其力量和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尤其是，它已经无法与

昆恩里尔布公司相比了,后者从未涉足过商业银行业务,因此也就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在这个解体和停滞的时期,金融资本主义即将结束的流言四起。

就连华尔街的巨头也感觉到了经济的窘迫,他们的窘迫更甚于商业界巨头。在这个萧条时期,商业界巨头还能拿到 30 万~40 万美元的年薪,而他们的雇员则遭受了减薪之苦,他们的股东没有了红利。1934 年,尽管 J. P. 摩根重新树立起了他的公众形象,但是 77 岁还不断遭受各种杂事之苦的他开始不再插手公司事务。那年冬天,他登上了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游艇“海盗号”,开始向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加拉帕戈斯群岛远航。次年春天,他就将那艘游艇永远地封存了,因为维护费用实在太昂贵了。随后,他又把收藏的艺术精品卖了,其中包括著名画家夫拉·安哲里科(Fra Angelico, 1378~1455, 意大利画家。——译者注)、夫拉·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 1406~1469, 意大利画家。——译者注)、鲁本斯(Rubens, 1577~1640, 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译者注)、哈尔斯(Hals, 约 1581/1585~1666, 荷兰画家。——译者注)和荷尔拜因(Holbein, 1497~1543, 德国画家。——译者注)的画作。1934 年或 1935 年,杜邦公司拒绝赞助一个周日下午的广播节目,理由是“周日下午 15:00,人们都在打马球”。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联盟俱乐部里的华尔街人自怜自哀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奢华,他们满面愁容地出处于俱乐部里一间以证券为墙纸的房间。这些证券由会员们捐献,曾经价值数百万美元,而现在却一文不值。(1936 年,当形势好转时,有些证券的价值有所回升,俱乐部就用蒸汽把它们从墙上熏下来,还给捐献者。)

1934 年城里最有生气的地方是维希(Vesey)街上的一间屋子,这是一个被称为“证券坟墓”的地方。阿德里安·H. 穆勒父子(Adrian H. Muller & Son)拍卖公司经常在那里拍卖破产公司那成堆的一文不值的股票。一群衣衫褴褛、爱捡便宜的人频繁出入于此,用一点点小钱买入成百上千的股票,期望有朝一日这些股票会奇迹般地复活。他们是黑暗的萧条时期中异想天开的乐观主义贫民。他们之中有一个叫哈罗德·戴顿(Harold Deighton)的英国人,总是习惯性地对每一批被拍卖的股票出价 1 美元,或是这家倒闭公司的 100 股,或是那家倒闭公司的 1 000 股。有时,他倒也能竞拍到手,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发过财。



二

调查、嘲弄、谩骂、鄙视，甚至变得相对贫穷，这些都让华尔街闷闷不乐，怨恨的矛头指向了它的主要折磨者——新政。约瑟夫·肯尼迪的任命只是一时的安慰。这个老投机分子根本不能成为华尔街在新政阵营中的代理，他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他谨慎但坚定地开展了第一项浩大的管理工作：对全国 24 家证交所、它们的 2 400 个成员和 5 000 只上市证券进行登记注册。随后，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一家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证交所，用他在华尔街获得的知识，建立起一个特洛伊木马式的侦听系统，然后利用得来的情报，针对不悔改的股票操纵者，开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一次法律行动。同时，他又高效地主持制定了新条款，规定证券发行者必须向公众公布真实信息。华尔街曾经声称，新的法律行不通，而肯尼迪却在逐步实施。在这一过程中，令人称奇的是，受害者和同盟者都对他赞赏有加。“理智而果断。”理查德·惠特尼在谈到肯尼迪的首个谨慎却无效的证交所管理方案时，友好地说道。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当肯尼迪逐渐显示出他对这项工作的认真态度，而且也表现出他精于此道时，惠特尼渐渐变得不再合作，转而阻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每一步行动。

约瑟夫·肯尼迪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呢？早在他为约翰·赫兹运作集合基金的时候，他就从没把自己当作是个高尚的人！有人说白宫里的那个人是他自己阶级的叛徒，那么，约瑟夫·肯尼迪大概也是他的阶级的叛徒！那些躲在俱乐部和酒吧里舔着伤口的银行家和经纪人是这么说的。

1934 年秋，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关系有所改善，但随后，事情又走向了另一面。转机出现在 10 月份的第三周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银行家协会年会上。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政府和业界的合作。在所有与会者中，指定的发言人就是罗斯福本人。因此，尽管银行家们已着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但他们仍然抱着小心翼翼的心态。仅仅在几个月前，参议院的调查就已经将米歇尔们和威金们曝光，并对摩根家族大加揶揄。上一年在芝加哥召开的银行家协会年会，曾邀请复兴银行公司的杰西·琼斯发言，结果他把银行家们当作恶少一般训斥（“听我一句吧，让政府来参与你们的事”）。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他们也是失败者。琼

斯提醒他们，出席会议的银行有一半无力偿还债务。

现在，说实话，银行家们都知道自己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由于害怕政府出台进一步的监管和限制措施，他们选定华盛顿作为 1934 年会议的会场，并邀请罗斯福为主要发言人，以此向政府求饶。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的这一态度，出席会议的银行家人数空前，以烘托气氛。大约有 4 000 人汇聚到华盛顿，上至华尔街的各大银行，下至被邦妮和克莱德(Bonnie Parker 和 Clyde Barrow，一对雌雄大盗，在 20 世纪 30 年代横行得克萨斯州，持枪抢劫银行，最后为警方击毙。——译者注)所抢劫的、只有少量分期付款和存款业务的小银行，许多银行的主管都出席了会议，小银行的主管大多衣衫不整，大银行的主管则都风度翩翩。在所有代表中，最抢眼的就是摩根公司的代表拉蒙特和吉尔伯特。摩根合伙人过去从未莅临过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会议。

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如同事先计划的一样，是一场友爱的盛宴。整个会议由华尔街的大人物们所控制，他们决定将当前的口号定为顺从和谦逊。所有银行家，除了少数来自边远乡村不易管束的之外，都把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完全掩盖了起来。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主席宣布，该组织“全力支持任何不违背银行业原则和不损害(银行)储户利益的复兴措施”。德高望重的杰克逊·E·雷诺兹(Jackson E. Reynolds)，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在介绍罗斯福时更是进了一步。“我认为这绝对不是投降。”他在开场白中字斟句酌地说。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坦承银行家们在崩盘前几年中表现欠妥，承认企望在一个普遍贫困的时期立即达到国家预算平衡是不理智的。他声称，银行界正处于一种改正错误和理解国家困难的状态之中。最后，他还说了一番自贬身份的话，他感谢罗斯福为“挽救和复兴支离破碎的银行结构”所做的努力。这番话听起来就是投降。罗斯福实际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心情愉快，也显得宽宏大度。他谈到，银行和政府合作可以形成一个“全美团队”。第二天，银行家们挽回了一点面子，他们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尽快发布一份平衡的预算。这样，每个人回家时都红光满面，心情愉快。

事情似乎还不错，但是很多银行家私下里都有点想法。在酒店的走廊上和房间里，他们嘀嘀咕咕，认为雷诺兹的话讲过了头，是以尊严为代价去换取和平。后来，人们渐渐了解到，这其中有一起秘密的投敌。雷诺兹私底下早已投降了。有迹象显示，罗斯福曾坚持要看雷诺兹的讲话稿，以此

作为他在会上露面的条件。在雷诺兹提交的讲话稿中，罗斯福被巧妙地比作罗马统帅西庇阿(Scipio)，而这位统帅因为拒绝接受敌人汉尼拔(Hannibal)伸出的桂枝而“死于流放”。雷诺兹还在讲稿中不温不火地调笑说，很多年前，雷诺兹还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一名青年教授时，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他的一个学生——他还打算笑着说，是一个不很聪明的学生。这两段话原本很可能改变雷诺兹讲话的基调，但是罗斯福明确坚持说，这两段话必须删去，这就是要他接受银行家们桂枝的代价。

这真是一个无端的大侮辱——被征服者连嘲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银行家们发现了真相后，变得坚强起来，华尔街的罗斯福仇恨时代开始了。

三

但是，有组织的罗斯福仇恨并非是从华尔街开始的。准确地说，这种仇恨在2个月前，1934年8月，美国自由同盟成立时就开始了。这是一个保守派民主党富人和高端共和党商人的联盟，其章程是“宣讲尊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必要性”。这个名义上的无党派自由同盟起初声称它“绝不反对罗斯福”，而罗斯福也坚定地宣布自己完全同意同盟的原则，并建议说，他或许会在制定明年的国家预算时启用自由同盟为顾问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罗斯福所喜欢演的政治喜剧，他和公众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由同盟的成立，其目的就是要抛弃新政，恢复旧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盟的成员越来越多，到1935年中期已经达到3.6万人。最后，到总统竞选的1936年达到顶峰，有12.5万之多。同盟成了美国那些自私贪婪的富人们进行罗斯福仇恨的汇聚点和工具。从政治上来说，这个同盟所做的努力几乎必定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富人是它的公开资助者。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乔治·沃尔夫斯吉尔(George Wolfskill)后来所写：“新政发言人没必要去驳斥同盟的观点，他们只需把同盟资助者的名字说出来即可。”然而，同盟还是对一小部分但却不可忽视的美国人弹起了同情的调子，这些人并不都是富人。同盟派向全国各商业和服务机构的游说者，在对新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大张挞伐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其各个成员则传播着恶意的反罗斯福言论(尽管这不是，或者说没有证据证明是同盟的安排)。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这些荒唐言论是令人悲叹的。他们传播说罗斯福其实是个犹太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人[有人编造了罗斯福的家谱,追溯到一个叫罗森菲特(Rosenfelt)的陆军上校];他的微笑是整形医生移植到他脸上的;他是个精神错乱的人,他疯子一般的狂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和他的家人整日酗酒;他与弗兰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关系暧昧;罗斯福夫人是个共产党人,她将接替总统的位置,把美国交到苏联人手上。这些荒谬可悲的故事,自由同盟者们习惯性地相互传播着,同时也向他人传播。这些故事中,有的还有不少人相信。一家全国性的新闻社曾向订阅者发布一条新闻,或者说是新闻的“秘密背景报道”,声称有证据表明总统正受梅毒的煎熬。精神卑劣已成为富人的通病,而这种传染病已经蔓延出了富人的范围。

华尔街也病得不轻。长期以来它形成了在国家事务上谨言慎行的习惯,正是这种习惯将它从商人们过激的公开言行中拯救了出来——也正是这一习惯,使它曾经在沃伦黄金购买计划中保持缄默。但是,在私底下,在华尔街人的俱乐部和行情室里,在他们可以发泄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不会危及他们与客户或政府的关系的地方,他们就肆意地进行罗斯福仇恨行为,以慰藉他们的心灵。例如,自由同盟开始时信心十足地要把各大银行和经纪商纳入其旗下,结果只得到了很多华尔街人的匿名捐助和秘密同情,而公开的成员却不多。然而,在粗鄙的小型经纪事务所内,迎合好色之徒和宗教偏见者的最低级的反罗斯福故事还在不断地被人重复着(有时,在华尔街巨头们那优雅、华丽的新教徒俱乐部里,也有人讲这些故事)。华尔街最大的一家银行的主管信誓旦旦地对《纽约时报》的艾里奥特·V. 贝尔(Elliott V. Bell)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相信罗斯福真的是“病态”的。据传,J. P. 摩根的侍从们不敢让他看到载有罗斯福照片的报纸,怕他那日渐衰老的心脏受不了。

摩根是老了,但这个关于他的传说和那些关于罗斯福的流言蜚语一样没有事实根据。摩根财团那时仍然是华尔街道德和理性的权威,有关摩根财团在罗斯福仇恨时代的领导力,有什么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吗? 现有的记录奇怪而混乱。虽然摩根自己偶尔会公开资助同盟的活动,但是摩根合伙人却都没有参加自由同盟。1934年10月,风头正健的托马斯·拉蒙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他认为罗斯福是“实施健全政策的唯一希望”和“支柱”。他还说,他认为新政的救济开支并不过分。但是,拉蒙特可是摩根公司的外交家。拉塞尔·莱芬韦尔,一个老资格的民主党人,一直固执地给罗斯福写信打气并提出建议,即使罗斯福对他的信反应越来越

越冷淡,对他的建议也不理不睬。1936年,莱芬韦尔和另一个摩根民主党人吉尔伯特满怀责任地为罗斯福竞选第二任总统捐了一大笔钱[除了W. 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保罗·谢尔兹(Paul Shields)以外,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入这么做了],但是他们的捐款远远比不上摩根家族和乔治·惠特尼对共和党的资助。自然而然地,莱芬韦尔对罗斯福的热情消退了。“拉塞尔是一位非常宽容的人,从不说人坏话,”他的一个华尔街民主党朋友说,“但我从没听说过有人称他为新政拥护者。”

压抑愤怒、圆滑的外交、小心翼翼地提建议、痛苦地保持沉默,这些是摩根领导集团的风格。比起粗俗的谩骂和男人房间里的下流话来,这要好得多,但如此消极的态度却无法阻止华尔街因与罗斯福的对立而招致的坏名声。然而,这种毫无理性的个人仇恨似乎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尽管摩根人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公开表现出来。一方面,在1933年,确实是罗斯福挽救了银行家和经纪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每当罗斯福谈到这些人或与他们打交道时,又总是表现出傲慢或不屑,除了最自负的人之外,谁又能受得了这么一个傲慢、不可一世的救世主呢?那时候,除了在华尔街23号,其他地方找不到这样自负的人。

有一个华尔街的罗斯福仇恨者,可以算得上是这样自负的人,他也许是仇恨者中胆子最大、最敢说话的人。他就是刚刚辞去其在华盛顿职务的詹姆士·P. 沃伯格。由于对自己原先的偶像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大为失望,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说服了银行界的同伴让他离开一段时间。在1934年的头几个月中,他远航到加勒比,期间写了一本书,述说他对伦敦会议和沃伦计划的看法。这本书名为《货币乱局》,其中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因而很快就成了全国畅销书。此书对罗斯福的政策提出了友善的批评。沃伯格“以良好的愿望”和一贯的爱慕之心,给总统寄去了一本样书,并收到了总统的回信。总统在信中称他为“亲爱的吉米”,同时轻松地他说他已经“带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这本书,并热情地邀请这位过去的顾问“屈尊驾临”,详细商讨。但是沃伯格并没有接受邀请。他仍在不停地思索,同时,知名作家的身份可能也让他有些飘飘然——毕竟,其他作家也有过相同的经历。他很快又写了两本书,继续深入抨击。其中一本是《我们的责任》,这本书公开呼吁修改新政的三个关键举措:银行法案、国家复兴法案和黄金储备法案。这一次,他又在书正式出版前给总统寄去了一本,并又收到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尽管这次的热情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另一本书是《孤注一掷为竞选》。实际上这是一本小册子，先是在《纽约先驱报》上连载，1935年成书。这本书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也难怪沃伯格没再在出版前给白宫寄书。随着对罗斯福政策失望的加深，沃伯格发现自己与那些无节制的罗斯福仇恨者越走越近了。不知不觉中，他几乎已经加入他们的队伍了。尽管作者再三表明他没有恶意，但是《孤注一掷为竞选》已经不再是友善的批评了。“我觉得就好像我的一个当火车司机的兄弟得了色盲症，”沃伯格写道，“我应该爱我的兄弟，但我当然不应该要求他的雇主继续放心地把别人的生命交到他手里，这不公平。”他明确指责，罗斯福所完成的不是他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而是社会党竞选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承诺，他还彻底驳斥了全国复兴总署，认为那是个“巨大的失败”。更加不可饶恕的是，他无情地攻击了罗斯福的人品和动机，指责总统“具有明显的演戏天分”，“喜欢作秀而没有政治家的风度”，荒谬地希望“成为英雄”并“取悦尽可能多的人”。沃伯格的结论是“现在的政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至于罗斯福本人，“我们越早把他赶下台越好”。

《孤注一掷为竞选》卖出了100万册，成了主要的反罗斯福宣传材料，也使作者成为了罗斯福仇恨者的宠儿。沃伯格被自己的雄辩及由此引来的欢呼声推动着，到达了遥远的彼岸，投入了自由同盟的怀抱。1936年1月，同盟举办了著名的晚餐会，发动了反对罗斯福连任的运动，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在晚餐会上说，新政有一股“令人恶心的气息”。这位得了色盲症的火车司机的兄弟亲临晚餐会现场，支持他们的运动，他终于彻底背叛了。他成了著名的彼得·亚诺(Peter Arno)漫画中那愤怒的批评者，出现在新闻片中只是为了给罗斯福喝倒彩。

但是，请等一等。在他不断走向背叛的过程中，沃伯格心中悄悄出现了缕缕困惑，现在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困惑充满着他的头脑。当共和党提名兰登(Landon)和诺克斯(Knox)为候选人时，沃伯格的支持票已经是半心半意的了。他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夏天，良心备受谴责。最后，到了10月份，沃伯格以兰登的一次反关税互惠的讲话为由，给国务卿霍尔写了一封公开信，声明他的立场已经转变，打算投罗斯福的票了。

就这样，詹姆士·P. 沃伯格结束了他的“政治漫游年”。大选之后，他离开了银行界和政党政治，后半生潜心于写作和世界和平事业。他短暂的华尔街罗斯福仇恨者生涯是如何成为美国生活中最乏味的章节中的亮点的？沃伯格后来对此做出了解释，他在自传中写道，“一项启人心智的心理



分析”最终开启了他的双眼,使他直视自己的内心动机。他深爱的父亲在1932年去世,而罗斯福很快就替代了他心目中父亲的位置。但随后,“很不幸,罗斯福开始打击我父亲所代表的心理象征:传统的银行结构……和‘健全货币’的通常概念……罗斯福总统的行为……不但引起了理智上的疑虑,还让我产生了一种非理性、无意识的情感,那就是已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我心中父亲位置的替代父亲出卖了我敬爱的父亲”。因此,他强烈地排斥这位替代父亲,而他发现自己的错误却太晚了。

当然,这是个很不错的道歉,在政治忏悔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而在华尔街罗斯福仇恨者的忏悔中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要是那些死硬的俱乐部老家伙们、说闲话的人和新闻片中喝倒彩的人也躺在精神分析的长榻上,他们也会如此幡然悔悟吗?至少,没人能证明他们不会那样,这样想来,也很有趣。

四

证交所也感受到了弥漫在华尔街上的不安全感,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待查德·惠特尼及其顽固派政权的反抗。但这是一种微弱的反抗,反抗者总体上来说肯定是有史以来最不情愿的造反者。

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证交所是继续像原来一样作为私人俱乐部来运作,还是根据其功能成为一家面向大众的机构。直至1934年底,私人俱乐部派的保守党们依然牢牢地掌握着实权。那一年的选举中,惠特尼顺利地连任证交所总裁,这是他的第4次连任,任期一年。像往常一样,与他同时当选的管理者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人。经纪人——潜在的反对派,因为他们与公众打交道,要为公众的利益承担直接的金融风险——获得了超过一半的证交所席位,但在管理委员会中只占了约1/3。年复一年,“掌权派”们在这个机构中的地位是永恒不变的,这是通过内定的提名和选举系统来保证的。

尽管如此,经纪人们也不是好管束的,他们与政府合作制定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以此来反抗惠特尼。他们的领导层早已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元老”的小团队。这个团队是证交所的影子内阁,他们定期举行午餐会,在一起抱怨惠特尼派的独断专行并商讨对策。尽管他们中间有一个真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正的特立独行者——E. A. 皮尔斯，“元老”也算不上是热忱的自由主义团体，绝对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积极热情的格雷森·M. P. 墨菲（Grayson M. P. Murphy），不久就成了美国自由同盟的财务主管，而他们的律师拉乌尔·E. 戴斯维宁（Raoul E. Desvernine）则成了自由同盟法律部的主席。这些人就是1934～1935年间华尔街的改革家。但是，对于改革家，华尔街很少有选择的权力。

事实上，元老们既怕理查德·惠特尼，又怕约瑟夫·肯尼迪。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领袖人物——一个个性鲜明、能够直面惠特尼并在选举中打败他和他的体系的人。皮尔斯和保罗·谢尔兹不行，因为他们是出了名的反叛者，连参选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在1935年初，可能是出于偶然，一个能担此重任的候选人出现了。1934年的整个下半年，肯尼迪一直在敦促证交所在政府强行介入前进行自我改革，但惠特尼一次又一次地予以拒绝。当他转而找到元老们时，他们也是拖泥带水。终于，肯尼迪失去了耐心，他明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证交所立即颁布一个11条改革计划，而惠特尼仍如往常一样，对此嗤之以鼻。于是，肯尼迪向元老们摊牌：“你们自称是我的朋友。现在，我要你们支持这个计划。”元老们就这样被推赶着通过了一个支持肯尼迪的决议，并敦促计划尽快实施。当管理委员会委员在下一次的会议上义愤填膺地谴责这种反叛行为时，起初没人元老们说话。这很好理解，因为惠特尼早就处心积虑地做好了安排——管理委员会中没有，或几乎没有元老的人。但是，委员会中有一个元老成员，42岁的约翰·韦斯利·海恩斯（John Wesley Hanes）。他是查尔斯·W. 巴尼公司（Charles W. Barney & Company）的合伙人，在元老中的地位不高。他新近被任命为管理委员会委员，临时顶替一个空缺。海恩斯站起来，带着一口北卡罗来纳州口音，竭力为元老的决议辩护，在惠特尼的鼻子底下，勇敢地攻击证交所的保守派。当他坐下时，一片死寂。后来，委员们在描述海恩斯的爆发时用了一个词——异端邪说。

就这样，改革者们有了英雄，但那是个什么样的英雄，什么样的改革者啊！约翰·韦斯利·海恩斯虽然不是自由同盟的人，但也不是个真正的改革者。他的家族，温斯顿—塞勒姆主要的纺织品制造商，是雷诺兹烟草公司最初的所有者，巨额利润使他们跻身于富豪之列。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投资银行界，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成功。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了那种温文尔雅的南方人中的一员，这些南方人曾以真诚的善意以

及健康、虔诚和浪漫的作风，给北方的商业和职业生活带去了一抹淡淡的优雅。他以近乎崇拜的态度对待摩根财团，按照他的标准来看，摩根财团代表了正确和正统，而能与拉蒙特、莱芬韦尔和乔治·惠特尼结为好友，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他信奉的是纯粹的自由企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能够催人前进的是对回报的期望。虽然海恩斯是一名合格的南方民主党人，是那位与哈里·伯德（Harry Byrd）共同参加 1932 年选举的民主党巨人的好朋友，但是他从没有投过罗斯福的票，1932 年没有，选举纽约州州长时也没有。晚年时，他成了一名养马人，同时也是伟大的纳舒厄（Nashua）公司的共有人。除了赛马战利品之外，他的书桌上总是放着一本《圣经》。约翰·韦斯利·海恩斯，一个典型的烟草王公，温和的老派绅士，他会是一个激进的改革家吗？那仅仅是在 1935 年的华尔街。

理查德·惠特尼长海恩斯 4 岁，多年来他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他们称不上是朋友。他们的家族保持着联系，只是因为两家的女儿在福克斯克罗福特（Foxcroft）学院是室友。海恩斯反对惠特尼掌管证交所，而且，由于某些原因——虽然不是海恩斯自己的原因，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早在 1932 年，海恩斯就得出结论：惠特尼的政策不把公众意见当回事，因而败坏了华尔街的公众形象。第二年，他去了摩根财团，向他的朋友及偶像拉蒙特和乔治·惠特尼表达了他的观点。乔治·惠特尼对他说：“别跟我说，去跟理查德说。”海恩斯就去了，而理查德·惠特尼一如既往地耸了耸肩。到 1934 年，他们之间出现了直接对立，可能也有了商业报复嫌疑。与那一年的许多投资公司一样，巴尼公司也正经历着债务危机。投机商们到处散布谣言，企图操控市场，把巴尼公司推向破产的边缘。海恩斯请求惠特尼以证交所总裁的身份出面干预，但惠特尼冷漠地拒绝了。投机商最终没有得逞。在以后的几年里，海恩斯以他南方人的高尚精神坚持说惠特尼的冷漠并不是报复。但是，1935 年初当海恩斯站在威严的管理委员会及其粗脖子总裁面前，以他温和但却带着怒火的语气发表那番使他成为华尔街激进斗士的异端邪说时，他真的完全没有想起这件事情吗？

五

惠特尼再一次集合力量展开了一场战斗。1935 年 2 月 7 日，在元老们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之后，他立即在一次广场晚餐会上尖锐地说：“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位新老板了，那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我们，尤其是我，被指责为独断专行、充满敌意、不愿合作。然而，证交所及其管理者努力在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合作……”也许是吧，但是，惠特尼和他的追随者却懒得向证交所里的对手表现出一丝合作的意愿。如同任何一个私人俱乐部一样，证交所的职位提名是由提名委员会来操作的，委员会每年提出一份唯一的、不容反对的候选人名单，然后举手表决顺利通过。当然，这样的系统是许多寡头保持自己统治的传统做法。但惠特尼却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危险。这个提名委员会在上一年证券交易法案通过后的混乱的几个内匆忙上阵，其成员是谨慎的自由主义者和反惠特尼者，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证交所的公众名声。从广场晚餐会到提名委员会提出 1935 年候选人名单的 2 个月期间，惠特尼势力在证交所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权力运动，以期直接影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这场运动通过施加压力、幕后交易和威胁，在证交所公开为惠特尼拉票。提名委员会急着想把惠特尼排除在总裁候选人之外，却又不肯。于是，他们在 3 月份提出了 3 个总裁候选人，而不是 1 个总裁候选人，让证交所成员在公开选举中做出取舍。这 3 个候选人是惠特尼、海恩斯和查尔斯·R. 盖伊(Charles R. Gay)。盖伊是个温和而讨人喜欢的经纪人，似乎能够在对阵中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他是理想的折中人选。但这种安排很快就显得混乱不堪。这一次，海恩斯，这个大家所公认的挑起争端的人，深思熟虑后决定既不当证交所总裁，也不参与反对惠特尼的公开运动。他很快就坚定地从此项选举中退出，只同意竞选管理委员会委员。至于盖伊，大家所认定的折中人选，更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温顺地告诉惠特尼，如果惠特尼想要连任，那么他，盖伊，就会很高兴地投惠特尼的票，而他完全清楚连任是惠特尼梦寐以求的事。就这样，激进的老虎退出了战斗，温顺的老虎支持了他的对手狮子。毫无疑问，证交所的反狮子运动陷入了可悲的境地。

一时间，惠特尼似乎胜券在握了。但是，提名委员会在肯尼迪和元老们的一再催促下，鼓起勇气做出决定，惠特尼必须离开总裁的位置，为了安抚他和他的支持者，他将被提名为管理委员会委员。接下来的问题是说服盖伊接受他曾经非常高兴地准备放弃的总裁提名。“查尔斯，这份工作是你的了，”提名委员会主席 R. 劳伦斯·欧克利(R. Lawrence Oakley)真心

实意地对盖伊说，“你必须得接受。”事情到这一地步，盖伊也就精神紧张地同意了。后来他为此向惠特尼道歉，他安慰惠特尼说：“谁赢谁输我都无所谓。但是我对劳伦斯·欧克利说过，我再也摆脱不了这件事了。”提名委员会要向惠特尼解释也很麻烦。欧克利不无内疚地承担了此事，这次轮到欧克利神经紧张了。“这其中没有任何个人原因，理查德，”欧克利在告诉惠特尼他没有被提名之后解释说，“这是公共关系问题。”惠特尼脖子涨得通红，他冷冷地说，他也许会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裁，而且他有把握获胜。胖子发火了。

4月初，选举日的前一个月，提名委员会勇敢地公布了候选人名单：总裁候选人是盖伊，财务部长候选人是中立人士本杰明·H. 普林顿(Benjamin H. Brinton)，管理委员会候选人11名，包括8名反惠特尼人士——其中有海恩斯以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8岁圣路易斯经纪人小威廉姆·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2名惠特尼的死党，再加上惠特尼自己。现在，惠特尼面临两个选择：有风度地放弃或是实现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威胁。如同往常一样，他带着这个问题穿过布罗德街，来到华尔街23号找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和托马斯·拉蒙特一致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证交所在全国的名声已经跌到了最低点，这个时候，独立候选人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并导致严重的分裂。这是一个最终判决。理查德·惠特尼可以不断反抗他在证交所和华盛顿的敌人，厉声斥责或公开辱骂他们，但是出于实际原因和心理上的原因，他不可能如此对待他的兄长。然而，如果说他是以自怨自艾、遭自己人暗算的心态灰溜溜地离开华尔街23号的，那么，他缓过来的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惠特尼还没完蛋呢。他还可以挽回点什么。乔治和拉蒙特只是不允许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裁，他还可以支持他的忠实追随者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管理委员会委员，从而与改革派一较高下。也许他的追随者们能够把官方候选人打得一败涂地；也许身不由己成为改革标志的约翰·海恩斯就是被屠杀者之一；也许，还是也许，理查德·惠特尼自己竞选委员所得的票数会多于盖伊竞选总裁所得的票数，从而证明谁才是证交所真正的老板。总之，也许他能够把表面上的失败变成真正的胜利。

就这样，惠特尼的死党们回到证交所里继续对选举施加压力，并为他拉票。在公开场合，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盖伊出任下一届总裁，而私下里，他们却敦促会员们不投他的票，以此表明对他没有信心。他们推出

了3个独立候选人，都是惠特尼的亲信，以对抗官方的候选人名单。这种对抗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对报刊金融版的读者来说，保守派及其白衣骑士为保卫他们的领地而与改革派进行的顽强斗争，其吸引力不亚于股票的价格。这件事成了华尔街的一出新戏。

选举在3月13日举行，参加投票的证交所会员人数较往年翻了一番。为了确保投票的保密性，交易厅有史以来第一次设立了投票站。正如惠特尼所希望的一样，投票结果对他来说是一次全面的、标志性的胜利。管理委员会的3个独立候选人以844、898和918票的绝对票数当选委员，盖伊以1131票当选总裁，而惠特尼，如他所愿，以超过盖伊的1146票当选管理委员会委员。最令他高兴的可能是约翰·韦斯利·海恩斯的惨败，他仅得了371票，是所有候选人中得票最低的。

六

证交所的新总裁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人，他年已60，身材结实，戴着眼镜，循规蹈矩，对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恶意。他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曾就读于当地的第35公立学校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19世纪90年代，他在华尔街只是一个每星期挣3美元的收款员，他每天干活，攒钱，就像阿尔杰（Alger, 1832~1899，美国作家，其作品大多为鼓舞人心的历险小说。——译者注）小说里的主人公。终于，在1911年，他在证交所买下了一个席位，在1919年成为白宫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自1923年以后一直担任证交所的管理者。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都无法与理查德·惠特尼相比。作为证交所的会员，他自然而然地倒向了惠特尼一派，两人多年来一直是生意上的朋友。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证交所的总裁，盖伊会在多大程度上贯彻自由派的意图、改变或推翻惠特尼的政策？不久答案就揭晓了。就在选举后的第二天，在盖伊的提议下，新的管理委员会任命E.E.哈利·西蒙斯为副总裁。西蒙斯是惠特尼的前任，绝对的惠特尼信徒。在以后的日子里，保守派得以一步步地在这个所谓的新统治集团里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仍然掌握着权力巨大的法律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元老”所要求的组织形式毫无踪影。盖伊对待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态度要比惠特尼的态度友善谦和得多，但在关键时刻，他的不合作姿态并不比老总裁的固执好多



少。最后，保罗·谢尔兹与皮尔斯，这两个改革运动的全力支持者，把盖伊叫来共进晚餐，指责他的背叛行为。

“我有什么办法呢？”查尔斯·盖伊辩解说，“我被捆住了手脚。”

他说到了点子上。选举那年，管理委员会只有 1/4 的位置可以调整，大部分位置仍被惠特尼的信徒所占据。而且，到那年年底，他们已经设法给管理委员会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以致盖伊的任何自由派动议都会被立即否决。随着选举的失利，改革运动也失去了推动力，盖伊成了孤家寡人，差不多就是个摆设。看起来惠特尼的胜利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他似乎确实还是证交所的老板。

还有其他令他满意的事。他的退位，或者说是假退位，使他赢得了公众的高度尊敬甚至忠诚。这正是他希望在华尔街获得的。选举的几周之后，他收到了一封由证交所和证交所午餐俱乐部各阶层 200 人签名的感谢信。信中说：“在过去的 5 年里，理查德·惠特尼赢得了所有下属工作人员的忠诚、友谊和信任。”这件事可不容易人为操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感谢信是有意安排的，也没有理由认为信上所说的不是事实。

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管理委员会 12 月 26 日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天，委员会推选惠特尼为证交所退休补助基金的 6 名托管人之一，任期 4 年。这只基金是为过世会员的家庭设立的一项互惠措施，其资金已达数百万美元，在证交所的所有职位中，其托管人必须是最清明廉政的。这一次的推选一致通过，没有任何麻烦。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朋友还是敌人，在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地方，都没有人想到过，惠特尼绝对不适合做基金托管人，不管他具备其他什么品质。

第十章 形势恶化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惠特尼如此努力地为权力而抗争，不光是出于固执的傲慢或是对权力的热爱；出于某些紧急的个人原因，他需要权力所附带的影响力。新泽西闪电酒仍然没有风靡全国，蒸馏酒公司股票的价格正在下跌。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这只股票从1934年初45美元的最高价一路大跌至11美元。

1935年，证交所的斗争还在进行之中，他感到债务开始步步紧逼。他已经在前一年的7月还清了朋友梅利克的钱。但是，他欠皮尔斯的10万美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欠E. A. 皮尔斯公司的10万美元，还有很多没有还清。他和皮尔斯现在成了公开的敌手，但私下里却彬彬有礼地保持着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其中的原因只能靠猜测。每隔90天借款到期后，惠特尼就会礼貌地要求延期，而皮尔斯则会礼貌地答应。最后，延期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于是惠特尼便带着一丝冷冷的幽默，以套用信函的方式要求延期。他在信中写道：“致以最真诚的感谢，相信我，理查德·惠特尼。”作为两名带头把惠特尼拉下证交所总裁职位的人之一，皮尔斯始终乐意把这个玩笑进行到底——或者说，至少乐意答应惠特尼的要求。

惠特尼欠赫伯特·惠灵顿的11万美元还没有还清，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这件事更为棘手,其原因正是这两人是亲密老友。朋友之间的借款会使友谊紧张甚至破裂,这一点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关系的紧张化。但问题是,这种紧张的关系完全被加载在一方身上;出借人不仅要承受实际的负担,还要承受道德负担。借款人在测试朋友的忠诚度——友谊的准则让他有权细究出借人是否有一丝一点的不安心或不放心,因为这种不安心或不放心可能代表着不信任或不愿意出借。出借人如果斗胆要求还款,那么,他就成了一名讨债者,可能被指责为侮辱了朋友的荣誉。除了名义上的利息和不可靠的感激之情外,出借人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相比,这些筹码都黯然失色。

惠灵顿没有向惠特尼讨债,或者说在 1935 年没有。两年前那笔借款的期限是 30 天;惠特尼大约提出过 6 次延期要求,之后,双方都同意让这笔钱变为无限期借款;惠特尼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还。两人常常在证交所和俱乐部见面,惠特尼时不时会漫不经心地说:“公爵,我可没有忘记欠你的钱,我希望能还得起。”惠灵顿会同样漫不经心地地点头。同时,出于严格的礼仪,惠灵顿从来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惠灵顿后来说道,到 1935 年底,他开始想知道惠特尼是否从来没有“一点利用我的友谊的意思”。此外,惠灵顿的合伙人至少从技术上来说也分担了他的风险,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为了安抚他们,惠灵顿继续承担他在这件事中的个人责任,并且指出他的友谊的神圣性;他告诉他们,惠特尼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承诺“就如同银行里的现金一样有效”。惠灵顿认为,突然要求还钱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

与此同时,惠特尼当然还欠 J. P. 摩根公司 50 万美元,欠他的哥哥乔治近 100 万美元;但是,这些都是家族债务,由于摩根和惠特尼家族的道德修养和经济实力,这些债务不会导致关系紧张。更糟糕的是,1935 年理查德·惠特尼又欠下了新债,债权人不是他的家人,也不是他的朋友。

那年 1 月,他找到了证交所专家会员商保罗·阿德勒(Paul Adler)。20 多年来,工作让他们两人交往密切,关系融洽,但是在业务之外,他们几乎无甚来往;这 20 多年内,他们共同用餐的机会只有 3 次。然而,阿德勒仍然非常钦佩惠特尼。

惠特尼对阿德勒说:“保罗,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大忙。”

“老板,我很乐意这么做。”阿德勒等不及聆听惠特尼的要求是什么就这么回答道。

惠特尼要向他借 10 万美元，期限是一周。阿德勒立即同意了，他说：“我很高兴你向我开口。”在无数次延期之后，惠特尼终于全额归还了这笔钱。但就在还钱之前，他向另一位证交所成员奥托·亚伯拉罕（Otto Abraham）借了同等金额的一笔钱——10 万美元。亚伯拉罕后来解释说，他很愿意借钱给惠特尼，而且还附带着答应保密，甚至连他的职员也不知情，因为他尊重惠特尼的“崇高荣誉和诚实正直”。这笔钱到期的时候，或者说过期的时候，也被还清了。

阿德勒和亚伯拉罕恰好都是犹太人，由此可以推断，惠特尼也无法逃脱西部商人被逼债的传奇命运，即“落入犹太人之手”的命运。但是情况也并非如此。这些借款的利息绝对不是欠款人的一磅肉，而只是所借款项微乎其微的一部分。阿德勒和亚伯拉罕既不是为了贪婪，也不是为了报复，相反，他们都是为了帮助他们所尊重、也有些敬畏的人脱离暂时的窘境，而他们帮助的这个人所创立的体制仍然将犹太人排除在证交所权力结构之外。事实上，是犹太人落入了惠特尼之手。

华尔街始终不知道惠特尼的借款。根据华尔街的古老惯例，私人借款必须严格保密。有关私人借款的闲话可能会损害欠款人未来的信用，而且出借人都清楚地知道今天他们借钱给别人，明天他们也可能向别人借钱。正如惠灵顿曾经说的一样：“我始终认为，借钱给朋友的事即便是双方共同的好友也不能告诉。”虽然如此，惠灵顿有一次还是稍稍越了雷池一步，目的恰恰是保护双方最好的朋友。那是 1935 年的圣诞节，下午，惠灵顿溜出家庭聚会，来到网球俱乐部，在那里遇到了萨拉托加赛马协会的会长乔治·H. 布尔（George H. Bull）。布尔曾是证交所的成员，长期以来一直与惠灵顿和惠特尼关系密切。当布尔提到他正考虑借给惠特尼一大笔钱时，惠灵顿立即做出了回应。他强烈建议布尔在咨询律师、拟定正式协议之前不要这么做。他没有详细解释，布尔也没有问，在圣诞节的俱乐部中，这样的建议已经够令人吃惊的了，其含义一目了然。然而一周以后，布尔还是借给了惠特尼 15 万美元。

二

这笔钱的大部分被直接投到了蒸馏酒公司股票中，那时，惠特尼已经



决定破釜沉舟了。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购买这只下跌的股票，那么就由他自己来买吧。他是否希望像赖安对斯图兹股票那样，对蒸馏酒公司股票进行垄断，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并不希望这么做；没有人为了垄断而特意对蒸馏酒公司股票发起卖空攻击；股票下跌的原因仅仅是缺少买家。不管怎么说，除了那些无担保的欠债之外，惠特尼的巨额银行贷款还未还清，这些贷款是以蒸馏酒公司股票为抵押的，如果股价跌得过低的话，银行就会要求更多抵押，而惠特尼则无法提供。那样，他就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不断收购蒸馏酒公司股票来支撑其价格，进而偿还贷款；二是等待银行催其还贷，随后破产。他落入了典型的债务人陷阱；为了还清旧的贷款，他必须申请新的贷款。整个 1936 年和 1937 年，他大量购入蒸馏酒公司股票，成功地将其价格维持在 10 美元左右，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断需要大量新的资金。

在寻找新资金的时候，他很快越过了借和拿之间那条纤细的界限。

多年来，他一直是纽约游艇俱乐部的财务总管兼证券经纪人。这样的职位让他得以接触到俱乐部的证券，并被授权根据俱乐部的利益处理证券。实际上，按照惯例，他办公室的保险箱内常常保存着俱乐部的部分财产。1936 年 2 月 14 日，他一时无法找到惠灵顿、阿德勒和亚伯拉罕这样愿意向他提供短期无担保贷款的人，于是，他从保险箱内取出了属于纽约游艇俱乐部的价值 15.02 万美元的债券，随后来到公共国家银行信托公司，用这些债券充当部分抵押品，以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名义贷款 20 万美元。

这是非法挪用。与一般银行抢劫犯所犯下的重大盗窃罪相比，这种行为较为复杂，但却同样罪恶，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惠特尼从事的是信托工作，这给了他很大的优势，使他能够秘密行事，而且无需使用暴力。然而，奇怪的是，精神正常、十分理智、智力超群的惠特尼似乎不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很久以后，一份精神病学报告称，他“从来没有从道德的角度思考过他的行为”。无疑，这位精神病学家十分天真——惠特尼总是拒绝抱怨，这份自大的淡泊主义欺骗了这位精神病学家。但是，同样有可能的是，惠特尼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偷。相反，他认为自己不论做什么都不会变成小偷；这也就是说，他是道德上的超人。

过去他也曾这么做过，或做过类似的事。早在 1926 年，早在他成为华尔街的白衣骑士之前，早在崩盘时期的强者角色给他带来知名度和权势之



前,他就盗用了他岳父乔治·R. 谢尔登(George R. Sheldon)的部分地产债券,并以此为抵押进行了私人贷款。谢尔登立下遗嘱,将这些债券的终身收益赠与了他的女儿——惠特尼的太太;地产的其他受赠方有哈佛大学和圣保罗学校。3年之后,惠特尼偿清了这笔贷款,归还了地产债券。随后,在1932年,他再一次陷入暂时性资金短缺的困境,于是,他又将谢尔登的部分债券抵押了出去;后来他又一次归还了这些债券。

在这两件事中,没人比他更狡猾,也没人受到伤害。这个银行抢劫犯在利用完了抢劫物后,又回到银行,归还了抢劫物。但是,惠特尼不可能这么考虑问题——他只是暂时借用了家族资金;他只是让岳父的房地产成为聪明的挪用者所谓的“强制贷款”。惠特尼甚至都不屑为他的行为找理由。唉,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华尔街屡见不鲜。此外,他的天性和生活环境中的——他的贵族背景,他的支配欲,他本性中的自大,他对公共权威的厌恶,同僚、下属、学校乃至全世界的不断赞赏——都让他觉得托付给他的财产实际都是赠送给他的,就像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东西都是赠送给他的一样。如果乔治·谢尔登在世的话,他会把债券借给惠特尼吗?当然会!哈佛和圣保罗会不会介意?当然不会!世人一直称他为金融界的奇才和最诚实的人。1932年纽约大学在授予他商业学博士学位时,郑重地向他宣称:“你在金融界的事业已经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那年,惠特尼第二次挪用了谢尔登的债券。他充当地产的托管人,难道不是给家族帮忙吗?他的家族难道不希望回报他吗?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1936年前向谢尔登地产的“借款”和欠哥哥乔治的钱一样,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不安。人们不喜欢找亲戚帮忙,但是当有人这么做时,他也不会提到回报的事。惠特尼不具备经得住考验的道德心,有权有势的人大多都不具备,公众的认可和美国统治阶级在受到攻击时的团结,使他无需具备这种道德心。暂时取用家族资金——惠特尼很可能会如此描述自己的行为——只是用了本来就属于他的财产。

挪用纽约游艇俱乐部的资金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一家令人感到舒适自在的俱乐部里,人们会觉得他们拥有这家俱乐部,但却不会觉得他们拥有俱乐部的财产。1936年身陷绝境的惠特尼在铤而走险采取这种手段时可能经历了道德危机,尽管他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承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非常理智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他已经破釜沉舟了;他完全清楚事情很可能被曝光,届时,那将是一桩大丑闻,

不仅会摧毁他自己的生 活，给他带来耻辱，还会摧毁旧华尔街——这个聚集了格外看重个人名誉的绅士和权贵的地方。1936 年的理查德·惠特尼知道，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头上悬着一把危险之剑。

这一切都是为了新泽西闪电酒！

同时，他还继续借钱，或者说继续努力借钱，而且比过去更加频繁。1936 年的 5 月，他又一次找到保罗·阿德勒，提出再借 10 万美元。“保罗，你能不能借给我 10 万美元？我借一个星期左右。”据阿德勒后来的回忆，他是这么说的。这次，阿德勒决定不再对惠特尼说他很高兴他来借钱，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好吧”，随后就回去工作了。他拿回了他的钱——当然不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而是在 3 个月之后。6 月，惠特尼停下手头的工作去参加第 25 次哈佛班级重聚，聚会时，他不出意外地被评为班级第二有成就的人，仅次于漫画家格鲁耶斯·威廉姆斯（Gluyas Williams）。6 月的晚些时候，梅利克再次借给了他 10 万美元，而且没有要担保。7 月，惠特尼第二次从亚伯拉罕那里借到了 10 万美元。但是，那年夏季的某一天，事情突然出现了不祥的转折，科佩道莫斯（De Coppet & Doremus）公司拒绝了他 20 万美元的借款要求，理由不详。据记录，这是第一次有人断然拒绝惠特尼的借款要求，这清楚地表明，遮挡着惠特尼众多借款的那块幕布，终于开始磨损了。之后，在秋季，幕布磨损得更加厉害，有关他借钱的传言传到了乔治·惠特尼的耳中。

除了前 10 年的旧债之外，这位摩根合伙人多年来已经远离了他弟弟的经济生活。1929 年以来，理查德只找他借过两次钱。他通过传言而了解到的消息比实际情况差远了；他恰恰没有听说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笔现金借款。他听说的只是几笔完全不同的借款。在那几笔借款中，理查德·惠特尼借的不是现金而是证券，借到手后，他立即以这些证券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乔治·惠特尼还听说了一笔 10 万美元的现金借款，他对这笔借款特别感兴趣，因为出借人是第一国家银行董事长、著名的第一国家银行创始人之子、美国最出名的银行家之一小乔治·F. 贝克（George F. Baker, Jr.）。乔治·惠特尼可能是听得厌烦了，他把弟弟叫来训话。理查德·惠特尼欣然承认他确实借了这些钱，但是他没有告诉哥哥更多的情况。乔治·惠特尼向他解释说这种局面很危险。传言扩散得如此之快，其事实令人咋舌，这很快就会让理查德·惠特尼及其公司的信用遭到破坏。就像 1929 年时那样，乔治·惠特尼没有犹豫。他决定立刻借钱给弟弟，不



论多少都借,以便让他还清欠别人的所有无担保债务,并且让他东山再起。乔治·惠特尼不想费力去弄清楚具体的欠款额,他让弟弟把个人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交给一位年轻的摩根合伙人亨利·P.戴维森。

理查德·惠特尼在12月份递交的资产负债表非常不完整,隐瞒了许多事实。例如,他隐瞒了他把一些客户的证券非法用作抵押品的事实。戴维森觉察到这份资产负债表有所隐瞒,但是他不知道究竟隐瞒了些什么。当然,他怎么能知道呢?不论理查德·惠特尼是否借过那么多钱,他仍然是摩根家族的一员,仍然是摩根债权人这个“好人”圈中的一员,仍然是摩根公司在证交所的经纪人,仍然是波斯廉俱乐部、沙丘俱乐部和纽约人俱乐部的成员!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去欺诈或盗窃,这是难以置信的。1936年的最后一天,戴维森给惠特尼写了一封信:“亲爱的理查德:很抱歉给您带来麻烦,但是我需要您把每笔贷款的抵押品列一份详细的清单。您真诚的,亨利。”如果惠特尼如实地列出这样一份清单的话,他挪用他人财产的事实将会暴露无遗,可以想象,这将会改变华尔街的历史。但是,1937年的第一周,理查德·惠特尼在与哥哥和戴维森谈论他的困境时,成功地让他们两人相信,其余的信息是不必要的。戴维森因而受到了误导,他得出结论说,要让乔治的弟弟恢复经济自立,需要65万美元。于是,乔治·惠特尼在1月8日开给了弟弟一张65万美元的支票——在理查德多年来欠他的巨额债款之上,又加上了一笔无担保、无限期的贷款。这样,乔治·惠特尼自认为又一次挽救了弟弟。

三

他当然没有。因为除了告诉哥哥他是个糟糕的投资者之外,弟弟不敢,或者至少不愿意向坦白他是个挪用他人财产的人,也不愿意向哥哥坦白新的贷款只是略微改善了他的处境。在他用这65万美元还清了证券贷款和欠贝克的钱之后,传言依然没有停止,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听到这些传言,也听说拥有无数财产和好脾气的乔治·惠特尼又一次坚定地支持了弟弟后,惠灵顿公爵最终在1937年1月认定,直截了当地向惠特尼讨债的时候到了,尽管两人是好友。惠特尼在4月冷淡而礼貌地还清了钱,这比最初的期限晚了3年零3个月。为了还清这笔钱,他又要求亚伯拉罕借

给他 10 万美元。亚伯拉罕冒着冒犯惠特尼的危险，把金额砍至 6.5 万美元，不能再多了。惠特尼饥不择食地同意了，随后又到别的地方凑钱以还清惠灵顿的债。就在此前不久，他开始冒险盗用他人财产，走上了毁灭之路。

惠特尼被革除证交所总裁职务后不久，管理委员会为了让他高兴而任命他为证交所退休补助基金的托管人。1937 年 2 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退休补助基金的托管方召开了每月一次的例会，这样的会议往往是令人愉快的社交活动。退休补助基金常常托管给保守派人士；托管方主席是正直老派的哈利·西蒙斯，除了盖伊总裁以外，其余的托管人都是惠特尼的老朋友或助手，当然，盖伊最近也越来越频繁地造访惠特尼。没有皮尔斯、谢尔兹、海恩斯这样的激进改革者来扰乱会议。与会者中唯一不是托管人的是证交所的雇员乔治·W. 卢茨(George W. Lutes)，他被指派为退休补助基金的书记员，简言之，是个打下手的。惠特尼对退休补助基金备感亲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正如他的公司是游艇俱乐部的经纪人一样，他的公司也是退休补助基金的经纪人。在 2 月份的例会上，托管人除了亲切地聊天外，还按照惯例指示理查德·惠特尼公司抛出基金持有的部分债券，其价值大约为 35 万美元，再利用所得的资金买入其他更有前途的债券。于是，惠特尼执行了指示：他抛出了指定的债券，又买入了指定的债券。但是，还有部分指示他没有执行：他没有把新购入的债券交付给退休补助基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不必执行这一没有明说的指示。

随后的一个月，托管人又授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抛出价值 22.5 万美元的债券。这次，由于某些技术原因，债券在许多个月后才被抛出。在此期间，惠特尼直接接管了债券，并把它们握在自己手中。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月。到 11 月，退休补助基金名下的 100 多万美元债券和现金——几乎占了基金总资产的一半——消失了，因为它们被划到了其经纪人的监管之下。

读者不难推断，惠特尼将退休补助基金的资产非法用作抵押品，为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向银行贷了更多的款。毫无疑问，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危险的一次挪用——这不是盗用家族或俱乐部的财产，而是盗用证交所自身机构的财产。通常情况下，基金的托管人不查账，但是，有一个人由于职责的原因而需要时常查账。这个人必然会知道，从 1937 年 2 月到 11 月，基金的资产流入了惠特尼的手中。这个人就是乔治·W. 卢茨，一个谦恭温

顺、信任他人的人。他并不认为惠特尼利用基金名下的债券是为了达到私人目的。根据他后来的证词，他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相反，他只是认为惠特尼和他的公司职员没有做好交还基金资产的文书工作。然而，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书记员，卢茨的确觉得，经纪人长时间握着债券，绝对不是“正常、正确”的做事方式。因此，从5月份一直到夏末，他曾经5次提醒惠特尼说，他还没有把债券交付给基金，并询问惠特尼几时方便交付。惠特尼每次的回答都大致相同：他很忙，他是想把债券交付给基金，但是他抽不出时间；他很快就会完成交付；他会通知卢茨的。

卢茨从来不怀疑惠特尼所说的话。（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惠特尼说的确实是真的：只要蒸馏酒公司能够复苏，其股票能够快速上涨，他就会还清所有人的债！）显然是由于这个原因，卢茨整个夏天都没有向退休补助基金的任何一位托管人提起过债券没有交付的事。但是，他的沉默似乎还有别的原因。后来，在说到惠特尼与证交所雇员的关系时，卢茨这样评论惠特尼的性格，惠特尼“有些尖锐……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他不太爱交际。他很友好，但是……他忙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和他说上话的……我是证交所的雇员，在他手下干活，只是个小小的书记员……说实话，我很害怕他”。这清楚地说明了惠特尼为什么不太担心乔治·W. 卢茨会揭发他。

其他一些地位不那么卑微的人从惠特尼那里得到的也是同样尖刻的答复。有趣的是，1937年夏，他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欺诈之网越铺越大，但他却似乎越来越傲慢自大了。与他的格罗顿—哈佛口音和作风格格不入的是，他极端保守的政治和社交观点以及对新贵的傲慢态度，一直伴随着他大规模的乞讨活动。他从来没有停止乞讨，因为他无法停下来。有记录表明，他的大规模乞讨活动一直继续着。蒸馏酒公司的股票在秋季跌到了9美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接下所有的抛盘，因而被套在其中，孤立无助；整个1937年，在超过80%的蒸馏酒公司股票交易中，理查德·惠特尼公司都是买家。数十万美元一下子就消失在这个无底洞之中，惠特尼急需更多资金投入其中。乔治·惠特尼在借钱给弟弟助其脱困后不久，就一病不起。他因此去了南部疗养，理查德·惠特尼无法找到他。惠特尼有一次曾开口向皮尔斯借50万美元，但自1933年起，他还欠皮尔斯10万美元没有还清；皮尔斯自然拒绝了他。（事后，有人问皮尔斯是否觉得金额太大了，皮尔斯答道，“从华尔街的角度来看”，他觉得金额并不是特别大。）9月中旬，惠特尼开口向亚伯拉罕借10万美元，这次，亚伯拉罕只给了他3万



美元，而惠特尼也急切地接受了；亚伯拉罕借给惠特尼的钱越来越少，这清楚地说明惠特尼正走向毁灭。当月，他把新泽西州的房产作为抵押，贷了30万美元。

四

同时，公众生活还在影响着他，而他也在影响着公众生活。作为证交所的幕后势力，他如今的权力比任何时候都大；1936年证交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暂时休战后，双方的冲突已经渐渐缓和。1937年仲夏，威廉姆·O. 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一位意志坚定、有着左翼思想的法律教授，被任命从詹姆斯·M. 兰迪斯手中接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兰迪斯于1935年接替肯尼迪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受过法律培训，有着法律才能。兰迪斯反对华尔街，而道格拉斯则完全不同。他出身于华盛顿的牧羊场，和任何一个西部人一样，他不信任圆滑的东部人，不信任他们与那些10年前谴责华尔街的人民党立法者类似的行事方式。确实如此。甚至在就任之前，道格拉斯就已经决定强制证交所重组，改变证交所像私人俱乐部一样经营的局面，或者说，除了名称之外，让证交所的一切都国有化。

惠特尼感觉决战在即，他想要先发制人。首先出击的是堕落的改革家查尔斯·盖伊。他在8月中旬发行的证交所年报中，直截了当地谴责证券交易委员会折磨证交所及其成员，声称证券交易委员会阻碍了市场发展，几乎毁了市场。他明确地暗示，证交所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废除《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遣散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所的牌摆在了桌面上——这是惠特尼的牌：盖伊的报告准确地表明了惠特尼的强硬路线，显然也标志着惠特尼集团在被遗忘了两年之后又重新控制了证交所方针政策的制定。9月，道格拉斯满腔热忱地就任了。但是，在他尚未熟悉自己的日常工作、尚未准备好对盖伊施以还击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和平使者，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于敌营的投降谈判者，来到了他的面前。他们就是不屈不挠的改革者、经纪人皮尔斯和谢尔兹。证交所发生的事情不仅让他们两人非常愤怒，也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损失，因此，他们不请自到地来到了道格拉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中。

皮尔斯作为两人中的代表，唐突地问道格拉斯：“你对证交所重组有什么想法？”

他有什么想法？这是他为证券交易委员会设下的一个目标。据说，道格拉斯拍着自己的膝盖，高兴得将信将疑。“你们介意再说一遍吗？”他问道。

皮尔斯和谢尔兹当然不介意；他们重复了一遍，并且进行了详细说明，他们所说的正是道格拉斯所想的：证交所目前的经营模式就像是私人俱乐部，仍然控制着证交所的保守派落伍得不可救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完全重组，雇用一个领取薪金的独立总裁。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道格拉斯开始暗中行动，他所依靠的不是正面攻击，而是华尔街内部勇敢的第五纵队（工作在一国内部的、旨在颠覆政府的秘密组织。——译者注）。唯一的问题是，皮尔斯—谢尔兹集团是否有足够的权力。皮尔斯—谢尔兹来访的两天后，10月18日，自8月起就一直下跌的股市突然在一片恐慌之中崩盘了。整个夏天，全国性大萧条的阴云不断聚积。前两年的小景气完全是以政府开支为基础的；现在财政部长摩根索终于说服罗斯福总统下大力气平衡国家预算。结果，联邦开支被削减了，这虽然没有使预算得到平衡，但却几乎让新政走到了尽头，也几乎彻底结束了那次小景气。由于政府开支减少，购买力逐渐减弱，1937年初达到7年来最高点的物价猛然下跌；罢工之风盛行；公司红利被削减；熟悉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开始出现。此外，盖伊8月份的报告让股票投资者深感不安，预示着股市又将像1934年那样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又将有一场长时间的对抗。令人惊讶的是，股市崩盘居然没有更早一些来临。

当崩盘来临的时候，它引起的恐慌空前巨大。噩梦又一次开始了：华尔街上每天都能听到紧张的窃窃私语，行情室内外都是忧心忡忡的人群，证交所交易厅内常常可以看到无人问津的大捆股票，人们都觉得心里没底——这是1929年的重复，给人一种令人不快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恐慌像往常一样愈演愈烈，到1937年底，股市1934年以来的辛苦所得几乎完全付诸东流。灾难并没有让证交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团结起来。相反，它们相互指责，证交所声称新的崩盘只不过证实了盖伊的话，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反驳说证交所保守利己的错误管理直接导致了崩盘的发生。

在仇视和危机的氛围中，有关证交所重组的谈判蹒跚前行，惠特尼一边疯狂地忙着重组他自己的私人事务，一边竭尽全力为谈判制造障碍。10

月20日，谢尔兹在华盛顿见到了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当时没有任职，但却仍然受到官方的青睐，而且是总统的私人使者。肯尼迪以生动的语言明确表示，总统坚决支持道格拉斯的决定，证交所要么自行重组，要么被接管。第二天，谢尔兹回到华尔街，把这一信息告诉了脸色阴沉的证交所统治阶级代表人——盖伊·西蒙斯、律师罗兰·雷德蒙、盖尔·多米尼克（Gayer Dominick），当然还有理查德·惠特尼。大部分保守派人士被触动了，可能也有点被吓住了，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现在是时候优雅地投降了，是时候原则上同意重组了。但是有一个人坚持不让步，他非常坚决，以至于在最终呈递给罗斯福的会议备忘录里，美国总统被简单傲慢地告知，证交所“正考虑”重组。再也没有别的话了——证交所会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坚持不让步的人以及备忘录的主要执笔者就是理查德·惠特尼。据部分与会者后来透露，他是会议室里最有支配力、最坚决的人。那些认为秘密债务和长期不道德行为会损坏一个人品质的道德家，可能会对此非常感兴趣。

接下来的一个月，股市继续下跌，出现了一系列混乱的小冲突，最终导致了僵局。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谢尔兹来到海德公园，带着歉意把证交所那份语气强硬的备忘录交给了罗斯福。很自然，这份备忘录只是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证交所已经无可救药，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但是不久之后，仍然不屈不挠寻求妥协的皮尔斯和谢尔兹组织了一个华尔街联合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为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取得和解做出最后的努力。为了代表两派人士，代表团中包括西蒙斯和谢尔兹，但没有惠特尼，因为除了对自己的朋友以外，他对每个人都怒气冲冲。代表们去了华盛顿，迎接他们的是道格拉斯的尖刻话语：“监管工作必须要做。现在监管工作没有人在做，真该死，你们如果不监管的话，就由我们来……如果你们还要讨价还价的话，我就要插手亲自管理证交所了。”

几周以后，11月的一个周六，盖伊·谢尔兹和道格拉斯等人在纽约耶鲁俱乐部的私人寓所里，尖锐地争论了大约12个小时，却毫无结果。这次会面的唯一结果就是，重组工作由证交所的法律委员会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由理查德·惠特尼负责；和退休补助基金一样，法律委员会也是惠特尼的私人禁地，其命运可能正如预料的一样。经过了充分的商讨之后，法律委员会得出结论，以雇一个领取薪金的总裁的方式进行重组是不可行的，因此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谈判应该中断。法律委员会给道格拉斯草拟了

一封信，告知道格拉斯法律委员会的决定，措辞十分尖锐。

那天是周五，11月19日。随后一周的周一，理查德·惠特尼的公共和私人事业同时告急。

那天早上，他的法律委员会正式批准了这封措辞尖锐的信，几个小时后，一位证交所律师将信交给了在华盛顿的道格拉斯，这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只是点了点头，阴森森地说道：“那么好吧，我们将会接管证交所。”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退休补助基金的托管人召开了每月的例会，惠特尼当天正忙于国家大事，因此放弃了例会。事实证明这次放弃的代价非常昂贵。发现这位令他如此害怕的人不在场之后，书记员卢茨壮了壮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其他托管人，惠特尼几个月来一直把属于基金的现金和证券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有趣的是，托管人，尤其他们的主席西蒙斯，对这一爆炸性消息的反应是惊讶和恼怒——惊讶是因为没有人想到惠特尼会做出这样的事，而恼怒的矛头指向的不是缺席的惠特尼，而是在场的卢茨，这一点非常奇怪。西蒙斯指责这位书记员没有早点提出这件事。卢茨发现西蒙斯似乎还有些责怪他自以为是地暗示，或者说猜测惠特尼不是因为粗心，而是有意做了这样不道德的事。不管怎样，卢茨觉得他遭到了严厉的、不公平的责备。“他的话非常尖刻，他好像有些气恼。”这位书记员后来这样抱怨西蒙斯。在神的战役中，持矛者往往没什么好运气。

会议一结束，西蒙斯就往惠特尼的办公室打电话。惠特尼出去了，接电话的是惠特尼的名义合伙人之一 F. 金斯利·罗德瓦尔德(F. Kingsley Rodewald)。和所有的名义合伙人一样，他在惠特尼的公司里没有个人投资，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雇员而非合伙人。西蒙斯告诉罗德瓦尔德(根据后来的事情来看，他对整件事一无所知)，他的公司握有早该交付退休补助基金的现金和证券，迷惑不解的罗德瓦尔德向西蒙斯保证说，他们第二天就会归还所欠的现金和证券。

第二天中午左右，惠特尼来到西蒙斯的办公室拜访西蒙斯。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老朋友、老伙伴此次见面时的复杂心境——西蒙斯疑虑重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疑虑是对朋友的不忠，他非常希望是他们弄错了；惠特尼则强迫自己表现得镇静自然，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以免露出马脚；两人都在想，对于华尔街、整个国家，乃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他们之间悬而未决的事有着什么样的巨大内涵。惠特尼要求再晚一天进行交付；他解释



说，他的办公室暂时人手不足，要在当天完成资产归还所涉及的文书工作不太方便。西蒙斯小心、抱歉地回答说，他认为，作为基金托管人的主席，他没有权力同意这样的请求，他要求惠特尼尽力在当天下午归还资产。惠特尼表示，他会尽力的。

他终于被逼入了绝境。当时，价值 65.7 万美元的退休补助基金证券被他抵押给了谷物交易银行，另外，他还欠基金 22.150 818 万美元的现金。然而，他和公司手头的现金还不到 7.5 万美元。他既拿不出证券，也还不出现金。从西蒙斯的办公室出来后，他去了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华尔街 23 号他哥哥的办公室。这次他再没有闪烁其词。他对大吃一惊的哥哥说，他把属于一个客户的大量证券抵押了出去，现在他无力归还这些证券了。他继续说，这位客户就是证交所的退休补助基金，被抵押的证券金额巨大。

理查德·惠特尼后来这样描述哥哥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反应：“他对于我竟然做了这样的事而感到非常吃惊不安，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就是无法理解。他有理由感到震惊。”

（乔治·惠特尼后来说：“我问他怎么能这么做……他说他无可奉告。”）

感到震惊的这位问，要多少钱才能把基金的资产还清。弟弟在计算了片刻后回答说，他很抱歉，他需要 108.2 万美元。乔治·惠特尼看上去并没有大惊失色。他看到了他的职责。但是，他的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钱，当时他的账户里也没有这么多。因此，他立即找到了他的高级合伙人拉蒙特。他对拉蒙特解释说，他的弟弟挪用了“某个客户”的资产，但他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个客户。他请求拉蒙特借钱给他帮助理查德脱困。

拉蒙特说：“好吧，乔治，这是件麻烦事。理查德·惠特尼是一个不错的人，不管遇到了什么困境，他怎么能去挪用证券呢？哪怕挪用一小会儿也不行呀。”

乔治·惠特尼说：“我不知道，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是个案；但是他必须在明天归还所欠的资产，我得帮助他；我必须帮助他，这是当然的。”

拉蒙特说：“我想你是完全正确的。我会助你一臂之力，让你帮助你的弟弟；我一定会的。”拉蒙特得知了所需的金额后说：“好的，交给我吧。我准备感恩节过后立刻动身去南方打高尔夫球。要多少你尽管开口，我会同意的。”

第二天早上,11月24日,感恩节的前一天,托马斯·拉蒙特给乔治·惠特尼开了一张108.2万美元的支票,这是一笔私人贷款,年利率为4%。乔治·惠特尼立即在支票背面签了字,随后把支票交给了理查德·惠特尼。当天早上,理查德·惠特尼用这笔钱还清了谷物交易银行的贷款,取出了退休补助基金的证券。在12:30到13:00之间,他一言不发地把证券以及现金交给了西蒙斯,于是,卢茨当着惠特尼和西蒙斯的面把这些证券放入了退休补助基金的保险库内,并把现金存入了基金的银行账户里。这比西蒙斯的最后期限晚了一天,但是惠特尼还是按照自己要求的期限交还了资产;最重要的是,他还清了资产,现在一切又恢复秩序了。

就西蒙斯、其他托管人甚至卢茨来说,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惠特尼的办公室人手不足是他拖欠资产的真正原因,他行事慵懒是整件事的唯一解释。当时,除了乔治·惠特尼和托马斯·拉蒙特以外,没有人确切知道理查德·惠特尼是个挪用他人资产的人。几周以后,另外一个人也对这件事有了一些了解。为了归还拉蒙特借给他的100万美元,乔治·惠特尼必须得到许可,从他在J. P. 摩根公司的资本账户里取些钱出来,因此,他找到了唯一有权批准这一要求的人——J. P. 摩根。乔治·惠特尼说:“理查德11月份遇到了大麻烦,你当时不在,我就找托马斯·拉蒙特借钱,他把钱借给了我。因此,我想把钱还给他,你能让我把钱取出来吗?”

摩根说:“没问题。”钱就这么被取了出来。

“大麻烦”——赛马?女人?不,摩根(他对理查德·惠特尼的了解甚少)后来说,他知道这肯定是业务上的事。“金额实在太大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事。”他很谨慎,没有进一步询问这位合伙人弟弟的事情。

那么,就有三个人知情了:摩根知道一桩“100万美元”的大麻烦,拉蒙特知道一起非法挪用,乔治·惠特尼知道证交所退休补助基金的资产被非法挪用。这三个传奇式的人物都不约而同本能地保持了沉默。这样,兄弟、合伙人、夫妻、学校和俱乐部之间的浓厚友谊和阶级忠诚,胜过了苍白平淡的社会道德心。

第十一章 大灾难

整个感恩节，乔治·惠特尼都在忙着挽救弟弟那乱作一团的事务，可能也在挽回他对弟弟的人品的恶劣印象。那天早上，在他的坚持下，理查德·惠特尼来到他家，交给他一组匆忙之中汇编起来的数据，以便让他了解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当时的情况。数据显示，公司的利润大约为 100 万美元，但理查德·惠特尼后来承认，这些数据是假的。然而，哥哥并没有质疑账目的真实性——只是认为理查德高估了蒸馏酒公司股票的价值，到如今，这些股票已经是惠特尼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了。在把股票价值降到一个更符合实际的水平之后，乔治·惠特尼得出结论，公司仍然盈利，利润可能为 50 万美元，前提是股票能卖得出去。他还得出结论，蒸馏酒公司的失败证明理查德的经营判断力非常糟糕，现在，对理查德来说最好的道路就是在招致更多失败之前就退出经纪人行业。必须找个人接管公司，这个人必须拥有 20 年的良好声誉，譬如，某个有钱人可能会想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管惠特尼公司。对于哥哥让他放弃在最近才掌控的世界里的立足点，理查德·惠特尼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他的反应和所有靠向哥哥借了 100 万美元才脱离困境的弟弟一样，他同意了。



乔治·惠特尼等不到休假结束就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他打电话给弟弟的老朋友哈利·西蒙斯,请他下午过来和兄弟俩聚一聚。西蒙斯非常吃惊,他托词说,他得去教堂,然后还要参加家庭晚宴。然而,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还是来到乔治·惠特尼的住所,与兄弟俩进行协商。哥哥简略地描述了一下形势,并解释了他的计划。毋庸多言,西蒙斯被匆匆邀请(如果不算是召唤的话)的原因十分明显了。显然,乔治·惠特尼的想法是让西蒙斯接管理查德·惠特尼公司。西蒙斯一点儿也没料到。他没有看理查德·惠特尼的数据表,他表示,对于惠特尼公司的主要业务——证券,他一无所知,因此完全不了解行情。

会谈笼罩在一片失望之情中。谈话者渐渐开始讨论各种可能的处理公司的方式。三人首先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公司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公司卖掉,而不是破产。接下来的几天内,三人一致同意,理查德·惠特尼必须为他的公司找个买家,并想方设法把被他们巧妙地称为“不活跃资产”的蒸馏酒公司股票转化为现金。

没有人提到退休补助基金事件。

感恩节后的第一天,乔治·惠特尼对他的合伙人拉蒙特说,他认为理查德不再“有能力将业务处理得当”,因此他“要帮助弟弟把他的业务处理好”。“好的,我想这是件好事。”拉蒙特这样回答,语气中带着摩根式的轻描淡写。那个周末,乔治·惠特尼和拉蒙特都离开纽约前往南方,他们将在那里度过计划已久的假期。至于西蒙斯,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惠特尼挪用了退休补助基金的资产,他后来说,他当时一点也没有怀疑理查德·惠特尼的正直。12月,他与惠特尼在证交所的午餐俱乐部见了几次面,其间,他问惠特尼清算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惠特尼缓慢地回答说,他找到了一两个有意接手蒸馏酒公司股票、甚至接管整个公司的团体。事实上,清算计划根本没有进行,没有人想要这些股票和这家公司,惠特尼继续疯狂地支撑着蒸馏酒公司的股票,为此,他必须借更多的钱。就在圣诞节前夕,阿德勒又借给了他10万美元,这次,他在一周后准时归还了这笔钱。但是,他在向态度较为强硬的亚伯拉罕借10万美元时,亚伯拉罕只答应给他1.5万美元——这几乎是对惠特尼的侮辱,然而他还是接受了。1938年1月3日,惠特尼向从南方回来的乔治汇报说,清算谈判都“失败了”。

同时,理查德·惠特尼的白衣骑士生涯走到了堂吉珂德式的最后阶

段。由于个人已经身败名裂，因此，在公众生涯的最后一幕，他要做一个绝对坚守原则的人。到感恩节那天，盖伊判定，证交所能做的唯有优雅地向道格拉斯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投降，并彻底改革。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华盛顿就会“接管”证交所——就像道格拉斯所警告的一样。1937年12月初，经过证交所管理者的勉强同意，盖伊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以便为证交所的重组提供建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不是证交所成员，其主席是大陆制罐公司董事长卡尔·C. 康威(Carle C. Conway)，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中还包括新政拥护者小A·A. 伯利(A. A. Berle, Jr.)。这几乎是正式承认证交所失败了。人们都明白，康威委员会将会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愿为证交所的重组提供建议，人们也都认为证交所会接受建议。惠特尼的法律委员会固执地反对康威委员会的存在，也反对康威委员会不拘一格的组成结构，但是它的反对徒劳无功。私下里，证交所的领导层可能多半仍然站在惠特尼一边，但是他们却都为了私利而倒戈相向；惠特尼几乎是唯一继续坚持原则的人。1938年1月1日，康威委员会开始写报告。27日，报告发表了，这份报告完全符合道格拉斯最初的愿望——领取薪金的总裁、技术人员、非会员管理者、提高自由主义者在证交所内的影响力。盖伊立刻完全同意了这份报告，道格拉斯也对此大加赞赏。为了强调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和谐融洽的新气象，最新任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摩根崇拜者约翰·韦斯利·海恩斯。有趣的是，他因此成为了继约瑟夫·肯尼迪之后第一位参与新政、跻身国内最高统治阶层的真正华尔街人。

长期的战争终于就要结束了；到了交换人质的时候了。但是，惠特尼仍然继续坚持原则。1月31日，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康威委员会的报告。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观点是立刻无条件接受。只有地位已经降得很低的惠特尼及其追随者表示反对，他们坚称只应大体上接受这份报告，而其中的条款还需逐条修改。惠特尼非常雄辩，以至于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就要赢了。但是，盖伊从总裁演讲台上走到管理者席位中间，以强调他说过的话，他激动地倡议证交所停止操纵股票和见风使舵，有风度地接受必然会发生的一切。

与会者全票同意接受报告——除了一票反对。事实上，这是惠特尼作为证交所管理者的最后一票。

二

1月份是乔治·惠特尼最后一次插手弟弟的事，这次，他试图亲自处理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清算事宜，但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如果成功的话，他日后将麻烦缠身，因为他的弟弟并没有告诉他那家公司已经破产。但是，他没有成功。那时，他的主要想法是，能够拯救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公司——摩根公司“可能会想法”接受蒸馏酒公司股票为抵押品，向惠特尼公司提供一笔新的贷款，让惠特尼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吸引潜在的收购者。如果作为一项严格的商业建议来看，这一做法有一个大障碍：惠特尼公司在黑暗的1931年向摩根公司借的50万美元中仍有差不多2.6万美元没有还清。但是，乔治·惠特尼顽固地，可能还有些羞怯地请摩根合伙人中最擅长普通股的弗朗西斯·巴托(Francis Bartow)查看蒸馏酒公司的卷宗，以确定这些股票是否能够作为新贷款的抵押品。

巴托有他自己的担忧。深入了解了蒸馏酒公司的事情之后，他发现这家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大约55万加仑的新泽西闪电酒(巴托优雅地称之为“白兰地”)以及100万加仑的苹果酒。他后来说道，他问自己：“谁能确定这么多酒可以在6个月或者1年内卖出去？”也许有人能够确定，但是巴托不能，他咨询的另外两个合伙人也不能。这样，新贷款的事就被搁置了，惠特尼公司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同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惠特尼公司财政紧张的传言最终传到了最危险的地方——证交所，导致了一连串无情事件的发生。感恩节过后，西蒙斯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惠特尼拖欠退休补助基金资产的事告诉证交所的纪律机构——商业行为委员会，他为此备受良心折磨。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既然惠特尼已经交还了资产，如今一切都两清了，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说闲话了。现在，一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故事中的人物再次现身了：“卖了吧本”(本·史密斯)，这位脖子短粗、在1930年和1931年的熊市上大吼大叫的投机者、集合基金操纵者、公众眼中的大恶人。12月中旬，盖伊总裁私下里邀请史密斯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进午餐。当时的史密斯已是一位实力雄厚、受人尊敬的证交所成员。盖伊在用餐时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问史密斯，他认为怎样才能改善公众对证交所的看法。

对于史密斯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他们两人后来的叙述不尽相同。史密斯说：“我告诉他我认为只要保守派还在，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提到了惠特尼，我告诉他，越早摆脱惠特尼，对证交所就越好；我觉得惠特尼应该对证交所今天的不光彩负很大的责任。他想知道我为什么反对惠特尼，我……说他破产了，在华尔街欠了一屁股债，我认为让他做证交所的管理者是不适合的。”盖伊后来证实了史密斯的说法，但是他坚决否认史密斯曾说过惠特尼“破产”。他还指出，史密斯在用餐时的言行表明，他对惠特尼抱有一种敌对、尖刻和愤怒的态度。

也许确实如此，一个是白手起家的爱尔兰人，一个是傲慢的贵族，华尔街这个严酷的小社会以及美国这个严酷的大社会让他们两人完全有理由相互对立。1931年和1932年，惠特尼大力维护华盛顿的卖空行为，归根结底，这可以说是在维护史密斯，即便惠特尼不是有意为之。自那以后，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在证交所的交易厅或是两人共处的这个小世界的其他什么地方，贵族曾经表现出了某种无礼的轻慢，而爱尔兰人则表现出了某种不得体的粗鲁。不管怎么样，由于史密斯对惠特尼的明显敌意，盖伊对他的许多话表示怀疑。这次午餐后的一个月，他没有费力去调查惠特尼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是，当有关这家公司财务状况的消息传来时，他仍然保持着警觉。

生活能够轻而易举地制造假象，而艺术却很难。真正起作用的传言其实完全是假的。1月中旬的一天，证交所灰狗汽车公司股票专家会员商约翰·B. 谢特拉(John B. Shetlar)注意到，有人正对灰狗汽车公司股票进行所谓的“廉价抛售”。“有人在分批抛售，每批500股”，他后来回忆道，“一批接一批持续不断”；而且，抛售者是许多不同的经纪人，他们“不顾市场价格，急着往外抛售”。谢特拉没有证据，只能依靠专家会员商必备的市场操纵第六感，得出了如下结论：廉价抛售是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发起的（虽然操作者是众多经纪人），这表明该公司遇到了大麻烦。实际上，后来的调查显示，1月中旬惠特尼公司本身没有抛售过1股灰狗汽车公司股票，也没有代表客户抛售过灰狗公司股票。

一旦得知某家成员公司遇到了麻烦，谢特拉作为证交所的成员，就有不容推卸的义务通知当权者。他尽忠职守地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他找到证交所的管理者、惠特尼的密友惠灵顿公爵。他把廉价抛售的事以及他



认定的发起者告诉了惠灵顿。惠灵顿点了点头，回答道：“我会处理这件事的。”惠灵顿立刻找到了合适的人——霍兰德·S·戴维斯(Howland S. Davis)，商业行为委员会的主席，把他听到的事说了出来，并请求说，不论戴维斯认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要泄露惠灵顿是告密者的事实，因为惠灵顿和惠特尼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戴维斯表示同意。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惠灵顿和戴维斯谈话的地点是证交所的交易厅，他还没有离开就接到消息说惠特尼想见他。见面后，惠特尼要求惠灵顿给他一笔2.5万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前一年的11月，惠灵顿曾拒绝这位老友10万美元的借款要求，因为他想起自己等了许多年才等到惠特尼还清第一笔欠款。现在，又听了谢特拉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

商业行为委员会的主席采取了行动。从家世背景来看，霍兰德·戴维斯有可能成为一个保守派人士。他的父亲是个老派的、有绅士风度的经纪人，他成长在默里山(Murray Hill)的一幢房屋中，就在J. P. 摩根所住的麦迪逊大街的对面，他曾经参加过摩根的女儿们进入社交界的舞会；作为一名经纪人，他总是被人认为是“摩根人”，因为他和几位摩根合伙人有交往，但实际上，从业务上来看，华尔街23号从来都不青睐他的公司。戴维斯在少年时代曾见过同是少年的乔治·惠特尼和理查德·惠特尼，当时他对这两个人没有好感。正如他多年以后说的一样，他发现这两个少年“非常势利”，他把他们视作“眼中钉”。然而，很久以后，戴维斯成了证交所的管理者，因而与理查德·惠特尼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他对这位弟弟的看法有了改变，甚至开始小心翼翼地喜欢他了，尽管两人的关系一直不太密切。在华尔街的政治方面，戴维斯从来都不属于保守派，尽管他所接触的人都是，但他也不是改革者；作为中立派人士，他没有卷入1935年的证交所斗争。现在，从惠灵顿那里听到了谢特拉的报告后，他看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压力下，证交所最近实施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向所有成员公司下发问卷，以便随时了解它们的财务状况。根据这一新的程序，第一批问卷表恰巧将在几天后的1月20日寄出；按照正常的计划，惠特尼公司将在5月中旬收到第一份问卷表，并于5月底之前给出答复。但现在，戴维斯下令将惠特尼公司提到最前面，立即把问卷表寄给该公司，并要求它在2月15日之前给出答复。他觉得，这样可以弄清楚情况；而且，既然成员公司大多并不知道证交所寄发表格的安排，那么，提前给惠特尼公司寄问卷表就不显得那么特别，因而不会让惠特尼察觉到自己已经被怀

疑了。

这样，错误的气息引领猎犬找到了正确的踪迹。惠特尼收到了他的问卷。2月15日，本应寄还问卷的日子，他要求延期一周，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2月21日，他寄还了问卷；当天晚上，证交所的审计员快速查看了问卷。惠特尼寄还的问卷尽管比感恩节那天给他哥哥看的账目要详细得多，但同样也弄虚作假地隐瞒了一些事实。即便如此，审计员的初步分析仍然显示，这家公司的资本情况远远达不到商业行为委员会的要求。因此，根据惯例，委员会采取了第二步行动：2月23日，证交所的一位会计被派往位于布罗德街15号的惠特尼公司，去审核这家公司的账册。

这些账册本身同样也有弄虚作假的地方，只是还不到位。意识到这一点后，惠特尼在2月24日登门造访了戴维斯在上城区的寓所，要求戴维斯多给他些时间。他说，他知道他的资本情况不符合要求，他很不明智地把资产集中投在了某些证券上，云云。他还解释说，他正积极筹措一笔大约70万美元的贷款，这将能填补他所有的亏空；他的公司名声很好，他十分不希望证交所记录下公司哪怕一点点的负面情况。为此，他问委员会能不能召回派往他公司的会计，等过几周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再回来。

这个曾经视惠特尼为眼中钉、后来又渐渐喜欢上他的人回答说，他觉得让会计继续正常工作是可行的。

到2月28日，在开始调查惠特尼公司账册的5天后，那位证交所会计掌握了大量说明惠特尼挪用客户证券的证据，但是他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3月1日，戴维斯把当时的发现告诉了盖伊。第二天晚上，盖伊、戴维斯、西蒙斯以及证交所的律师在大都会俱乐部会见了惠特尼的私人律师L. 伦道夫·梅森(L. Randolph Mason)，众人详细讨论了整件事。他们巧妙地警告梅森说，他们非常怀疑惠特尼的账册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他们会和他联系的。第二天，周四，惠特尼再次试图说服戴维斯召回他的猎犬，但仍然没有成功。周五，猎犬发现了尸体。证交所的审计员向上级报告说，他已经掌握确切的证据证实理查德·惠特尼挪用了他人资产，他的公司已经破产。

3月5日，周六的早上，审计员亲自向惠特尼提出了他所发现的证据。这位审计员后来说，惠特尼“默认了”他滥用客户证券的事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惠特尼并没有放弃。那天下午，他在盖伊的办公室里呆了2个小时，亮出了他的底牌。他对自己的胡作非为供认不讳，还要求盖伊给予他特殊



照顾——具体来说就是，证交所默许他出售自己的成员席位，随后撤销对他的指控。盖伊很想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理由。惠特尼于是出击了。“我毕竟是理查德·惠特尼，”他说，“在上百万人的眼中，我就是证交所。”因此，任何伤害到他的事情也会伤害到证交所以及华尔街。他破产的事被曝光无法避免，但是如果他挪用他人资产的事被曝光，那么人们对股票交易将不再信任，这将意味着华盛顿改革势力的胜利，将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带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好运……

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惠特尼对此强调又强调；在2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提到这个论点。“我不觉得惠特尼先生是在请求什么，”盖伊后来叙述道，“他更多的是在说理，就好像他谈论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确实如此：白衣骑士正在谈论小偷。可以想象，查尔斯·盖伊很受诱惑。他骨子里有着白手起家的人的保守性格，他欣赏华尔街保守派平易、慵懒的优雅举止，为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一辈子像个苦役般地工作。现在，他当然和惠特尼一样不希望看到保守派以及保守派的时代随着惠特尼一同毁灭。如果同意惠特尼悄悄辞职，宣称他不再打算涉足债券业务，而将从事其他的工作，那么至少，他挪用证券的事很可能就不会曝光，短暂的流言蜚语过后，整件事很可能被淡忘，一切都会恢复过去的秩序。而如果不这样的话……

但是，盖伊同时也是个非常诚实负责的人。诚惶诚恐的道德心战胜了他那维护自己早已接受和欣赏的世界的愿望。他一次又一次坚决地告诉惠特尼，他们将继续拟定对他的指控和要求，并将按计划在周一早上把拟定的材料和证据一同交给商业行为委员会。

三

这个周六之前的2个月内，惠特尼为了维持他的生活，也可能是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方式，最后一次疯狂地四处借钱，其详情为他的故事，也为借贷史增添了一些奇特的注释。借款要求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拒绝，他也渐渐学会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接受拒绝。“乔治呢？”当他提出借钱时，人们会直截了当地这么问他。“我哥哥不在城里，如果他在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他傲慢地回答道。“嗯，我很抱歉……”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

话,此时,他就会转身离开。1月,饱受折磨、一直对他敬畏有加的保罗·阿德勒也拒绝了他;阿德勒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偶像在自己面前倒塌,他在证交所的信纸上写道:“理查德,我很抱歉,我们已经决定现在不借钱给任何人,非常抱歉。真诚的保罗。”2月中旬,惠特尼找到约翰·H. 麦克曼奴(John H. McMannus),一位远在他交际圈之外的专家会员商。惠特尼向他借10万美元。麦克曼奴吃惊地停顿了片刻,随后表示如果惠特尼的借据有乔治的背书,那么他就把钱借给他。但是,惠特尼提供的是他妻子的背书。“她的身价有50万美元。”他厚颜无耻地说。麦克曼奴说他从不接受女人的背书。惠特尼点了点头。“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他转身离开时很随意地说道。麦克曼奴后来表示,这是他商业生涯中最令他惊讶的一件事:“我以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精英。我非常震惊,怎么也想不明白。”麦克曼奴直到后来才意识到,如果他想明白了,他就会发现他根本没有10万美元可借。

2月底,惠特尼找到西德尼·温伯格。那时,温伯格已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而且即将成为战后早期的“华尔街先生”。惠特尼向他借5万美元,而唯一的麻烦是惠特尼似乎认为这位绅士的名字是温斯坦(Weinstein)。

然而,同时更令人惊讶的是,惠特尼也有几次成功的奇遇。2月中旬,惠特尼开口向证交所成员亚历山大·B. 盖尔(Alexander B. Gale)借钱,像往常一样,这次的金额也是10万美元。盖尔说他只能借7.5万美元,并且当即就给了他一张7.5万美元的支票。然而,惠特尼却厚着脸皮给了盖尔一张10万美元的借据。盖尔因此觉得自己是个吝啬鬼,为了让借据上的数字与事实相符,他又给惠特尼送去了2.5万美元。大致在同一时间,惠特尼又向一位名叫沃尔特·T. 罗森(Walter T. Rosen)的人借钱,金额和他惯常借的一样,而且和往常一样,没有抵押品。罗森把钱交给了他,同时还说了几句中听的奉承话:“老摩根先生的态度一直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借钱者的个人品质远比他的抵押品重要。”“‘摩根先生完全正确。’这位摩根经纪人在接过支票时态度自若地承认道。

惠特尼的最后两次借款是值得纪念的。3月1日,向盖伊摊牌的那个周六的4天前,他找到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mpany)的两名合伙人耐特·沃利(Knight Woolley)以及尚未开始外交生涯的W. 艾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按照惯例向他们



借 10 万美元。沃利和哈里曼与老摩根先生不同，尽管他们属于一家同样著名、气派的公司，但是他们不愿意没有抵押就把钱借出去。惠特尼承诺几天内就把抵押品交给他们，因此当场就拿到了钱。不知何故，沃利和哈里曼一直没有拿到抵押品。同一天，惠特尼又向一个身体虚弱的老朋友借了 2.5 万美元。这位老朋友贯穿着我们这个动荡的故事，他就是普伦蒂斯上校，1920 年艾伦·赖安和证交所纠纷案中那位机敏的调停者。18 天后，普伦蒂斯上校去世了，至死也没有等到惠特尼的还款。

1 月底，惠特尼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金额最大的一次挪用。26 日，他 不加解释地让公司出纳罗伯特·J. 罗森塔尔(Robert J. Rosenthal)拿给他一大叠证券，这些证券都属于公司的众多客户，其中包括他岳父的地产债券，总价值约 80 万美元。两天后，他将这些证券带至公共国家银行，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资产抵押给银行，换取了 28 万美元的贷款。

让我们大致计算一下惠特尼在 1938 年 3 月第一个星期内令人震惊的真实财务状况。前 4 个月中，他总共谈下了 111 笔贷款，总金额为 2 736.15 万美元；其中，超过 2 500 万美元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多少都有健全的抵押担保，旧的贷款到期时，惠特尼就用新的贷款来还，抵押品因而常常被接连使用。除此以外，他还欠乔治·惠特尼 289.7 万美元，欠 J. P. 摩根公司 47.4 万美元，欠其他人大约整整 100 万美元，这些欠款全都没有担保。他借入的股票价值约 39 万美元。这样，不算他挪用的客户资产，他的借款净额就远远超过了 500 万美元，而他所依靠的只有或者说几乎只有他的品质 and 好名声。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中，他在证交所交易厅中找过许多不认识的人，以便得近乎冷漠的口吻，请求他们借给他标准的 10 万美元。他做过的一件事表明，他终于疯了。周四，他找到了本·史密斯——那是疯狂的一周，最终以周六下午的那场对峙为结束。他没有虚情假意地去讨好史密斯，只是唐突地宣称他“想尽快结束这件事”，就好像他的任务是义正词严地训斥下属。随后，他说，他想凭他这张脸借 25 万美元。史密斯的回答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令人吃惊，也不算太过粗鲁。“我说他高估了他那张脸的价值，”史密斯后来叙述道，“于是他把他的事情告诉了我，还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必须弄到 25 万美元。我对他说，他连时间都没跟我约好，就跑来问我借 25 万美元，他可真有勇气。我告诉他，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不会借给他一毛钱。”惠特尼点了点头，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除了毫不留情的拒绝之外，他还想从本·史密斯那里得到什么呢？这难道是投降的礼节，是落败的狼把自己的脖子送到征服者的獠牙之下？不可能是这样；就我们所知，在那个周四，惠特尼绝没有准备投降。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他承受侮辱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对侮辱已经无动于衷了；他非常看不起这个暴发户，以至于史密斯的恶言相向不能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去找史密斯只是因为他不会损失什么；就像史密斯所说的，他很有勇气，非常有勇气，至少这种勇气不会枯竭。

四

弗朗西斯·巴托是 J. P. 摩根在证交所里的人，拉蒙特和乔治·惠特尼不在时，他就是公司的责任合伙人。拉蒙特在结束了南方之旅后，又去了国外，而 1937 年就病魔缠身的乔治·惠特尼在 1938 年初又回到南方继续他的长期疗养。那么，就让巴托以其在戏剧方面的天赋，告诉我们惠特尼最后一次试图说服盖伊撤诉后的那个周六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吧：

3 月 5 日下午，我正在纽约的沙丘俱乐部与几个朋友玩桥牌，理查德·惠特尼打电话找我。他说他想尽快见我。我解释给他听我在哪里，并且建议他顺便到俱乐部来找我。他说他会的。

过了一些时候，他出现了，我们一起坐下来说话。这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张折叠着的纸，随后把纸打开。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说：“等等，你现在跟我谈话是想借钱吗？”他说：“是的。”“好吧，”我说，“坦白地说，我不会借的。”我想我那时对他有点不耐烦，因为我猜想他一定知道我已经和伦道夫·梅森谈过他的事了，但还没有拿到梅森答应给我的审计报告及其他信息。他说：“星期一 10:30，商业行为委员会将审查我的事情。”我说：“等等，就此打住。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事。我建议你去找伦道夫·梅森，把这事告诉他。”

他把纸折起来离开了。我继续和朋友玩桥牌。我记得他临走时我对他说：“如果你想找我的话，我会在这儿多呆一会。”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人来告诉我理查德·惠特尼在楼下，他有话要对我说。我一空下来就去了那里。他和伦道夫·梅森在一起。他说：“弗朗西斯，我们已经详细谈过这件事了，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没什么建议。”

“好吧，”他说，“星期一商业行为委员会就要审查我的事情了，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我说：“你说的令人尴尬指什么？”

“是这样，”他说，“举个例子说，纽约游艇俱乐部的证券在我这儿，我把这些证券拿去作贷款的抵押品了。”

我说：“纽约游艇俱乐部欠你多少钱？”

他说：“他们不欠我钱。”

我说：“你的意思是你把客户的证券拿去作贷款抵押，并把获得的贷款据为己有、用于你自己的公司，而你的客户却不欠你什么？”

他说：“是的。”

我说：“这就严重了。”

他说：“这是犯法的。”

我问道：“这样的事还有吗？”

他说：“还有两件；一件是谢尔登的地产，我是遗嘱执行人；还有一件是贝尔德(Baird)太太的证券。”

我说：“理查德，现在，这和你最初跟我谈的事情的性质完全不同了，我不再和你深入谈下去了。我现在要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

一个人听到朋友和业务伙伴向他坦白说自己卷入了违法事件，而仅仅回答说他要给律师打电话，这是不是有点奇怪？怪也不怪。记住，当时公共舆论对华尔街的影响还很大，惠特尼是华尔街上最受关注的人物，摩根公司则是最受关注的公司，摩根合伙人私下里了解一起违法行为，这很可能让人觉得摩根公司是同谋。巴托给摩根的律师打了电话，这位律师正是前总统候选人约翰·W. 戴维斯。两人约定晚上在戴维斯在长岛峡谷海湾的家中见面。然后，他回到惠特尼和梅森的身边，三人在沙丘俱乐部匆匆共进晚餐。在用餐前或用餐的过程中，惠特尼对巴托说：“我想给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我在公共国家银行贷了一笔 28 万美元的款。这笔贷款的抵押品都是我从公司账户上非法挪用的证券，其中有游艇俱乐部、谢尔登和贝尔德的证券。如果我能借到 28 万美元来还清贷款，我就能归还所有被非法挪用的证券，这样，星期一早上面对商业行为委员会的时候，我就能如实地告诉他们我的公司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了。”

巴托没有马上回答。作为一个谨慎的人，他要先咨询一下律师。晚餐



过后，他和梅森立即告别惠特尼离开了沙丘俱乐部，两人驱车一个小时前往峡谷海湾去见约翰·W. 戴维斯。在了解了事情以后，戴维斯毫不犹豫地，现在没有人能够、也不应该帮助惠特尼。“帮助他的人很可能会有被误解的危险。”戴维斯委婉地说道。

“好的，戴维斯先生，”巴托说，“我接受你对这件事的建议和忠告。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你。”还有一个问题：打电话给盖伊，请他把商业行为委员会审查惠特尼一案的日子推迟一天甚至两天，这样做是否合适？

戴维斯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于是，巴托和梅森匆忙赶回了纽约，这次，他们当即准备午夜在大都会俱乐部与盖伊会面。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盖伊，当时，盖伊正和证交所的一名律师在一起。听了巴托的请求后，盖伊坚决地回答说，定在周一早上召开的会议一分钟也不能推迟。事情看来没有回旋余地了。巴托和梅森回到沙丘俱乐部，把这个残酷的消息告诉了闷闷不乐的理查德·惠特尼。

周日更是一片混乱。巴托继续写道：

我很早就打电话给我的合伙人安德森先生，同时还打电话到另一位合伙人查尔斯·迪奇(Charles Dickey)在费城的家中，我把前一天的事大致告诉了他们，请他们下午14:30到我在纽约的家中碰头，他们答应了。随后，我往高级合伙人J. P. 摩根先生在峡谷海湾的住所打电话，与他约好12:00见面。接着，我又给伦道夫·梅森打电话，告诉他下午在我家将会有一次碰头，问他是否愿意过来。我还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罗德瓦尔德先生也过来，因为我想直接从他那里了解他认为审计需要多长时间。

梅森先生说他会过来，如果可能的话，他还会安排罗德瓦尔德先生过来。

随后，我坐车前往峡谷海湾。我来到摩根先生的住所，告诉他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从约翰·W. 戴维斯那里听来的建议以及戴维斯先生得出的结论。很自然，摩根先生极度震惊，并提出，除了遵守律师给的建议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这也是我的看法。

(但是，根据J. P. 摩根对事情的了解程度，他怎么可能真的如此震惊呢？这位老绅士会不会是在他的次级合伙人面前装假呢？)

之后我就起身回到城里的家中。安德森先生和迪奇先生在星期日下午来到我家，我们坐了下来，我把我能回忆起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他们。

随后，我打电话给约翰·W. 戴维斯先生的合伙人桑德兰(Sunderland)先生，问他是否愿意到我家来。他来了。梅森先生大约也在那个时候到了。过了一会儿，罗德瓦尔德先生也来了。我问罗德瓦尔德先生，据他判断，高级会计进行一次彻底审计需要多长时间。他含糊其辞，让我觉得要比我假设的时间长得多，这令我非常失望……

桑德兰先生到达之后，我把我做过的些什么和计划做些什么告诉了他。我问他，他觉得我这么做合适与否、正确与否。他说：“你和J.P. 摩根公司的任何人绝不能为了查清事实而踏入理查德·惠特尼公司。”

接着，我对罗德瓦尔德先生说我要问他的已经问完了，我们不再需要他了。我猜他一定很忙，他立即离开我家做自己的事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一个接一个地对他们说，我很抱歉把他们(安德森、迪奇和梅森)从家中叫到我这儿来。我猜他们从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了……

下午晚些时候，我觉得必须要给我的合伙人乔治·惠特尼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于是我拿起电话，和远在佛罗里达的他通上了话。我尽可能谨慎，也尽可能全面地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

乔治·惠特尼先生说：“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确实，除此以外，乔治·惠特尼没什么别的可说了，也没什么别的可做了。

于是，周一，证交所的公正之轮开始转向。那天早上，商业行为委员会准时召开了会议。听取了证据之后，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立即向管理委员会递交对惠特尼及其两名在证交所拥有成员资格的合伙人小埃德温·D. 摩根(Edwin D. Morgan, Jr.)和亨利·D. 米盖特(Henry D. Mygatt)的控状，让管理委员会对他们采取行动。当天下午很早，管理委员会仔细考虑了控告，并一致投票决定向三名合伙人宣读控状，按照惯例，三人有10天的时间准备答辩，10天结束后，即3月17日，将举行一次听证会。当天，控状被宣读给了惠特尼、摩根和米盖特。当晚，盖伊通过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华盛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同时，这件事并没有公之于众，也没有透露给媒体，这一点令人颇为吃惊。惠特尼的其他合伙人都忧心忡忡，疯狂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惠特尼的东窗事发对华尔街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周一一大早，乔治·惠特尼就从佛罗里达打回电话找巴托。他说，他对自己不在纽约而深感不安；他是不是应该立刻回去？巴托劝他不要这么做，提醒说他的病还



没有完全康复，并且指出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上午晚些时候，巴托在再次得到约翰·W. 戴维斯的许可后，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拜访了罗兰·雷德蒙。雷德蒙是证交所的律师，可能也是惠特尼最好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有谁有能力在这件事中做些什么？”巴托问道。雷德蒙回答说：“完全没有。我一个也不知道。”可怜的雷德蒙显然非常痛苦；他是证交所的律师，对他的朋友拟定控状是他的职责，前一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泪流满面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巴托后来说道，“那天下午，伦道夫·梅森打电话给我，说晚上想见见我。他说他可能会晚一点，问我愿不愿意在家里等他，我说我愿意。那天晚上，他的确来了，但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来，因为我觉得他的来访毫无意义。他只告诉我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准备与第二天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破产事宜相关的文件。我们只聊了很短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梅森来到巴托家的原因非常清楚——他是为了哀悼。

五

约翰·韦斯利·海恩斯带着复杂的心情成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惠特尼一案中的联络员。周一晚上，道格拉斯主席在听了盖伊的报告后立即决定让海恩斯承担这一职务，并在午夜前一刻打电话给他让他接受安排。

海恩斯连夜坐火车赶到纽约，途中，他考虑了很多，几乎没睡觉。“我的首要担心是公众在这起破产事件中的参与度，”他后来说道，“我们无法在华盛顿了解这件案子牵涉到多少公众利益。我来纽约是为了弄明白我们无法在华盛顿了解的事实。”有人后来坚持说他还有另外一大担忧：海恩斯绝对不是眼红这位摩根经纪人的获利，无疑，和他所崇拜的华尔街23号里的朋友一样，他担心的是整个华尔街，尤其是J. P. 摩根公司的好名声。那天上午，华尔街有传言说，海恩斯来到纽约有一个特别任务，即以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名义建议推后将这一灾难公之于众，以便为取得某种和解做最后的努力。该传言其实是那些顽固的惠特尼余党传播的。不管海恩斯意欲如何——他后来否认他有挽回的意图，他在9:45，证交所开市前15分钟到达华尔街时发现，事情已经完全无法逆转了。他发现，那里到处都是有

关惠特尼的传言,这些传言甚至可能比事实还要糟糕。从华尔街的公共形象来考虑,不发表声明是最糟糕的做法。海恩斯因此建议证交所当局按计划发表声明。不管怎么样,那时证交所已经计划发表声明了。之前的9:00点,商业行为委员会在霍兰德·戴维斯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委员席前的地毯上站着惠特尼的代表人梅森以及惠特尼的2名合伙人。戴维斯宣布会议开始,他说:“先生们,我想委员会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从现在到10:00,我们必须决定理查德·惠特尼公司今日是否正常交易。”

梅森说:“我们不了解全部的数据……我不得不说公司无力偿还债务。”

委员会主席随后问惠特尼的合伙人金斯利·罗德瓦尔德有什么要说的。和所有惠特尼的合伙人一样,他也感到迷惑不解,多年来,他对惠特尼挪用资产、甚至公司危急的财务状况一无所知。罗德瓦尔德回答说没有。

“你的公司能否还清债务?”主席询问。

“不能,先生。”罗德瓦尔德回答道。

这样,公司的破产就被确定了下来;现在,根据证交所自己的法规,它别无选择了。10:05,刚刚开市后不久,盖伊就走上了俯瞰交易厅的演讲台;秘书敲响铜锣,交易暂停了;交易厅里的嘈杂声渐渐平息,变成了死一般的静寂;盖伊宣布惠特尼公司因破产而停止交易。之后,证交所立即发表了一份声明,清楚地表示,这次浩劫中存在着不道德行为:

在调查理查德·惠特尼公司事件的过程中,商业行为委员会在1938年3月1日发现了其明显违反公正公平交易原则的行为。商业行为委员会在1938年3月7日,周一,下午13:30,向管理委员会特别会议提交了控告和详细情况。听证会定于1938年3月17日举行。今天上午,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告知证交所,它无法还清债务。现在,证交所宣布该公司因破产而停止交易。

随着战士的倒下,保守派失败了。

世界
经典译丛

资本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十二章 结 局

一

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惠特尼偷了债券。”《纽约每日新闻》在头版头条中尖叫。3月8日，周二，也就是证交所发布首个通告的日子，惠特尼和他的合伙人出具了破产文件。纽约州和地方当局大为惊讶，急忙准备起诉状。惠特尼在证交所匆忙召集的听证会上作证。他表现得坦率自若而不拘礼节。在回答一个他认为毫无意义的问题时，他决心要表现得随便而率性，他答道：“长官，你的问题不三不四。”

第二天，他做了件算不上很有面子的事——为他无辜的合伙人开脱责任。首先，正如摩根公司的科克伦几年前指出的，他们算不上是真正的合伙人。除了埃德温·摩根，一个和蔼的打猎能手、波斯廉俱乐部的会员以外，他们既不属于惠特尼的社会阶层，也不属于所谓的金融阶层，在他的公司里也没有金融投资。他们只是“办公室勤杂工”式的合伙人。科克伦曾说，他们是利益伙伴而非共担责任的合作者。他们之中确实有一个是从公司勤杂工干起的，而另外一人的妻子，场外交易所的电话接线员，直到现在还坚持说，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她的丈夫都不是合伙人，而只是一个雇员。其次，惠特尼早就别有用心地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控制账户”，目的

就是对合伙人隐瞒其盗用公款的事实和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只有惠特尼的会计和私人秘书才知道这个账户。他们两人都很清楚,要想保住饭碗,就必须保持沉默。

在一份由他新近聘用的刑事律师查尔斯·H. 塔特尔(Charles H. Tuttle, 共和党前纽约州州长候选人)所发布的声明中,惠特尼说:“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公司所遇到的困境负全责,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合伙人、业务助理或相关人员牵涉其中,或要为此负责……我充分认识到,我的某些行为是错误的,我决定承担后果……因此我接受正在调查此事的州检察长的处置,并将向他提供完整的说明。”

纽约县十区检察官托马斯·E. 杜威(Thomas E. Dewey)周四的指控让全国都大吃一惊。他列举了惠特尼在1932年、1937年和1938年1月挪用谢尔登地产的行径。当鲍威利区的流浪汉们困惑或嬉笑地在一边看热闹时,惠特尼正在伊丽莎白街的警署里做笔录。警官说:“惠特尼先生,看到你有麻烦我非常抱歉。祝你好运。”“谢谢。”惠特尼回答道,两人还握了握手。意外遇见名人而又能随便扯上几句,这让这位警官既高兴又局促。随后,在10分钟的刑事诉讼中,书记员将惠特尼叫到被告席上,向他宣读了起诉书,他被以1万美元保释。惠特尼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双手后背,微微低着头,脸上毫无表情,他的波斯廉金猪从深蓝色西装背心前的表链上炫耀般地垂下来。随后,他欣然摆姿势给记者拍照,只是要求他们别把他的妻子拍进去。

第二天,纳粹占领了奥地利,有预言说战争即将爆发。此时,惠特尼又被带到法庭上,这一次是因为州检察长接到了纽约游艇俱乐部会长对背信弃义的财务主管的严厉指控。这次的审讯在刑事法院大楼里进行,保释金是2.5万美元。但是同样,被告仍然冷静恬淡、无动于衷,波斯廉的徽章仍然炫耀夺目。地方法官托马斯·A. 奥雷利奥(Thomas A. Aurelio)收下保释金后大着胆子讨好地说:“据我的愚见,即使是在这样艰难的时期,挣钱也比管钱容易。我想大家都是这样。”法官等着回音,而惠特尼却一声不吭,他照样佩戴着他的金猪,照样摆出一副怠慢的姿态。



二

同时，社会各阶层都有了反应。纽约老派社交圈长期以来一直和保守党走得很近，又因为新派咖啡馆社交界人士的加入而有所削弱，现在，他们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南希·伦道夫(Nancy Randolph)在《纽约每日新闻》上写道：“这样的社会大崩溃，我们的时代没有过，我们父亲的时代没有过，我们祖父的时代也没有过……他没有必要过分地攫取权力、金钱和社会地位，这些他都拥有！”可以说这正是社会各界的看法！

华尔街上上下下都异常震惊，陷入了暂时性的神经错乱。不仅是喜欢和信任惠特尼的大人物如此，就连那些对他既怨恨又信任、又有所依赖的小人物也是如此。股市对这可怕的真相揭露也有很大的反应，事实上，大部分经纪人当天都泡在午餐俱乐部的酒吧里议论这件事。

惠特尼的俱乐部里却是一片怪异、死气沉沉的安静。公开谈论这场灾难的滋味并不好受，可是还有别的事可以谈论吗？

真相被揭露的那天或不久之后，哈利·西蒙斯说：“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对此无法理解……惠特尼竟然会做这种事，绝对不可能。”惠灵顿公爵则只是说：“他没想到”惠特尼会这么做。罗兰·雷德蒙说：“我原本认为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刚正不阿的。”惠特尼的一个形影不离的老朋友罗杰·D. 梅利克说：“据我所知，没有比他更正直的人了。”约翰·麦克曼奴认为惠特尼是集世界上所有优良品质于一身的人，那些地位在惠特尼之下的人一再对此表示赞同。就连惠特尼的私人出纳罗伯特·罗森塔尔也对发生在他鼻子底下的事视而不见，他动情地说：“我无法相信，如坠云雾。真的，因为我从没怀疑过惠特尼。他是一个我从不怀疑的人，一个我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人。我心目中的他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些人都各怀私心，而且，由于借给惠特尼的钱成了坏账，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滑稽。即便是这样，难道会有人曲解他们那悲观、心碎的真诚吗？

到3月17日，缓过劲来的证交所管理委员会按照原计划举行了听证会。惠特尼没有出席，也没有递交辩词。委员会一致决定把惠特尼逐出证交所，并对其不幸的合伙人摩根和米盖特处以停职三年的处分。

那些厌倦了大萧条、恨不得喝了富翁们的血的国民，又迎来了一个比皮科拉听证会更轰动的时刻。《国家》杂志写道：“只有 J. P. 摩根被抓住从圣约翰大教堂的募捐箱里找食吃这样的事，才会让华尔街更丢面子。”惠特尼曝光事件神秘而真实，大大满足了人们内心深处那些不值得赞美的人性动机——嫉妒、敌意和报复。一部包含着惠特尼案件那样虚构章节的揭丑小说出版了。这部小说如果出版于 1938 年 3 月之前，那么它可能因为太假且太具宣传性而不为读者所承认。（只有一个细节破坏了这部小说的完美性：惠特尼并没有偷穷人或“公众”的钱，他只是从富豪阶级的口袋里和他们的机构里偷了钱。）似乎这整件事还不足以满足大众的口味，于是又冒出了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合适的女人——既不是呆板乏味的秘书，也不是老套的舞蹈演员，而是一个富有、漂亮、出身高贵、喜爱打猎的寡妇，她就像惠特尼一样具有傲慢的贵族气度。美国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告诉媒体，他们已经询问过她是否对惠特尼的财务状况有所了解。很明显，检察长没有问到什么。她坚决不接受媒体的采访，短暂的骚动之后，她成功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国民幸灾乐祸，随后，很快又为自己的幸灾乐祸而感到羞耻。真相曝光造成第一波冲击后不到一个星期，报刊评论转而关注惠特尼的个人悲剧，采用温和的语调写道：“就让那个可怜人有尊严地默默接受惩罚吧。”作为公众情绪的晴雨表，罗斯福总统这次头脑清醒，没有从惠特尼的失势上捞取政治资本。惠特尼以及经济保皇主义者祸害这类不上台面的事，罗斯福一次也没提过。

幸灾乐祸如此容易，而此人的行为却如此得体！

他确实如此。他固守着他阶级的道德准则，几乎可以说从来没有偏离过这套道德准则。这套道德准则属于古老的家族、良好的学前教育、绅士俱乐部和保守派华尔街。在无底的贪欲，甚至是某种形式的偷窃——这个阶层很多人的行为都与偷窃相差无几——面前，这套准则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当这种行为被抓住时，这套准则又会变得明确而不可更改。有的时候，整件事情似乎是惠特尼策划的巴洛克戏剧，他希望创造机会让自己演最后一幕。3 月 14 日，他向州法律机关的指控认罪，宣读了一份由前一份认罪声明扩展而来的 700 字认罪书。他宣读时语气清晰、坚定，几乎带着某种愉悦。判决在 4 月 11 日下达，在这 4 周期间，他被保释，并按照常规程序，接受了法庭精神诊所和监管警察的检查。诊所和监管警察的报告以

及惠特尼 3 月 25 日提交的个人破产申请表明，他的精神和行为状态与平时并无两样。

精神诊所发现，他的作风直爽而彬彬有礼，他的智力属于人群中最高的百分之一的范围。总之，没有丝毫智力低下和神经错乱的迹象。

破产申请中载明，他在城里和乡间的别墅以及人寿保险都已经被抵押了，而他引以为豪的新泽西牲口——700 只下蛋的母鸡和小鸡、艾尔夏牛群、23 头纯种巴克夏猪、20 匹良种猎马——都还没有被抵押。申请还表明，他仍然过着每月花费超过 5 000 美元的生活；他在城里和乡下的佣人一个也没减少，在乡下还雇有牧人、马夫、赛马师共 12 人。他还非常着迷于快速致富法，痴迷于诸如改进捕鼠笼子和能够解决世间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法之类已被淘汰的美国式神圣想法：他第一次在申请中披露他目前的业务不仅包括无人要的苹果白兰地和苹果饮料，而且还包括利用喷涂金属控制锈蚀的专利和“革命性的”压缩空气轴承专利。

监管警察比精神诊所说得更详尽。他发现惠特尼装束整洁，神情镇定，言语精确，还“不乏幽默”，“对自己困难处境中某些具有讽刺性的方面非常敏感”。他在报告中写道：

导致他犯罪的因素是：自负、固执、对自己金融判断力的绝对自信以及赌博的本性……他的自我主义极度膨胀，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这个全国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其对经济事务的判断被认为是专家之说的人，居然会遭遇个人失败……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勇气，也具有某种绅士的荣誉观……同时，他的处世之道一贯机敏，他还具备斯巴达式的刚毅精神，这使他能够面对目前丢人的尴尬境地，坚强地保持镇定。

这位监管警官在总结时变得格外有文采：“自负和米考伯(Micawber，《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现通常指空想乐天主义者。——译者注)式的借贷能力是他内在本性的基调。”我们也许会问，当惠特尼躲在东 73 大街的家里，由仆人和家人抵挡好奇的媒体和公众、与世隔绝地度过他最后的自由日子时，他是否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尘封的牛皮纸封面毛边版《大卫·科波菲尔》，从中寻找他的原型？

4 月 11 日是他的宣判日。上午 9:00，他离开了东 73 大街 115 号，身穿制服的男管家将他送到门口，礼貌地深鞠一躬。街上凑热闹的人看得津津有味。随行的只有他的律师塔特尔。他的妻子和兄弟原本打算和他一起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到场肯定会影响那些突然变得多愁善感的公

众,或许还会影响法官,但是惠特尼拒绝了。东 73 大街上的人群渐渐散去,但是一整天不断有高级轿车开到 115 号,向惠特尼夫人送花,似乎那儿正举行葬礼。

这次,惠特尼在法庭上终于露出了紧张的神色。当区检察官杜威要求对他做出“有分量的严厉判决”时,他面容憔悴,双手明显抽搐。精心准备的塔特尔作了长篇辩护,要求从轻发落惠特尼,他强调说,惠特尼“既没有逃避法律,也没有选择出逃……他是有骨气的……他直面他的朋友,这也许是最难以做到的”。但是,法官欧文·W. 伯翰(Owen W. Bohan)看起来无动于衷,宣判前,他严厉斥责惠特尼:“你的行为是蓄意的、有目的的,在实施这些行为时,你完全能够了解这些行为将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并为你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当他称惠特尼为“公众的叛徒”时,这位犯人又一次脸涨得通红。对惠特尼的判决是:在新新监狱服刑 5~10 年,并终身禁止在纽约州从事证券业务。

更多好奇的人目睹了惠特尼被警官带出刑事法庭送往纽约市监狱。在监狱的第一晚,通宵有看守看着他,以防他自杀,但是惠特尼并没有这么做。第二天上午,他与两个诈骗犯铐在一起,由警车送到中央火车站,在那里坐火车前往哈得逊。大约有 5 000 人聚集在候车室为他送行,但是警察绕过候车室,把车开进了行李房,从而躲过了送行的人群。在新新监狱的大门口,又有一群人聚在那里,警察再也没法躲开。惠特尼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他穿着黑色的外套,带着礼帽,看起来好像随时会习惯性地向和他铐在一起的犯人或看守借 100 美元,以维持一星期的生活。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监狱大门。

那天,4 月 12 日,恰好是他教子的生日。这个十多岁小伙子的父亲是惠特尼的老朋友,也是他在华尔街的助手。多年来,惠特尼总会按时送去礼物,为小伙子庆祝生日。直到 1933 年,每年的礼物都是一枚金币。后来,由于法律禁止持有金币,因此,礼物就改为一支支票。在这个特别的 4 月 12 日,小伙子像往年一样收到了一张支票,随支票一起寄到的还有惠特尼秘书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写道:支票是她代惠特尼寄出的,教父想说,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很抱歉以后的生日他不能再送支票了。

第二天,哈佛大学宣布,惠特尼辞去了他在经济系监督员访问委员会的职务。

三

往昔疯狂的日子里那些被嫉恨同时又受到崇拜的华尔街冒险家们现在又在哪里呢？他们之中有一个极为善变的人——驻伦敦圣詹姆斯法庭的使节，他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最终获得了证券交易无法给予他的地位和荣誉。

我们已经了解到，原先的公众敌人，本·史密斯摇身变成了华尔街体面人物的顶梁柱，但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例如，船务代理所和著名的无线电集合基金的迈克尔·J. 米亨就落入了深渊。他没有随时而变。他的一个朋友后来把他的没落归结于“未能认识到新政已经使华尔街的业务运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通过后，他还继续操纵股票，因而撞到了枪口上。1935年5月15日那个星期，他利用他所擅长的古老的藏豆骗术，几乎让贝兰卡（Bellanca）飞机公司的股价从2.5美元翻了一番。在6月10日到当年初秋，他使股价保持在5美元左右，而此时他和集合基金的其他参与者悄悄卖掉了他们在春季吃进的成千上万股股票。直到1年以后，1936年夏，米亨才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对他展开深入调查。他很快躲了起来。4个月以后，1936年11月，他出现在纽约州威彻斯特县的布卢明代尔（Bloomingtondale）医院——一所为富人提供服务的豪华私人精神病院。“他的行为没有受到限制；他已经患病一年，在这期间没有过问公司业务。”他那仍然欣欣向荣的代理所的一个合伙人这么说道。然而，那些在布卢明代尔医院见过米亨的人并没有觉得他像个病人，更别说神志有问题了。相反，人们发现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对朋友热情慷慨，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嘴里吐着雪茄烟圈，打起招呼来声音洪亮，完全是过去一副高傲自大、充满活力的模样。

1937年6月，米亨离开了布卢明代尔。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盯住他不放，就差没在医院门口迎接他。那年8月，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他在贝兰卡股票问题上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并禁止他插手任何国内股票交易。有人认为，米亨在带动公众参与股市的方面贡献最大，而现在，他在华尔街的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并不知道,对于呆在布卢明代尔的米亨是应该讽刺还是怜悯,他究竟是一个精明的、诡计多端的装病者,还是一个被时代的车轮碾碎的人。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最终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身后留下了大笔财产。他没有随时而变,只能固守着过去的一些东西。

杰西·L.利维摩尔是旧华尔街金钱机器上最悲惨的人,他注定会有凄惨的下场。在经历了股市崩盘后,他依然富有,而在经历了1930年熊市的一系列变故后,他愈加富有。1931年,他毫无理由地倾其所有大肆投机。可是,他赌错了地方。几天之内,他从国王般的富有跌入了债务的泥潭。商业赌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再也成不了百万富翁了,他所能做的就是混饱肚子。他出版了一本书,介绍对他来说已经毫无用处的股市技巧。10年后,60岁的他“奇怪地”保持着“年轻时的模样,仍然满头金发,脸上没有一丝皱纹”,这就是1907年引起皮尔庞特·摩根注意的投机新手在1938年时的模样。但是,两年后,1940年11月的一个下午,他从施贵宝(Squibb)大厦的办公室走到附近的雪利—荷兰饭店,独自坐在酒吧里,慢慢喝了2杯鸡尾酒,然后在一楼的男洗手间里对着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了结了生命。

除了一所对外宣称价值“不超过1万美元”的房产以外,利维摩尔还给妻子留下了一张充满悔恨和深情的便条,其中写道,他“厌倦了争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的生活是失败的”。这张便条暗示了某种内心的最终胜利和临终前的人性回归。第二天,《时代》在社论中为他写了墓志铭:

他做过什么好事,他又做过什么坏事,他的一生对他人、对自己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留给小说家们去说吧……他的激情推动着他向前……他所做的投机生意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就像是孩童抛硬币赌输赢的游戏那样普遍……他的身后没有留下一丝对荣耀的玷污,他亲手制造的悲剧也没有造成任何人性的灾难……他曾经工作的那条街,已经今非昔比,他的辞世为那个年代画上了句号。

四

1938年华尔街的福丁布拉斯(Forinbras,《哈姆雷特》中的挪威王子。——译者注),这个刀不血刃、性格直率、在大灾难后收拾残局的人,名

叫小威廉姆·麦克切斯尼·马丁，一个非常年轻的圣路易斯经纪人。在惠特尼落马的那次选举中，他首次进入证交所管理委员会。

惠特尼的曝光使得保守派失去了捍卫者，也失去了最后的无形资源——士气。他们的勇敢成为了笑柄；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华尔街置于尴尬境地，抵抗阵线溃败，持久战落下了帷幕。就在惠特尼被曝光的那个星期，管理委员会匆忙通过一项规定，要求所有成员公司，只要有客户要求，就必须对其财务状况做出说明。5月9日，委员会首次按照更为民主的新程序举行了选举，选举候选人实际上构成了新的管理层，因为40人委员候选名单中，只有13人是上一届留下来的，而另外27人都公开宣称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占了候选名单的绝对多数。负责选定候选人名单的提名委员会坦言，它认为它的职责就是“推动实施康威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原则”。

代替盖伊成为委员会新主席的就是马丁。年仅31岁的他已经声名卓著，今后他的名声还会更大。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其父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他是个单身汉，表情严肃，戴着一副规正的圆形眼镜，烟酒不沾，住在纽约耶鲁俱乐部的单身公寓里，毫不张扬。他是崇尚自由和知识的社会研究学院的评议员，定期到哥伦比亚上经济和政治课。他喜欢按自己的思路思考问题。在不去哥伦比亚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呆在时代广场艾斯特酒店的一间房间里，目的只是为了思考问题。在那里沉思几个小时后，他会前往这一街区44大街上的萨迪(Sardi's)饭店，要上一杯热巧克力。因此，那里的老板、服务员和顾客都称他为“巧克力先生”。午夜时分，他会给圣路易斯的父亲打一个长途电话，讨论他当晚思考的问题。

远远传来的是理查德·惠特尼的哭声，甚至还有查尔斯·盖伊的哭声！

上任后，马丁和他的委员会行动迅速。上任后一个星期，证交所采用了新的章程，其中包括康威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证交所一下就从私人俱乐部变成了绝对的公共机构。下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负责这个机构，那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领取薪金、具有宽泛执行权的总裁。5月，管理委员会委员们考虑了多个人选，其中包括一个业务经理、一个政治人物和一个出色的证交所成员。到5月中旬，委员们一致决定将这个位置交给年轻的马丁，他成为了证交所的临时总裁兼管理委员会主席。第二天，在他就任新职位时，媒体首次被允许进入管理委员会会议室。6月30日，马丁被正式选举为证交所首任领取薪金的总裁，年薪4.8万美元。他宣布，他将按照

章程的要求，立即卖出他在经纪事务所的股份以及他在证交所的席位。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道格拉斯说：“对华尔街的制裁结束了。证交所的兴盛不再与国家的繁荣背道而驰。”

华尔街与华盛顿的战争确实结束了。华盛顿及其在华尔街的自由主义朋友胜利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改革后的证交所并不完美，但它终于有了一个适于在民主社会制度下运作的构架。然而，也许正如所有进步和美德的胜利一样，有些东西丢失了。深藏在保守派们严厉外表下的某种善良和高尚丢失了。霍兰德·戴维斯，这位把惠特尼送上法庭的关键人物，一位温和而高尚的人，在许多年后如是说：“证所在改革前是个私人俱乐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证交所的大多数管理者，如沃伦·纳什（Warren Nash）、艾伦·林黎和盖尔·多米尼克等，都是体面人。他们致力于经营一个负责任的证交所、一个体面的俱乐部。他们是一些你可以与之促膝谈心的人。我不知后来证交所怎么会变得如此没有人情味。”

托马斯·拉蒙特身上体现了华尔街乃至整个国家丢失的最优秀的、最精华的东西。67岁的他仍然处在事业顶峰——他仍然是摩根公司的灵魂，仍然是伦德伯格笔下的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尽管他和其他人都知道，他和他公司的力量已经开始衰退了。然而，摩根公司还是引人注目。“无论从道德上还是能力上，摩根公司都要比华尔街的其他公司高出很多。”《时代》的记者贝尔（Bell）这么写道，他可以算是那些年最机敏的金融记者。至于拉蒙特，这个摩根公司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相反，他是一个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略有些驼背的老绅士。他迷人，文雅，永远都彬彬有礼，对人从不鲁莽。他的母亲是上游地区一个牧师的妻子。一次，她在克拉弗拉克的门廊上面对着蓝绿色的卡次启尔山（Catskills）祈祷，请求上天给她一个“安详而坚强的儿子”，而拉蒙特正是这样。拉蒙特非常喜欢意大利，他用一张漂亮的意大利古董餐桌作为办公桌，甚至在1938年还在他的办公室墙上醒目地挂着有老朋友墨索里尼亲笔签名的照片——真是怪癖！

4月下旬，正在调查惠特尼一案并在华尔街高层中间积极搜寻同谋证据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摩根合伙人叫到华尔街作证。在听证室里等待作证时，他们沮丧地板着脸，再也不像1933年那样目中无人。和他们坐在一起并且故意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最意想不到的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和关键人物约翰·韦斯利·海恩斯。长期以来，他的心灵和头脑饱受折

磨：一边是他在摩根合伙人身上发现的老派绅士式的理想，另一边是在他理智中极其重要的华尔街自由派改革。现在，他终于可以为他所崇拜的人做点事了：冒着被称为叛徒的危险，向他们表示忠诚。“我因为在听证会上与他们坐在一起而大受批评，”海恩斯几年后回忆说，“但是我和他们一样感到心痛，管他呢，我就是要和拉蒙特先生坐在一起，尽我的全力帮助他。”

很快，人们就得知，两名摩根合伙人，摩根和拉蒙特早在 1937 年底就从乔治·惠特尼那里听说了理查德·惠特尼的罪行。乔治·惠特尼对证券交易委员会那些无情的审问者保守秘密还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是兄弟，但另外两人呢？为什么恪守道德规范、拥有超群智商的 J. P. 摩根和托马斯·拉蒙特也一言不发？

摩根的证词简短、顺从，几乎是梦呓。整个过程他都闭着眼睛，好像不愿意看那些丑恶的事实——和李尔王一样，他是个被出卖的、退了位的国王。询问他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高级检察官格哈德·格塞尔(Gerhard Gessel)都不忍心逼得太紧。

接下来就轮到了拉蒙特。他坐在证人席上，而做了充分准备的格塞尔毫不留情地让他说出了所有的细节：乔治·惠特尼如何在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二找到拉蒙特；他如何向拉蒙特解释他的弟弟在退休补助基金上的困境；拉蒙特如何一口答应借给乔治·惠特尼上百万美元，以期保住乔治的弟弟、掩盖其盗用公款的行为。随后，格塞尔转到了问题的关键点上——拉蒙特的行为和他随后的沉默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含义。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称，拉蒙特在回答一连串问题时“顽固地漠视公共责任”。同时，他最后一次在美国公众面前表现出了摩根公司和保守派的所有风格——时而迷人，时而强硬，时而温暖，时而冰冷：

Q(审问者)：你是考虑你作为公民的责任呢，还是考虑你作为证交所成员公司中一员的责任，还是仅仅考虑你对乔治·惠特尼的责任？

A(回答者)：格塞尔先生……我的合伙人讲了他弟弟的需要。他认为那是一件完全独立的事，他做梦也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再次发生，我也一样。他说他要解决这件事。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Q：你是否觉得你有责任将乔治·惠特尼所说的事情告知与证交所管理机构相关的人？

A：不，格塞尔先生。我不这么认为。

Q：你是否觉得你有责任将这些事告知公共当局的人？

A：不……

Q：区检察官办公室是否知情？检察机关是否知情？

A：你是在问我问题吗？

Q：是的。

A：据我所知，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格塞尔先生，难道你希望我对乔治·惠特尼说“是的，乔治，我会帮你解决这件你认为完全独立的事情，但是我必须向区检察官告发你的弟弟”？你希望我这么说吗？

Q：难道你不认为，作为公民，你有责任向检察官报告此事吗？难道你不认为，作为证交所成员，你有责任向证交所报告此事吗？

A：哦，不，格塞尔先生，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

Q：让我们假设一下，拉蒙特先生。如果纽约市长滥用救灾资金，而你恰巧得知了此事。你是否会认为救灾委员会完全能够发现此事，而用不着你去告诉他们？

A：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格塞尔先生。我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

拉蒙特在后来的证词中说：“我对理查德·惠特尼很有信心。”格塞尔迅速抓住了这句话：

Q：在那件事（感恩节前的会谈）发生后，你对理查德·惠特尼还有绝对的信心吗？

A：是的。3月初发生的事我是在国外听说的，当时我感到无比震惊。

Q：即便你在1937年11月23日就知道理查德·惠特尼偷了100万美元的证券，你还是对他很有信心吗？

A：格塞尔先生，我从来没有用过……你刚才用的那个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有用过……

Q：你认为那是一种不明智或不合适的行为？

A：是的，先生。

Q：你知道那是违法的？

A：当然，但是你用了“偷”这个词。我从来不认为理查德·惠特尼是个贼。我所认为的是，他有了大麻烦，他不适当地、违法地使用了证券，他的哥哥打算帮他还清欠款。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说过，即便是在乔治找过我之后，我对理查德还是很有信心。当我在国外听说了事情后，我感到极为震惊。他一直在欺骗他的兄弟，欺骗他的合伙人，欺骗他的妻子和公众，这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哦，那真是——真是难以置信。



Q:那么,拉蒙特先生,你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愿意面对 1937 年 11 月的事吧?

A:(没有回答。)

Q:你的回答是否是:即便在你听了乔治·惠特尼告诉你的事之后,你还是不愿意相信?

A: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格赛尔先生。我不想冒犯你,但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如果我是个律师或者聘请了一个律师,那么我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这么做。我不是个律师,也没有咨询过律师,我只是按照心灵的指引行事。

这就是托马斯·拉蒙特,我们这个故事中最伟大的人的证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理查德·惠特尼是个贼;他对理查德·惠特尼所做的事极其震惊,不是因为这些事产生的公共影响,而是因为惠特尼欺骗了他的兄弟、他的合伙人和他的妻子;即便在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之后,他还在墙上挂着墨索里尼的照片,因为他们是老朋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按照心灵的指引行事。

五

在新新监狱,狱警回喊:“所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或星期二进来的人和惠特尼先生走出牢房!”“惠特尼先生”的牢房和其他犯人的没什么两样,但是一直会有其他犯人和警卫走过来向他脱帽致敬,并问他要自传。他没有滥用他受到的尊重。他的处世原则让他对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嗤之以鼻,而对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彬彬有礼。对于新新监狱的生活来说,这种处世原则绝对有益无害。惠特尼最初被分配做扫除工作,他动作迅速而且不卑不亢;2 个月后,他被指派在监狱学校内执教;不久之后,他成为了监狱学校棒球队一垒手。根据记录,1938 年 6 月 25 日,在监狱学校和新新监狱其他部门举行的棒球赛上,他在三次击球中打出了两次安全打,并且无可挑剔地完成了接球。

5 月,曾经庄严神圣的 2 号交易台和惠特尼办公室里的其他物品一起被搬上了拍卖台。这座交易台是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以 205 美元/股的价格买入钢铁股的地方,1930 年以后又被安放在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

办公室大厅里展示。如今,2号交易台只拍卖了5美元。

对于这个毁了自己生活的人,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他那无比忠诚的哥哥乔治最终还清了他所欠的和盗用的钱。他的蒸馏酒公司在他破产后不久也悄无声息地破产了。在新新监狱,他一直是个“模范囚犯”,最终成为了新囚犯的东道主,在新囚犯入狱的时候向他们分发香烟;在够格获得假释的第一个月,即1941年8月,他就获得了假释。他在城里的住宅和乡村的地产已经因长期抵押而被拍卖了,因此,他前往科德角(Cape Cod)和他的亲戚住了一段时间,那儿距离阿尔贝拉号的登陆点不远。他后来的生活平静守法,甚至似乎还非常有价值,他的妻子格特鲁德·谢尔登·惠特尼(Gertrude Sheldon Whitney)一直与他相守在一起,其他的细节不属于本书描写的范畴;1968年,他年已80,在一次晚餐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士听说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双眼熠熠发光的老人”就是理查德·惠特尼时,吃惊不小。他的背景、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拥有的亲戚关系都表明,只要他愿意,即便再铺张浪费,他也会非常富有;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令人们深深思索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931年对美国生活的描写:“尽管传教士和信徒们宣传着各种各样的美德……但我们共同认可的是一种勤勉、热忱、公平、自主和自足的生存方式。”

1938年夏,惠特尼的老教师和仰慕者、心痛万分却仍然忠心耿耿的恩迪科特·皮博笛前往新新监狱看望惠特尼。这位格罗顿学校的校长曾经出席过他的另一位学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两次就职典礼,继续为罗斯福祈祷,并给予他忠告。罗斯福在向皮博笛表示感谢时曾说,学生时代的回忆让他有力量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职责。现在,在与另一位老学生不那么愉快的会面中,皮博笛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他问这位老学生是否需要他的帮助。

“是的,”惠特尼回答说,“我需要一只一垒手的左手手套!”

世界
经典译丛

资本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致 谢

在众多为本书出版向我提供了各种帮助的人士中，我想特别感谢：阿诺德·伯哈德(Arnold Bernhard)、亨利·比林斯(Henry Billings)、菲利普·克拉夫林(Philip Claflin)、霍兰德·S. 戴维斯、约翰·迪堡(John Diebold)、路易斯·加兰蒂尔(Lewis Galantiere)、佩里·E. 豪尔(Perry E. Hall)、约翰·韦斯利·海恩斯、艾略特·简维(Eliot Janeway)、伊丽莎白·简维(Elizabeth Janeway)、亨利·S. 摩根(Henry S. Morgan)、皮尔斯(E. A. Pierce)、杰弗里·波特(Jeffrey Potter)、托马斯·O. 瓦格(Thomas O. Waage)。

致
谢



资料来源

第一章

Sidney Sutherland, "The Mystery of the Wall Street Explosion," *Liberty*, April 26, 1930.

Edmund Gilligan, "The Wall Street Explosion Mystery," *The American Mercury*, September 1938.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World*, *New York Sun*, and *New York Herald*, September 1920.

Alexander Dana Noyes, *The War Period of American Finance*, 1908—1925 (New York, 1926).

George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From War to Depression*, 1917—1929 (New York, 1947).

Robert Sobel, *The Big Board* (New York, 1965).

Robert K. Murray, *Red Scare: 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 1919—1920 (Minneapolis, 1955).

"Wall Street's Bomb Mystery," *Literary Digest*, October 2, 1920.

第二章

Barnie F. Winkelman, *Ten Years of Wall Street* (Philadelphia, 1932).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New York, 1934).

Gustavus Myers,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revised edition,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New York, 1936).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1925.

They Told Barron: The Notes of the Late Clarence W. Barron, edited and arranged by Arthur Pound and Samuel Taylor Morse (New York, 1930).

New York Times, 1920; also November 24, 1928, December 1, 1928, and November 27, 1940.

New York World, 1920.

McClure's magazine; *Automobile Yearbook* 1920.

Motor magazine, 1919—1920.

第三章

Winkelman, *Ten Years of Wall Street*.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Frederick Lewis Allen, *Only Yesterday* (New York, 1931).

Frederick Lewis Allen, *The Great Pierpont Morgan* (New York, 1949).

Edwin P. Hoyt, Jr., *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 1966).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930—1939, edited by Nigel Nicolson (New York, 1966).

Frederick Lewis Allen, *The Lords of Creation* (New York, 1935).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Thomas W. Lamont, *Henry P. Davison: The Record of a Useful Life* (New York, 1933).

Harold Nicolson, *Dwight Morrow* (New York, 1935).

Ferdinand Lundberg, *America's 60 Families* (New York, 1938).

Thomas W. Lamont, *My Boyhood in a Parsonage* (New York, 1946).

Current Biography, 1940, article on Thomas W. Lamont (New York, 1940).

Joseph Wechsberg, *The Merchant Bankers* (Boston, 1966).

Stephen Birmingham, *"Our Crowd": 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 (New York, 1967).

Sobel, *The Big Board*.

In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Civil Action No. 43—757; Opinion of Harold R. Medina, C. J.

(1953).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article on Otto H. Kahn, Vol. XXI, Supp. 1 (New York, 1944).

E. Digby Baltzell, *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New York, 1964).

Heywood Broun and George Britt, *Christians Only* (New York, 1931).

Nicolson, *Dwight Morrow*.

James P. Warburg, *The Long Road H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averick* (New York, 1964).

Frank Parker Stockbridge, "The Problem of the Downtown Church,"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31, 1928.

第四章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New York, 1966).

Joseph Stagg Lawrence,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Princeton, 1929).

John T. Flynn, *Security Speculation* (New York, 1934).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Flynn, *Security Speculation*.

Allen, *The Lords of Creation*.

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pursuant to Senate Resolution 84, 72nd Congress, and Senate Resolutions 56 and 97, 73rd Congress; Report No. 1455, Senate, 73rd Congress, 2nd Session, 1934.

Winkelman, *Ten Years of Wall Street*.

William Z. Ripley, *Main Street and Wall Street* (Boston, 1927).

Alexander Dana Noyes, *The Market Place* (Boston, 1938).

Dana L. Thomas, *The Plungers and the Peacocks* (New York, 1967).

Earl Sparling, *Mystery Men of Wall Street* (New York, 1930).

Sobel, *The Big Board*.

Edwin Lefèvre,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Market Operator* (New York, 1931).

Josephson, "Sell'em Ben," *The New Yorker*, May 14—21, 1932.

Richard J. Whalen, *The Founding Father* (New York, 1964).

Claud Cockburn, *In Time of Trouble* (New York, 1956).



J. 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paperbound, New York, 1963).

第五章

New York Times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926.

John Moody, "The New Era in Wall Street,"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28.

Allen, *Only Yesterday*.

Lester V. 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Central Banker* (Washington, 1958).

Literary Digest, May 12, 1928.

Lawrence,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Boston, 1957).

J. K.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1961).

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Allen, *The Lords of Creation*.

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Matthew Josephson, *Infidel in the Temple* (New York, 1967).

Sobel, *The Big Board*.

Noyes, *The Market Place*.

Cockburn, *In Time of Trouble*.

Alec Rackowe, *All the Millionaires* (New York, 1967).

Graphic Stocks 1924 — 1935 (F. W. Stephens, distributor, New York, 1949).

New York Times, August-September-October, 1929.

第六章

Trinity Church Parish Year Book and Registry, 1930.

Cockburn, *In Time of Trouble*.

Schlesinge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Allen, *Only Yesterday*.

Josephson, *Infidel in the Temple*.

Edwin Lefèvre, "The Little Fellow in Wall Street,"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uary 4, 1930.

——，“The Bigger They Are,”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uary 11, 1930.

Hoyt, *The House of Morgan*.

Winkelman, *Ten Years of Wall Street*.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Thomas, *The Plungers and the Peacocks*.

Sparling, *Mystery Men of Wall Street*.

Whalen, *The Founding Father*.

Warburg, *The Long Road Home*.

Josephson, “Groton, Harvard, Wall Street,” *The New Yorker*, April 2, 1932.

Richard Whitney, “The Work of the Stock Exchange in the Panic of 1929,” speech to the Boston Association of Stock Exchange Firms, June 10, 1930.

Caroline Bird, *The Invisible Scar* (New York, 1966).

Edward Angly, *Oh Yeah!* (New York, 1931).

Broadus Mitchell, *Depression Decade*, 1929—1941 (New York, 1964).

Herbert Hoover,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41* (New York, 1952).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n the Matter of Richard Whitney, Edwin D. Morgan, Jr., F. Kingsley Rodewald, Henry D. Mygatt, Daniel G. Condon, John J. McManus, and Estate of John A. Hayes, individually and as partners doing business as Richard Whitney & Company, pursuant to Section 21 (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three volumes, Washington, 1938).

Mitchell, *Depression Decade*.

Flynn, *Security Speculation*.

Sobel, *The Big Board*.

Hoover, *The Great Depression*.

Flynn, “Bearing Down on Short Selling,” *Collier's*, April 16, 1932.

S. J. Woolf, “The Man Behind the Ticker,” *World's Work*, March 31, 1932.

“Whitney's Defense of Wall Street,” *Literary Digest*, April 23, 1932.

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William E. Leuchtenbe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New York, 1963).

第七章

Raymond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New York, 1939).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Boston, 1959).

Hoover, *The Great Depression*.

Herbert Feis, 1933: *Characters in Crisis* (Boston, 1966).

James P. Warburg, *The Money Muddle* (New York, 1934).

——, *The Long Road Home*.

Leuchtenbe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Mitchell, *Depression Decade*.

Newsweek, November 25, 1933.

Literary Digest, December 9, 1933.

Warburg, *The Money Muddle*.

——, *The Long Road Home*.

Charles O. Hardy, *The Warren-Pearson Price Theory* (Washington, 1935).

G. F. Warren and Frank A. Pearson, *Prices* (New York, 1933).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John M. Blum, *From the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Jr.* (Boston, 1959).

New York Times, May 25—26, 1938.

Schlesinge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Feis, 1933: *Characters in Crisis*.

Hoover, *The Great Depression*.

Noyes, *The Market Place*.

Papers of George Harrison,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第八章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33, and June 1, 1963.

Ferdinand Pecora, *Wall Street Under Oath* (New York, 1939).

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Hoyt, *The House of Morgan*.

George Harrison papers, March 28, 1933.

T. L. Stokes, *Chip off My Shoulder* (Princeton, 1940).
Leuchtenbe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Flynn, *Security Speculation*.
Pecora, *Wall Street Under Oath*.
Joseph Alsop and Robert Kintner, "The Battle of the Market Place,"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11 and June 25, 1938.
Schlesinge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Wall Street's Raid on the New Deal," *Today*, April 21, 1934.
John T. Flynn, "The Marines Land on Wall Street," *Harper's*, July 1934.
Josephson, *Infidel in the Temple*.
S. E. C. in the Matter of Richard Whitney, esp. Vol. I, pp. 10, 60—63, 72—76.
Time, March 21, 1938.

第九章

Hoyt, *The House of Morgan*.
Robert Bendiner, *Just Around the Corner* (New York, 1967).
John Brooks, *The Seven Fat Years* (New York, 1958).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36.
Schlesinge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34 and September 25, 1953.
Whalen, *The Founding Father*.
Frederick Rudolph, "The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1934—194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50.
George Wolfskill, *The Revolt of the Conservative* (Boston, 1962).
Marquis W. Childs, "They Hate Roosevelt," *Harper's*, May 1936.
David C. Coyle, *Ordeal of the Presidency* (Washington, 1960).
Baltzell, *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Lundberg, *America's 60 Families*.
James P. Warburg, *Hell Bent for Election* (New York, 1935).
——, *The Money Muddle*.
——, *The Long Road Home*.
Alsop and Kintner, "The Battle of the Market Place."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Rudolph L. Weissman, *The New Wall Street* (New York, 1939).

New York Times, 1935.

第十章

S. E. C. in the Matter of Richard Whitney.

Alsop and Kintner, "The Battle of the Market Place."

第十一章

S. E. C. in the Matter of Richard Whitney.

第十二章

S. E. C. in the Matter of Richard Whitney.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0 and 12, 1938.

Time, March 21, 1938.

New York Times, 1938.

Thomas, *The Plungers and the Peacocks.*

Weissman, *The New Wall Street.*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1937, November 29 — 30 and December 6, 1940.

Elliott V. Bell, "The Decline of the Money Barons" (in *We Saw It Happen*, edited by Hanson W. Baldwin and Shepard Stone, New York, 1938).

S. E. C. in the Matter of Richard Whitney.

Newsweek, May 16, 1938.

George Santayana, *The Genteel Tradition at Bay* (New York, 1931).

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华尔街的发展历史以及市场心理学悖论的当代投资者来说，《戈尔康达往事——1920~1938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是一部必读的经典著作。

戈尔康达曾是印度东南部的一座城市，传说穿过这座城市的人，都会变得富有。在马可波罗的年代，戈尔康达是世界大型钻石市场之一。戈尔康达附近的钻石矿出产了希望钻石、凯瑟琳大帝的黑色奥若芙和英国王室的皇冠钻石。

本书首次出版于1969年，并于1972年、1997年、1999年重版。全书记录了华尔街在战争期间惊人崛起、全然崩溃和痛苦新生的生动的编年史，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牛市的无情、贪婪、蛮勇和欣喜，1929年大崩盘前的绝望，大萧条时的苦难岁月，以及罗斯福的新政。

作者布鲁克斯以其权威、充满神韵而又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介绍了摩根合伙人等美国新式“贵族”如何像对待他们的私人狩猎场一样专横地操控华尔街。贯穿故事中心的是狂妄自大的理查德·惠特尼，这位贵族式的摩根经纪人、证交所总裁及保守派的首领，冠冕堂皇之下却是一个落入负债陷阱的“百万富翁”，最终因挪用证券钁铛入狱，展现了华尔街如何从美国贵族的宫殿圣地演变为各种平民力量角逐的场所。

的确，戈尔康达熠熠生辉的财富，造就了许多王国，也毁灭了许多王国。今天，戈尔康达已是一片废墟……这也许象征着，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对财富的渴望和我们实际所掌握的财富都是暂时的。

本社网址：www.sufep.com

ISBN 978-7-5642-0251-4



9 787564 202514 >

定价：33.00 元

汇添富基金——长期投资致胜的选择